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于沛·主编

彭卫 杨艳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

于沛·主编 彭卫 杨艳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3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于沛主编;彭卫,杨艳秋著.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61-6585-0

I. ①马… II. ①于…②彭…③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0099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郑彤
责任校对 王楠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6
字数 398千字
定价 13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秦汉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出版学术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

杨艳秋，1971 年生，四川彭县人。历史学博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序

庞卓恒

于沛教授主编和主笔、并约集国内诸多名家协力完成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不仅卷帙浩繁，而且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为什么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的论述范围涵盖了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个发展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初创之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再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一个更加宏阔壮伟的新高潮。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恰在此时面世，这个历史时刻本身就赋予了它一个里程碑的地位。

1976年，在20世纪国际史坛享有盛誉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编写一部对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加以综合概述的著作。他在一批国际著名史家协助下，历经两年完成初稿，又经集体讨论后定稿。该书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丛书之一，于1978年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就是杨豫先生翻译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巴勒克拉夫在该书中对唯物史观和它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创和发展历程做了简略但颇有深度的回顾，值得在此引述。

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

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①。……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是1928—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②。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務，正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③

我之所以在此大段地援引巴勒克拉夫的论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想在这里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④。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他在这里阐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这就是巴勒克拉夫说“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

① H. S.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8, pp. 226 - 227——巴勒克拉夫原注。

② [法] J. 格伦尼松：《当代法国史学》，载《1949—1965年的法国历史研究》（*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n France de 1949 a 1965*），1965年版，第21—22页——巴勒克拉夫原注。

③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2页。引文中提到的C. 韦伯斯特的话，见他所撰《历史教学和研究变化的五十年》，载《历史协会，1906—1956年》（*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6—1956*）——巴勒克拉夫原注。

④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注③。

思主义的时期”这句话包含的真理所在。这也正是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的人们的认识规律。

巴勒克拉夫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历史。再次，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又次，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①

巴勒克拉夫把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影响归纳为上述五个方面，实际上这个时期唯物史观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上述五个方面。巴勒克拉夫的归纳实际上可说是这个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的即时记录。读了于沛教授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我们对此会有更多体会。

那么，为什么到20世纪末它逐渐走向了低潮呢？这需要我们认真做一番总结。我深信，通过这样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然会迎来一个空前宏阔壮伟的新高潮。

2015年2月9日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史学

- 传统史学的转型和新史学的发展 (1)
- 第一节 史学变革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1)
 - 一 传统史学的变革 (1)
 - 二 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3)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8)
 - 一 “史界革命” (8)
 - 二 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10)
 - 三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共同趋向 (15)
- 第三节 流派纷呈的史学界 (23)
 - 一 西方思潮的涌入 (23)
 - 二 史学流派与趋势 (26)

第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 (32)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早期译介与唯物史观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 (32)
 -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 (32)
 - 二 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 (36)
- 第二节 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 (43)
 - 一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对唯物
史观史学意义的认识 (44)
 - 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54)

三	李大钊的史学实践——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66)
第三节	瞿秋白、蔡和森、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71)
一	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71)
二	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78)
三	李达《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基中的作用	(86)
四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92)
第三章	1928—193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成长	(96)
第一节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早期史学观念	(97)
一	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模式	(98)
二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观念	(101)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108)
一	概念的提出	(108)
二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110)
第三节	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	(118)
一	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	(119)
二	几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132)
三	关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	(134)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背景和脉络	(141)
一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复杂背景	(141)
二	论战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	(145)
第四章	1937—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	(149)
第一节	历史分期讨论的深化	(149)
一	殷商社会的性质	(151)

二 西周的社会性质	(156)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	(164)
第二节 批判与论辩	(168)
一 对秋泽修二侵华史观的批判	(168)
二 对胡适实验主义历史观的批评	(171)
三 关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	(176)
四 批判“战国策”派	(179)
五 批判复古倾向	(183)
第三节 中国通史的编纂	(191)
一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及其历史观	(194)
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及其历史观	(197)
三 翦伯赞《中国史纲》及其历史观	(208)
第四节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 史学观念	(218)
一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	(218)
二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侯外庐的史学思想	(226)
第五节 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	(231)
一 历史研究的理论	(233)
二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236)
三 历史学的价值	(238)
四 历史规律	(240)
五 历史的关联性	(244)
六 阶级和阶级分析	(252)
七 传统史学	(254)
八 史料	(258)
九 历史知识的普及	(263)
第六节 毛泽东的历史观	(265)
一 毛泽东早年对历史的认识	(265)
二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初步形成	(268)

三	两个核心与六个原则：毛泽东历史观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72)
四	毛泽东的中国历史研究	(291)
结语	理论的壮阔与研究的意境	(305)
附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大事记(1898—1949)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57)
索引	(388)
后记	(401)

第一章

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史学

——传统史学的转型和新史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中，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应当沿着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道路进行追寻。

第一节 史学变革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一 传统史学的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逐渐走向解体，就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忧虑和深思，要求当世学风的变革。脱离现实、日趋烦琐的考据学日益受到批判，由庄存与复活的《春秋》公羊学在嘉道年间崛起并逐渐走向兴盛，治史成为一时风气，形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繁荣。

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剧变，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在“开眼看世界”和“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影响下，晚清史学开拓出了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领域。无论是研究的范围、内容乃至重心，都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了传统学术格局，踏上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史学研究视野由内向外，出现了梁廷枏《海国四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王韬《法国志略》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述。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在撰著意识上，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①。

其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姚莹《康輶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著作“以考古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②，由叙沿革转向重实用，涉及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这两股史学思潮的奔腾、激荡，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③

此外，还出现了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等与现实密切相连的当代史著和鸦片战争史著，史学研究的重心从古代转向当代。

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史学，表现出史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密切结合，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学被称为“经世史学”。但这种经世，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彰善瘅恶”“彰往查来”“资以借鉴”的史学经世，其中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史学救国”的思潮，反映出19世纪后期史学领域内发生的鲜明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以往限于传统社会，以帝王将相为考察对象的

①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页。黄遵楷（1858—1917），字庸达（亦作幼达），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黄遵宪幼弟。清光绪举人，曾任清末驻日外交官。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有《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传世。

③ 瞿林东：《开眼看世界——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旧的史学格局被打破了，史学的研究中心由古代转为现今，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由国内拓展至国外，中国史学开始面向世界，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出现的最早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晚清史学的变革是在外力压迫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史学进行自身调整的结果。但这些变革，主要由治史指导思想的根本变化带来，“对于历史学本身，还没有提出除旧立新的改造方案”^①。或者说这些变革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作的内部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史学的模式。^② 更大的变革的到来，是此后“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天朝大国”的门户，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东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史学理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其最初并不是通过史学本身，而是夹杂在与史学理论有一定关系的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译著中带入。鸦片战争后，西方社会学，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是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历史发展总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和方法很快就被引入了史学领域，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成为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19世纪末，这一

^①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2页。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山东省金乡县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贡献卓著。

^②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新兴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1882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斯宾塞（其序言中称为文本守）所著《肄业要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斯宾塞思想的重要开端。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精深微妙，繁富奥衍”，称其“宗天演之力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还极力推扬说：“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①

达尔文的进化论最初通过传教士的译作引入中国。187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中国学者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就提到了“物种可变”说，此后傅兰雅《格致汇编》、丁韪良《西学考略》中也有一定的介绍，但当时这种理论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的姿态出现，还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严复。他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也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严复介绍说：“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他还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到人类社会中，指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②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普及读物。译文先是在《国闻报》上分期刊出，1898年，又以《天演论》为名，正式出版。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并未采取忠实于原著的态度进行直译，而是有意识地将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法则”糅合在一起，“取便发挥”，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大力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中对循环论和天道不变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判，反复强调宇宙和社会处于进化发展之中，“世道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严复（1854—1921），原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再改名复，字幾道，晚号癸廌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译作汇刊为《严译名著丛刊》，具有启蒙意义。

② 同上书，第16页。

必进，后胜于今”^①。《天演论》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② 进化论的传播，使国人对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顾颉刚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③

此外，孔德以来社会学倡导的实证方法、比较历史方法以及广泛吸取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主张，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正式冲击，始于19世纪末斯宾塞《肄业要览》一书的流传。其中对旧史学进行的系统批评，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④ 20世纪初年，中国迎来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第一次高潮，一些新型报刊如《湖北学生界》《留学译编》《汉声》《学报》等都有栏目专门介绍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1859—1936）《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1839—1931）等人有关论著编译的《史学概论》，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1859—1945）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史

① 严复：《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94页。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被誉为国学大师。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开创者之一。一生著述颇丰。

④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5—153页。

学理论著作，在1903年便有六种版本。1903年，英国学者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即主要来自这部著作。这部著作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

20世纪初，各国文明史学，特别是日本文明史学的传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明治初年，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文明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编写文明史的热潮。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在史学界高树“文明开化”的旗帜，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①1897年，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中提到了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略史》、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等文明史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东籍月旦》，介绍日本的学术书籍。其中提到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文明史》，家永丰吉与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永丰秀树所译的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多部日本人著译的“文明史”，并倍加推崇。他盛赞《万国史纲》“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故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②。称基佐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批评中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因而“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认为“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③。

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译介日本文明史著。自1901年到1903

^①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②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96—97页。

年，中国人编译或翻译的日本文明史有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书室译，普通学书室1901年12月版），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刘陶译，广智书局1902年4月版），《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2月版），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万国史纲》（邵希雍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译，上海竞化书局1903年5月版），《东洋文明史》（萨幼实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8月版），高山林次郎《西洋文明史》（支那翻译会社译，文明书局1903年8月版），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译，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等多种。^① 其中既有中国史著，也有世界史著。这些以近代史学观念编写的历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和战争史，将历史书写范围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文学、美术、建筑等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史学主张探讨历史因果关系，从世界史的角度叙述国家文明的发达状况，给国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文明史传入后，被视为一种新的史学体裁，梁启超称之为“史体中最高尚者也”。谢无量则说：“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著者交错相，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主张采用“文明史体”论述历史“盛衰兴坏之故”以及文明变迁之大势。^② 文明史学的传入，对中国近代的新史学思潮起到了推进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人将此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并称，认为：“支那向无文明史之体，迩来东西新思想渐次输入，乃有著译文明史者。若饮冰子《新史学》等，实可谓史界革命家也。”^③

近代传统史学的变革与西方进化论、史学理论的输入，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①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② 谢无量：《万国史纲·序》，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第210页。

^③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第127页，转引自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42页。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一 “史界革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联合各地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向光绪皇帝痛陈时局,发动“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随着《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的出版和创刊,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的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伴随着维新思潮和变法运动被推向高潮,思想界掀起了批判封建旧史学的浪潮。

批判随着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展开。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且会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①189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他认为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之类,才是“史裁之正轨也”^②。同年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他重申有君史、国史、民史之别,同时批评二十四史说:“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764页。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姓、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光绪廿一年(1895)进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页。

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①

1898年2月，徐仁铸在《湘学报》撰文说：“中国正史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②同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倡导以报纸彰民史：“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③1899年，王国维代罗振玉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翻印本作序，认为若以进化论观点衡量中国旧史，唯司马迁《史记》略与相近。“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④

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发现，这显然是用西方的史学观念衡量中国传统史学的结果，而对国史、民史的呼唤表明，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时代呼唤着能够适应社会变革的史学，也必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出来承担起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的重任，梁启超为此慷慨陈词：“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而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⑤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

①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② 转引自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

③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9页。

④ 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⑤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①

在这里，他区分了“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历史研究目的的不同，实际上是区分了传统的旧史和他所期望的新史在性质和内容上的根本不同。1902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大声疾呼：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②

振臂一呼，回声四起。有识之士改革旧史学的思想在20世纪初汇成了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新史学思潮。

二 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影响深远，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已成为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陈黻宸、夏曾佑等新史学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之中，在各个方面探索新史学之道。“他们史无前例提出‘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之类响亮口号，掀起一个求‘新’的热潮，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③，在当时的学术界激起层层波澜。在众多的新史学倡导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③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一面继续宣传维新思想，从事政治活动，一面如饥似渴地涉猎西方近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为维新变法寻求新的理论依据。他自称当时“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①。根据自己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梁启超对维新变法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其知识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一时期，他最主要的思想便是“新民”，那就是开民智、兴民权、振民气，在史学领域里便是提倡“新史学”，进行“史界革命”。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分为“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记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八节进行叙述，这原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1902年他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阐发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叙论》中，他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不过一二权力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家一姓之谱牒”^②。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更是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二十四史为“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他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此又造成三大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这使得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无法发挥如同欧美史学一样的作用，“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无论是对旧史学批判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对社会和学术界产生的影响，都是时人无法相比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西方历史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构建起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视为新史学形成的标志，梁启

^①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超也成为了我们所公认的“新史学”奠基人。

破旧是为了立新。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表现在他对史学的性质和任务、史学功用、史学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的新认识上。

(一) 史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 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上作了全新的回答: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 谓所研究之事物也; 主观者, 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 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 其主体, 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 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自注, 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 则虽有佳书, 亦不过为一家之言, 不得谓之史)

梁启超明确地提出, 史学应该是主体和客体结合而成, 如果割裂二者, 便是“有魄无魂”, 就不成其为史学。由于史学的这种性质, 史学活动不仅需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实, 还需要表达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见, 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因此, 梁启超引入了历史哲学的概念: “是故善为史者, 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 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也就是说, 史学应当是历史事实与历史哲学的统一。这样的论述在我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梁启超认为, 明确什么是史学, 什么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欲创造新史学的先决条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 界定了新史学的三个层次:

其一, “历史者, 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①。他论述说: “进化者, 往而不反者也, 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此类者, 谓之历史学。”也就是说, 新史学的本质应当以进化论为指导, 叙述考察种种进化现象。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其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①。梁启超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人群进化的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历史最应关注的事情是人群，“欲求进化之迹必以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②

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③。如前所言，这里的“公理公例”指的是历史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强调：“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④

（二）史学之功用

中国传统史学多从垂鉴与资治的角度来说明史学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史学“官学”化的反映。梁启超从强化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史学的作用，他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甚至指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从理论上阐述了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将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结合，寻求“公理公例”即历史哲学中的理性的认识。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论述说：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⑤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7—10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⑤ 同上书，第11页。

这是表明，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社会文明的促进，这种促进来自于从“公理公例”中得到的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三) 史学研究方法

其一，研究历史需从整体出发。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认为必须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历史，指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那些“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是“客观所当取材者”。

其二，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梁启超认为，各种“科学”，近代以来史学以外的诸学科与史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他详细列举说，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籍者”？他主张：“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①

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梁启超对“新史学”的界定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原则和研究视角，他把西方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提出建立历史哲学的任务，明确指出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他关于新史学的论述，已经涉及历史观、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在历史认识上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何兆武先生评价说：“严格来说，中国近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1页。

代史学思想是到了梁启超的手里才正式奠定的。”^①

三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共同趋向

20世纪初，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回响。《新史学》发表不久，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批判旧史为“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沉迷梦醉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期望中国史学“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上，以照耀东亚大陆”^②。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力主“诚宜于历史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③。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的《中国新史学》例言中写道：“中国学科夙以史学最为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④旧学传统较深的王舟瑶亦在其《中国通史讲义》中指出：“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貽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⑤这说明20世纪初，“新史学”的概念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过程中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形成了如下的共同趋向：

其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

^① 何兆武：《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历史理性批判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3页。

^② 《政艺通报》，1902年8月18日，第12期；9月2日，第13期。转引自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三）》，第1436页。

^③ 《新世界学报》，1902年9月2日，第1号，“史学”，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④ 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⑤ 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学术史》“论读史法”，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王舟瑶（1858—1925），字星垣，一字玫伯，号默庵、潜园、墙东居士，浙江黄岩人。近代学者、纂辑家。

研究。

20世纪初以前,中国传统史学一直为各种复古论和历史循环论所束缚,^①往往认为,历史是复古的、循环的、退落的,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此后大道衰微,历史越来越退化。19世纪末,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入转变了国人的历史认识观念,进化论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理解新史学、观察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受到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认识论上,梁启超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进化观。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在《新史学》中,他指出,宇宙间有两种现象,一为“去而复来,止而不进”的循环现象,一为“往而不返,进而无极”的进化现象。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即言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他对中国千百年来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循环论者未曾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发展大势,只看到一个小时段的进退、涨落,是误将螺旋之状以为圆状。由此,梁启超界定了历史发展的三个层次,认为史学最终应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同时的章太炎也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修史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③。正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曾鲲化亦认为,历史学精神就是阐明社会、人类的进化之理,他说:“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

^① 如董仲舒“陈陈相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孟子“一治一乱,治乱相嬗”说、邹衍“五德终始”说、邵雍“元会运世”说等。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③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八》,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一生著述甚丰,被尊为经学大师。

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①

其二，转换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民史替代君史。

新史学思潮中，传统史学以王朝更替、一姓兴衰为核心的政治史模式，是批判的重点，新史学倡导者们认为这是传统史学不能满足时代要求的主要原因，以至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充满了“中国无史”的论调。^② 新史学思潮中，新式知识分子们坚决摒弃以一家一姓为中心的旧史学，主张以国民作为史学的价值核心。他们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国民，而不再是帝王将相，因此必须建立起“民史”。梁启超指出，封建旧史家著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③，以帝王为中心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批判“帝王中心论”的同时，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正统观进行了批判，他强调真正的“统”应当是“国民”：“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④ 陈黻宸在受到《英国人民简史》影响后，撰写了《独史》一文，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⑤ 在《独史》中，他提到要作“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及任侠、高士、列女、一家、义民、盗贼、胥吏等列传。强调对平民社会

①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曾鲲化（1882—1925），字转九，笔名横阳翼天氏。湖南新化人。辛亥革命后，曾于国民政府铁路、交通部门任职，著有《中国铁史》《交通文学》《政余随笔》等。

② 如，邓实：“呜呼，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史学通论》）马君武：“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法兰西近世史序》）1902年，《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上的《私史》一文，指出中国旧史皆为“一人一家之谱”“甚矣中国之无公史”；1903年，支那少年（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等）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

③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⑤ 陈黻宸：《独史》，《陈黻宸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4页。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晚年更名芾。浙江瑞安人，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学家和政治人物。

生活的考察。邓实认为史的精神是民，“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民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充栋之著作而无一史矣”。他在《政艺通报》上发表《民史总叙》和《民史分叙》，对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和意义、民史和民权的关系、民史专史的编修方法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提出从种族、言语文字、风俗、宗教、学术、教育、地理、户口、实业、人物、民政、交通等方面撰写“民史”。

其三，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以新史学拯危救亡。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产生于民族危亡、国家衰弱的社会大背景下，倡导史学革命的新史家无不在新史学中寄寓着他们团结民心、开启民智、复兴国家、培养民族精神的愿望，因此史学的社会作用被他们大力强调。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陈黻宸在《独史》中写道：“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无一物则已，有物则有史”，“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①。1902年，马叙伦对史学在诸学中地位的论述也引人注目，他说：“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史之为用亦大矣哉！故一国者之有史，为一国文明之所寄；一人者之有史，为一人术业之所存。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乏之学矣。”^②在新史学倡导者们看来，史学是一种救亡的工具，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提出，将史学的革新提高到关乎民族危亡的高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

^① 陈黻宸：《独史》，《陈黻宸集》，第569页。

^② 马叙伦：《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壬寅第1期“史学”，1902年9月2日。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又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余杭）人。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政治人物。

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曾鲲化撰写新的中国史，也是本着振奋国民精神的目的。他陈言道：“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②史学功能的扩张表明，在危机中产生的新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迹。

其四，吸纳科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史学。

随着近代“科学”的引入及“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中国人开始以西方“科学”的眼光来衡量旧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历史研究要“求得其公理公例”，史学要借助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等学科的“公理公例”，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建立科学史学的问题，因此，许冠三以梁启超为中国“科学史学”的开端。当时除梁启超外，还有不少人也将史学与科学相联系，汪荣宝批评旧史学撮录数千年的故实，只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他指出：“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研究者之目的也。”^③曹佐熙叙述其《史学通论》的撰述宗旨说：“与吾国助学之士究心史道，探邃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方，以自成科学。”陈黻宸认为史学中应有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

①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② 曾鲲化：《中国历史首编》，东新译社，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③ 《译书汇编》，1902年12月10日，第9期。

者，尤不足与兴史学。”“不佞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①可见以科学为标准改造旧史学，是当时新史家的理想选择。

其五，以新的体例，编撰新式史学著作。

改革旧体史书，编纂新的史著是新史学思潮的实践，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等人都设计了中国通史的编纂方案。1900年，章太炎借鉴传统史学，熔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综合体裁，编一部中国通史。其中包括五表、十二典、十记、九纪、二十五别录，以典志体容纳心理、社会、宗教等诸方面内容，十二典为种族、民宅、浚筑、工业、食货、文言、宗教、学术、礼俗、章服、法令、武备，“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②。梁启超的中国通史设计为政治、文化、社会生计三大部。陈黻宸设计的中国通史“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③，废除本纪，无论帝王、平民，一律编入列传，以示平等。包括八表、十录、十二传，“皆先评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

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批新体中国通史著作。曾鲲化《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中代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年由上海东新译社出版上卷，1904年续出下卷。这部著作在编纂方式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体裁，“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于项，项附于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内容上广泛涉及政治、教育、学术、外交、军事、地理、宗教、习俗、实业、财政、交通、文化艺术

① 陈黻宸：《京师大学堂讲义》，《陈黻宸集》，第676页。

② 章太炎：《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

③ 陈黻宸：《陈黻宸集》，第569页。

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淬厉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并致力于探讨社会进化大势和盛衰兴灭之原因。“每编尾必综论其时代之社会与国民之情状，使读者按其系统之活脉，以吞纳四千年历史上舞台之万因万果。”由于有这些全新的特点，《中国历史》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国粹学报》认为此书“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浙江潮》更赞扬是书“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①。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后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最早采用章节体编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原拟出版五册，但只出了三册。全书分4章、170节，运用进化史观，按照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特点，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自草昧以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世，三世又划分为七期，即“七小时代”：上古之世分为传疑（太古三代）和化成（周中叶至战国）时代；中古之世分为极盛（秦至三国）、中衰（晋至隋）和复盛（唐朝）时代；近古之世则分为退化（五代宋元明）和更化（清）时代。“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从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历史，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古今演进。据俞旦初考证，20世纪初编写的新式中国史书，能历久不衰，被史学界推崇50年以上的，只有夏曾佑的这部《中国古代史》。^②

刘师培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所述内容自上古至西周末。作者在“凡例”中阐明，此书编写，“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③也就是说，他论述的重点是历代政体之变化、制度改革之大势、种族分合之始末、社会阶级之进化，以及历代学术的发展演进。

① 《浙江潮》之《绍介新著》，1903年第7期。

② 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续），《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③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产生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社会危机的背景下，是史学界对中国民族危亡的情势和西方学术双重冲击的回应，可以称作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在这种环境里酝酿建立的新史学，又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它表现为反思传统史学，对史学的宗旨进行新的规范，对史学的内涵进行重新发掘。而作为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新史学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脱不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关系。新史学倡导者们“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双重目的，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新史学的发展。

与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变革的晚清经世史学不同，这时的新史学已经创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学者们试图创建的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核心，以国民活动为主体，社会化、科学化的中国近代新史学。杨翼骧先生指出：“近代新史学与传统旧史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判断其是否建立的标准有两点：一是应当形成比较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二是出现按新观念、新体系编撰的比较流行的历史著作。根据这两个条件，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正式建立，是在1902—1906年之间。”^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新史学走向了高潮。但这激扬一时的史学风气却并没有发扬下去，从1906年至1915年，新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高涨之后，渐渐步入低潮。一方面，这是因为借助外来观念的新史学在中国还缺乏深入的学术基础，新史学的观念虽然已深入人心，但晚清时代现代学术因素的发展还不充分，人们对新史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从日本学界得到的对现代史学概念粗略了解的这一表面层次。另一方面，新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应当时救亡、启蒙思想而兴起，重在“史界革命”的层面上，当社会变革的热点集中于立宪和辛亥革命，热衷于直接的政治运动比倡导史学更加有效。再者，民国建立后出现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倒退，复古思潮大行其道，客观上制约了新史学思潮的继续发展。^②

^①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2页。

^② 参见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第62—76页。

“新史学”思潮的停滞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和反思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2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建设新史学的局面。而这个新史学，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现代史学，从而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史学界。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①。

第三节 流派纷呈的史学界

一 西方思潮的涌入

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倡导下，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为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予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在猛烈抨击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还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③许多国外学者，如美国杜威、英国罗素、德国杜里舒、印度泰戈尔等人相继应邀来华讲学，传播他们的历史哲学观点。20年代前后，西方自19世纪以来有影响的哲学思潮，如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3）的实证主义、德国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的新康德主义、法国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生命哲学、德国杜里舒（Hana Driesch, 1867—1941）的新生机主义、美国杜威（Johan Dewey, 1859—1952）的实用主义、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1号，1919年1月。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罗素(W. Russel, 1872—1970)的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德国赫尔德(G. Herder, 1744—1803)的历史哲学、德国朗普勒西特(G. Lamprecht, 1856—1915)的文化史观、德国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文化形态史观、美国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的“多元史观”等,纷纷被引进到中国思想文化界。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

如潮水般涌入的思想和学说,在西方历经了百年的发展,此时却被同时引进,这些纷繁驳杂的西方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均有反映,有的直接影响到当时史学流派的形成。如杜威从1914年4月来华讲学,在中国逗留了两年,行程遍及11个省,他主张的实验主义经过学生胡适等人的宣传,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之一。胡适宣称:“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①他接受了杜威的思想,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由他奠基的“实证主义史学”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传入中国,其基本宗旨是取消康德对客观世界必然性和因果律的承认。梁启超晚年即是因为深受李凯尔特这一观念的影响,进而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中否定了他曾大力宣扬的进化论观点。再如朱谦之接受了杜里舒的新生机理论,把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归结为人的“本能”。他的《历史哲学》一书的基本观点即是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翻版。梁漱溟读了柏格森《创化论》后,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宣传其观点,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精神”或“意欲”。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卷2,第199页。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先驱,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在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

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比较重要的是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法国朗格诺瓦（Charle V. Langlois, 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arle Seignobos, 1854—1942）的史学方法论以及德国兰克（Leopold V. Ranke, 1795—1896）的史学。^① 鲁滨逊的《新史学》由何炳松推广，他从鲁滨逊的“多元史观”出发，认为影响历史事件的诸多因素相互影响而又互为因果，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直接影响到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②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则打上了兰克史学的印迹。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批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著述被翻译过来，其来源地也从日本转向欧美。这批著作主要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2）、何炳松翻译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6），李思纯翻译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1926），张宗文翻译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1930），向达翻译美国班兹的《史学史》（1930），黎东方翻译法国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薛澄清翻译美国弗林的《历史方法概论》（1933），陈石孚翻译美国塞格利曼的《经济史观》（1928），何炳松与郭斌佳合作翻译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董之学翻译班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陈韬翻译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1937）等。此外，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班兹的《西洋史进化概论》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都译成中文出版。^③ 除直接翻译外，中国史学家也编辑出了一批史学理论著作，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卢绍稷《史学概要》（1929），吴贯因《史之梯》（一名《史学概

^① 参见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② 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③ 参见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与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论》，1930），罗元鲲《史学概要》（1931），周容《史学通论》（1933），胡哲敷《史学概论》（1935），李则纲《史学通论》（1935），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1933），杨鸿烈《史学通论》（1939）等著述相继推出。这些论著在探讨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理论，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供学史者参考。

这一时期，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受到了较为普遍的重视，大量的译著和以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所写的“新论著”，呈现出一种众流争渡、相互碰撞的局面。正如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中所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致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非吾国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也。”^①

二 史学流派与趋势

1940年，张荫麟在他的《中国上古史纲》中回顾过去史学的发展，写道：“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来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沉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②其中所言“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说明20世纪

^①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何炳松（1890—1946），字伯臣，又字柏丞。浙江金华人，近代历史学家。有《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历史研究法》《通史新议》《浙东学派溯源》等著述。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社会科学名著选读》等。

^② 张荫麟：《中国上古史纲·自序》，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版。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上半期，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代。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至五四前后开始，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景观。西方思潮的冲击，民主和科学观念的发展，本国文化遗存和新史料的发现，相互的作用，拓展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范围，形成了众多的史学流派。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流派的划分，因有按照学术宗旨、学术阵地、学术思潮、阶级性等不同的标准，所以众说纷纭。吴怀祺先生曾经对此作过总结，他说：“一种是以某些学术特点来区分，分成疑古、信古和释古派；一种是以某种杂志的作者群的学术思想倾向来区分，如《古史辨》的疑古派、《新潮》的新潮派、《甲寅》的甲寅派、《战国策》的战国策派、《食货》的食货派等。还有的人把整个近代史学家分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马克思派别。还有人在论近代史学进程中，提出几个派，如考证派、科学派、史料派等。也有的在着重讲思潮的前提下兼论史学流派，把整个近代史学分成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洋务思潮下的史学；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疑古、考古和实用主义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① 近来，侯云灏主张与其几种划分标准莫衷一是，不如“就事论事，把事实先摆出来，等待将来继续研究”。本着这个原则，他将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流派分为新史学派（梁启超）、古史辨派（顾颉刚）、南高派（柳诒征）、考古派（王国维、李济）、国粹派（刘师培、邓实、章太炎）、食货派（陶希圣等）、守旧派（钱穆）、史料学派（傅斯年）、生机史观派（朱谦之）、生物史观派（常乃德）、战国策派（亦称文化形态学派，林同、雷海宗）、马克思主义史学派12个学派。^② 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如动力派、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学衡派、文明史学派，等等，可谓众流竞进，色彩纷呈。

这些众多的流派表明，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学者们对史学建设路

^①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② 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径的不同选择。随众多的史学流派而产生的众多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李大钊等人,在五四以来的史学界,皆能影响一方,开一时风气。

(一) 梁启超的“史之改造”

1918年,梁启超退出政坛,1919—1920年,游历欧洲归国后,重新回到书斋,潜心著述。他已经不再提起“史界革命”,还评价自己世纪之初的思想为过于“卤莽疏阔”。在20年代,他相继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关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等著作。梁启超治学不谨守一家之法,一生不断追求真理,他的史学观念亦在变动之中。他先是主张“史之改造”,将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法相结合,建立“客观的史学”。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系统论述了关于史料研究的种种问题和方法,即体现了他当时的思想。此后,他又专注于历史学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注重考证、史料的搜集和别择只是治史的捷径,只选此捷径而走,“史学永无发展”。他主张治中国史,应当“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①。

(二)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王国维是古史新证的杰出代表。他倡导学术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并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他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的治史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运用这一方法考古证史,结束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从文献到文献,在神话传说中兜圈子的格局,为古史研究开创了新的途径,也因此促进了当时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王国维的考证方法和传统乾嘉学术的理念不同,“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① 在《王静庵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②。王国维生前的声誉虽然远不及梁启超显赫，但死后却成为学术领域内“新旧、左右各派”共同推崇、信服的宗师。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一生，说他研究学问的方式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却是封建式的，他留给我们的知识产品“好像是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战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③。

（三）胡适实用主义史学

胡适对历史学的贡献，不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而在于他所倡导的史学方法论。他吸收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要点在于重证据。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验室的方法，二是历史的方法，三是存疑的方法。他写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为用实验主义研究历史作了示范。他在《实验主义》（1919）、《井田辨》（1919—1920）、《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1919—1921）、《国语文法的研究》（1921）、《红楼梦考证》（1921）、《学术季刊发刊宣言》（192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等文章中，有许多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论述。他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十字箴言，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对形成“实验主义史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派”都是在他构筑的模式下产生。

（四）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

①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卷首《王国华序》，山海书店1996年版。

②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卷首《陈寅恪序》。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传统的“中国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一代垒造起来的。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这一创见，当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童书业、吕思勉等人纷纷支持，并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先秦至两汉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考辨，推动了史学界的疑古风气。这一批有影响的学术名家，后来被称为疑古学派或古史辨派。与此同时，刘澹黎、胡堇人、柳诒征等则撰文反驳，引起了古史论战。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的论战文章中，又补充了四条考订古史真伪的原则，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将有关古史论争的文章和信函编辑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古史辨》前后共出7册，收文约350篇。

（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

唯物史观自五四以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一书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作了明确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出的史学理论著作。

史学领域的流派化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打上的特有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全面展开。但尽管这一时期的史学界流派纷呈，各展其姿，不可否认的是，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外，影响一代史学走向的流派并不多。我们发现，中国史学的趋势，20世纪二三十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

代，在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唐人书卷、内阁大库档案、各民族文字和各地吉金文字等六大史料发现的基础之上，以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盛极一时。20 世纪 40 年代后，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一系列的文化较量，成为了中国史学的主流。

第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早期译介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潮而涌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风靡欧美，也已在俄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分的国家广泛传播。相比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对较晚，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后方才来到中国。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伴随着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入而进入中国。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波及中国。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当时旅居巴黎的王韬在他编译、整理的《普法战纪》中，以见闻的方式把巴黎公社的概况介绍给中国读者。1873年至1882年年初，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使用了“共产主义”的音译“康密尼党”“康密尼人”，将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和“贫富均财之说”。1898年夏，基督教设于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出版了《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原名《社会主义史》，是英国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著作。

为了迎合变法维新的思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该书在第七章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经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其中写道：“共倡定律与革命二义，势力最伟，学说亦锋利无前。凡国人之以文明称者，莫不奉为矩矱。”^①“综观马说，盖为研究近世生计之性质，而据古史以释资本之制度也。”^②这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③也是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出现于中国。1899年2月至5月，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124期连载了节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颌德《社会进化论》一书的《大同学》（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其后，广学会将《大同学》印成单册，书中将马克思视为“百工领袖”。在第三章《相争相进》中指出：“今世之争，恐将有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德（即马克思——引者注），主于资本者也。”其第八章还提到德国有“讲求善民”学者，“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斯”^④。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发介绍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学说。其介绍途径，一是以报纸和杂志为依托；一是通过翻译国外，主要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普及读物来实现。

据不完全统计，十月革命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有《民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浙江潮》《政艺通报》《新世界》《天义报》《衡报》《新世纪》《民立报》《复报》《江苏》《东方杂志》《国民日日报》《正义报》等十余种报刊。^⑤涉及的知识分子，既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家，又有朱执信、

① 《泰西民法志》，《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一辑（上）》，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26页。

② 同上书，第134—135页。

③ 成章：《中国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译著——〈泰西民法志〉》，《历史知识》1989年第4期。

④ 《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52、620页。

⑤ 参见郭卿友《试评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史革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马君武、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有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

当时出版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主要译自日本学者的著作。仅1902年到1903年，翻译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书籍就有村井知至《社会主义》，幸德秋水《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久松义典《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社会主义概评》，西川光次郎《社会党》，大原祥一《社会问题》等多种，其中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都有引述。

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唯物史观的个别原理在译文和报刊中屡有体现。

1903年2月，《译书汇编》第11号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还附录了《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附马克思著作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五本书。其中说道：“自达尔文发明天择物竞生物进化之理，直抉世界事物发达之源。马克思之徒，遂指出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密切之关系。达尔文虽非唯物论者，然其学说实唯物论之类也。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又说：“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①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君武在这里所说的“唯物论”虽非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唯物史观，但“以唯物论解历史学”，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特点，所以这段文字被视为中国学者最早提及唯物史观的记载。

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3号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列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①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2月15日，第11期。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又名同，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祖籍湖北蒲圻，生于广西桂林。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的情况，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要点。其中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梁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朕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济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了也。”他将《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名言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①

1907年，由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天义报》第15号刊登了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文后按语强调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1908年，《天义报》第16—19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部分内容。刘师培（申叔）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欲明欧美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认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是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同一期，还译刊了英国社会党领袖海因秃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在识语中写道：“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变迁，而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济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使得所根据。因格而斯（恩格斯——引者注）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同时指出：“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②

^① 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列传》，《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页。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字执信。浙江萧山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② 《天义报》第16—19四册合刊，1908年春。

在当时，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不过犹如满天繁星中的几个瞬间即逝的闪光，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和注意。其间原因，可能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说：“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特别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随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一起，在我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二 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这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成功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先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改变国家命运上的价值意义，这使得正在热切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已被推上了先进思想的前岸，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潮。时人评论说：“以我国思想界之迟钝，输入之西洋学说，殆莫不经过多少阶级而始得其一知半解之理想，而社会犹反对之。今不数年，而马克思之名喧传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②

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是零星地夹带于社会主义思潮中传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特征。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的十年间，公开出版的马、恩、列、斯译著达80多种，其中陈望道译《共产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杨端六：《马克思学说评》，《太平洋》1920年第2卷第7号。

宣言》(1920)、瞿秋白译《列宁主义概论》(1925)、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1925)、《国家与革命》(1927)、李一氓译《哲学之贫困》(1929)、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卷(1930)、吴黎平译《反杜林论》(1930)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这十年中,出版翻译外国学者研究唯物史观的专著也有李达译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吴念慈译俄国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1929)、郑里镇译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1930)等近十种,至于发表探讨唯物史观的论文,更是数量可观。^①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李大钊、杨匏安、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者中的第一人。早在1913—1916年,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把这些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行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提供了这种外部条件。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烈赞扬了十月革命的成功,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这表明,在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李大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此后,他便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他以《晨报》《新青年》等刊物为宣传阵地,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翻译和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文章。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办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相继译刊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来自日本刊物的文章。其中,1919年5月5日至8

^① 参见叶桂生《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② 梁柱等著:《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③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陈博贤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该文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二:其一,社会组织变迁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上经济事情的变迁”,这就是“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视为重要根本的东西。其二,凡一个社会有一定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将决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关系。“以经济上的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由各方面的社会组织,左右一般个人的思想感情,等等。”这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文章,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①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

同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一共登载了七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即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兆熊(即顾孟余)《马克思学说》、刘秉麟《马克思传略》、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和转载自《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的三篇文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和陈博贤的《马克思的奋斗生涯》)。李大钊为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新青年》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实际上寄托了他的期望,他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指《新青年》——引者)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②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

^①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29页。

义观》一文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著作。这篇长文中，李大钊阐述了唯物史观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先后发表《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展开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还将唯物史观带到了大学，搬上了讲台。1920年，在李大钊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①。1920年起，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此后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也涉及对唯物史观的评述和介绍。他为武汉华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所作《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等讲座亦以唯物史观为指归。

杨匏安是中国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当时思想界曾有“北李（李大钊——引者注）南杨”之说。1919年11月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了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这与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差不多同时问世。文中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②值得注意的是，杨

^① 北京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页。

^② 杨匏安：《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杨匏安（1896—1931），原名锦涛，笔名匏安。广东香山县人，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中执委，中共中央委员。

杨安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上的重要意义。指出：“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昔之学者，咸谓人类特长，在有灵性，能驱驾万类；故以为人类文化史实由于人类之精神所成；人类的精神，不随历史而变化，故文化的根本方向亦无变化，于是立一定之法道，作文化之标准，以一时代一地方之形式，而范围各时代各地方的现象，此其弊在消极的固使多数人不能进步，在积极的仍发生无限痛苦也。然马克思之论文化史，谓不成于人类的精神，而成于物质的境遇。从表面观之，各种文化，似皆出自人类之努力，惟实际上终由物质而决定。”^①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大贡献。1920年前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答蔡和森》等介绍与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1922年7月，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是陈独秀论唯物史观的代表作。文章将马克思的学说概括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部分。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作了专门介绍。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是科学而不是空想，“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

^① 杨安：《杨安文集》，第170—171页。

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①。针对当时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一种自然进化说，从而与阶级斗争革命说相矛盾的看法，陈独秀指出：“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②

除上述三人外，蔡和森、李达在中国早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表现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上。蔡和森在1919年年底留法期间，先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其日以继夜翻译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多达百余种。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其中于1918年秋至1920年夏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当时翻译为郭泰）]一书，附有李达所写的《唯物史观要旨》一节，这部著作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国内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党创办的杂志《建设》和《星期评论》也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传播。一批国民党理论家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等人，都曾经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据统计，1919年8月至1920年4月的半年多时间，胡汉民主编的《建设》杂志登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类文章20余篇（次），占全部篇目的15%—20%。1919年6月至1920年6月一年间，戴季陶负责的《星期评论》登载这方面的文章有50余篇，与同期的《新青年》相比，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相上下。^③1920年，《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河上肇撰、苏中译的《见于〈资

^①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4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页。

本论》的唯物史观》(摘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和第3卷第1号发表苏中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二、三章)作为唯物史观的间接文本,被后来一个时期内运用唯物史观的人们大量采用。^①国民党在宣传唯物史观中最具影响的人物是胡汉民(1879—1936)。1919年10月、11月、12月,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等文章。《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举出了以唯物史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的六大要义,《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一文则用唯物史观解析了家族制度。《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颇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详细地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因为这个学说(唯物史观——引者注)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②。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唯物史观的九种非难,胡汉民一一进行了批驳,这对于中国人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传播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改造社会、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88年,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简明地叙述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

^① 参见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转引自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广东番禺人。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

本原理”，他明确指出，这个基本原理即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①唯物史观传入前，中国最先进、最进步的历史观为进化史观，它所包含的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科学方法等因素被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继进化史观之后，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中国人带来了第二次历史观念的巨大变革。人们认识到：“‘唯物的历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人类的历史，必以动的社会为对象，以唯物史观的观察法去研究他，然后才可成为科学的历史学。”^②1920年，作为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作了分析和评价，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③

第二节 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宣传和广泛传播，并自觉地将它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的准备。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和《晨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② 李清荫：《唯物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页。

③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报》等进步刊物的编辑或主任编辑。1918年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图书馆主任。自192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史学、经济、法律等系,以及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女子高师等院校授课。他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北京地区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7年4月6日被捕,28日壮烈就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的史学论著,除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专著外,尚有辑为《史学思想史讲义》的讲义和多篇论文。身后辑有《守常文集》(北新书局,1949)、《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等著述。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地介绍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证了唯物史观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思想武器;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实践范例。

一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对唯物史观史学意义的认识

李大钊宣传、阐释唯物史观的文字,除了那篇举世闻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五、六号,1919年5月、11月)外,还有写于1919年的《阶级竞争与互动》(《每周评论》,1919年7月6日)、《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物质的变动与道德的变动》(《新潮》,1919年12月1日),写于1920年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1月)、《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1920

年12月), 写于1923年的《圣西门的历史观》(《社会科学季刊》, 1923年8月)、《研究历史的任务》(《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3年11月), 以及他用作讲义的《史学思想史讲义》(1923—1924年)和可称为“第一本新史学理论”的《史学要论》(1924年)。^① 这些论著中, 李大钊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 还论述了唯物史观的进步性及其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一) 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介绍和阐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 李大钊对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作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 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他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三个部分的统一: 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 亦即历史论, 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 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 即经济论, 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 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 即政策论, 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 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李大钊认为, 唯物史观是这三个部分的基础, 因为“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 去考他的社会主义, 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 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这篇文章中, 李大钊摘录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 进行归纳和分析, 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 “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 简单说, 凡是精神上的构造, 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 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 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 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 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 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 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 与那不能适应他的

^① 参见徐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九章《李大钊: 经济构造决定精神构造》, 岳麓书社2003年版, 第297页。

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命运，也是万万不能发生。”^① 在这段文字中，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作了明确、详尽的归纳，明确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人们不可能主观随意地离开生产力去改变社会组织。

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简要的概述：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名称，乃是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Engels）在一八七七年开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里，都含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克思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未用历史这个名辞，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

《史学要论》中的这段文字意在运用唯物史观说明历史与社会的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186页。

关系，他认为必须从社会的基址，亦即经济的构造来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①

根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李大钊一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②因此在李大钊看来，“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他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③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李大钊亦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④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李大钊亦指出：“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他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⑤李大钊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显著地位，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在实际运动的手段上，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一定时期内的历史范畴，并非与人类历史相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57页。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35页；《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80页。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78页。

④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14页。

⑤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43页。

始终。马克思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所以，“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①。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他一开始就准确而深刻地宣传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阶段，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认识上有过分注重经济的倾向，李大钊也是如此。他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还说“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②。他对唯物史观，也存在理解上的不足，如他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认为“与前世纪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类似”，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为生产力”和“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他提出，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的说法，“终觉有些牵强和矛盾的地方”。他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条件读到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如李大钊，他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大多是根据日本学者研究的第二手资料。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时信仰唯物史观的青年人往往过分看重经济方面，与他和马克思在过去的著作中对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强调不够有关。^③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前，国内刊物上尚未出现如此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李大钊无愧为中国唯物史观传播的“第一人”。除了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释外，他还分析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他说：“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不在18世纪以前产生，也不产生于今日，是因为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宗教政治势力全然扫地，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46页。

②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37页。

③ 参见张学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374页。

而资本主义经济支配当时的社会，“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所以，“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对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更有全面的认识。

（二）李大钊对唯物史观史学意义的认识

李大钊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位“夙研史学”的历史学家。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色彩纷呈，西方200年来相继形成和发展的史学观念、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起，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②。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哲学来指导中国史学研究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如同近代中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李大钊也将寻求真理的目光，注视于西方，在深入研究了近代西方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之后，他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个心路历程，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昭然可见。

首先，他通过对中外历史上历史观的批评，倡导树立“新史观”。李大钊认为，历史观是认识人生的准则，“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③。为此，他对中外历史上的历史观做了梳理和概括，他指出：“自康德以还，各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其中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这多种的历史观可以依照四种的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52页。

②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07页。

分类来概括：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李大钊认为：“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①李大钊指出，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生动无己的，根据人生的史观、社会的史观、物质的史观、进步的史观解释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个人的史观、精神的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史观解释的历史，“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楼，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远”。因此，“根据新史观、新材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他还指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②这里，李大钊身当其责，热切呼唤的新史观，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其次，他通过论述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思想和历史哲学的学术发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必然。从李大钊1923年至1924年所著《史学思想史讲义》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用意。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由11篇文章组成，其目录为：

^①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09—310页。

^② 同上书，第308—311页。

- (1) 史观
- (2) 今与古
- (3) 鲍丹的历史思想
- (4) 鲁雷的历史思想
- (5)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 (6) 韦轲及其历史思想
- (7) 孔道西的历史思想
- (8) 桑西门的历史思想
- (9)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
- (10)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 (11)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通过这一系列的文章，李大钊厘清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线索，将众多欧洲学者的历史思想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博丹（Jean Bodin，李译为鲍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李译为韦轲）、法国历史学家勒卢阿（Louis LeRoy，李译为鲁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理论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李译为孔道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李译为桑西门）等人的历史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同时，还将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贯穿其中，以此论证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其内在发展的合理结果，为欧洲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发展的必然。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总结说：“唯物史观自鲍丹（Bodin）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 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Thiery、Mignet 及 Guizot 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条、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关键，信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至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①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这种“特有的”唯物史观继承了近代西方优秀的历史思想，修正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根本缺陷，并加以创见和发明。因此他肯定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由衷地赞誉：“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②。又说，“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③。

其次，论述了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及于人生的影响，提倡以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指导史学研究。为了论述唯物史观于史学上的重大意义，李大钊专门写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文中，他批评了亚里士多德、莱辛、赫尔德、黑格尔等“唯心的”解释历史的理论。他指出，旧史观解释的历史，以为历史不外是政治、外交上的史实，“专述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是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由于旧的唯心史观全用神学的方法解释历史，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采夺”。“一般的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④ 正是因为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79—480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67页。

③ 李大钊：《史学概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75页。

④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41页。

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所取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与唯心史观全不相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便利，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①。

李大钊指出，两种解释历史的方法于人生带来的影响也是绝对不同的。旧历史的方法寻求社会情状于社会本身之外，让人茫然无所适从。新历史的方法“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动力和指导力”。旧历史的方法给人以懦弱无能的人生观，新历史的方法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鉴于此，李大钊满怀热情地呼吁：“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是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② 这“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进行解释的新生的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建立在他的信仰之上，也是他深入研究东西方历史理论的理性选择。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研究》一文中对历史的解释是：“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记录也。”^③ 同年10月，他在《Bolshevism 主义的胜利》一文中亦称：“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④ 这些都尚带有唯心史观的倾向。但当他选择了唯物史观后，就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贯彻于他的史学实践，从而超越了他前此的史学认识，并在历史研究和史学探索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开启了道路。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41页。

② 同上书，第543页。

③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研究》，《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8页。

④ 李大钊：《Bolshevism 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110页。

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李大钊相继写成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史学与哲学》(1923年4月)、《史学概论》(1923年11月)、《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11月)、《史观》(1923年12月)、《历史与人生观》(1923年12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3年12月—1924年7月)等一系列史学理论的专文。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史学要论》,这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共六章,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史学问题。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旗帜鲜明地主张应用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历史,他指出:“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李大钊的这一切活动和著作,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作用等,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史坛的界标。

李大钊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可从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 关于历史本体的基本问题

1. 历史内容的界定

关于什么是历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研究最为根本的问题。李大钊在1920年的《史观》一文作了这样的回答:“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①他对历史的理

^①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08页。

解和界定，可以从历史与历史纪录、历史与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

(1) 历史与历史纪录。关于历史是什么，李大钊首先廓清了将历史等同于历史纪录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活的历史”与“死的历史”两个概念。李大钊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卷帙、册案、图表、典籍等虽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但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只是“死的历史”，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在许多死的纪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存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所下的定义，实际上是为历史的纪录下的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生活的历史”^①。那么什么是真的历史，活的历史呢？李大钊认为，真的历史、活的历史则“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以外，有他的永续的生命”。真正的历史，即“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总之，用一句话来解释，“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②。

(2) 历史与社会。由上而进，李大钊又论述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解释说：“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③李大钊引申为：“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性质相同，内容相同，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而已。他指出，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正因为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种现象都应为历史的内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5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57页。

容所包含，“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①。这样看来，人类的历史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的广大的活动，因此，李大钊批评了以往史学家“只认政治的历史为历史”的错误观点和中国旧史一家一姓的谱系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李大钊对历史所下的定义是：“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②

2. 历史的特征

李大钊关于历史的特征的论述，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1)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唯心史观的史学家认为，历史是人们心中有意识的东西，可以依照人的主观意识进行描绘和打扮。李大钊则认为，历史是“实在的过去”。“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瞬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的存在。”^③ 意即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物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定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无法作出丝毫的改变，“不能照原样再作他们”^④。我们所能改变的，是我们认识的历史，那“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历史的这种客观性意味着历史绝非可以任人打扮。

(2) 历史是延续前进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他说：“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62—363页。

③ 同上书，第360页。

④ 同上书，第290页。

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历史“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①。他形象地比喻：“宇宙的命运，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②又说：“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已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谢，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③

(3)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亦是完全可以认识的。恩格斯指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④。李大钊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称为“法则”或“理法”，他说：“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现它，确定它了。”这种“理法”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找到了“历史的根本立法”即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他论述说：“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⑤相对适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普遍规律而言，特殊的规律则只是适应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区域、民族和国家，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支配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法则也不相同，所以“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⑥。

3. 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生活上大变动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08页。

②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175页。

③ 李大钊：《清代通史序》，《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0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92页。

⑥ 同上书，第378页。

的理由究竟如何?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回答是根本对立的。唯心的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往往是从“外部的社会构造”去寻,而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于人类的精神,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帝王将相的活动。唯物史观则“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那些“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①。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后原因,“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②。那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就将居于主导地位。从唯物史观出发,李大钊认为历史是由一般人来创造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③。因为“一个智识的发觉,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觉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④。他说:“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⑤“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⑥

4. 历史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

1922年,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提出了“实在的事实”和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78页。

②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38—539页。

③ 同上书,第541页。

④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09页。

⑤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17页。

⑥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43页。

“历史的事实”两个概念，他认为，实在的事实，“只是历史长途中的一趟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①，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又再次作出解释，他说，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是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②李大钊在这里所论述的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实在的事实即是客观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它只是一趟过去，不可重现。历史的事实则是我们主观认识的历史，亦即通过解喻而得到的历史认识。李大钊非常重视史学家的主体认识作用，他说：“所谓历史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③即言必须给历史的内容作出科学的解释。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

正因为历史的事实是解喻中的事实，是由后人评价和认识的，李大钊提倡对旧历史进行改作和重作，这是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④。所以“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而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⑤。

李大钊区分“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史家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了这种需要“解喻”的“历史的事实”，就需要史学家运用科学的历史观，不断去发掘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一思想，深深启发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在李大钊之前，没有人能明确区分历史过程和历史记录这两个概念，李大钊对历史的认识和界定，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达到了

①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10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59—360页。

③ 同上书，第360页。

④ 同上书，第361页。

⑤ 同上书，第362页。

同时代人的最高认识水平。

(二) 史学认识论

1. 历史学

关于历史学，李大钊纠正了中国史学界以历史记录就是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错误，他认为虽然“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记录”，但这绝非是历史学。在对历史内容理解的基础上，李大钊明确指出，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或者说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所以他对历史学的定义是：“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①

李大钊指出，史学发展的路径，最初只是沿革的研究，到现在才渐知为推理的研究，它一方面要将事实组合起来，另一方面则要弄明白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从这一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他说：“今日的历史学，既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之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经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② 在李大钊看来，史学是一门可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不同于历史记录的地方就在于此。

2. 历史学的任务

在明确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历史学的科学性之后，李大钊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的任务。因为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所以史学的“重要职分”是“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对特殊事实必须进行观察和征验，核查它的正确性。也是史学的要务。但具备这两点还是不够，所以李大钊指出：“然史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③ 这是说史学家研究历史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65页。

② 同上书，第366—367页。

③ 同上书，第367页。

先要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然后须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李大钊指出，史学的要义有三，一曰察其变：“社会的进展不已，人事的变迁无常，治史者必须即其进展变易之象，而察其程迹，始能得人类社会之真象”；二曰搜其实：“欲求人类进变之迹，苟于个个现实发生的事件，未得真确之证据，则难免驰空武断之弊”；三曰会其通：“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锁，互有因果关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见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①“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这三层意思便是：其一，全面、整体地对社会进行动态的考察；其二，搜求个体事件的真实证据；其三，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从历史的事实中发现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

3. 历史学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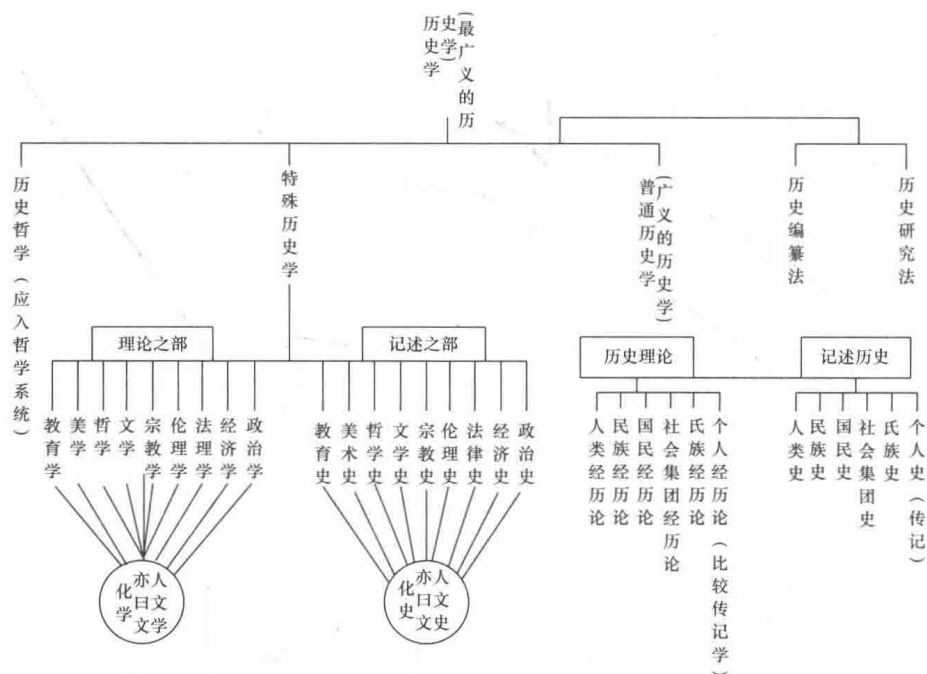
李大钊认为，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记述历史、历史理论二部。记述历史是对历史事实的整理记录，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是对历史事实的一般的理论研究，是科学的工作。李大钊既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经济为中心去考察整个人类的生活，是整个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均为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记述历史可分为个人史、氏族史、社国民史、团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历史理论则是对这六大部分史的理论研究。李大钊认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必须“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②。李大钊非常重视理论研究，他说：“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历史理论……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强调，是针对中国当时的史学发展状况而言的。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运用新的方法，以史料考证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史学，史学家们“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

^① 李大钊：《报与史》，《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43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76页。

研究，似尚置之度外”^①。

这两大部类是普通历史学系统，李大钊还构建了一个“最广义”的历史学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三大部类，各部类自有子系统，其分类如图2—1所示：



在这一历史学系统里，历史哲学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普通历史学与特殊历史学又下辖“史”与“论(学)”两部分。普通历史学考察的是人类或人群的经历与命运，特殊历史学考察的是人或人群活动的效果。

4.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李大钊将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分为六类：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71页。

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字书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李大钊认为史学与文学、哲学、历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而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最为李大钊所关注。

李大钊认为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及历史哲学。史学、哲学二者之间是一种双向作用的关系。他首先立足于史学，探讨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1）哲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2）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3）就历史事实阐明一般的原理必须借重于哲学；（4）史学研究法和一般理论学或知识哲学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李大钊又以哲学为中心，探讨了哲学和史学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哲学是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那么作为宇宙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也属于哲学研究的对象；研究人生哲学或历史学，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的观察方法和考量方法也可以用到哲学中；研究哲学，必须以具备一般的史识；研究哲学家的学说，必须要研究哲学家的传记；哲学史也是一种历史研究，所以须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史。由此史学和哲学“实非漠不相关。二者于研究的性质上，有相辅相助的关系”^①。这种相互作用表明，从研究对象上来讲，史学和哲学有一定的重叠。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史实和材料是哲学研究的依据。哲学所提供的一般原理和理论是史学研究的指导，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②。有时史学研究“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有时尚不能不求助于一般哲学”^③。

阐明史学与哲学的联系，李大钊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区别。他认为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③ 同上书，第396页。

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是比较历史学上所研究的更普遍，更渊深，是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史学是研究人生即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史学研究是科学的考察，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自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其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法理者”^①。

5. 史学的功用

关于史学的功用，中国传统史学多集中在“资治”、“垂鉴”的层面，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以史学为“爱国心之源泉”。李大钊则从史学于人生的影响去探索史学的功用，从一种全新的角度，作了说明。李大钊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正的学问，否则不能说它是学问，或是知识。他对史学于人生的影响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现代史学可以陶炼吾人对科学的态度和认知能力。李大钊认为，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两点，一是尊疑，一是重据。这两点，正是史学家最可宝贵的信条。史学家以怀疑批评的态度对待史料，然后对其进行选择、考证、确认，最后还要根据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的纪录，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接近真理。史学贵在求真，这种求真态度逐渐熏染，深入人心，就可以造就一种认真的习性，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②”。

第二，现代史学给人以“乐天努进”的人生观。首先，现代史学告诉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历史不是过去的陈迹，而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历史的进路虽然有盛衰、循环，但却是循环着不断前进的、上升的。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则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01页。

^② 同上书，第406页。

生观。”其次，新的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天神，也不在个别的圣哲，乃在社会生存的本身，社会的进步“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①。这种新的历史观给了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②。李大钊在此所说的新的历史观显然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三，史学对指导人生有重要意义。李大钊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他论述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脚踏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③

第四，史学对人的思想教育有重要意义。李大钊指出，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从智识和感情两个方面去说明。从情感方面而言，读史可以激发情感，他举例说：“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关于智识方面，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④。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09页。

② 同上书，第217页。

③ 同上书，第408页。

④ 同上书，第216页。

三 李大钊的史学实践——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李大钊写于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他亦身体力行，尝试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和原理为指导，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研究中国历史，初步开始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短短数年间，写出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五一”MayDay运动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胶济铁路略史》《土地与农民》《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一系列文章，涉及对中国上古社会状况、中国近代历史、中国近代思想、伦理等问题的初步考察。这些考察虽然只是初期的尝试，却无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一）对上古社会史的初步考察

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中，李大钊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文字绝不是某些圣人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是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其中经济生活给文字的影响尤为深刻，所以“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①。例如，对有关货币文字的分析，李大钊指出：当人们处于渔猎时代，人类转徙到海滨海岸的地方，以贝鱼为食，贝壳成了最早的财富和货币，因此，“贿”“货”“贡”“贷”“寅”“宣”等与经济有关的字，都有“贝”的偏旁。而到了后来，农业、畜牧业和纺织业发达起来时，货币也发生了变化。有以布或帛作货币的，中国古代钱谓之布货，货币的“币”字即是帛。也有以农器为货币的，“《毛传》云：‘钱，铍也’”。“铍”即是古“锹”字，因此，“足证钱为一个农器”。这表明不同时代的货币，

^①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59页。

留下了不同时代的经济特点的记号。

再如对古代姓氏名字的分析，李大钊指出，古代的姓如姬、姜、嬴、姒、姚等多从“女”，以往人们的解释是因居住地而得名，“居于嬴滨者赐姓嬴，居于姜水者赐姓姜”，李大钊认为，地实因人而得名，不是人因地而得名。“倘是人因地而得名，何以地名水名都从女旁？”“由此可以证明，那时的社会实为母系制，故生于从母姓，故为姓的字都从女边。种种地名，亦系因有某姓的母系氏族居住该地而命名”，这是血缘家族制度的演变在文字上的反映。

通过对中国文字书契的解读，结合考古文物、古代文献和神话传说，李大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遗迹。他认为中国的原始社会经历了渔猎经济、畜牧业经济到农业经济的阶段，而且经历过“女权”的母系社会。他还论证说：“女权的衰落，大约起于畜牧时代，而男性的优越，实大成于农业经济时代。”^①

（二）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考察

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论述了中国近代史的性质。他论述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役、日德之役，直到1925年“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地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而从1841年广东三元里组织平英团打击英军，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义和团的覆清仇洋运动，乃至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直至“五四”“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李大钊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②。他预

^①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573页。

^② 李大钊：《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62页。

见道：“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① 简明地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这就是说中国这近百年来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一方面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的历史，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所证明。

李大钊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太平天国史的历史意义。他特别强调“太平革命的兴起，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他论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中国民族反抗满洲（清朝——引者注）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他列出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巡游长江，以炮舰轰击南京太平军炮台至1863年英将戈登助李鸿章消灭太平天国，这期间英国海军、英法联军帮助清廷攻打太平军的客观事实，指出：“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② 从此以后，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的传统政策。这些看法，在当时称为卓见，影响及于我们今天的近代史编纂。

（三）对中国近代思想、道德、伦理的考察

李大钊还研究了中国近代思想、道德和伦理。他首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由社会经济入手，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变革。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一切的政策，一切

^① 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644页。

^② 同上书，第649页。

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① 道德也不例外，“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② 这说明道德观念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要旨，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③ 这也就是说，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而只有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德。一切风俗习惯、道德观总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④

基于这样的认识，1920年，李大钊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⑤ 他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而大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这种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是中国两千年来社

①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38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402页。

⑤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33页。

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①也就是说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度上的东西。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人心达两千多年之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是因为它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②。一旦这样的基础发生动摇，孔子学说的理论基础也将从根本上动摇。

李大钊指出，由于外力的压迫，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在近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19世纪中叶，欧洲的商人就开始叩击中国沉静的大门，鸦片战争后，国外的工业品以极低的税率源源不断地输入，结果是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中国的农业经济因此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大家族制度首先崩颓粉碎，建立在大家族制度之上的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的那些风俗、礼教、政法、伦理也就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③李大钊认为，“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の征候”，中国当时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还有中国的劳动运动等种种思潮和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34页。

② 同上书，第435页。

③ 同上书，第440页。

解放运动，都是打破大家族制度、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经济变动发生的，若不能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打破，“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①。这些分析，深刻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封建古老的农业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压迫的结果。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先驱，也在当时的史学界最早树起了以新的唯物史观进行史学革命的旗帜，他那些光辉夺目的史学论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铺下了厚厚的基石。白寿彝先生评价说：“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集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他的遗文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③。

第三节 瞿秋白、蔡和森、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一 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我国著名现代作家、文学理论评论家、政治活动家。1920年，他作为《晨报》特派记者驻莫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441页。

^② 白寿彝：《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页。

^③ 鲁迅：《〈守常文集〉题记》，《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斯科。1923年，从苏联返回中国，任《新青年》和《前锋报》主编。先后参加了相继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东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1923—1924年，先后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专著。此后，又翻译了苏联哥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一书，撰写了《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论》《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等论文，在继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宣传，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国情和近代历史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理论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在他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编中，瞿秋白引述了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艺术论》论述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理论、科学、哲学的问题永久有很大的意义，以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些问题之中，所谓历史哲学的问题，简直是最有趣的问题……历史哲学永久是人类精神上的最高贵的任务之一。我们现在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就是要使得最接近实际的理论更加深刻化。”^①在这里，瞿秋白把唯物史观当作了最重要的历史认识武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的《社会科学概论》一书基本架构起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共12节。其内容分“总论”“社会之意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现象之联系”十二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劳动、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制度等问题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7—1108页。

的基本观点，并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① 丁祖豪先生等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中对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作出如下评价：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全面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理论体系和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该书从正面全面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科学的体系。这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都是带有首创性的。在它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没有这类著作。其他国家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外，都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才陆续出版了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理论体系上相去甚远”^②。

第二，将“互辩的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瞿秋白的史学思想，基于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史学理论，实际上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哲学方面主要是宣传了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而对辩证法却几乎没有涉及。瞿秋白则通过他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部著作，《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唯物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等文章，以及他的译著——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阿多拉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底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哥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新唯物论》等，首先在中国系统地提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开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河。

瞿秋白在他的论著中，对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是意识规定（实质），而是实质（存在）规定意识”，同时又指出，唯物论并不否认意识和精神的作用，“哲学中的唯物论并不是否

^①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② 丁祖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认精神，确是能解释精神”^①。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瞿秋白论述说：“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②

瞿秋白将辩证法称为“互辩法”或“互辩律”。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有两种观察的方法，一种是“静力观”，意味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不变的；一种是“动力观”，以为一切是“变迁不居的”^③。互辩法就是一种“动力观”。因为宇宙永在运动中，所以研究一切现象，应当看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因宇宙的各部分相互联系，一小部分有变动，便能影响到别的一部分，牵动全局，所以“互变法的考察一切现象，第一要看现象之间的不断联系，第二要看他们的动向”。“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④瞿秋白进而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指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⑤“物的矛盾与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而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都是自然界、社会及人们思维中的“公律”。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最新、最科学的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在《唯物的宇宙观概说》一文中，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了原则性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在于互辩法的唯物论，互辩法唯物论的名称便可以表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与互辩法的综合，而且是这两种学说最发展的最进化的结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以此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同上书，第499页。

④ 同上书，第451—452页。

⑤ 同上书，第357页。

为基础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思想形态。这无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推向了新的高度。

基于此，瞿秋白指出，“科学、宗教、习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流变不止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一样，不断的在变更，人类社会经过无数的阶段”^①，必须用唯物主义的“互辩律”来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瞿秋白强调，用唯物主义的“互辩律”来研究社会现象，应当坚持历史主义思想，“这亦是互辩法原理之一，亦可称为历史观”。一是要“研究每一种形式的社会之个别的‘个性’”，不可以一概笼统地推想一切时代、一切社会。对每种社会都应细加研究，只有如此，才能明了变动的历程；二是要“研究每种社会内部变动的历程”；三是要“研究每一种社会的发展及其必然的消灭——即研究其与别一种社会的联系”。他指出：“历史的阶段不是固定的、凝固的、自己有独立的个体的；——而是继续不断，互相勾连，转辗变迁的。要明白某种社会，应当寻求他的根源于前一阶段之中，研究他发生的原因，他形成的必要条件，他发展的动力。同时，又应当观察他的必然消灭的原因，发展的倾向，——那些倾向，又在预备新的社会形式来代替他。所以每一阶段是练绌上的一环，环环相衔接的。”^②这是因为“一切现象，不当作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③。

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在认识论方面，瞿秋白指出，物质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以外的客观实在，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的认识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实际，“一切认识都是从经验发生，由主观的我接受外界的刺激而得来”，人们“对于外界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455页。

③ 同上。

渐次认识，同时对于自己的‘我’也渐次认识”^①，他说：“我们的观念是切合真理的——只要这一观念确与外界物质相符合；否则，便是错误。”因此必须“以科学的宇宙观去观察一切现象，纯粹客观的考察外界事物，对于各种现象都要寻找物质方面的，亦即客观的实际的方面之原因；却不可以根据于主观的思想上心理上的解释，去说明宇宙或社会的现象”。

第三，研究“历史进程之共同因果律”。

瞿秋白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论它怎样复杂怎样各不相同，始终我们能考察得一定的规律”。“科学的职任却在发现这种规律性，而使人类对于宇宙社会一切现象的概念脱离混沌的状态——舍弃那‘混沌的印象’。”^② 1923年，针对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瞿秋白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具体深入地论述了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对张君勱、丁文江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文中，瞿秋白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差异性，他认为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却大不相同，“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乘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进程之共同因果律”。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历史不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③ 他说：“历史是人做的，当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历史偏偏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正因为其中亦有个‘必然’在。既有这一‘必然’，便有这‘必然’的果——人的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②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上海书店1924年版，第17页。

③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第297页。

某种意向。此种意向再回过去做社会发展因素。‘意向’并不与‘必然’不相并立；不过意向亦受‘必然’的规定罢了。”瞿秋白认为，“各人自求其目的而有所行动，于是无数人的行为相互牵掣推移而进展，便成历史”^①。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有“共同的因果律”，“科学之责任便在于发见这些公律”，“科学的公律正是流动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的一致性，因有公律可寻，所以才有社会理想”。

瞿秋白认为，研究历史现象，不能停留于人的思想动机，而要进一步研究群众的、阶级的、民族的动机，然后“再进便求此等动机的最后原因”，“如此，方能发现历史进化的公律以及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之特别公律”。而什么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呢？瞿秋白进一步分析说，“历史现象的研究应当更深一层。英雄伟人以至于群众的动机，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隐匿难见的，都不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最后原因却是造成这些种种动机的现实力量”。瞿秋白认为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是：（1）生产力之状态；（2）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3）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5）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瞿秋白解释说：“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中之一因素。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②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关系的相应变动，从而引起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心理、社会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再反过来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了新一时期的社会变迁。

^①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②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第126页。

1927年,瞿秋白提出了“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①的著名论断,瞿秋白也一直在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他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他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②他在《多余的话》一书中写道:“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致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就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③他写于1921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和军阀》《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章,便在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演变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析,从而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二 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蔡和森(1895—1931),原名蔡林彬,别名和森,湖南湘乡(双峰县)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

①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② 同上书,第415页。

③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第416页。

1919年，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研读了法文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先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在法期间，他以通信的方式和毛泽东、陈独秀等人探讨唯物史观。1920年9月，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①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论是阶级战争加上阶级专政，其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1921年2月，他致信陈独秀，归纳马克思主义学说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②这封信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于《新青年》第9卷第4号。

蔡和森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革命者，他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作改造中国社会的锐利武器的同时，也以此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考察，对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从1922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还一度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任教，讲授社会进化史。他根据恩格斯原著的精神，编成了《社会进化史》讲义，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解析社会史。这部著作1924年5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①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②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第74页。

全书除“绪论”外，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家族之起源与进化”，第二篇为“财产之起源与进化”，第三篇为“国家之起源与进化”。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又补充了中世纪和近代的许多有关材料，引证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埃及和中国的大量史料，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序言”中，蔡和森追述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原始社会史研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伟大贡献。摩尔根于19世纪下半叶，从“群”“家族”以至“国家”的形成，挨次追溯社会的进化。虽然他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唯物史观的学说，然而他于不知不觉中，“竟在美洲重新发明并且系统的应用了这种真理（马克思是在他的前四十年发明的）”，得出了和马克思大致一样的结论。蔡和森称赞摩尔根为发现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将摩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可见，他对恩格斯阐明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等理论问题，对于历史学的科学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社会进化史》一书的出版，也标志着蔡和森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这部著作在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表现在：

第一，立足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指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据此对社会发展的动因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人们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另一面则是家族发达的程序。^①依据摩尔根的理论，蔡和森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论时代分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断言：“每个时代的变化，有每个时代的新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即直接为生产方法的变迁所引起。”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发现“人类进步的大时代，是直接和食品来源的扩充相适应的。而家族的团结便是直接这种需要”。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进步，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反复阐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包括上层建筑在内，都同经济发展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中，也贯穿着这一思想。论证了人类婚姻制度的发展，私有制、阶级的产生，都是“随生产之变更而变更”。蔡和森还阐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经济和政治组织之关系约可分为四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为共同连带性质，故雏形的政治组织全然为共同的形态；奴隶制度时代，自由人对于政治上的共同连带仍视为生存必要条件，不过范围只限于富人阶级而非全民族；封建时代，政治的组织，除却自治城市之政治连带外，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至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②就是说，政治是经济状况的表现，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完全是与这个时代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总之，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动力，这是《社会进化史》一书的中心思想。

第二，论述了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以及国家的本质。

在论述国家的起源、发展时，蔡和森指出：“国家这种东西：有些人视它为神圣；有些人视它为万恶的渊藪；有些人以为它是由几个

^①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第一编第一章“家族之起源与进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②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第三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199页。

野心家设立的；有些人以为他是从有人类以来便有的；有些人想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它废除；有些人想把它维持到万万世。”^① 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针对这些“主观的歧异意见”，逐章“揭发客观的历史的事实”，使人们对于国家“既明其源，复知其究竟”。蔡和森指出，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只有氏族，国家是在氏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它是“私有财产的派生物”，“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说：“远古的氏族社会里并没有国家和政权的意义。经济发达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阶级分裂的时候，才由这种分裂形成国家的必要。”他指出，“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构”，而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所有者用以控制其奴隶的工具；封建的国家乃是贵族阶级用以隶属农人的工具，近世代议制度的国家乃是资产阶级用以掠夺工钱劳动者的工具。他强调：“现在生产发达的程度已使我们大踏步的接近了这样的时代：即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②

第三，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

蔡和森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他认为，“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即如半开化时代，东大陆与西大陆因自然条件之不同，以致两地所具家畜植物显然歧异；这种生产上的歧异，在一定时期内虽足影响于该地民族的生活及其演进的程度，然决不能根本破坏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③。人类社会是按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的，人的主观意识和地理环境虽然会影响到历史发展，然无法改变历史规律的基本

^①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第三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②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第三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第193—194页。

^③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第7页。

趋势。

蔡和森从家族、财产和国家的进化三个方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再向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蔡和森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认为：“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种时候现在又轮流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它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①

（二）蔡和森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

1. 党史研究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开创者，他著有《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论陈独秀主义》等党史论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是他1926年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所作报告，后来油印成册，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使命，自建党至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经过，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党的机会主义史》是蔡和森于1927年9月在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上所作报告，对机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第一次深刻揭示了研究党史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研究中国党史的目的：第一，要知道中国革命及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必须明白党的历史。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虽然只有五年，而仍在幼稚的时代，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而值

^①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第三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第201页。

得我们研究。第三，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首先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他明确地指出：“要问究竟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① 蔡和森认为，研究党史“不仅要明白八十余年前的客观环境各阶级势力的关系，并应明白‘五四’以后的倾向——新的力量都起来了”^②；“不仅要明白其政治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③。基于这一思想，蔡和森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化写起，对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我国的阶级状况、我国的革命斗争史等都非常重视，把它们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以及对中共党史的全面的综合的研究。^④

2. 对近代革命史的研究

蔡和森认识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2年9月，他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俄罗斯苏维埃》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必要的政策，而中国莫不一一躬受其赐。”^⑤ 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文中，蔡和森亦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⑥ 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蔡和森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对象、性质和任务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指

①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④ 参见周一平《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研究》；牛崇辉：《论蔡和森对创立中共党史学的伟大贡献》，《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⑤ 蔡和森：《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蔡和森文集》，第107页。

⑥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0页。

出，中国近代革命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它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这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民主革命不同，当资本主义先进国革命时，国际资产阶级每每能互相援助（如法美）以对抗国际的封建势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时则不然，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本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明证”。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这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①

蔡和森还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关于革命发生的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反复论证，一切社会革命都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发生矛盾，当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会到来。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指出：“经济情形既已根本变化，自然一切都要革故鼎新了。”原始社会母系制度的覆灭和父系制度的勃兴，“是生产方法进化所携来的一大社会革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革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便是以后一切革命的种子”。他分析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说：“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②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经济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发生了‘改革内政以图自强’的革命运动。”^③蔡和森亦从经济的根

①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关系》，《蔡和森文集》，第271—272页。

②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蔡和森文集》，第101页。

③ 同上。

源，分析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所以辛亥革命是少数觉悟的革命党人“凭藉饱受外国刺戟的外埠华侨势力”，勉强完成罢了。

1924年，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对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进行了对比探讨。他指出：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他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同时又指出：他的缺点在于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但这并不能减低该运动包含着的神圣意义，因为这是一场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蔡和森将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作了对比，他指出，义和团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因效仿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而以失败告终。他分析其原因说：“革命党不知按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人民群众反帝国主义的忠实需要去把革命弄实在，他们只知拘守从前欧美资产阶级改革内政的目的，一天一天把革命弄虚空。因此，他们只知以军事行动，建立政府，求援‘友邦’为惯用方法，而不知道这些方法都是离开群众的需要而得不到结果的。不仅得不到结果，而且要使革命濒于危险与破产。”^① 这些识见，为分析、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

三 李达《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基中的作用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他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俄国十月革命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留日期间，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

^① 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文集》，第639—640页。

著作，1920年回国后，将这些译著一一出版，其中他译自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是当时国内宣传唯物史观的畅销书。1919年至1922年，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主义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予以了深刻的批判。

1921年1月，李达在《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的《马克思还原》是当时思想论坛上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李达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归纳为五条：一是唯物史观；二是资本集中说；三是资本主义崩坏说；四是剩余价值说；五是阶级斗争说。并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做了概括说明，指出：“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①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他的代表作。1922年至1926年，李达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一师任教，研究唯物史观，讲授社会学。《现代社会学》是他在这一时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于1926年6月由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部独成体系的专著。

在《现代社会学》序言中，李达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他说：“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李达认

^① 李达：《马克思还原》，《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为现代社会学之趋势，实已由唯物论而进至唯心论，“盖采取所谓社会心理学之方向者也”。反因为果，倒果为因，推其极致，将愈使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因此，他“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其间，李达表明他作此书的目的，是以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非敢谓于社会学上自标新帜也”^①。当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关于社会本质的研究，旧有三说，即契约社会说、生物社会说和心理社会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李达便是要以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力辟这“三说之谬误”^②。可见，这部书的宗旨，在于阐明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全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发源”等章，主要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部分分别论述“家庭”“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社会之阶级”等问题；第三部分为“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内容，是唯物史观的应用问题。无论从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来讲，还是从所述内容的深刻性来看，《现代社会学》一书都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③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在对唯物史观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上有明显的进步，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系统地阐明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同时，客观地阐释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大多不再引述原文，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作了中国式的表述，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现代社会学》出版后广为流传，1926年至1933年连续印行了

① 李达：《马克思还原》，《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40页。

③ 参见许全兴等《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14版，在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吕振羽曾评价说：“李达老师是中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不会忘却的。”^① 桂遵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一书中评价说：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既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战线上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初创阶段到成长时期的重要理论前提和过渡环节”^②。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阐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论证了生产力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统观人类之历史，各时代有各时代之政教风俗及思想，各时代有各时代的经济制度及特殊的社会与国家形式。李达认为，之所以会造成这种错综复杂的“精神的社会的现象内容及形式之变化”，是因为有一种“原动力”在起作用：“人类感觉思想及意识之所以发生变化，社会制度及社会冲突之所以异其形式者，皆此原动力之作用也。”^③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他论述说：“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的历程……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④ 由此而进，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是生产力。他认为，社会的革命的进化，依据两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但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

① 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②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③ 李达：《社会进化之原理》，《李达文集》第一卷，第343页。

④ 同上书，第243页。

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而改造此生产关系之人工的发动力则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之结果，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改造，因而政治法制等上层建筑亦适应此基础而改造，如此产生之新社会遂超出旧社会之上，是谓社会之进化。”可见社会进化的过程中，生产力起了主导作用。因此，李达指出：“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他意识形态亦随之继续进化，此社会进化之原理也。”^①

第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革命的原理。

李达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为进化之母，社会无革命，则社会无进化，此历史之公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无日不在革命中。李达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社会革命，若就历史举其最显著者而言，可分为四大阶段：古代公有土地制度崩坏以来，自由民或贵族阶级掌握政治上之权势，树立奴隶经济，以剥削奴隶或平民之阶级，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这是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初期封建社会小土地私有制度崩坏以后，出现大土地私有制，代表大地主贵族的封建阶级，利用其经济上的优越势力，取得政治上的权势，以剥削工商农奴阶级而进入高级封建社会，这是社会第二次大革命；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其经济上之优越势力，推翻封建阶级，掌握政权，以剥削工农无产阶级，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社会第三次大革命；无产阶级利用其生产上之优越势力，企图推翻有产阶级，树立社会主义经济，以期实现无产阶级之社会，这是社会第四次大革命。“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社会之革命盖如此其进行不已也，是亦社会进化所必经之途径欤？”

李达指出，社会革命即“社会全体超升—进化阶级之谓，换言之，即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

^① 李达：《社会进化之原理》，《李达文集》第一卷，第344页。

其上层建筑之全部者是也”。他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指出：“由于社会组织阻碍生产力之发达。方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遂与从来所借以活动之现存生产关系，或仅表现于法律上之财产关系发生冲突。此等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向之助长生产力发达者，今则转变而阻碍生产力之发达矣，于是社会革命之时代以至。”^①李达认为，社会革命可分为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前者是渐进的，后者则可一蹴而就，但只有两者“相须并进”，革命才能完成。就近代社会革命之性质言，可分为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及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两大类。前者为实现资本主义而行之社会革命，由资产阶级主动；后者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行之社会革命，由无产阶级主动。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为机械论、经济决定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需等待社会经济的自然进化，个人不必做革命努力的想法，李达指出：社会组织的变革，一方面受到物质条件制约，一方面必须依靠个人有意识的行动，物质条件与个人努力二者皆为社会变革之要件。

第三，科学地阐明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关于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世之主观论者恒重视个人在历史上之活动，以为历史纯由个人创造而成，遂轻视社会发达之历史的法则；反对论者又重视社会发达之进化的历程，以为社会之进化纯系自然进化，遂忽视历史由个人创造之实事。”李达指出：“二者皆一偏之论也。”他认为：“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②又说：“个人之性质所以能成为社会发达之一要素者，非个人之特殊天才使然，实社会关系有以玉成之也。”如果个人所处之地，所处之时，都与当时的社会关系相适应，那么个人在相当范围内的努力，一定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个人努力对于历史发展影响的大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但在一定时期内，

^① 李达：《社会之变革》，《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69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各个人所负之使命，仍受社会组织所限制”。在物质条件与个人努力的关系上，李达强调：“方物质条件之未备也，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①因此“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诚宜细察社会之潮流，熟审时代之精神。创造自身之历史，促进社会之进步。不当逆反时代潮流，致为无益之努力；亦不宜放弃自身责任，徒托玄妙之空言。”^②李达的这些论述不仅正确地分析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而且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史学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述。

四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以五四运动前后为开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酝酿与初步建立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和宣传者，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和阐释，并运用其基本原理于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将中国史学引向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实现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此起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起步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备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基础。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了社会，第一次提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用历史的事实来阐释革命的纲领，现实的需求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历史研究之路，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当代中国工农

^① 李达：《社会之变革》，《李达文集》第一卷，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86页。

运动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三个领域。^①也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因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起步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即自历史自身的认识得出的见解思想，再运用于历史的研究，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它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社会进行考察，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从经济上认识历史的发展变化，代表了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与社会问题。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了历史学的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此后，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论著，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原理进行了更全面、更系统的阐发，并努力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研究实践，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示范。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奠定在了一个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重新探讨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重要的历史理论。

在历史学理论的探索中，李大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大钊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质的认识。他指出，迄今为止的中国史研究，“全为循环的、

^① 参见陈海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社会科学》第3期。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著作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刘少奇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写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和《二七大屠杀之经过》、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和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恽代英编写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的代表作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支配，必须根据新史观、新史科，把旧历史一一改做。他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概念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认为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将史料、历史、史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李大钊还对历史学的任务、性质、体系、功能及史学与其他学问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具体分析了历史学的现状，指出其成为历史科学的途径，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出基本的理论框架。

对历史理论问题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以往的旧史观不同，它抓住了现代历史认识的本质，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中，确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类历史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强调“历史的根本理法”，“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律的”，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他们突破了“循环论”，认为历史发展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①。二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他们反复阐明，经济条件是社会一切变更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社会的变革，最终是由经济的条件来决定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们指出：“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②“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③因此，他们在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上，突破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批评了“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的产儿”的观点，^④认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主人“是这些群众，决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08页。

②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14页。

③ 李达：《社会进化之原理》，《李达文集》第一卷，第344页。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不是几个伟人”^①。

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主要是基于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重要的历史理论的认识和探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研究开启了道路。

第三，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在这一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体基本上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战斗的姿态涉足史学领域，他们的唯物史观历史实践在解释历史的同时，又反过来用历史促进唯物史观的宣传，证明唯物史观革命理论的现实性及科学性，从而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种与当时革命形势和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现实性特征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征。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大多不是单纯地谈历史，史学的研究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彼此互相渗透，^②这就使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往往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思想联系在一起。

^①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观》，《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85页。

^② 参见陈海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第三章

1928—1937年：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思想的成长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变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种政治力量代表着两种政治走向，为着不同的政治目标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中国现代历史学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这个时期同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段。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文化界许多人士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广泛讨论。从意识形态上看，他们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立场上看，他们当中既有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声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托派”人士；也有国民党人，以及既反对国民党右派也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改组派成员；还有一些政治立场较为模糊的人。从专业上看，他们当中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思想文化界的其他人士。在当时就被定义至今仍然沿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框架下，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阶段以及“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讨论不仅明显地交织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使得后人难以简单地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得失和价值；同时这些讨论也交织在个人意气之中，使得讨论有时弥漫出非理性雾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否声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争辩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概念，成为这场大讨论中最基本的理论阐释模式和框架，形成了讨论中的主流。因此，尽管这个大讨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但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解释中国历史方

面，“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一个巨大并十分有效的催化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也正是由此而得到了空前大发展。

第一节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早期史学观念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字鼎堂。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至1926年间，曾撰写《整理国故的评价》和《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测》等论文，显示出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浓厚兴趣。1927年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阅读日本学者翻译和著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著作，^①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明确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导，使其“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②。作为一个精力充沛才思敏捷且“好议论”“好做翻案文章”^③的学者，郭沫若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论文，并在1930年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题结集出版，^④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影响最大”的

① 日本东京亚非图书馆的“沫若文库”收藏了20世纪20—30年代郭沫若的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古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如卡尔·格尔修原著、冢本吉三译《马克思主义哲学》（1926）、渡部义通著《日本母系时代之研究》（1932）等，书中都划有不少红色道道。参见曾宪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日本“沫若文库”谈起》，《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群益出版社1945年版。

③ 郭沫若：《我的童年》，1924年，《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完稿于1929年11月10日，初版于1930年2月20日。参见蔡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版本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学刊》2010年第2期。

一部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①。从理论来源看，郭沫若除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外，更多地接受了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表达。

一 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模式

由于资料匮乏，以及传说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的纠结，早期中国历史状况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在20世纪初期的学人当中，王国维、罗振玉等有着重大贡献，郭沫若也受到王国维的影响。^②然而与王国维主要致力于精致绵密的考据不同，郭沫若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出土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以及传世文献，构建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面貌，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富有生机的广阔道路。

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各篇论文是分别撰作的，并不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系统论述”^③。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对早期中国社会的一种整体认识，而不是将之视为结构严密的著作，我们便不能同意上述意见了。在这部著作中，郭沫

①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已有研究者指出，由于熊得山在1928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书，因此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应独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标志”（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熊得山（1891—1939），湖北江陵人。字子奇。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李达、邓初民等人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史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原始社会（殷商以前）、奴隶社会（殷商社会）、“初期的封建社会”（西周至春秋战国）和“发展期的封建社会”（秦汉以降）的发展路径。这部著作在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力不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熊著没有如郭著那样明确提出用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历史的工具，以及缺乏郭氏的问题分析和激情的文字，似乎是重要的原因。

② 郭沫若写道：“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变革的剧烈时期。这个看法直接启发了郭沫若“殷周之际当即所谓‘突变’之时期”的思路。参见谢保成《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③ [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若提供的恰是一个具有理论上“内在统一”的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模式。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理论前提。其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序”中明确而形象地表达了这一认识：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这是一段在当时^①和后来曾经得到称誉也饱受争议和批评的文字。有的研究者认为郭氏的陈述是为了批判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点，是为了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实现的客观规律。^②我们认为这个判断似嫌牵强。郭沫若在说明撰写该书目的时，虽然点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③但这部著作并不是社会发展史，其时代断限也只是在

^① 张荫麟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列为1930年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另一部是《古史辨》第二册），认为郭氏的研究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同时他又认为“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之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论点”（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收入李洪岩编《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中国史纲》。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12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秦之前。如果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郭沫若不便明确提出撰述这部著作是为了证明中国必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的1954年，他依然自评该书只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①，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政治高度。从主观上看，郭沫若之所以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信仰，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理论根基和说服力，试想，离开了马克思理论普适性这一基本前提，郭氏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释便变得困难重重。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人类历史“趋同”的认同，也大大超过了对“求异”的理解。直至在随后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多数人仍然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道路与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路径相同，如王伯平写道：“中国历史，并不有异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其不同之处也不过是某种特殊条件，如山川河流等自然界环境之特别影响而已。其整个的历史发展规律，则完全是一样的。”^② 陈邦国认为：“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③ 陶希圣也指出：“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④ 从客观上说，对一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大抵要经历从机械移植到灵活运用过程。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侯外庐，在后来的研究中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不断成熟，这是后话。

其二，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进程。郭沫若对秦汉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描述是：“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修订本。

② 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年第3辑。

③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④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历史学家。1932年创办《食货》杂志，1949年去台湾。

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郭沫若关于古史分期的标准鲜明地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例如，他判断殷商是原始社会的根据是：第一，在生产工具使用上，商代是金石并用时代。第二，在生产状况和经济结构上，殷商已超过渔猎时代而进展到牧畜最盛时期，农业已经出现却尚未十分发达，商业行为虽已存在，却还在实物交易向货币交易的转变过程中。对西周社会是奴隶社会的判定理由是，由于铁器的出现，促使农业发生革命性变化，而“农业的发达就是奴隶制度的完成”。不仅如此，西周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奴隶，西周奴隶制关系在西周宗教思想系统等上层建筑中也得到反映。周室东迁后社会关系之所以发生剧烈变动，其原因同样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中原地区农业的进步，人口的繁殖，农民得到了解放的机会，商人阶级地位提高，因此奴隶制度也随之瓦解。可以看出，郭沫若对社会形态构成和变化的基本推论方法是单因素递进式模式：某种生产工具决定了该社会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导致特定的社会阶级、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出现，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方法论有明显的简单化、公式化之嫌，郭沫若本人在后来也反思自己“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①，但这种简单化和公式化是所有新的思想介入学术研究初始阶段都难以避免的过程，对其过度诟病和否定同样也是简单化的表现。郭沫若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的自觉认识，提升了传统史学所说的“必然之势”和“必然之理”的认识高度。^②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看到它的开创性贡献，给予其历史主义的合理解释。

二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观念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

^② 瞿林东：《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而作》，《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曾经走过了一段轻视史料的弯路，其迹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已有所表现。不过，在这种表现显现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早期进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特别是对史料的重新解读更加引人瞩目，这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9年，刘师培和黄侃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旗帜下创办《国故》月刊，以文言文和排斥新式标点为象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先是受西学影响的毛子水、傅斯年等人尖锐地批评他们“抱残守缺”；^①继有胡适冲锋陷阵，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其成果，使得整理“国故”成为20世纪20年代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论辩的深入，对“国故”的讨论实际上已超出“国故”本身，延伸至对史料、历史研究、传统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评判。郭沫若在这场讨论中，阐述了一系列看法，这与他的其他主张，一同组成了其史学观念。

第一，继承传统朴学考订学问，注重文献的时代，并加以新式标点。郭沫若指出：“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郭沫若显然不满意旧学的故步自封。他讥讽“谈‘国故’的夫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无所知，提醒他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断言“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③。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作者对一些史料的引用受到批评，这引起了郭沫若的自省。他后来曾检讨没有把一些文献的时代区分开来，出现误引误用的硬伤。反映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求

^① 毛子水（1893—1988），名准，字子水。浙江衢州人。曾创办《新潮》杂志。1949年去台湾。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年去台湾。

^②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1924年，《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真的学术精神。

第二，对史料的广博吸收和审慎研究。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采用的资料极为富赅，除传世文献外，特别看重出土的甲骨卜辞和金文资料。董作宾曾公允地评论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把《诗》、《书》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①我们固然可以说，郭氏的这个方法受到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直接影响，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在起步之初所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的次年，郭沫若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该书从作者能见到的35种著录中，选取251器，上编收西周金文137器，下编收列国金文114器。1935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引用著作增至43种，选器511件，并着力于考释工作。同样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重视程度的连续性。应当说明的是，对史料的重视并不限于郭沫若一人，在郭氏之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对史料这一历史研究的根基给予了认真关注，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第三，在对史料的解释和研究方法上，郭沫若有自己不少独到的心得。齐侯缚和齐侯钟上“翦伐夏后”一句一直不得确解，其中的“夏”自宋以来就被释为“履”字，郭沫若引据《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认为这个字当读为“夏”，结论是“历来以禹为夏民族祖先之说，于金文上已得一证”^②。这一“凿破混沌”之见，为了解远古历史提供了线索。^③毛公鼎是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的西周铜器，上有铭文499字，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文书，对于了解

^①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1950年2月。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河南温县人，著名甲骨学家。1948年去台湾。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追论及补遗》第9条“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李学勤：《郭沫若同志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西周政治和社会关系十分重要。关于其时代自出土至郭氏时见解多有不同，大体说有成王、昭王、穆王说。郭沫若别开蹊径，确定毛公鼎为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器物，他解释自己的考据方法是：

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时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之时代上占有极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据，有时过于铭文，在无铭文之器则直当以二者为考订时代之唯一线索。^①

郭氏自评自己的这个发明是“古今中外之铁则”。郭沫若曾于1929年翻译德国学者米海里斯（A. Michaelis）的著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②因此他可以以一种较为专业的姿态进入这个领域。与郭沫若同年出生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其晚年专门谈到古物出现时间的鉴定。与郭沫若方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一种风格物品的出现，“或者因为其在特殊条件下的高效率，或者因为其他什么情况，它们一定是流行很广，而且一旦被社会所采纳，其存续时间会很长”^③，因此用一种风格来确定具体时代是困难的。柴尔德的观点来自于他长期从事史前考古经验，理应得到重视。在缺乏明确地层年代关系和其他参照物对比情况下，确定一个器物的时代自然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遗留物除非有明确的年代记录（排除年代误写或作伪因素），对其时代的判断都存在或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历史复原工作都是一种冒险。问题在于如果放弃了这种“冒险”，也就放弃了研究本身。柴尔德提出的是方法上的困难，而郭沫若则提出了方法上的可能。如果对其做出某种条件限定，二者都

^① 郭沫若：《“毛公鼎”之年代》，1924年，《沫若文集》第14卷。

^② 郭沫若说：“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我，因而我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是这本书赐给我的。”（郭沫若：《美术考古一世纪》前言，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

^③ [英]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1页。

是合理的，是可以互为补充的。事实上，郭沫若关于毛公鼎的结论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成为不移之言。这也说明如果运用得当，郭氏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第四，既不同于旧派学者对“国故”的无条件拥护，也不同于胡适、傅斯年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主张，郭沫若强调史学不等于史料，指出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国故”，只有跳出“国学”范围，才能认清“国学”的真相。他针对单纯考订史料工作，认为史料考订的完成意味着研究工作的完成的观点写道：

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也不可估计之过高……一般经史子集的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①

他是这样指明自己与胡适等人主张的差异：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评”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评”精神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②

这里涉及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历史是否就是史料学，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求真还是致用。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不要“先

^①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刊》第36号，1924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①，其目的“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②；他还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感情的作用。”^③郭沫若则强调对历史了解不应只限于怎么样，还要知其为何如此。整理国故一定要“有助于社会”，看“社会的需要如何”^④。对过往社会的清算是为了认识今天和未来。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在当时存在不同认识，今天依然仁智互见。不可否认的是，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辨伪考订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历史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离开了这个基础，研究工作无从谈起。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史料整理工作的完成也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恰恰相反，它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准确地说，胡适本人并没有将历史研究局限在描述历史之中，他也试图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胡适曾指出有三种原因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变迁：即“个人才性不同”、“所处时势不同”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⑤。他与郭沫若的最大不同并不是在于是否探讨原因，而是以什么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解释。^⑥郭沫若将史料的整理放置在其恰当的位置上，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释工具，使得他对史料和史学关系的理解比起同时代的一些学者要高出一筹。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郭沫若由于有了“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作指导，就避免了疑古派的形式主义地对待史料的毛病。他把《诗经》《尚书》《周易》这些历史文献和卜辞、金文结合起来研究，并且参照近代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观念，把中国古代历史放在人类历

①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第1集，《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致复钱玄同》，1925年4月，耿云志、欧阳哲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③ 《胡适往来书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④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刊》第36号，1924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161页。

⑤ 葛懋青、李兴兰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⑥ 刘筱红：《批判与整理：郭沫若与胡适古史研究的区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史共同规律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给我们描绘出一幅中国古代社会的鲜明生动的图景。^①

历史学既是人文学科也是社会学科，取决于学科的特质，它与生俱来就有着致用的因素，排除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取消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中外史学发展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历史学都不是“纯粹的”“客观的”学问，都包含了对现实要求的回应。在这里郭沫若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历史研究目的，也陈述了历史学存在的真实状态。不过，过分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性，过分强调历史研究的致用功能，有可能引致压制和牺牲对求真的追求，成为政治工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学”的惨痛教训，其思想源头正可追溯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基者对历史学致用方面的高度重视。

第五，整理“国故”的重要目的是使普通民众了解古代文化。在《古书今译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② 郭沫若身体力行，用白话文选译《诗经》，翻译《离骚》。使普通民众接近文化遗产，而不是将文化遗产作为少数人怡情玩物，这种实践与其“人民本位”观息息相关。“人民本位”的提法最早见于郭沫若1921年发表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但当时他的意思主要是指三代以前“政长之出，完全出于使民”的“民约建国论”，与后来主张的“人民本位”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人民本位”思想开始包含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道主义、关心人民疾苦以及民主精神等内容，^③ 成为郭沫若史学观念中富有特色的内容。

概括起来，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郭沫若的历史观念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强调对社会形态的认识，以恩格斯《家庭、

^① 林甘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1924年，《沫若文集》第10卷。

^③ 林甘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曾明确指出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好恶标准是什么？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蓝本，试图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释社会变迁。第二，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第三，强调史学研究的解释和致用功能，反对“为历史而历史”。同时，强调历史知识的大众化。第四，重视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力求在全面掌握历史资料的前提下，说明历史的变迁。郭沫若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虽有较为明显的生搬硬套的痕迹，但他的历史研究实践，不仅指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影响了许多人的研究工作，^① 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最令人困惑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术语。

一 概念的提出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勾勒的人类历史进程。这段表述，1995年译本与1972年译本有所不同。1972年译本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① 略举几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谈到了郭沫若研究工作对他们的影响。吕振羽将郭赞誉为“旗手”，称自己是跟随郭的“后来者”（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翦伯赞称扬道：“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到殷周之世。”（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侯外庐写道：“1930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便有机会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内容丰富而又新颖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3—224页）。

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1995年译本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1972年译本说：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③

1995年译本说：

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④

两种译文虽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差异，但仍可使读者产生不同感受，例如“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与“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中文范畴中并不能完全对应。考虑到不同译本的背景，我们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引起争辩多一分理解。

译文的不同自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时歧义丛生的主要原因。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做出过明确、系统和完整的表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地域范围以及所处的阶段，都为后人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怀疑马克思本人后来“改变”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古代社会”的衔接关系。^①同时,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直接引导人们对时下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②这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在必不可少的学理之外,增添了浓重的政治因素,从而使论辩语境更为复杂。

二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主要开展于1932年到1935年间,尽管其初起在1928年就出现了。1928年,苏联学者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分析》一书出版,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编辑出版该书的苏联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序言”中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意见。1928年,德国学者魏特夫也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引入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他们的研究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③中国学者最早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是郭沫若,1928年,他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做了如下解释:

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中国)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

① [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② 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是从亚洲生产方式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结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③ [苏联]马迪亚(即马扎亚尔 Mazar Yar):《中国的农业经济》、[德]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均刊《新生命》第2卷,1929年8月第8期。

1929年至1935年间，苏联和日本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热烈争论。在时间上，中国学界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内容始于国外学者的讨论，争鸣论战却要稍晚一些。1932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学界激辩最引人注目的年份，不同观点大都是在这一年提出的（参见本书表3—1《苏联、德国和日本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和表3—2《“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而《读书杂志》在此次讨论中成为一个重要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讨论，这一点在苏联表现得尤为明显。马扎亚尔提出中国近代以前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后，受到苏联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们除了必须具有的学理上的说明外，还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指责。哥德斯认为尽管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自从摩尔根《古代社会》说明了原始共产制崩溃和私有制产生后，马克思就不再提这个概念。列宁在《论国家》提到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三种剥削形态，却没有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包括在某个国家的具体形态特征中，也不作为历史过程中必需的一环而存在”。因此，“马扎亚尔学派所拥护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根本问题上的方法论，也抹煞了现代东方的封建主义残余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约尔克则声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的学说相对立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②。在苏联，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甚至长期成为一个学术

^① 《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1931年在上海创办，主编为王礼锡和陆晶清夫妇。它相继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第1卷第1辑出版于1931年8月，最后1辑出版于1933年。共出版3卷17期。王礼锡（1901—1939），江西安福人，1929年在上海组织神州国光社。陆晶清（1907—1993），云南昆明人。

^② 以上转引自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25—26页。

和理论禁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启旧题。

尽管也有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却没有外在的政治高压，因此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学术性似乎也比苏联学者更多一些。这次讨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怎样的发展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为东方社会所特有？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否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相同？^① 下面，我们从问题和学理两个方面，对这场讨论进行勾勒。

德里克认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其一，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形态排列的提示，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早期社会，持这种看法主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之后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和欧洲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对应，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外国学者。^② 实际上，在“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学者的观点歧见丛生，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也并不一致，大体上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共产主义，中国存在着这种社会形态，在时代上在西周以前（郭沫若）。

(2)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时间上先于封建社会而与奴隶社会同时。中国从殷至殷末（后修正为夏至殷）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李季^③）。

(3)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氏族社会瓦解后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同时并行社会形态，但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

(4) 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形式（胡秋原^④、王宜昌）。

① 罗新慧：《〈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56页。

③ 李季（1892—1967），字懋猷，湖南平江人。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译著有《社会主义史》《通俗资本论》等。

④ 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历史学家。

(5)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东方的“贡纳制”（何干之）。

(6)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受到19世纪欧洲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的影响，并没有对东方社会进行切实的考察，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否准确需要斟酌（季雷）。^①

可以看出，除去个别学者，多数人都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概念上的“合理性”，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进行论辩。

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深受国外研究的影响，例如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农奴制的胡秋原的认识来源于苏联学者约尔克和杜博洛夫斯基。他援用并支持约尔克主张的马克思“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殊政治形态”来观察东方专制政体，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东方封建社会的特殊形态。^②他也赞同杜博洛夫斯基关于“亚洲方式”是对农民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者，不过是亚洲之先资本制，即与农村公社结合的封建的及一部分农奴底制度”^③。又如，何干之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贡纳制”，也是受到日本学者的直接启发。

在研究方法上，论战参与者大都将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作为最重要的环节。他们中有的人试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外的马克思其他论述中寻找理论线索。郭沫若研读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书中提到的家长制、奴隶制、身份和阶级4种经营方式以及相应的氏族财产、古代的公社财产与国家财产、封建的或身份的财产、近代有产者财产的财产占有形态进行分析。他的心得是：这四种经营和财产占有方式也就是家长制、奴隶

^① 参见表3—2《“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

^② 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2月。

^③ 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8月。

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如果将其与马克思后来谈到的社会发展阶段加以比较，则可看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而‘古代的生产方式’便明确地指示着希腊罗马的奴隶制”^①。郭沫若还试图解释马克思表述的变化原因，在他看来，“族长制”这个语词是马克思从希伯来古代传说和用语中引发出来的，马克思由此发现了奴隶社会以前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十几年后，马克思关于族长制社会的知识更加丰富，也了解了古代印度和中国的资料，“资料一丰富，族长制的内容，便自然有所扩充。大约在马克思的意识中，已觉得由古代希伯来传说所得来的概念不能含盖一切，或者觉得‘族长制’那个名词不足为奴隶制以前一个阶段的特征，故尔放弃了‘族长制’那个名词，而采取了‘东洋的社会’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样混舍的用语”^②。还有人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陈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李季从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中汲取了养分，他认为马克思在了解了摩尔根关于氏族社会及其解体后社会变化特征之后，改变了他对早期社会的看法，将亚细亚社会放置于原始社会阶段之后。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这个变化，能够解释中国早期历史的进程，即中国社会没有经历奴隶制阶段，而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后，由于地理环境与欧洲社会不同，在殷末直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进入封建社会。^③

对理论的理解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由于对原本就不多的历史资料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见，甚或取舍全凭主观好恶，使这个方面的难度更大。郭沫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将殷商作为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其根据除商代经济牧畜盛行外，在社会结构上还遵行“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及母系力量的强大。李季将盘庚迁

① 郭沫若：《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文物》第1卷，1936年7月第2期。

② 同上。

③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殷作为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开端，其根据是盘庚将氏族共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符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①后来他修订自己的看法，认为夏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开始，根据同样是夏代的土地属于国有，大禹由于治水的需要，使用大批官僚，使权力集中于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专制政权。这些史料上的证明多有说服力不强倾向。有的研究者批评说，李季承认甲骨卜辞有奚奴臣仆，说明殷代确是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成立时代，但又根据殷代是“土地国有”而断言它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国有在不同社会形态中都曾出现过，单凭这一种表现怎能确定其社会形态归属。^②何干之后来批评说：“在历史理论的公式里，排在奴隶社会之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一个经济结构？这点在过去以至现在，不但在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上未曾有人着手，在方法论上也各执一说，弄得非常混乱。”^③这段话固然有些偏颇，但如果将史料上的粗线条处理作为此时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一个特点，是不过分的。

讨论的话题不少，但最终大都指向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当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看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古代西方社会不同的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李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居多的学者则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胡秋原认为：“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论，从非马克思主义者韦伯那里取得基本的‘水利’理论，又由最有权威的普列汉诺夫承继着一部分否定的遗产，于是，在苏联就形成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一派，他们共同的见解不外：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者，是东方的，与奴隶的、封建的、农奴的生产方法根本不同的特殊生产方法；这生产方法之本质，就是私有土地缺乏——国有土地，人工的灌溉之决定意义——及政权由水利而生，以及东洋专制国家之政治，特殊官僚士大夫阶级之存在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

①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32页。

③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影响，找着了許多信徒。”他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非东方社会所特有，例如农村共同体在苏联的某些地方还残存着，所以它并不能决定亚洲社会的特征。将亚洲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毫无根据”的观点。^①王礼锡也持相同观点。实际上这个分歧涉及的是更为深刻的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在趋同论占据优势的当时，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集中在1931年至1933年间，只持续了数年便消逝了，歧见依旧，留给后人的依然是一团乱麻。德里克写道：“在余下的几年间，苏联和日本学者对于亚细亚社会的讨论仍偶尔见诸文字；而中国的作者对此相对比较沉默，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拒绝这一概念的有效性。”^②在我们看来，情形似乎并不在于中国学者排斥这个概念，其间的缘由主要在于没有人能用更完满的解释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虽然对中国古代社会知之不多，但他深刻的洞察力敏感地察觉出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这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③这次论战的所有参与者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本身给予了高度关注，相形之下，对中国历史实际的探究却显得缺乏深度和广度，这是这次讨论未能延伸的一个原因。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是玄想，必然要以经验作为其基础；对宏大历史问题的判断也必然要以一系列中观和微观问题为支撑点，这或许是这场讨论留给后人的经验和启迪。

然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而言，“亚细亚生产方

① 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② [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56页。

③ 根据发现和出土的西周彝铭和战国秦汉简牍，西周和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特点，即专制君王的“王有”或“国有”；战国时期的“里”类似于印度村社性质，是国家基层行政单位兼里民的自治组织，没有理由拒绝称它们是农村公社，更无理由拒绝用马克思的农村公社理论分析古代中国社会；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不单纯是由统一管理水利工程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中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及其他一些公共工程的出现又确实是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以后形成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总体论述对于中国来说也并非无稽之谈（沈长云：《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及相关历史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式”的讨论并非是一个热快凉也快的匆匆过客。它鼓励和促使人们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的人，都因此而接触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它引导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研究中国历史，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表3—1 苏联、德国和日本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

论者	基本观点
普列汉诺夫	人类社会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欧洲社会的发展道路，其过程是氏族社会解体后依次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条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其过程是氏族社会解体后代之而起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征是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而缺乏像欧洲社会那样的内部的发展动力。(1888)
马扎亚尔	现代中国之前的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1928年，后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其特点是：(1)土地私有财产之不存在。(2)人工灌溉之必要及与此相适应的极大范围的公共事业组织之必要。(3)农村公社。(4)专制政体。(1930)
魏特夫	“亚细亚社会”是高度依赖于水资源的社会，由于国家对水利的控制促使其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根本性作用。(1928)
杜博洛夫斯基	“亚洲方式”是对农民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是封建社会。(1929)
约尔克	没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各国前资本主义关系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物，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1931)
哥德斯	不存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封建主义。(1931)
司特鲁威	古代东方是奴隶社会。(1933)
科瓦列夫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度的变种。(1934)
雷哈德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和古代奴隶社会间的过渡形态。(1935)
森谷克己等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阶级社会。
羽仁五郎等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合体。
平野义太郎等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
早川二郎等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贡纳制，并非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

资料来源：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7页。[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60页。

表3—2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中国学者关于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观点

论者	基本观点
郭沫若、 王渔邨(王亚南)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1928年。(1936)
杜畏之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几种并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中国历史上并不曾形成这种生产方式。(1932)
李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奴隶社会并行而先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种生产方式。(1932)
胡秋原、王宜昌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农奴制。(1932)
何干之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中的一种贡纳制,并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1936)
季雷	马克思没有对东方社会进行切实的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值得怀疑。(1934)
吕振羽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封建主义。1930年后认为是奴隶制生产方式。(1936)

资料来源: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60页。

第三节 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

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密切相关的是对关于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以及奴隶社会的断代。

一 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

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压迫社会；它是否是所有地区的必经阶段？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看法，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问题因此同时成为社会史论战的一个部分。

如前所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李季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奴隶社会并行的一种社会形态，在原始共产制解体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否定了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在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否定派的意见有了更为充分的表达。

从方法论上看，否定派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不承认奴隶社会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或否定马克思勾勒出的人类社会递进模式，或否定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性，或对奴隶社会的评定标准提出怀疑。陈邦国认为，“奴隶经济”不构成可以和氏族社会或封建社会相等的社会形式，而是二者之间的过渡，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写道：

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上，氏族社会是到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犹之乎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发生资本主义是一样……奴隶经济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①

另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没有承续关系，氏族社会消亡后，既可能出现奴隶社会，也可能出现封建社会：

由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移到中世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的退化，不是人类社会前进的表现……要是氏族社会一发展而为封建社会，那就不一定要经过奴隶制了。在许多地方，封建国家是由氏族社会来的。^②

杜畏之则确定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在氏族社会内部孕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组织的废墟上建立的新制度，是“道地的封建社会”^③。胡秋原进一步认为，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不过是原有封建社会的一种变形：

误解马克思公式者以奴隶社会是承继氏族社会的（于是氏族社会就成了亚细亚社会了！）。他们不知道希腊罗马之广大奴隶制，是商业与战争之产物；希腊罗马之大奴隶社会之前，是经过了一个短期封建社会的。从埃及到希腊罗马，到中世欧洲，是整个历史之发展，不是一个民族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历史不是一个直线……理解这事实，就可知道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希腊罗马之奴隶制度，只是封建农

① 陈邦国：《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② 丁迪豪：《殷代奴隶史》，《历史科学》第1卷，1933年9月第5期。

③ 杜畏之：《古代中国社会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杜畏之（1902—1992），原名屠庆祺，河南永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托派。译著有《战斗的唯物论》等。

奴制度之变形发展。^①

王礼锡和王伯平则认为奴隶的存在与是否有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②

王伯平也认为奴隶社会“一定要根据有奴隶生产在那时期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奴隶所有者要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才能成立”。尽管甲骨卜辞中有奴隶存在的证据，但“这样的社会，以我们的知识，在中国没有存在过”^③。关于奴隶数量以及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历史分期讨论中再次被论者提及。

也有人试图按照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基本理论解释古代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形态的原因。陈伯达的看法是：

由于自然环境缺乏铁的存在，或即殷代没有发现铁的原因，而这原因，却影响与中国历史路途的前进，使当时劳动的强大分工成为不可能，使“奴隶劳动的大田庄经济或用强迫劳动的大规模生产”缺乏自己的前提；而当时氏族社会内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程度，恰只有造成封建制度的前提。这是中国所以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原因。^④

① 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合刊，神州国光社1933年。

②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③ 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

④ 陈伯达：《殷周社会略考》，《太白》第2卷，1935年第4期。

奴隶社会问题讨论主角之一是“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梅思平。^①他们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回避“奴隶制”或“奴隶社会”概念，使用另外的术语描述中国社会的进程。陶、梅二人部分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理论，如陶希圣在分析中国社会史时，把井田制看做氏族社会的土地分配制度。他说：“井田制度，无论何人俱承认是原始共产制度的一种。设果为原始共产制度的一种，则建设在井田制度上的社会，便确是原始共产社会，无贵族与庶人之分，每个人民都是社会生产的一份子。然而儒家所主张的井田制度，决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与贵族庶人阶级对立状态同时并存的一种奇妙的理想……整个的贵族阶级剥削整个的庶人阶级，而使庶人不得据有土地以树立其经济基础，这是井田制度的精神。井田制度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的阶级独占制。”^②但氏族社会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在他们看来却经历了既非奴隶社会也非“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陶希圣认为早期中国社会经过了如下变迁：

氏族间的战争，如传说上的黄帝与蚩尤，炎帝与共工氏间的战争，使一氏族征服他氏族，便建立了初期封建国家。封建国家间的战争，使一国家征服他国家，便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国家。社会中到了这个时期，已构成了三个或四个阶段。

这“三个或四个阶段”的说法在陶氏的这本著述中也前后参差，有时表述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又将“宗法社会”表述为“次级的封建国家”。梅思平的看法与陶希圣

^①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历史学家。1932年创办《食货》杂志。曾任《中央日报》总主笔，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湾。梅思平（1896—1946），名祖芬。浙江永嘉人。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伪政权要员，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② 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新生命》第1卷第9号，1928年；收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中国社会史论战（下）》，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2年，第25页。

相仿，他将春秋以前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为“氏族斗争时期”，可与传说中的黄帝、蚩尤、共工相应。第二个时期为“原始封建时期”，可与传说中的唐虞时代相应，“这时候，已经有一个民族（同血统的多数氏族构成）战胜其他民族，使其一部分降为农奴，一部分则为朝贡的人民”。第三个时期为“原始帝国时期”，可与夏商两朝相应，“这时期的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势力的逐步扩大。但是社会的组织，仍然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第四个时期为“新封建时期”，可与西周相应，其特征是“地主等级的增加与组织的严密”^①。一个概念的成立必须有明确指示，“次级”“新”等语词，没有对所指内容予以确切显示，而“原始封建”、“原始帝国”和“新封建”三个时期的定义，也无法使人明晰其间时代递进的内在联系，这些都反映出陶、梅二人在理论素养上的不足。有评论者认为，他们只是在套用“连他们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西方学界的一些名词和公式，^②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不过应当看到陶希圣在讨论中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说道：“在中国史上，封建国家最初成立在什么时代，我们是不敢武断的。”两年之后，他又改变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批评“永久的封建论是违背社会进化的原则的”，“因为它的前提论断是世上有不变的社会”。他重新勾勒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西周是氏族社会的末期，由春秋到战国是私有财产对士族身份的抗争时代，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由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是封建制度分解时期亦即先资本主义时期。^③这与他最初的想法有了很大不同。

肯定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社会首推郭沫若，他的基本看法前文已有介绍。除郭氏之外，站在这个阵营当中的还有吕振羽、翦伯赞、邓

① 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陶希圣：《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46页。

③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重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3卷第7、8合刊。

云特、王宜昌等人。

吕振羽(1900—1980),湖南武冈(今属邵阳)人。原名典爰,字行仁。早年学习电机工程,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①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后,他逢时而出,成为奴隶社会问题讨论中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有感于讨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吕振羽明确谈到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论争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其次,深深的感覺一般中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法’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此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②他声明在理论立足点上,将唯物史观作为“唯一正确的史学方法论”,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奴隶社会时“都是明白的在指一般的古代阶级压迫之支配形态而说的,并不曾限定为希腊和罗马”^③,中国历史的发展不能被排除在唯物史观所指明的“共同法则”之外;在具体研究中则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构建起中国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路程,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也成为在论述上具有连续性的著作。

这里有必要稍微偏离主题,对吕振羽对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略作评述。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之前,中国史前史几乎谈不到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上古史”篇中虽然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将史前时期分

^① 1930年,吕振羽按照马克思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撰写《中国国民经济趋势的推测》一文,从产业资本的积累、原料的生产和储存、劳动市场的供给和技术等方面,考察中国社会现状。显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初版自序”,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页。该书1934年由北平人文书店初版。

^③ 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1卷,1934年4月第1期。

为“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和“耕稼社会”，却没有阐明社会关系的本质。^①众所周知，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于打破旧学信古之风，以及在方法论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振羽在肯定疑古学派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对所有古书和神话一概否定是片面的。中国古代的传说和神话具有“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实意义”的价值——这个看法与托派人物李季有相似之处，^②并显然受到王国维主张^③的影响，而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抽出真实可靠的部分来”^④。在中国各个时期，史前史的资料最少，研究的难度也最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料。考虑到这个因素，吕振羽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将考古资料和丰富的神话传说结合起来的设想，并建立起四条研究原则：第一，缺乏考古资料的阶段尽量以神话传说予以阐释。第二，无法用考古学证实的史前婚姻家庭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空白处以神话资料予以充实。第三，务必注意确凿的考古资料，以之论证某个历史阶段或某种生产力经济结构。第四，注意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参证。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具体说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时代，传说中的启的时代是由女性为中心转向男性为中心的时代。仰韶文化属于史前社会“初期未开化时代之结局”，“或中期未开化时期之开幕时的情形”^⑤。尽管他认为“只有用着发掘的锄头才不说假话”，在对待考古资料的价值上有偏颇之嫌，但这并不影响他大量运用考古资料考察中国史前社会的卓越建树。他还提出：对中国原始社会问题的解决，

① 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李季认为，被疑古学派怀疑的古代文献虽然是伪作，却反映了它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参见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2月。

③ 王国维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是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史实”与“传说”的关系是：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④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82页。

⑤ 同上。

不仅有待于国内大规模的地下发掘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之研究，^①而且有待于我们对亚细亚作大规模的发掘，以及作语言学、土俗学、人种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李大钊主张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提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并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特征。^②吕振羽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对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设想的深化和实践，值得重视。吕振羽对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很快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学术界都认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1933年以后“国际东洋古史的一大创见”^③。翦伯赞后来评论说：“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④；“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点上，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⑤。

比郭沫若年轻8岁的吕振羽十分尊重郭氏的研究成果，后来曾称郭沫若为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旗手”，自谦是“后起

①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

② 李大钊批评说：“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了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的相互间关系，这种弊象，是由来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关系。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记录。唯物史观，就是应用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他指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些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以及多种自然科学，以文学、哲学和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上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38页，第394页）。

③ 朱政惠：《吕振羽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⑤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修订4版，香港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70页。

者，追随他上去的”^①。他也是最先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于社会史论战的学者。^②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独立探索的勇气。他不同意郭沫若关于殷商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判断，认为殷商社会已经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他针对郭沫若的意见，系统陈说了自己的主张。

二人看法的不同首先来自于对殷商生产力水平估计的差异。在郭沫若看来，殷商是金石并用时代，产业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不发达。但按照吕振羽的论述，殷商的情形则是另一番景象。《安阳发掘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殷墟中既有大量的石器，也有规模较大的铸铜遗址。对于这个矛盾现象，吕振羽指出：“大多数的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并不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或兵器。^③由此他进一步判断：判断殷商已具有相当发达的冶金业，金属工具和兵器得到大量使用，因此殷商时期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他又结合卜辞资料认为，由于青铜工具投入生产领域，殷代的农业生产也较为发达。

对于殷商社会特征之一的“兄终弟及”制度，二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郭沫若将“兄终弟及”制视为母权社会迹象或其子遗，而吕振羽则认为殷代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这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中，王同时也是军事集团首领，有年龄（成年）和必要技艺（善战）要求。王死后本可由子继承，但若子不符合条件，则要传弟。因此从根本上说，“兄终弟及”制是反映了男性世袭权力的确立。

郭沫若对殷商时代生产者的身份、土地制度和社会构成着墨不多，吕振羽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讨论。他根据卜辞提供的资料，判定在农业生产上，奴隶已经作为主要劳动者出现在殷代社会。在财产

^① 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

^② 谢保成：《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25页。

占有上，土地归国家所有，奴隶主贵族（侯）则国家（殷王）分子土地。在社会结构上，由天子、帝、王公、侯、大人、君、卿等组成了贵族阶级，由武人、邑人、行人、旅人等组成了自由民阶级，由小人、刑人、臣、小臣、奴、奚等组成了奴隶阶级。

吕振羽并没有止步于中国奴隶社会出现之时，他进而又分析了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确立。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由于殷周易鼎，生产者身份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封建社会得以在中国出现：

周人一方面把原来的奴隶解放，一方面把殷代国家的土地所有宣布为“王”的所有；“王”又以这种土地去酬庸其左右扈从和随同去“伐殷”的各氏族酋长。这种受有土地的王的扈从和酋长，又皆相次的以之去酬庸其自己的左右。于是他们便转化而成了各级的土地的新所有人；从而开始把原来的村落公社转化为庄园，把原来土地上的居民重新编制而把牠转化为农奴。^①

郭沫若否定井田制的真实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此外如《春秋》三传、《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度，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而“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办法，以常理度之，“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②。与郭氏不同，吕振羽不仅肯定井田制的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准确地反映了西周封建社会庄园形态和性质，它是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基础：

①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161—162页。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4页。

土地名义上集中在各级领主的手中，但由于在各分邦封建领主的领区内，不只存在着原始公社制残留的自由农民的土地所有，并有着奴隶所有者的土地所有和他并存，因此，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形态，自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代末开始发展；在西周至所谓“宣王中兴”，在各分邦，大都至春秋时代，有的直到战国，才取得支配形态。^①

在这种庄园制内部所构成的独特的剥削关系的基础，是以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以及其对于地主的人格从属为前提的。^②

吕振羽缜密的分析和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使得他的意见发表后便引起很大反响。有的学者将之与郭沫若在方法论上进行比较，说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不十分准确”，而吕氏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能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因而“比较地前进一步了”^③。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对西周封建说存有不同意见，对殷商是青铜时代则被广泛接受。郭沫若后来也修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于殷商社会形态的看法，承认殷代为奴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早年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26年回国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他是当时又一位活跃在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与吕振羽相似，他也认为马克思经典作家不是一种偶然的或散在的形态，也不是先阶级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某种附属因素，而是“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之独特的经济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在这个阶段都有着共同的面貌：

①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奴隶所有者构成的基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展的奴隶制，在形式上也可分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①

1934年苏联学者科瓦列夫发表《关于奴隶制社会的几个根本问题》，指出奴隶社会虽具有普遍性，但东方的奴隶社会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家内奴隶制。翦伯赞受到这个观点的影响，又进一步提出“其他的奴隶制”。“其他的奴隶制”的范围很广，从逻辑上说，许多具有某种“奴隶社会特点”的社会都可以被放置于其中。前面我们提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社会史论战中令人困扰的问题。尽管主张统一性的学者在当时人数占优，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从学理上给予详尽证明。以统一性解释中国历史进程，时有捉襟见肘之窘。翦伯赞试图以大“统一”、小“多样”来弥补历史说明上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以论带史”倾向的纠偏，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初创阶段所具有的独立思考精神。

1932年，翦伯赞曾与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资本主义经济》。或许受到吕振羽的影响，他也认为殷商时代是奴隶制社会。与吕振羽相仿，他也认为殷商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不是石器。大批的奴隶被驱使到牧场、作坊和田野中去劳动，“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演着重要的角色”^②。在家庭婚姻关系上，翦伯赞则认为殷代已出现了一夫一妻制，而不是郭沫若所说的殷代实行彭那路亚（普那路亚）家庭制度。

邓云特（邓拓，1912—1966），福建福州人。1929年加入中国左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

^② 翦伯赞：《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6期，1935年8月。

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奴隶社会问题讨论中，他的基本观点与吕振羽相同，这里不做赘述。值得提到的是，在地理环境与奴隶社会形成关系上，他与另一位肯定中国有奴隶社会的托派人士王宜昌的分歧。王氏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立足于奴隶制制度生产关系上的经济阶段。^①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划分是：商代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至汉末三国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五胡十六国之后是封建社会。他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发生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渤海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地理基础。如果中国人古代没有渤海，象北美古代没有内海一样，或许便没有奴隶社会的发展，而和印第安人一样停滞于原始共产社会，以至今日。^②

按照王宜昌的理解，奴隶社会是否出现并不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因素，而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由这个思路进一步推导，便可以说奴隶社会的发生具有偶然性。邓云特则提出了相反的判断。他不赞同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普列汉诺夫把地理条件看成了能够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是一种“地理唯物论”观点，只能“不正确地抹杀了客观历史的规律性”^③。本书主旨所限，我们在这里不拟评论地理环境怎样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也不打算评定王、邓二人看法的孰优孰劣。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奴隶社会问题讨论中，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环境等因素都被纳入到认识的范围中，国外流行的看法也被引入，并引起争鸣，显示了这个讨论在广度上所具有的前沿水准。

^①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

^② 王宜昌：《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中国经济》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

^③ 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第1卷第3期，1936年11月。

二 几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相似，在奴隶社会问题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首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在讨论中，绝大多数论者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评判标准，以之框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否以及何时存在奴隶社会形态。有的人批评说这些讨论者存在着将中国历史“嵌”进历史唯物论的弊病。^①“新生命”派的领军人物陶希圣强调应对中国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社会现象固然具有合法则性，但并不能象公式一样适用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多数社会而毫无不合。所以观察中国社会，要不放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要不因其不合假定而故意否认它。而如果在观察社会现象之前先怀抱着一一种假定，依照假定去寻求适合于证明这个假定的材料，这便很容易使观察陷于错误。”^②他曾经这样评论“公式派”和“经验派”的对立：

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用公式来收捺材料，这一方法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者的方法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③

李季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实际生活的指导者，——恰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地方就在于对于具体的情形，加以具体的分析。”他提出要在“深切了解事

①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期。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重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8月。

实”的基础上，“活用马克思的学说”，“否则必定滞碍不通”^①。陶氏所说的“公式主义”主要是指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包括其他某些人，^②他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者，语中颇含自负。应当说，他的批评并不完全公允，以材料将就理论是社会史论战中的通病，陶氏本人也不能免俗。问题在于，当人们在运用一种理论时，遵循和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和概念是基本要求，通过理论，人们可以对材料进行新的有意义的解读，并通过对材料的新的理解重新观察过往社会。社会史论战中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怕材料多”，十分强调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当材料和理论发生矛盾时，他们并没有抛弃材料来成全理论，而是力图通过对材料的更为合理的把握，使之能够与理论衔接。吕振羽主张殷商为奴隶社会和郭沫若后来放弃殷商原始社会并接受吕振羽的观点，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我们应当对陶希圣关于理论与史料关系、李季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醒给予肯定，特别是李季提出的不要教条化的理解唯物史观，要在研究工作中让唯物史观具有活的灵魂，让我们看到了这场讨论中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其次，是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尽管当时已有人察觉到论战表现出的忽视和否定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倾向，并提出批评，^③但在讨论中，绝大多数论者（其中有不少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论者的论述中有

①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

② 如王宜昌就声称自己是“公式主义者”：“虽然有许多人反对过这种意见，但我却认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永远是要从‘搬家主义’和‘公式主义’出发的。”参见王宜昌《评吕振羽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思想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1月。

③ 陈邦国说：“必须注意，我们不能，也不应抹杀一个国家由于某种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呆板的把西洋史译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汤等等人物的名称，就可以塞责了的。”参见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明显体现,^①这种趋同观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关系。艾思奇就曾断言:“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个特殊的传统”,即“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②但趋同论在托派人士如王宜昌、“新生命派”人物如陶希圣等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在力图建立中国社会发展与欧洲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相对应关系方面,比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得都要远”^③。这又说明其深层次缘由可能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讨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时,以西方或其他社会的发展过程作为参照体系,加以比较,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将比较的目的设定在比附西方社会上,而不是观察其间的差异,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在这一点上,翦伯赞提出了奴隶社会可以以多种类型出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有不同形式的奴隶社会,为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

三 关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

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虽受到某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大体上看这

① 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序”中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李季提出的三个“深切了解”中的第二条就是“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参见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合期。

② 艾思奇:《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辰光书店1946年版,第68页。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哲学家。

③ [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211页。德里克的评论是有道理的。王宜昌和陶希圣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认识顺序完全一致,甚至在时间和背景上都惊人的相似。如王宜昌说与罗马帝国崩溃、欧洲中世纪出现时间相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原因也与欧洲相同,乃是受到“异民族”的入侵,“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亦如西欧社会的历史,由于异族侵入底大扰乱,打破了奴隶主人的腐朽统治,而新生了旧民族的经济生命”(王宜昌《封建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8月)。

种影响是有限度的，毕竟遥远的古代与当下有着漫长的距离。相形之下，对现实关系更为紧密，时间也更为接近的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认识，政治化的意味也就更为浓重了。陶希圣和梅思平等人力倡的“商业资本主义”说和李季主张的“前资本主义”说是这个讨论中引人注目的观点。

陶希圣等人主张的出发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商业活动很早便成为在中国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从春秋或者更早时期便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因素。陶希圣写道：“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遂其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经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在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① 陈邦国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末年便已开始了商品生产的形式，这是不能牵强附和的，货币经济乃是商品交换达到相当程度才出现的事实。由这些事实，我们的结论说：西周时期末，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东周时期已发展到城市手工业制度的时代了。”^② 其次，相比于地主阶级，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力量更为庞大。梅思平指出：“中国的地主阶级，其膨大往往有限，而商业资本阶级则可以无限制的膨大”，由于商业资本力量的强大，“皇帝宰相以下，都只可认为一种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官僚阶级”^③。由此判断，春秋中后期，“中央集权的政治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了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破坏”^④，形成了秦的统一。而秦的统一则“已经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业资本的政权形式了”^⑤。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

② 陈邦国：《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

③ 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④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

⑤ 陈邦国：《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

陶希圣等人所依托的理论并非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来源于狄拉克和波格丹诺夫关于中国问题的表达。波格丹诺夫被有的研究者称为陶希圣的“思想导师”^①。前者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声称:“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本阶级手中。”后者在《经济学大纲》中勾勒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包括“原始氏族共产主义社会”“家长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内的“原始的自然自足社会”,包括“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都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内的“商业社会”,以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等同的“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②。虽然主张者认为他们都是唯物史观的信仰者,这些表述确与当时通行的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观不同,尤其与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大相径庭;同时,他们对商业因素对社会的作用,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有不小的差异,因此这些观点引起了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愤怒和抨击是很正常的。

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在韦伯那里,商业活动也被视为改变一个社会的重要因素。^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商业活动的影响,而在于它是在怎样的社会状况下发挥着怎样的影响,由此也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与其他学说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商业对各种生产组织形式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程度首先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而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他区分了商业活动在“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中的不同作用:“在古代世界,商

^① [美] 德里克 (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03页。

^② 转引自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58、63—64页。

^③ 参见韦伯 (Max Weber)《经济通史》,第3篇《资本主义时期前的商业和交换》,姚增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而在现代世界中，“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他还认为16、17世纪地理大发现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业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②。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商业因素的一般性和革命性结果，都与这个社会的自身结构以及某种外部因素有关。商业本身并不能必然的决定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③德里克归纳说，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有五个要点：（1）商业自人类社会之初就存在；（2）它对自给自足的社会起着消解作用；（3）它的作用根据它所作用的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改变；（4）它本身不能决定新的生产方式；（5）它是寄生性的，除非它为工业服务，而这种情形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他还说，主张“商业资本主义”说的论者用第1条和第3条为自己辩护，反对者求助于第2条和第5条，而双方都同意第4条的有效性。^④这些概括是合理的，其分析也有见地。不过，我们看到在讨论中实际上的情形更为复杂。陶希圣确也从社会内部进行观察，如他关于由春秋后期到战国再入秦的论述中，就注意到庶人、士、贵族、天子位置的移动。问题似乎不在于“商业资本主义”论者是否观察社会结构，而是怎样去观察。陶希圣等人对马克思关于商业作用于“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371—372页。

③ 德里克认为本书正文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文字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承认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则地理大发现必不会引致资本主义的出现；反之，则能得出“外在于主导生产方式的因素对历史变革产生重大作用”这样一个“颠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前提的结论（〔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05页）。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实则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马克思说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在欧洲社会中发生的，从本质上说，仍属于外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

④ 〔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03页。

实质性差异的有意识忽略,使得他与马克思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探讨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

陶希圣后来的提法又有所变化,他认为可以把春秋时代到清王朝的漫长历史时期命名为“封建时期”,或“先资本主义时期”,或“商业资本主义时期”^①,但实质内容却无变化。而在争论中,李季则提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从汉语表达习惯上说,“先”和“前”是含义相当的语词,但“先资本主义时期”说和“前资本主义社会”说,却有着很大不同。

李季提出的“前资本主义与生产方法时代”有如下特征:

- (1) 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 (2) 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占据很大优势;
- (3) 商业牵制工业;
- (4) 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 (5) 手工艺工人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存在;
- (6) 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 (7) 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②

在李季看来,这种生产方式存在于秦至清的2000年间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③。从表面上看,李季所提到的一些特征乃至时间分段,都与陶希圣的意见相似。但二人侧重点的不同依然清晰可见。如德里克所分析的,李季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作用,陶希圣强调的是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由此引导出二人对这一时期阶级问题认识的差异。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政治上层和经济上层之间的分歧,二者的对立超过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李季关于“阀阅”、“身份”和“阶级”的分析表明,在他看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

^②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③ 同上。

来，在这个时期当经济关系可以取代政治关系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才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自发的源泉。^①

还有几位论者值得提及，一位是与李季观点相近的杜畏之。他认为，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分解后，则继之以被历史拉长的过渡阶段——“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过渡”，这个过渡时期是“异常驳杂的社会合金”，其中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它又是变化多端起伏迭见的，“在每个时期中，每一种关系的比重都有增加或减少——直到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取得了决定的优势，中国社会才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②。多种社会形态因素杂于一种社会形态中，而这样一个“大杂烩”式的社会形态，便成为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这就是杜畏之的基本判断，当然在论述的系统性上，他比李季还是逊色不少。

受到苏联学者波克罗夫斯基观点启发的胡秋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中已显露头角。胡氏曾经赞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他认为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期间存在着前期资本主义，亦即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主义，“我所谓资本主义之成立，远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者，就是指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社会”^③。后来他却调适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商业资本主义”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出现了“专制主义”时期，具体说“中国东周的封建主义，因商品经济之分解发生质变而为专制主义。自秦至清末，就在这一个阶段”^④。可见胡秋原并没有放弃关于“过渡阶段”的思路，其变化在于他是用“专制主义”

① [美] 德里克 (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65页。

② 杜畏之：《古代中国社会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③ 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④ 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3卷第7、8期合刊。

取代了“商业资本主义”。创办《读书杂志》的王礼锡也持有类似观点。应当提到的是，在“专制主义”立论上，他们仍然坚持商业活动的作用。王礼锡认为：“地主为了商品的大量生产而发生豪强兼并的现象，即土地集中的现象”，“区域的政权为了商业的集中现象而毁坏，专制主义政权于是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起来”^①。可以看出，他的推导过程是：对商业活动的追逐——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地方政权的破坏——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观点给予了回应。何干之^②指出：李季归纳的上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七个特征不能作为否认封建主义和承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据。对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在生产劳动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产业位置上，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并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法。至于地主阶级的存在，他反诘道：“如果地主阶级的存在不能称为封建主义，我真不明白，什么阶级支配的社会然后可算封建主义，难道资产阶层的社会才算是封建社会吗？”^③何干之还从方法论上批评了李季对待历史的片面性：

纯粹的封建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在人们的幻想中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止在它的早期，混合着农村公社和奴隶制的残余，在以后的一二千年中，也都是如此。研究那时代的历史的人，必须把主要的生产方法，和封建制度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区别开来，并且再进一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然，徒然掇拾了一二现象，而加以夸大，把它夸大成为一种生产方法，那是没有意义的。^④

①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

② 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郁君（毓均），又名谭秀峰，广东台山人。1936年正式用何干之笔名撰文。

③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④ 同上。

丘旭（王学文）则指出，陶希圣的错误在于没有准确地把握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一个社会不管它在政治上国家的统治表现为何种形式，只要它是维持封建剥削关系的，便可称为封建国家。他的结论是：

（一）中国在商品输入前期经济结构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于名义上土地所有者，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独立生产者的农民的剩余劳动，所以，中国的社会基础是这种封建地主关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中国的国家也就是为了维持这种封建剥削关系。所以，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官僚的国家统治形式不过是封建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

（二）商业资本是独立于生产资本之外的一种资本。所以他自身在经济形态上不能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形态，结果，在社会的政治形态发展的阶段上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在当时中国的商业资本是附属于封建经济中而发展，它所产生的土地自由买卖，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它对于封建社会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侵蚀但这绝不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理由。^①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其他人在看待“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上的鸿沟，并不单是对史料理解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方面存在巨大差别；换言之，对史料的取舍和解释，也都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态度和选择。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背景和脉络

一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复杂背景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讨论在1936年基本结束。在发生背景和论辩

^① 丘旭（王学文）：《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第4号1930年2月。王学文（1895—1985），江苏徐州人。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过程上，这次讨论具有若干引人注目的特征：

首先，它不是中国本土独立发生的一次论辩，而是有着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思想交锋。在中国国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着革命实践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未来发展的走向进行新的思考。在国际上，苏联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为代表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为代表的少数派，他们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根本对立的看法。多数派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基本力量是封建势力，中国社会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数派则认为，中国早已是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商业蚕食了封建势力，中国的农民斗争的性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因信奉托洛茨基理论而被驱逐出中共的“托派”分子，以及“分共”之后的国民党人，在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性质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从论战双方或多方的表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外政治力量、国外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国外学者运用马克思历史理论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的影响。

其次，在论战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运用或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作为大革命时代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①的延续，参与讨论的人，“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从事分析。^②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武器，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余地”^③，声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④而在论战中，“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⑤。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10期，1949年。

② 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读书杂志》1933年第3、4期合刊。

③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第3、4期合刊。1931年。

④ 杜畏之：《古代中国社会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⑤ 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何以能在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論首选，现下国内主流观点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 展蓝图的描述，以及这一理论对人类历史深刻和科学的洞察力，吸引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国外有的学者则认为，在20世纪中期，当中国走向革命道路时，社会问题居于显著地位。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解释“革命变革的社会维度的努力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它在史学领域也表现出崭新的革命性的范式变革”^①。就是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本身具有的革命性，吸引了处在变革时代的中国人。在这两个合理的表述之外，还应看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全球大为增强。如巴勒克拉夫所说：“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2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②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研究，也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論抉择。

再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这次论战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争辩，而是被赋予重大政治任务的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探讨。明显的政治目的与必须具备的学术性被程度不等地纠缠在一起，使得整个论战一直交织在政治呐喊和学术探讨之间。与同时出现的其他史学流派也缺乏有效的交流。^③相对来说，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关于奴隶社会讨论的学术性要强一些，而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讨论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因素的支撑，论

① [美] 德里克 (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13页。

② [英] 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③ 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战并未被彻底政治化，即使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商业资本主义”这类问题中，激辩也并不总是在政治键盘上跳跃。

但是，讨论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和把握能力表现出了重大欠缺。讨论者大都抓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只言片语，恣意发挥，不仅在解释历史资料时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点而不顾其余，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吸收上同样也是只看几句而不顾其余。正如翦伯赞几年后反思说：“当时他们都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辞句为渊博，主要的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之整个的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用。”^①

同样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存在，这次论战充斥着激越的情绪，尖刻的言辞时时可见。有些是政治因素使然，如丘旭（王学文）批评陶希圣时使用“呓语”“浅薄”等语词，说陶是“骗子”，声明要将其“唯物的外衣除下来”^②。陶希圣则调侃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的“半封建”是占十分之五还是十分之六？^③有的则仅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斗胜争强，“你来一拳，我来一脚”^④。甚至还有人声称：遇着“混蛋”的观点，“非‘骂’不可”^⑤。不能不说，这种情绪对讨论的深入产生了消极影响。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对理论的强调和将欧洲社会发展历史道路作为范本，成为论战中的主旋律。如下一些论断在讨论中时可见及：“方法论上的辩论是最正确的辩论。更明显些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的解决，还在于方法论的解决”^⑥；“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② 丘旭（王学文）：《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第4号，1930年2月。

③ 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④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前记，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⑤ 严灵峰：《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

⑥ 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①；“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没有中外之分的，我们知道欧洲历史发展的程序，我们便容易来认识我们的历史发展的过程”^②；“假如我们利用世界史底全盘，和中国历史比较，不只是用理论来观察中国，更不是用指导原理底图式来观察中国，而免去一切理论上的抽象和含义混淆底困难。我们会发现中国底社会史的阶段，同西欧”^③，等等。即使如陶希圣试图通过对东西方社会各自结构的特殊之点进行考察来缓解理论与资料上的尴尬，但依然坚持中国社会的各个要素，与欧洲社会史上曾经发现的各个要素不甚悬殊。^④ 这些表述是以一种断然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出，表达了他们自信。然而，中国的历史道路与西方的历史道路究竟是否一致，不是哲学层面上的先验断定，它需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方能获得较为确切的答案。论战的许多参与者，先入为主地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放置在欧洲社会的框架里，这难免会生出削足适履的弊端。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从更为宽广和未来走向上观察，这次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论战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

台湾学者郑学稼认为，社会史论战暴露了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理解的肤浅，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它本该摧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受欢迎程度。^⑤ 我们不清楚郑学稼做出这种假设的理由，但我们看到的恰是另一种情形。社会史论战的结束，不是因为对马克

①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② 李麦麦：《中国封建制度之崩溃与专制君主制之完成》，《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11、12期合刊。

③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

④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3页。

⑤ 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的起因和内容》，台北，1965年，第104页。转引自[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36页。

思主义理论的疏离，而主要是因为与所有的讨论一样，在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之后，由于难以有新的开掘而暂时止步。在论战期间，许多著作多次脱销^①，在推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论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论战提出的问题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抗日战争期间，由这次论战提出和引发的问题得到重新研究，并有新的进展。^②正是通过这次社会史论战，许多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指导——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无不受20世纪3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国际大讨论的影响，他们的史学体系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为前提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此得以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成长并走向兴盛。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肯定。193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论著可以通过出版社和杂志公开发表，促进并增强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对唯物史观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吕思勉^③对马克思理论有“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臧往以知来，远瞩若数记”的赞叹，^④并在1945年撰毕的《历史研究法》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如下评论：

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这话看似玄妙，其实是容易明白的……把一切有关系的事，都看得其关系相等，

①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数月间印销了8版。而在论战中同样产生很大影响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1929年至1933年间也印销了8版。《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后在10天内两次印刷并迅速售罄。参见[美]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第45页。

② 侯外庐曾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归纳为两个承续，其中一个就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④ 吕思勉：《再示荣女》(1943)，转自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就茫然无所了解，等于不知事物相互的关系了。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①

其时吕思勉已年逾六旬。大致在同时的1947年，顾颉刚在回顾社会史论战以来往事时写道：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即摩尔根——引者）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② 吕思勉和顾颉刚当时均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而顾颉刚还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唯物史观以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肯定，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史论战结束后强大的后续影响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论战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早期形态，这种形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是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也是在与一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交锋中形成的。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指导意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在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变化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人类社会的其他形态尤其是欧洲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表现出广博吸取，认真研究的精神。对史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和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两个基本价值上，更加侧重于“致用”的方面，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并不放弃“求真”的精神。这个态度也导致在理论和

^①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0页。

史料方面的基本倾向，即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和启迪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在研究中注重理论和史料的合理结合。尽管当时已显露出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和教条化的明显趋向，但仍保持了对史料的尊重。如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常说的“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研究取向衡定，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表现出的是“以论带史”和“史论结合”的双重研究态度，并以前者更占上风。上述这些基本表现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是否应将其提倡的基本原则与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区分开来？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是否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途径？这些问题在当时虽有所涉及，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并不在此。这些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随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回应。

第四章

1937—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思想的发展

1937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两场接踵而至的战争。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经过3年多的内战，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

艰难困苦但充满希望，在13年的岁月中，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样也走过了伟大的历程。这个时期，在研究领域方面，关于中国历史分期诸问题继续进行，并走向深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得到开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的断代和贯通性研究持续进行。在理论与研究实践的关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考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得到推动。在历史学的功用方面，以历史为现实服务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职业担当，使历史学的价值在拥有学术性的同时也走向了社会和大众。

第一节 历史分期讨论的深化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的社会史论战的结束，并没有使得论战讨论的问题也随之沉没，相反，在历史分期涵盖下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等课题的研究，在战

时开展研究工作十分困难的环境下,^①继续得到关注。

思想史所体现出的进步,是在沉淀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也是如此。在历史分期的讨论中,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以往研究不足和欠缺的反省。经过反复斟酌,郭沫若调整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殷商时代不是自己原先主张的氏族社会,而是“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②吕振羽原先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没有看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前的假设,指的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性”^③。到了1936年他改变了看法,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初期国家之奴隶制度的形态”^④。又经过多年思索,吕振羽反省了自己的研究存在“教条主义的偏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度的变种。^⑤对原有观点的改变是学术研究的必要过程,是研究工作应有之义。我们看到,郭沫若等人对原有看法的修正,不是轻率的,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经过认真思索后的放弃和更改。吕振羽将研究中的“失误”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更体现了这种自我批判的严肃性。

与反省意识相呼应的是历史分期讨论的细致化——这些讨论主要

① 郭沫若描述说:“为要预防书籍和原稿遭受敌机的轰炸,就得取出图书馆和藏书室中最有价值的书分散到各个地方。如果研究结果获有一定的成就,那要把这些著作印刷出来又会遇到不少的困难。”(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重庆《中国学术》第1卷1946年8月)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之间进行的,延安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能够很快被重庆由中共创办的报刊上转发[参见徐春夏《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11期;张海燕:《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的学术意义》,《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形成了良好的交流机制,这对于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是积极意义的。

② 1935年,郭沫若在《中日文化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讲演中说殷周是青铜时代。但在随后发表的《屈原时代》中却再次强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我在七八年前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是分析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身分制的封建社会”,“这个见解我现在还依然维持着”(《沫若文集》第11卷)。1941年,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一文中,他声明:“我以前把殷代视为氏族社会末期未免估计的太低。现在我已经证明殷代已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存在了。”(《沫若文集》第12卷)

③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

④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

⑤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

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进行的，尖刻的语言被较为和缓的学理争辩所取代，较之社会史论战，学术性大为增强，显示了研究的深入。大体来说，关于殷商社会性质有氏族末期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意见；关于西周社会性质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意见；关于春秋战国社会性质有奴隶制从氏族纽带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向国民富族的土地私有制发展阶段、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产生、初期封建社会发展3种意见（参见表4—1）。下面，对这些讨论作简要回溯。

表4—1 中国学者关于历史分期的主要观点（1937—1949）

时 代	社会性质
殷商	氏族社会末期（尹达、侯外庐） 奴隶社会（吕振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 非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胡厚宣、冯汉骥）
西周	奴隶社会（郭沫若、侯外庐） 封建社会（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
春秋战国	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郭沫若） 初期封建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吕振羽、翦伯赞） 奴隶制从氏族纽带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向国民富族的土地私有制发展阶段、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产生（侯外庐）

一 殷商社会的性质

在郭沫若开始放弃他关于殷商社会是氏族社会意见的时候，侯外庐则延续郭氏的原有看法。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处庐，山西平遥人。1924年结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1927年赴欧洲留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在重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关于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本书将做专门讨论。这里只略述他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基本主张。侯外庐主要从四个方面去解释殷商社会性质：（1）在经济活动方面，殷代虽有农耕，但畜牧业仍占主导地位。（2）在生产劳动者性质方面，奴隶虽已出现，但还未达

到奴隶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使用在农业生产上的“典型地使用阶段”。(3) 在城乡分野方面,城市处在形成之中,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因此,殷代社会是“氏族共同体所有的畜牧生产手段与氏族成员主要的共同劳动力二者之间之结合关系”,“至多是进入野蛮上期的门口(无铁而有文字)”。(4) 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殷王没有对本族成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只可对外族战俘行使判决处分之权,其性质是氏族联盟的军事族长。^① 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侯外庐对殷代社会性质的分析,明显受到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② 这个意见是恰当的。不过侯外庐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关于城邑的分析,这也成为侯外庐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认识的一个生长点。

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尹达也对郭沫若的殷商氏族社会说的观点持肯定意见。^③ 由于来自考古学领域,他格外强调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要性,认为这些资料是了解殷商社会性质的关键,“离开了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④。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他的研究主要依靠殷墟遗址资料的分析。殷墟遗址中青铜器和石器并见,吕振羽因二者类型不同,做出殷商是奴隶社会的判断。尹达批评说,吕振羽所依靠的资料只限于小屯村的北地,不是殷墟的全貌,不能证明殷代已普遍存在冶炼场所。尹达的目光扩展到殷墟附近的村落遗址,他指出,这些村落遗址的遗存物中有大量的石制工具,却未见精致器物,这种情形显示殷墟遗址中心地区的铜制器物为氏族最高首领和下级指挥官所有,而边缘地区村落遗址中大量的石器,则是普通氏族成员所使用的工具。器物上的这种区分表明,“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是没落的氏族社会走向坟墓里去

① 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102页。

③ 尹达(1906—1983),原名刘耀,河南滑县人。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殷墟、河南浚县辛村和山东日照两城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研究部工作。

④ 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

的前夜”^①。尹达在论述中也对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进行了讨论，受到随后有的研究者的批评。^② 不过更有意义的论辩表现在如何理解考古资料方面。叶蠖生对尹达的诘难是：第一，对事物的考察首先要看它的质，而不是简单拘泥于量。殷墟遗址中青铜器水平很高，在质上已经发展到晚期（成熟）程度。第二，即就量而言，也要考虑其他因素。殷墟的石器数量多于铜器，可能与周人掠夺有关。第三，对比殷墟石器与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可以看出其残余迹象。^③

郭沫若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改变了对殷商社会性质的看法，可以说是对自己原有观点的一次颠覆性修正。在这时的他看来，殷商社会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达，尽管迄今未见殷以前的青铜器，但这个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大悬案”，并不影响殷代是青铜时代的结论。卜辞虽然显示了殷代繁盛的畜牧业，但由于与农业生产有关词语的大量出现，因此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卜辞对“众”和“众人”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记录，则说明殷商大量使用奴隶从事农业劳动。^④ 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吕振羽对殷商社会性质的意见。

翦伯赞关于历史分期的意见集中在其所撰之《中国史纲》中，^⑤ 后来又对其观点做了解释。^⑥ 他立论的基点有三个，即经济方式、阶级构成和家族形态。在经济方式上，与其他殷商奴隶社会论者的看法一致，翦伯赞认为农业是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生产部门，但在殷代是否出现牛耕的问题上，他比郭沫若要谨慎一些，他不赞成根据卜辞字形

① 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

② 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

③ 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叶蠖生：《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

④ 郭沫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版。

⑤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据《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⑥ 翦伯赞：《解释中国史前史上的几个问题——答复王尔宜君提出来的问题》，《新文化半月刊》，1946年12月，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的推测，期望“地下发掘之证明”。在阶级关系上，他认为，殷代社会形成了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的奴隶主集团，为首的是殷王，其下是接受殷王册命的师侯、邦侯、师长等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奴隶则包括甲骨卜辞记录的小臣、奚、奴、童、仆等。奴隶构成了殷代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主体。此外还有自由民。在家族形态上，殷代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度。

赞同殷商是奴隶社会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重要学者是范文澜。范文澜（1893—1969），字仲沅，浙江绍兴人。早年受到浙东学派影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并因谈论共产主义而被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①但1931年他出版的《正史考略》绪言中“广泛评述《春秋》、《史记》以下的史书及其作者，而没有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足见直到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治学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路”^②。社会史论战期间，他在北平高校任教。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与前述几位学者有所不同，范文澜的具体分析主要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他根据《尚书·梓材》所说的“皇天既付中国民”等传世文献记载，认为殷代的土地制度并非国家所有，而是殷王所有。第二，农业生产并非一定是奴隶社会的特征，殷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畜牧业而非农业。第三，金属农具在殷代并未得到广泛使用，金属农具开始普遍化，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端。第四，殷代存在大规模杀戮奴隶的现象。^③

社会史论战中除吕振羽外，王宜昌也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他的判断是殷代存在大量的奴隶，其来源是战争获得的俘虏。^④不过他主

^① 《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351页。

^② 刘大年《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9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第5卷第4、5期，1940年9月。以上概括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92—93页。

^④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

要是从奴隶数量上说明殷商社会形态，在理论分析的深度和缜密性上不及吕振羽。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看法虽存在分歧，但其分析的理论构架都是从劳动工具制作（石器或铜器）、生产类型（农业为主抑或畜牧业为主）、生产者身份（是否奴隶）、阶级构成（氏族部落首领和氏族成员抑或奴隶主和奴隶）、家族形态（血缘家庭抑或一夫一妻制家庭）等方面入手，进行讨论，显示出一致性的历史说明取向。

在社会史论战中有的人提出殷商社会是封建社会，其根据是这个时代已出现私有财产，^① 或出现侵略、众多的奴隶和土地占有。^② 这几项标准与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封建社会的说明大相径庭。此时几乎没有人再沿用这些说法证明殷商是封建社会，相反，奴隶的出现和数量多少是公认的奴隶社会的重要指标。胡厚宣正是由此对殷商奴隶社会说提出质疑。他指出，被作为殷商奴隶社会证据的卜辞中与奴隶有关文字如“奴”“臣”“仆”“妾”等都与奴隶无关，而卜辞和传世文献中的“众”或“众人”，是自由公民。殷商以分封为基本国策，故其应为封建社会。^③ 冯汉骥也认为自盘庚以后，由“固定的村落组织，自与一时常迁徙的村落社会组织大不相同，封建制度之始，大概亦于此时”^④。胡厚宣从更为专业化的角度讨论殷商社会性质，尽管他对封建社会的理解不是马克思历史理论所说的封建社会形态，因而在社会性质上与被质疑者并不是在一个框架中讨论，但“从文字学和史料学的角度指出殷代社会研究中存在的缺点，这对于中国古代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和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益的”^⑤。

① 胡秋原：《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3卷第3、4期合刊。

② 梁园东：《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

③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殷代封建制度考》，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1944年。胡厚宣（1911—1995），河北望都人，甲骨学家。

④ 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第5卷第5、6期1945年6月。冯汉骥（1899—1977），湖北宜昌人，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⑤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112页。

以当时讨论者的关注点看，这个时期关于殷商社会性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殷商时代是奴隶社会抑或氏族社会（主要的）抑或封建社会（次要的），讨论显示的迹象是，多数人主张殷商时代是奴隶社会。如果从后来者的眼光回顾，这个时期关于殷商社会性质（还包括下面谈到的西周社会性质）讨论留给人们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形态？殷商奴隶社会说是否能够成立？这是不同时代研究者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和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理解差异所形成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做过多评说。我们只想指出，在殷商社会性质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把握这个时代基本特征，同时对资料进行细致爬梳，并在对资料辨疑和相互诘难中完善了各自观点，使得讨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二 西周的社会性质

社会史论战期间，关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封建社会的出现时间歧见丛生，其中涉及的重要时代即是西周社会。关于西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主要意见有氏族社会（陶希圣）、奴隶社会（郭沫若、王宜昌）和封建社会（吕振羽、胡秋原、陈邦国）。陶希圣的论证是：西周的征服活动形成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但二者并非阶级关系，而是族与族的关系，“氏族的贵族平民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阶级”^①。其实，有关西周的资料都显示这个时期存在明显的阶级分野，因此陶氏的观点这时已不再为人们所重视，而奴隶社会说和封建社会说则成为两种主要看法。

西周社会奴隶说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的基本主张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已有系统陈述。其要点大体是：第一，西周出现了铁器，从而引发了社会变革。第二，西周出现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来源于被周人征服的殷人。奴隶作为生产劳动者广泛使用在农业领域。第三，西周的宗教思想系统——人格神的存在、神权政治的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

主张、以折中主义消灭辩证式的进化——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郭沫若的观点受到吕振羽、李季等人的质疑。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对质疑进行了回应，依循的仍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思路。

与郭沫若判断相同但论述过程有不小区别的是侯外庐，他的出发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力的来源和身份。第二，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形态。第三，土地与城市的关系。^①

关于劳动力的来源和身份，侯外庐认为周代社会的基本模式是，周人通过征战消灭了其他氏族，被俘的氏族成员被周最高统治者与各种器物一同转赐给贵族，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是奴隶典型标志的“工具”。主人与被俘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被俘者为主人的劳动是无酬劳动。要之，在战争和扩张中被俘的氏族集体性地沦为奴隶，构成了奴隶的来源。他们“由族人的集体奴分散为家族单位奴”，他们以“家”为单位（如康王时青铜器《麦尊》铭文所记得“锡臣二百家”），表明“集体族俘”向熟练生产者的集体奴隶的转变。

关于土地占有形态，侯外庐认为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以氏族贵族所有制为表现形式的国有土地制度。作为周土地制度特征之一的“受土”反映了周土地制度的基本要素，即土地是由先王从“天”那里得来的。“受土”即有国，“失土”即亡国。正是在这一土地国有形态背景下，形成了周人营国“左祖右社”的二元宗教思想。同样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周代的“宗法”政治。

关于土地与城市关系，侯外庐认为迁殷以后的商代以农村公社的家族酋长制为骨干，由于经济上没有分业，城市或国家还没有产生。到了周代发生了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周初的“筑城”以及周代社会存在的“国”与“野”的对立，反映了城市和农村的分裂。不过周的城乡分离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性质不同，西周的城市是“宗子维城”的宗法制城市，形成了经济上的城市与农村不可分裂的统一体。周的“封建”是一种分封制度，不同于社会形态所说的“封建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制”。可以看出，前两点是对西周奴隶社会性质的证明，末一点则是在表明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同时解释西周并非封建社会。

除马克思历史观中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理论外，侯外庐的上述观点更多地受到《资本论》对社会经济分析的影响，在同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他的论述有着较强的理论色彩。他提到的作为中国古代分封制度的“封建”和作为社会形态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的不同，这在当时不少人的观念中并不明晰，并在讨论中引起了混乱。如李季将《左传》昭公七年无宇所说的“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作为西周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说“这正是画出一幅封建制度的图形”^①。周绍濂将西周的“庄园”（分封）等同于封建制度，断言“周之封建制，确实建筑于各种庄园上面”^②。王亚南也认为，周的分封制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开始。^③ 尽管侯外庐等人多次强调西周“封建”与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封建社会”不同，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者当中，这两种概念仍未被彻底厘清（如前述的胡厚宣和冯汉骥），直到时隔60年后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对“封建社会”旧话重提之时，又一次出现了“封建制”和“封建社会”概念的迷惑。这不禁让人感受到理论在指导研究实践中的困难。

前已述及，西周封建说的首创者是吕振羽，此时他的看法又有所延伸。针对郭沫若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三条主要论据，即分封物中人与物品并提，是一种没有人身自由的物品；^④ 金文中被锡的臣和庶人是奴隶；以及金文中有奴隶买卖记录，吕振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被分封的人与物属于马克思说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一同赠予的封建的土地赠予，这些人是否是奴隶不能仅看其被赠予，更要看他

^①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

^② 周绍濂：《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的质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2卷第4、5期合刊。

^③ 王亚南：《封建制度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2卷第4、5期合刊。

^④ 《左传·定公四年》记殷民六族和怀姓九宗等与物品一同被分封。

在生产中的地位。西周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如“庶人”“夫”等式分田而耕的农奴。西周社会存在的奴隶如“舆”“皂”等是不从事直接生产的家内奴隶。而作为农奴的“庶人”等被赠予和转移，也是封建制度的常见现象。^①

与吕振羽观点相近的是翦伯赞。他不仅质疑郭沫若“对‘亚细亚的’这一名词的含义，未能彻底的理解”，而且批评他“把西周时代当作是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的时代，因而把中国历史上之真正奴隶制时代的商代，反而划入他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②。从经济（土地制度）、政治（国家形态）和社会（等级制度）三个方面对西周社会性质进行了正面论证。^③

在土地制度方面，西周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庄园制经济”领主通过占有土地，对土地上耕作的农奴进行以“赋”（田赋）和“役”（徭役）为表现形式的超经济强制剥削。农奴从领主那里领取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和耕牛）后，在“田峻”即管家的监督下进行集体耕作，只有在为封建主土地耕作完毕后，才能“治私事”即耕种自己的份地。

在国家形态方面，周建立后，通过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废除了殷商奴隶制度。通过大规模分封诸侯，使西周国家拥有了大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在受封地上实施封建主义的统治，将包括自由民和奴隶在内的居民转化为农奴，让其在封建庄园的上耕作劳动。这种分封形成了《国语·晋语》所说的“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即不同等级的封建主。

在等级制度方面，由国家形态和土地制度所决定，西周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等级关系，即以庶人以次而上达周天子的贡纳制，这就是

^①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氏著《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9年版。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③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据《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左传》昭公七年《传》芊尹无宇描述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值得提到的是，翦伯赞在西周封建说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决定论色彩，在他看来，“殷末的社会经济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它的变革过程，即使没有周族的入侵，它一定也能从其社会经济自身的矛盾之发展中完成由奴隶制经济到封建制经济之转化”^①。

同为西周封建说主张者的范文澜的判断显得有些谨慎，在主要方面，他承认西周社会具备了封建社会形态的要素，如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农奴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权，并拥有私有经济，等等；在次要方面，他又认为西周社会保留了许多奴隶社会的残余成分，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描写的生产场景就很像奴隶劳动。不过他还是强调不能把这些残余误当做这个社会的本质，“即使在开始时，旧的还占较大比重的力量，而必然要被新制度所代替，是无可置疑的”^②。

上述讨论都涉及对土地制度和社会分层的理解，事实上，井田制形式和实质、庶人身份等确是中国早期社会的关键词语，对它们理解的差异，足以构成或改变对西周社会形态的认识。

《孟子·滕文公上》记录了孟子对滕国（今山东滕州）所进行的井田制规划：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对这段文字的理解聚讼两千多年。20世纪以来关于井田制的争论发生在20年代初，胡汉民在一篇并非专论井田制文章中提出“井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初版，据《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②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5卷第4、5期。

田是计口授田、土地公有、古代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公元前8世纪井田制度遭到破坏后，“使社会全体生活根本动摇”^①。随后胡适写信质疑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看法，这即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引人关注的《井田辨——寄廖仲恺先生的信》，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井田制问题的论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井田制度的有无和井田制下土地制度的性质。胡适否定井田制的存在，站在这一边的有季融五；胡汉民肯定井田制的存在，站在这一边的还有廖仲恺、朱执信和吕思勉。^②胡适以近代实证史学的方法审定史料，指出孟子对井田的描述存有大量主观拟构成分，并注意到了先秦文献之间的流传、演变关系，对以后井田制研究奠定了史料学基础。^③讨论涉及的两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社会史论战和这个时期古史分期讨论中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难点。

除去否定井田制存在的观点外，社会史论战期间关于井田制性质的代表性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种，（1）井田制是氏族社会的土地分配制度。^④（2）井田制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取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⑤。（3）井田制是“半共有半私有制度”中的土地状态。^⑥（4）井田制是贵族阶级剥削整个庶族阶级的“土地的阶级独占制”^⑦。（5）井田制是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一种土地形态。^⑧

如前所述，郭沫若关于井田制的看法发生过变化。在《中国古

① 胡汉民：《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63—154页。

② 徐歆毅：《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8—9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康生：《中国社会的蠡测》，《新生命》第1卷第16号，1928年。

⑤ 陈邦国：《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

⑥ 周谷城：《现代中国经济变迁概论》，《中国社会史论战》第3辑。

⑦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⑧ 王亚南：《封建制度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辑第4、5期合刊。胡秋原：《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辑第3、4期合刊。

代社会研究》中，他认为井田制是“有问题的书”和“后来文献”的描述，不能成为有效证词——这与胡适否定井田制的理由一样。后来他读了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的《支那历史地理研究》中《阡陌与井田》一文，受到启发。小川琢治比较了古罗马都邑和田野划分方法后认为，这与井田制颇为近似。郭沫若从中推想“古代田制或有与罗马制度相仿佛之处，故先秦学者始据以创立井田说”^①。经过反复，到1944年郭沫若开始承认井田制的存在。他的论证过程是，首先，孟子的井田制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它所根据的应该是《考工记》的《匠人》职文，或与《匠人》职文同根据一种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②。其次，甲骨卜辞中的“田”字是一个象形字，古代必有过豆腐干式的田制才能出现四方四正、规整划分的“田”字。再次，周金文中许多土地赏赐和交易都以“田”为单位。此外，古代灭人国有改变“亩道”之事，“亩道”正是对土地的规整划分。因此“我们确切地可以说：殷周两代是施行过豆腐干式的均田法的”^③。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吕振羽也援引金文资料，肯定井田制的存在。但郭氏的证明要更为系统。井田制何以能在中国古代出现？郭沫若认为，井田与西周奴隶制度密不可分，通过井田的划分，奴隶主既可以考察奴隶劳动状况，也可以作为奴隶劳动管理者的报酬单位。他特别之处，井田制中队土地的分割，只是对土地的“享有”，并不意味着所有权上土地的“私有”。至于《诗经·大田》所说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也不过证明在公有的土田之外有了私有土田。

对井田制的认识在西周封建论者那里就完全不同了。吕振羽认为，井田制下“私田”是领主给予农民的“分与田”，以此把农民

①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122页。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1页。

③ 同上书，第621—633页。

束缚在土地上面。^① 翦伯赞将井田制定义为封建庄园，这种封建庄园由封建领主直辖的庄园和领主委托或派遣家臣经营的庄园构成。先秦文献所说的“公田”即是前者，而“私田”便是后者。经营庄园的“君子”即是封建领主，在庄园上从事劳作的便是农奴。^②

既然是封建社会，西周时期生产者的主体自然就不是奴隶，这是西周封建论者的一致意见。翦伯赞认为“庶人”是一个复合体，其中虽有工奴和贱奴（即“臣”“妾”等），但其主要成分是农奴，他们可以被封建领主作为获得财产赏赐、买卖和偿债，但并不是奴隶。^③ 范文澜则指出，西周的“庶人”有自己的家室，他本人有为封建主服徭役的义务，但“家室却是私有的”^④。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将“庶人”定义为奴隶，此时，他对奴隶的身份做了进一步说明。他根据周金文和传世文献相关记录，概括了“庶人”的几个特征，即“庶人”既可以被“授予”，也可以买卖。是典型的奴隶身份。西周的“庶人”虽容易与农奴混淆，但被束缚于土地上，经营半独立性经济，向主人纳税。这与古代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相仿。周代的“庶人”即是“黑劳士”式的农业生产奴隶。

显然，西周社会奴隶论者和封建论者意见的分歧不仅在于对“奴隶”“农奴”定义理解的差异，也在于对资料看法的不同。同样的材料，如周金十二器铭文关于庶人赏赐、赠予和买卖，在奴隶论者那里被用来证明“庶人”即是奴隶，在封建论者那里则被作为农奴的根据；传世文献所说的殷民六族、怀姓九宗，在奴隶论者那里被用来说明“种族奴隶”的普遍存在，在封建论者那里则被视为是数量众多的农奴。对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的明晰化和进行重点探

① 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原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收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四册《中国社会史论战（上）》，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2年，第123页。

②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同上。

④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第5卷第4、5期，1940年。

讨,是此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研究的一个进步,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认识能力的提高。但同样也反映出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在理论的把握上还不够圆润,对史料理解有牵强的缺陷。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

社会史论战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有所涉及,除郭沫若明确主张“周室东迁前后”即春秋时代开始,“中国的社会是由奴隶制变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时期”^①;也有一些论者在研究西周社会的同时,捎带顾及了春秋战国的社会。由于大都不是对春秋战国的专题讨论,因此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深入分析,是从此时开始的。^②

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春秋战国社会形态认识主要有两种看法,即不同社会形态间的社会变革说、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阶段说。

郭沫若主张春秋战国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变革时期。他的研究思路由如下方面展开: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土地制度的改变。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根据《诗·公刘》“取厉取锻”认为周初发现了铁,这时他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相当严重”,《公刘》的这句话

^① 郭沫若:《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② 社会史论战中,除郭沫若主张两周之际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外,其他意见有:(1)奴隶社会说,代表人物是陶希圣、王宜昌和周绍濂。主要论证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兴盛,西周的庄园奴隶制被商业资本力量打破,农民土地被剥夺,沦为奴隶(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周绍濂:《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的质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1931年第2卷第4、5期合刊)。或认为战国时期的主要阶级是奴隶主和奴隶,奴隶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重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3卷第7、8合刊)。(2)“先资本主义时代”说,代表人物是胡秋原。主要论证是由于商业大发达,破坏了封建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集中和封建制度的衰落,使社会进入“先资本主义时代”(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可以看出,当时的讨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的界定上相当混乱。

“没有炼铁的意思”^①。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土地的更大范围的开垦成为可能。作为西周奴隶制社会经济基础的井田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遭到了破坏：

私田的垦殖是在国家大法的范围之外的，当然不必遵守你那种四方四正的古板办法，而且也不能遵守。山林陂隰，那是无法拓出井字来的。这就是所谓“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也就是所谓“辟草莱，拓土地”了。

井田制的破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而私田的产生则是由于奴隶的剩余劳动之尽量榨取。这项劳动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坏了井田制的原动力！^②

郭沫若认为，井田制的破坏不是同步进行的。其中鲁国发生的较早，有的国家来不及蜕变便被别人吞并了，“但在战国年代所有存在着的国族都先先后后起着变革，一直起到秦始皇并吞六国，乃至陈吴刘项的奴隶大暴动的成功为止才达到了它的最后终结”^③。

第二，井田制的崩溃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首先，对于奴隶剩余劳动无限制的剥削使地主阶层和工商阶层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势力逐渐庞大。这两个阶层的出现，对于原有的奴隶主阶级造成严重威胁。其次，原本也是统治集团成员的一些大夫或陪臣在羽翼丰满后与更上层的统治者形成敌对之势，他们“必然地要转换作风，把被剥削者的大群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与公家对抗”。私家和公家之争是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国家共通存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人民争夺战”，“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从奴隶的羁绊解放出来”^④。郭沫若特别提到了“士”阶层的出现。在他看来，春秋时代“士”已经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氏著《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43—44页。

③ 同上书，第49页。

④ 同上书，第61页。

包括来源于奴隶的小地主，他们可以被遴选出来，参与政治活动。“士”在春秋前期大抵是各诸侯的公室所蓄养，其成分以贵族子弟居多。到春秋末叶以后，私门也大量养士，“士”的来源也复杂起来，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流都可以成为“士”，“表示着在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奴隶解放的程度相当彻底”^①。

第三，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士”地位上升后，上层的礼乐刑政地位也随之下降，文化发生了“对流”：不下庶人的礼乐，一部分下了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部分也登了上去。在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奴隶解放，人的地位提高，出现了儒家“仁”、道家“慈”和墨家“兼爱”观念。以前被上层统治者所蔑视和忽略的民间语言，也被接受，得到流播。

郭沫若关于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反映了他在历史意识上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坚守。从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到井田制度的破坏，到社会阶层的变动，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郭沫若完整地构建起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说明。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有较为明显的教条化表现，在此时的研究中，教条化的色彩则少了许多。他不反对生产工具在社会变革中的意义，例如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用相当多的文字讨论铁器和铁制工具的出现，但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铁器讨论放在井田制崩溃之后，而且在探讨井田制瓦解时强调的是奴隶主对奴隶剩余劳动的无限制榨取——这似乎暗示了郭沫若对欲望在历史上作用的肯定，并没有直接论及铁器使用的作用。郭沫若的论述显示出他意识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所具有的复杂性。在研究井田制崩溃时，他指出了社会变革的不平衡性，即变革不是所有地方同步进行，而是有着前后的差异。在研究奴隶社会完结时，他考虑到历史的反复性，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并没有直接造成一个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是一个奴隶

^①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氏著《十批判书》，第65页。

制帝国，“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而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由后一阶段的建设制言，可以比为水达沸点前的一时镇静”^①。尽管对秦统一六国性质人们可以有不同评判，郭氏本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但郭沫若历史观中所表现出的辩证因素，是值得肯定的。

吕振羽和翦伯赞都主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延续的两个阶段，但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吕振羽侧重于剥削形式的变化，他以鲁国“初税亩”、郑国“作丘赋”等历史事件为例，认为春秋末期封建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即实物地租）发展，到战国末期完成了这个转变。封建领主因此陷入财政危机，与此同时新兴地主商人力量不断增强，吕振羽认为，秦的统一标志着由初期封建制进入专制主义的封建制。^②

翦伯赞侧重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他认为，在社会结构上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天子成为诸侯的附庸，诸侯地位日隆；封建小领主没落，成为游说之士，扶助旧领主，反对新兴商人集团。在经济结构上，由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和庄园制的破坏，农奴阶级出现了分化，一些人成为商人，另一些人则沦为贱奴。最终的结果是，多数农民成为佃农。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推翻封建制的经济，只是把初期的封建制，推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经济而已”^③。中国封建社会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翦伯赞还指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到思想方面。例如，战国时代是中国封建“领主经济”向新兴“地主经济”转变，这一时期的封建领主一方面感于农民反抗运动的勃兴，又感于新兴地主——商人力量的抬头，遂出现了孟轲的“封建调和主义”，即企图使封建领主与新兴商人统一起来对付农民的反叛，同时在“民为贵”口号下，缓和农民反叛。战国末随着商人势

① 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收入氏著《十批判书》，第457页。

②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之《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7月。

③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翦伯赞全集》第2卷，第38页。

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贵族完全退出政治和经济舞台,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出现了代表没落封建领主意识形态的庄周的“厌世主义”哲学,也出现了代表新兴统治者利益的荀子的一系列主张。^①

尽管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二人都十分重视商业活动的意义,对其他社会因素的论述不够深入。正如有的评论所说,他们“对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阐述,都不是很深入的。西周封建论者对这个时期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和探讨,还要留待建国以后”^②。

此外,侯外庐主张战国末和秦汉之际是中国的封建化过程,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第二节 批判与论辩

1938年到1948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继续深化古史分期研究的同时,对宣扬侵略的反动史学观进行抨击,也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展开了论辩。

一 对秋泽修二侵华史观的批判

宣传侵略合理的史学观点来自日本,代表性人物是秋泽修二。此人早年服膺马克思理论,并以之研究中国历史。后堕落为日本法西斯的文化帮凶,力倡中国社会停滞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张目。因此,他的观点理所应当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严厉批判。

系统批判秋泽修二的学者是吕振羽和华岗。^③他们针对秋泽修二对中国历史的如下划分——殷商时代是氏族社会、春秋战国到秦汉时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45页。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第135页。

^③ 华岗(1903—1972),原名华延年,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浙江龙游人。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主要著作有《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纲》《中国历史翻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

期是奴隶社会、汉至唐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唐至清末是封建社会——提出了批评。吕振羽指出，秋泽修二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错误，他把一个社会中残余的现象视为这个社会的本质，从而不见春秋战国以后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是农民，而奴隶不过是补充这一历史实际，以片面概括全局。因此，秋泽修二“不但抄袭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历来的花招，从零片的、部分的现象去夸张，企图把本质掩盖起来；而且拿部分去概括全部，以残余作为主要。这在他们夸张秦汉或春秋以来的奴隶制的残余性质时，也同是这一诡辩的逻辑公式的应用”^①。华岗也认为秋泽修二的亚细亚社会观点，以“‘残存’的东西”给予“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以支配和决定的作用”，“真可以说是海外奇谈了”。他还批评了秋泽修二关于过渡期的说法，他嘲讽说从汉末到隋唐历时千年，“过渡而需要千年，无异说婴孩出胎的经过实践，要长过其母体的年龄，岂不是千古奇闻！”^②本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对中国历史分期自可有不同意见，但秋泽修二的目的并不在于学术上，而是企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划分，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这一点在他关于中国社会“停滞性”的论述上表现得更为直接。

秋泽修二认为，中国社会一直保留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使得中国社会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同样是从方法论出发，吕振羽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迟滞性”与秋泽修二所说的“停滞性”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乃至其他许多‘文明古国’，其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较迟慢，这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史家便给予其比较迟缓的进程以‘停滞性’的规定（我认为中、日译马克思列宁文献中的‘停滞性’可改为‘迟滞性’）。正确地说来，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客观规律的下面，采取着一般的共同进程；但并不规定相同的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

^①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3页。

^② 华岗：《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吕振羽等编著：《中国历史论集》，东方出版社1945年版，第82、86页。

其独自的特殊性。”^①因此，用“停滞性”来定义中国社会的历史道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只是秋泽修二的“虚构”和刻意的“颠倒是非”。

秋泽修二中国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外族侵入是改变并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举例说，殷商氏族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便是在周人的征服下完成的。外族征服推动中国进步的现象，在周以后不断出现。对于秋泽修二这种曲解中国历史的做法，华岗直斥为是唯心主义的“外铄论”和“循环论”的结合，其用意在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辩护”，让中国人民放弃抵抗，并感谢“侵略中国的外族”^②。吕振羽也指出：“当作对立的或彼此从不相属的异族之‘周种族’的侵略把‘殷种族’‘征服’，便完成了中国社会由氏族制转化到奴隶制的变革任务，从而又创造出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这应用到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宣传意义上，就是在说，如果中国人民肯欢迎日本帝国主义来征服中华民族，便能‘破坏’‘中国社会的特有的停滞性’，给你以‘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道路。”^③华岗等人的分析并非是主观臆测。据吕振羽揭露，秋泽修二曾自陈他研究“中国社会构成”的最中心的“主要课题”，在于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中国与“日本结合”^④。

对秋泽修二的批判主要是政治上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学术上的说明，但显然不能与此前社会史论战和此时其他一些学术讨论同日而语。不过这并不影响这次批判的积极意义。对秋泽修二法西斯侵华史观的揭露和抨击，清除了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史观在中国曾经产生过的一些影响，也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民族存亡关

^① 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6页。

^② 华岗：《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吕振羽等编著：《中国历史论集》，东方出版社1945年版，第79页。

^③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56页。

头的社会担当。

二 对胡适实验主义历史观的批评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传播西方民主和科学观念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上，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主张“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①希望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改造社会。在历史观上，他反对历史唯物论，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的这个立场引起了中共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感，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希望范文澜能对胡适的错误“有所批判”^②。而重庆的翦伯赞则对此进行了实践。^③

翦伯赞的观点见诸1940年5月发表的《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④他从三个方面批评了胡适的历史观念。

第一，关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和“牵着鼻子走”的问题。翦伯赞认为实验主义在德国表现为谢赫的人本主义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在美国则以杜威的“应用主义”而出现，它是“以极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乘着哲学的贫困时代而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方法论上说，是一种“庸俗的思想方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美国资产阶级“权利意识和企业精神的一种表现”。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代表了人类文化优良的部分。胡适搬用杜威的理论，告诫青年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要他们“学一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实际上是用落后的实验主义代替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翦伯赞反诘道：胡适说上述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

① 《胡适文存》第1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毛泽东对范文澜的建议时当1940年9月，翦伯赞对胡适的批评文章写于1940年5月，可知翦伯赞此时对胡适的批评并非受到毛泽东的授意或影响。

④ 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重庆《读书月报》第2卷第3期，1940年5月。本书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翦伯赞不仅批评了胡适对科学社会主义“完全采取污蔑的态度”，而且也指出他否定传统文化的极端立场。翦伯赞认为，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武器，打击中国古典圣贤经传，“以为这些如果不是伪造，便是封建的残渣”，这是一种虚无主义态度。翦伯赞批评了胡适企图“赤手空拳凭空建立中国文化”的幻想，指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主干部分的儒家学说，应持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的立场。他说：儒家学说中存在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一些积极成分，我们否定封建主义文化，不是用武断的方法予以“完全的消灭”，而是“从否定的东西中找出肯定的东西来，即使否定的东西获得辩证的统一”。

第二，关于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①。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胡适还写道：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②。翦伯赞认为，胡适的这些说法表明，在他所秉持的实验主义历史观中，不但不存在客观的历史规律，而且也没有现实的历史，历史只是依靠人的主观观念的目的而显现其形象，而客观的实在只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布的物品。翦伯赞认为，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类生活的发展，历史的实在性是离开人类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不是人类的主观观念决定其发展倾向，而是发展倾向决定人类的主观观念。人对历史的创造不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而只能顺应历史之客观的倾向创造历史”。他举例说，只有当私有财产发生之后，希腊罗马氏族贵族才能创造古代的奴隶国家；只有当奴隶制经济崩溃时，日耳曼人才能在欧洲创造封建的国家；只有在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的历史条件下，近代欧洲市民才能建立其阶级的统治。他总结说，中国实验主义者从西方那里学习了一些最简单的知识，以此来武断中国历史，是非常可笑的。

① 《胡适文存》第1集，第197页。

② 同上。

第三，关于“点滴进步”和历史规律。在翦伯赞看来，实验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点，即在历史发展上强调“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明因求果”的因果律论。胡适对“点滴进步”有下面的表述：

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的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事实——才是真进化。^①

这种观念运用在历史上，“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这就是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的到现在的样子”。胡适还说这是进化论的一个结果。^② 翦伯赞问道：既然实验主义者认为自己继承了进化论学说，为什么要抹杀达尔文学说中的物种突变论？他指出这是在哲学上取消质变，在社会历史观上取消革命：

很显然地他们是要借此否定人类社会之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事实之存在。他们以为人类社会是永远在和平进化中发展着，人类社会就是在同质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伸延和发展，从古到今没有质的突变。从今往后，也不会有质的突变。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社会怎样一点一滴的和平进化到了现在。

翦伯赞认为：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所谓“发展”，都不仅仅是量的增大或延续，“只要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原来的东西就会失去其以前的质，而在新质上面成了另外的新的东西”。如果仅仅承认连续性的和平进化，就等于否认了历史的变革和革命，“然而在现实的历史中，这种变革和革命是存在着的”。

胡适不反对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讨。他用“祖孙的方法”这个通俗的比喻说明实验主义的因果观：

^① 《胡适文存》第2集，第535页。

^② 同上书，第415页。

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東西，总是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厉害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①

翦伯赞认为，历史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也存在着普遍的交互作用。一个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出另外的现象。先行的现象是原因，继起的现象是结果。因果性的关系要得到比较全面的证明，“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一定的现象再产生出来的时候才能得到”。因此考察因果关系在不可避免地把个别现象从一般联系中相对地孤立出来时，不应忘记这些因果关系的相互联系。实验主义把“明因求果”方法，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孤立的单个关系，“原因不能成为结果，结果不能成为原因”，“没有看见各现象的整个联结及其交互作用”，不理解历史现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不理解一切历史运动都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和普遍的交互作用，把因果性作为规律性的唯一形式，因此并不能真正解释历史的变化。

第四，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胡适对历史上个人作用的重要性的评估臻于极致。他说：

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

^① 《胡适文存》第1集，第234—235页。

头，也许可以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①。

翦伯赞指出，胡适在这里极端颂扬“个人”，以为历史就是这些“个人”的意志。中国的哲学，是孔子这个“个人”想出来的，后来又被秦始皇这个个人消灭了。中国哲学史就是孔子加孟子，孟子加荀子，荀子加朱熹这些特殊“个人”一点一滴的意识，机械相加的历史。实验主义者所谓的“个人”是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他可以不顾历史条件创造世界，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或“上帝”。翦伯赞认为，应当承认“个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但“个人”的意志在本质上是“被规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的，社会发展最终并不取决于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和思想，而是由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迁来决定。个人，“只有他能反映出整个民族和民族中的整个阶级的意识的时候，他才能够形成一个历史的行动，否则他决不能给与社会以影响”，因此，不是特殊个人的一言一笑、一行一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的发展条件决定着特殊个人的言笑行动。

翦伯赞把“个人”的历史作用进一步引入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范畴中。他认为，特殊个人的出现和他的作用属于历史中的偶然，历史的偶然性不仅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历史的偶然，并不消灭历史发展之必然的规律；反之我们只有把这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起来看，才能正确地理解个人对历史的作用。”

胡适的主张并不限于翦伯赞所批评的这些内容。例如他提出重证据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说这个精神的实质是“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说这个方法的要旨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即

^① 《胡适文存》第4集，第422页。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①。翦伯赞未提及此，并不意味着他对胡适这些主张的认同，他关于历史研究中史料的处理方法与胡适和傅斯年大不相同，这些容后文叙说。这里要强调的是，翦伯赞对胡适历史观的批评，着眼的是实验主义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具有挑战性的方面，虽然有的论证还不够细致和深入（如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但就整体来说，仍然打中了实验主义的要害。

三 关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

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②认为满蒙回汉藏“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指出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其血统错综复杂，其文化亦无明确的界限。顾颉刚本意是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背景下，以此为出发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③。此时的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格外关注，他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学界友人讨论这类问题。傅斯年对此有所担忧，顾颉刚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④这就是这篇文章写作的缘起。《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誉贬均有。白寿彝致信称顾颉刚此文系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首篇文章。而费孝通则表达了不同看法。^⑤顾颉刚遂于同年4月撰写《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和《续

① 《胡适文存》第4集，第623页。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③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④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⑤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回应，^① 强调要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后来费孝通了解了顾颉刚的初衷，遂表示完全拥护顾颉刚的政治立场，在学术上保留意见，因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没有再写文章。^②

然而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并未中止。次年，翦伯赞撰文与未曾谋面的顾颉刚进行讨论。^③ 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他将“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出发点和结论是不正确的。顾颉刚根据当时欧美学界流行的对“民族”界定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能同安乐、共患难的”人群的定义，认为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因此语言、文化和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主要条件的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翦伯赞指出，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顾颉刚出现了两个错误：“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翦伯赞从如下方面阐述了他对“民族”概念的理解，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见。

首先，翦伯赞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认为“民族”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的概念，与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济联系，以及有

^①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②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集》，《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96页。

^③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重庆）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本书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顾颉刚1944年5月8日日记云：“伯赞与予初交而作深谈”（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18页）。是1944年4月，翦、顾二人始识，又可见此次“笔战”并未影响二人的交往。

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顾颉刚认为民族只是一种“团结的情绪”，且与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等无关，是不正确的，因为想把中国国内一切不同语言、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决不是自己发生的东西，必须有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联系他才能表现为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表现为民族意识”。如果否认表达民族意识的具体形式，而只认为是一种空洞团结的情绪，则可导致出现不正确的结论：“我们知道顾先生之所以把民族抽象为民族意识，再把民族意识抽象到最高度的单纯的顶点，为的是要去掉中国国内各民族的特征与民族间的差异，从体质到言语文化的差异，而使一切民族在这一最高度的最单纯的抽象范畴上，达到同一，从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的之正确。然而假如用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则我们大可以说‘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因为他们都是人类，都有人类的意识。”

其次，顾颉刚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秦统一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样多，也总能容受”。翦伯赞批评说：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必须有统一的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又说在秦统一前，中国早已有统一的民族，这是自相矛盾。

再次，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混淆了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顾颉刚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因此汉族“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翦伯赞认为，民族的融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与汉族接触后便消灭，或同化于汉族。在融合过程中，既有外族加入汉族的，也有汉族加入外族的。即便汉族文化在中国乃至在东方都在领导着文化，但只能给予各民族以文化影响。“所谓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所以一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

最后，顾颉刚写道：“我现在要问，汉人能成为民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他不是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他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他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现在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就是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翦伯赞批评说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概念的理解存在误解：“民族是种族的变质”，“从种族到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

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严肃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近代化过程兴起后的话题。20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解部分来自西方世界，部分来自斯大林理论^①——后者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是国内学界对民族确认的标准，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讨论中，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成为学界遵循的唯一标准。而新近的研究则倾向于使用“族群”（Ethnic group，或 ethnicity）概念，它指一群基于血缘或世系而相互认同群体，或基于文化、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与其他有所区别的群体。顾颉刚的理解似乎与“族群”更为接近。关于“民族”概念的分歧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们无意评论顾、翦二人的孰是孰非，但两位学者关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形成的讨论，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 批判“战国策”派

以林同济^②、雷海宗^③和陈铨^④等为代表人物的战国策派，是20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1913年）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② 林同济（1906—1980），福建福州人。主要著作有《天地之间》，译著有《哈姆雷特》。

③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主要著作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

④ 陈铨（1900—1969），四川富顺人。主要著作有《从叔本华到尼采》《中德文学研究》。

世纪4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文化流派,^①以1940年至1941年创办发行《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②这个流派主要成员的学术来源多样,但都以爱国救亡为目标,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试图通过振兴中国文化和改造政治制度,探索一条存亡强国之道。他们以文化形态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宣扬“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战国策”派出现之时,正是国共两党关系紧张时期,这个学派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以及其代表人物公开批评马克思理论,^③一方面既不能完全见容于国民党舆论,更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学派的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直斥其为“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的第五纵队”^④“最下流的唯心论的代表”^⑤。

“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来源于德国斯宾格勒的主张,^⑥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文明的成长与人的成长是相同的,经历了列国时代、战国时代、大一统帝国、蛮族入侵和文明灭亡的生命周期。“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和理路脉络如下:

文化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独立成长起来的,每个文化都有其自

① 这个流派中的思想文化界人士还有贺麟、何永佶等。

② 1941年7月,《战国策》杂志停刊后,复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

③ 战国策派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参见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除去见诸文字的一些论述外,他们在授课时也表现了对马克思理论的不以为然。一次,学生提问说人类社会是否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林同济回答道:“马克思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人的话未必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今后是不是这样,还要看事实的演变,不是现在可以断言的。”(何兆武:《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1页)

④ 章汉夫:《“战国”派法西斯主义实质》,《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胡绳:《论英雄与英雄主义》,《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⑥ [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ler)《西方的没落》第1卷出版于1918年,1922年出版第2卷。俞颂华《德国之文化形态学研究会》(《东方杂志》第20卷第4期,1923年)介绍了斯宾格勒的基本观点。随后,有关斯宾格勒主张的译介和评论日多,主要有葛达德、吉朋斯合著,张荫麟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学衡》第66期)、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朱谦之文集》第5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6页)、张君勱:《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身的发展和消长过程，例如中国的殷周时代与同时的欧洲和西亚的历史性质完全不同，“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纯一的历史，必致到处碰壁”，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个文化实践与空间的范围认识清楚，然后断代的问题以及一切的史学研究才能通行无阻”^①。

文化同时还是一个有机体，每一个文化都经过了大体相同的阶段，这些阶段主要有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文化灭亡的末世时代，^②或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一统帝国阶段——甚至每个阶段中不同文化也表现出若干彼此类同的“若干根本形态”^③，从而形成了一般性的“历史的形态”。因此历史上不断出现着“历史重演”现象。雷海宗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特征后，提出了“二周期”说。这个看法的要点是，不同于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这些文化经历了从封建时代到文化灭亡5个阶段后都消亡了，中国文化则经历了两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从殷商到东晋初的淝水之战，是纯粹的华夏民族的文化时代；第二个周期从淝水之战到20世纪前期，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的文化时代。中国文化之所以在第一个周期结束后，没有像古代埃及等文化那样灭亡，是因为文化中心在西晋时期的南移，迁徙于长江流域的中原人是“从优秀分子中选择出来的优秀分子”，造成了“在别的民族已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的格局。^④这个说法与“战国策”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陈诠所提倡的英雄崇拜正相表里，在陈诠看来，群众是渺小的，如果历史上没有英雄人物的存在，群众就如没有牧人的绵羊。

在“战国策”派的上述观点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重点批判的是“历史重演”论和英雄史观。在“历史重演”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学

①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0页。

② 雷海宗：《历史形态与例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0页。

③ 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④ 雷海宗：《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伯伦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0—201页。

者认为，“战国策”派通过宣传历史循环论歪曲中国历史，并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未来的走向起到了有害的作用。一种批评指出“战国策”派历史重演论否认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不符合历史事实：“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向着进步的，较前更高的阶段发展，纵然在发展中有些地方某个时期是黑暗的，倒退的，类似历史上早期阶段的某些现象，然而这也决不是历史的重演。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其内容和意义，也是和以前不同的。顶多，也只是现象的某些地方类似而已。类似就不是相等。”^①一种批评认为，“战国策”派把不同历史现象混为一谈，例如“今天的世界战争，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有被侵略的民族解放独立的战争，也有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战争”，但“战国策”派却不相信或不承认有这样的区别，“而混称之为‘战国时代’”^②。有的研究者断言，“战国策”派说“今天的世界要循环到‘战国时代的重复’”，就是表明“他们所算定了的将来秦始皇的世界‘大一统’。独裁的恐怖与狂欢的史的循环论”^③。在英雄崇拜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战国策”派反对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强调英雄对群众的“管理”和“支配”，从本质上说，是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史观。

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主要是政治上的，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显著差异，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批判的一方大都政治立场鲜明，火气十足，对“战国策”派的主张存在重大误解，对其定位有失公允。值得提到的是在重庆出现的一个插曲。侯外庐回忆说：

记得，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群众》主编章汉夫著文批判《战国策》，点了雷海宗的名……我们都意识不到有什么问题，而周恩来同志指出，从抗战的大局

① 章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页。

② 茅盾：《“时代错误”》，重庆《大公报》1941年1月1日。

③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群众》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

出发，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①

侯外庐提到的章汉夫的文章应该就是本书引录的《“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周恩来说要“从抗战大局出发，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实际上已在暗示战国策派的主张，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理论，“战国策”派学者属于抗战阵营。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战国策”派政治追求和学术研究的公正评价，要延宕到20世纪80年代，令人感慨。

五 批判复古倾向

“复古”即肯定和溢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这种观念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扫荡，却一直没有中绝。翦伯赞曾批评过其中的“正统主义”表现。所谓“正统主义”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一个主流观念，“即在中国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指定一个集团，作为合法的政府，以之承继正统，而与这个合法政府同时并世之其他的政治集团为非法的僭伪政府”。翦伯赞指出：“正统主义，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用以辩护其‘家天下’之合法的说教；而其出发点，则是‘皇帝至上’的思想。”^②对于史学界中“复古”主张的系统批评是胡绳^③对钱穆^④历史观的批判。

20世纪40年代，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⑤他立意于续承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以古鉴今，通过历史认识中国历史。在该书“引论”中，他将新史学以来的史学流派分为三个类型：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3页。

^② 翦伯赞：《论中国史上的正统主义》，重庆《民主星期刊》，1946年4月20日第19期。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③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遯，江苏苏州人。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香港《大众生活》编辑和重庆《新华日报》社编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出版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

^④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述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等。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⑤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原文为小字注出,现改为括号,下同——引者),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也,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结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国史之认识,故今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①

钱穆所说的“革新派”上起自史学革命的发动者梁启超,主要则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他对传统派和科学派月旦不多,唯独对“革新派”偏爱有加,行文所至,不仅有本书引录的上文,还专辟一节分析“革新派”史学的三期递变,实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系统评论,值得重视。前引这段文字,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概括为三个特点,即第一,研究目的上的致用性

^①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页。

(“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第二，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能求把握全史”)，以及第三，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些本质性内容如关于存在决定意识、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个方面在其后文间有所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内容，都未涉及。不过，就其所谈的方面，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情则庶几近之。

然而，钱穆并未由此而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他对“革新派”提出了四项严厉指责：第一，急于求智识，急于问材料，对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因此其理论不过是空中楼阁。第二，对历史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不能成立。第三，对民族文化的评价来源于一时的热情，并未有实际根据。第四，以历史为宣传工具，进行社会改革。急于事功，伪造智识。可见钱穆对“革新派”的指斥实有全盘否定的意味，又可见他开始时将“革新派”的高高抬起，只是为了随后的狠狠摔下。

钱穆提到“历史智识”是指通过对历史的认识而得到的判断，获得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他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

“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计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①

^①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1—2页。

钱穆不但不反对“历史智识”的随时变迁，而且还主张“历史智识”应当贴近现实，应当鉴古知今——在这一点上，钱穆与并世同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实无不同，而钱穆本人认为，他重视史料而“革新派”则空谈史识。他自认所追求的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①。在这里钱穆又表现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某种认同。简言之，钱穆并不反对“革新派”实践的以历史研究服务于当下，他异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是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

钱穆思想上的复杂性，说明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的实际情形，也反映出文化界对此存在的“排异”和“抵抗”。可能是由于钱穆思想上的这种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批判也相对较为温和。

对钱穆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批评主要由胡绳的两篇论文组成，即写于1944年10月的《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和写于1944年12月的《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

胡绳没有全盘否定钱穆的历史观念，他赞同钱穆把“历史材料”和“历史智识”分开，将鉴古和知今结合起来，历史智识应有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认为这是“极好的”意见。^②针对钱穆“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鹵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的批评，^③胡绳认为蔑视历史，不研究历史，“一味但求革新”的人，是应该接受钱穆的这种批评的：“事实上，这样的蔑视历史的结果还不只是不能有所改进，连破坏也做不到。”胡绳还强调，不根据事实的宣传就是欺骗，“真正的革新派”的态度是以“认认真真地掌握历史材料，了解

①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8页。

②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华夏书店1946年版，第88页。

③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历史真象”为基础。^①

胡绳认为，钱穆主张的重视史料，是一个初步的不完整的方案，认识历史不但要以史料为基础，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即“从杂多的史料中找出其真实的发展进化的规律和线索，能够根据过去而更了解现在，并烛见将来”。而要运用历史智识致用于当下，在现实中实行革新，也不能满足传统的以“资治”为目的的历史智识，“必要求用科学方法去重新检查一切旧的史料，追求历史真象”^②。

钱穆对“革新派”对历史现象的批判一概视为对历史的蔑视，反对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是专制的主张，反对这个时期中的支配思想是与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中世纪思想”的主张，反对认为这两千余年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主张。认为如果专制政体垮台，则传统文化也将随之被束之高阁，“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③。在胡绳看来，对待传统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蔑视”，一种是“盲目的蔑视”，另一种是“革命的蔑视”。前者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后者则是经过了理性思考和分析后的判断。如果“认真地从历史中看出了病象之所在，而在现实中对于这一切历史的病象采取革命的否定态度，那就是主张革新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传统文化中既有积极的内容，也有封建主义毒素和其他消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可以敬爱的东西，但这些好的因素只是和那至今还起着牵制我们，阻挠我们前进的坏的因素相伴而行的——后者且较前者大过百倍。”只有先将这些不利于民族进步的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予以批判，才能在将来整个民族从这些有害遗产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可以更自由地从历史中看出一切可资取用的养料，再不必惧怕那些毒素的为害了”^④。

①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89、90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13—22页。

④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90、91页。

钱穆对历史知识有重中轻外的倾向。他在比较了本国历史知识和外国历史知识后指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胡绳认为我们固然应当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但这种情感并不专属于本国历史。我们对历史取舍的标准，不是看是否是本国史或外国史，而是“要从现实需要出发来给以评价”：“由现实的需要来看是好的东西，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我们都要带着‘敬意’去接受，是坏的东西，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都无妨带着‘蔑视’而加以排斥。”^①

钱穆认为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最大不同是，前者是在和平中“以舒齐步骤”发展，后者是在斗争中发展。而斗争的历史时期只是“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进步。^② 这究竟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是否揭示了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规律？胡绳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从三个方面指出这个说法的错误。首先，中国历史中的和平时期远远少于不平时期。“一部二十四史，充满着对外族的战争，军阀割据的战争，农民叛乱的战争。”其次，就“斗争”本身而言，虽并非一切战争和斗争都是有意义的进步，但简单地否定所有战争就无从理解历史的真相，如被钱穆斥责的太平天国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封建噩梦中惊醒过来自觉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声。再次，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欧洲近代史上那种划时代的革命斗争，但每一次革命斗争都是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③

钱穆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不是专制政体，而是与近代欧洲社会一样，是民权的政体，只是二者表达民权的方式和机构不同。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古代中国

①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92页。

②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23—25页。

③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96—97页。

土地占有者与佃户农民也“同为国家之公民”^①。胡绳认为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断言实出于钱穆维护旧的社会体制、反对革命的动机。他用富有激情的笔调写道：“他又要我们不要对于那历史上的君主官僚主义的政制轻言改革，因为据说是在那里面已经包含着民主精神了；也不要对于那历史上的‘富者田连万顷，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关系‘轻言改革’，因为据说是在那里面已经包含着平等精神了；也不要对于那历史上在专制统治卵翼下的学术思想轻言改革，因为据说是在那里面已经包含着自由精神了；而且据他说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的原故，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在中国是只能表现在像秦汉以来的那种政制、学术思想、社会组织之中的。”^②

胡绳敏锐地注意到与钱穆主张相呼应的一种值得警觉的观点，这就是承认中国历史上虽不曾有民主政治，但秦汉唐宋实行的政治体制是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很好的政治”，也可以造成民安物阜的“好时代”。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可以不需要民主政治。他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种制度，在从前的种种条件之下纵然行之有效，也不能由此证明到了现在的种种条件之下还能行之有效。而且从前的那种政治是否能说是好的，值得赞美的呢？是不是真的造成了什么值得我们留连回顾的时代呢……我们要指出，根据一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历史，并不能证明中国情形的特殊，不能或不实行民主政治，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的“国情”也和世界一切国家的“国情”一样，可以证明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是好的政治，不民主的政治只能产生坏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并没有任何特殊条件使得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产生。^③

① 钱穆：《国学大纲》引论，第21—22页。

②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学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98页。

③ 胡绳：《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氏著《理性与自由》，第102—103页。

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各种被人们夸耀的时代，尤其是汉唐盛世，发现这些人所“礼赞的对象只限于汉代武帝以前的一百年和唐代的贞观以后的一百年间”，但这两个时代能成为中国不需要民主的历史证据吗？他写道：“固然我们可以承认，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贞观之治（唐太宗）算得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最高楷模。但不论我们可以对此举出多少优点来，它们终究只是专制主义政治，不能真正使万民安康，也不能克服在统治机构内部滋长起来的腐烂毒害自己的因素。我们应该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给以估价，却不能像那些妄人一样，以为唐太宗型的政治，就是实际政治中的最高理想。”^①

民主政治是否不稳定，容易引起动荡？当时的一种看法认为，在民主政治下不能有强力的、统一的和稳定的政权。胡绳质疑道：“假如民主政治不能产生这样的政权，难道不民主的政治倒能有这样的效果吗？”他同样从中国历史上寻找例证，如秦的速亡、三国和五代分裂时期，以及异族进入中原等，证明专制政治是最不稳定、最易于涣散分裂、最没有力量承受艰危苦难的。他指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专制主义政权的成立是以剥削全国人民的血汗为基础，与全国人民是对立的。纵然用爱惜民力、行施仁政的方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②

中国是否难以实行民主？当时的一种看法认为，民主政治虽好，但由于民主是要人民来管理国家，中国历史表明，中国人民忍苦耐劳不愿意过问国事；而且中国人民向来无知识，缺乏管理国事的能力。因此民主政治在中国难以实行。胡绳指出这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公平的估计。他问道：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中，究竟是人民自己不愿意去过问国事，还是人民得不到国事的权利？是人民没有能力管理国事，还是人民没有机会练习管理国事的能力？他认为由于封建政治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造成一般百姓没有过问国事的

① 胡绳：《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氏著《理性与自由》，第198页。

② 同上书，第110页。

机会。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人民也不是没有过问政治的要求。他以北宋末年宋钦宗罢免李纲后激起汴京民变为例指出：虽然在封建时代，一到国事最危急时，人民也要自动出来过问国事。他们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有自己的主张，并不真是一切都逆来顺受，俯仰随人。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内容，更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向来是不愿过问国事的。由于人民从来没有得到参与政治权利的机会，从来没有站到过管理国家的地位上。这段历史是不能用来测量人民管理国家的能力的。至于以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来证明人民缺乏管理国家能力，是不公平的。因为李自成和太平天国队伍是由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所组成，由农民中自己产生领导者，难免有游民在其中起破坏作用和城市产生的腐蚀作用。农民在组织上的散漫性、行动上的破坏性，以及缺少远大方针和具体计划，也使之不能有效地阻止各种危害因素的增长。“所以在历史上人民的失败倒可以反证，当人民队伍组成的分子及其领导成分有了变化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做的更好，做的成功。”^①

胡绳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史料与理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及其意义、专制和民主的观点，积极回应了当时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特别是他从历史和现实入手，分析了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时至今日仍不失光彩。还应指出的是，胡绳是以学理上的讨论展开他的批评，他建议“科学派和革新派携起手来，形成科学革新派，或革新的科学派”^②，表现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追求真理的胸怀。

第三节 中国通史的编纂

在中国史学史上，通史体例由司马迁所开创。他撰述的《史记》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了通史传统；他撰述

^① 胡绳：《历史能够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吗？》，氏著《理性与自由》，第113—114页。

^② 胡绳：《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氏著《理性与自由》，第90页。

《史记》时提出的“通古今之变”，成为百代不移的治史精神。章学诚对此有如下解释：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①

章学诚的这段阐释，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史学的历史渊源和学术积淀，^②也点出了通史撰述的意义和困难。断代史和其他专题历史，让读者看到的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要完整了解历史演变，不能离开通史的撰述。与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不同，通史是对长时段历史过程描述和研究的著作，其中必然需要作者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储备和对历史知识的整体驾驭能力，需要作者对这一长时段历史发展变迁有着独到理解，在撰写体例上也有着特殊要求。20世纪初，在新旧史学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呼吁撰写新的中国通史，他说：“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③但通史的撰述，一直是当时中国史学的一个薄弱环节。何干之曾感慨说：“五六千年中所包括的几十个朝代，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属于什么阶段呢？至今也还成为一个谜。”“通史多不正确，一提起来，简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④

实际上，从20世纪最初的第二个10年以来，对通史的思考 and 实

①（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0页。

② 瞿林东：《范文澜史学风格的几个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页。

④ 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代青年出版社1937年版，第3页。

践即已开始。章太炎以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因此应兼取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之长进行史的编纂。他的设想是用表、典、记、考记和别录作为通史内容。1918年，梁启超提出的通史体例包括“传志”、“志略”、“年表”和“载记”四个部分。^①可以看出，章氏的五体和梁氏的三体，都带有显著的中国传统史学编纂学的风格。^②同样向传统史学求教的还有陈鼎忠和曾运乾，二人认为古代目录学史部，“横有编年、纪传、纪事三体，纵有通古、断代二家”，这些著述彼此隔膜，使读者“穷年莫殫”，因此要“综二家，通三体，创殊例”^③。

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有想法并进行实践的学者有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和周谷城。王桐龄的《中国史》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都采取了纪事本末体例，一个立意于“去其繁琐事迹”，对“每一时代盛衰兴亡大事，多用统括的行事，以一二章说明之”，使“欲明了一时代之大局者”可以明确获得相关历史知识；^④一个先写世系，并注明年代；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变迁”；再次之以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终之以生计。^⑤体例较新且比王、邓二人著作出版更早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1页。

② 章太炎：《馗书重订本·袁清史》附录《中国通史略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2页。

③ 陈鼎忠、曾运乾：《通史叙例》，南京中山书局1933年版，第6页。陈鼎忠（1879—1968），字天倪。湖南益阳人。近代经史学家。曾运乾（1884—1945），湖南益阳人，语言学家。

④ 王桐龄：《中国史》凡例，北平文化学社1931版。王桐龄（1878—1953），号峰山。河北任丘人。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中国史》《东洋史》等。

⑤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同纪事本末体的周谷城是以“新派”人物的姿态出现在通史编纂工作中，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纪传体和编年体以及章节体都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要达到通史完整性的境界，就要完善纪事本末体，即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参见周谷城《周谷城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341页。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江苏江宁人。历史学家，代表作是《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代表作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的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①该书将远古时代至20世纪20年代分为6个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和现代（辛亥革命以后）。《白话本国史》宣扬进化史观，其纲目设计是以社会结构的变化来区分中国历史阶段，并用通晓易读的白话文体撰写，故在当时反响颇大，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撰写中国通史产生了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中国通史撰述工作，创建了以社会形态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向学界和社会提交了厚重的成果。同时，通过对中国通史的撰写，也丰富和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水平。

一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及其历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已萌生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1933年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时，曾编著《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这可能是中国最早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通史。吕振羽曾考虑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史纲》的第1册和第2册，将准备撰写的《中国专制的封建制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史》，作为这部著作的第3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的设想没有实现。^②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完成于1941年，同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上由传说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到春秋战国。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② 参见朱政惠《论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翦伯赞评论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述说：由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吕振羽“开始用这种方法（指唯物史观——引者），把中国史来作系统的叙述”（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此后因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影响，没有继续这项工作。1948年完成了下册撰写，补充了从秦汉到清的历史。1949年两册合并由三联书店出版。

《简明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吕振羽已经显示出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在《简明中国通史》中，他继续着原有的理论风格，力图从生产工具的演变所决定的经济状况，由经济状况所形成和引起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部著作不是一部王朝编年史，而是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下展开的中国通史，是考察中国历史“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①的尝试。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公社制（其间包括前后两个阶段）、奴隶制和封建制（其间包括初期封建制和专制封建制）三个时期。用社会形态的演进说明中国历史的变迁。吕振羽还提出，他要“注重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②。而这部通史的确是在对历史的具体论述中展开的。

这部通史值得关注的特点还有，不是将中国通史作为一部汉族的历史，而是注重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使中国通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将目光投向史家历来忽视的普通民众，这就是吕振羽所说的“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③，“把人民的面貌复现出来”^④。如果说，重视普通民众的历史在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时已有表述，并得到广泛赞同，吕振羽“复现”人民面貌的撰写设想是对一种进步史观的承续和发扬；那么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重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作用，重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影响，将中国历史作为整个中华民族而非单一民族的历史，则显示出吕振羽的卓识。

在社会史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尽管没有忽略历史上

①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序，香港生活书店1941年版。

③ 同上。

④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跋，三联书店1949年版。

的阶级斗争，但着墨相对有限。《简明中国通史》重点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下层人民反抗上层的斗争，对从秦末陈胜、吴广到明末李自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行了细致描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赞宋代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一种“原始社会主义纲领”^①，赞扬张角等领导的黄巾起义“没有一个投降，英勇惨烈，足以流芳千古”。同时，他也指出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小生产者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任务。

《简明中国通史》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高度重视，首先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有关，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在这种情形下，《简明中国通史》自然而然将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作为论述的重点。吕振羽回忆说，他在撰写《简明中国通史》下册时，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狂风暴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因此从历史上阐明土地问题和历代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及其正义的斗争，便成了本书的又一个主要任务。^②

这当然是历史学“致用”的一种表现。不过，《简明中国通史》的致用精神并不限于此。大体上说，该书上册出版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作者试图表达的是抵抗外侮的民族精神。吕振羽写道：

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它。^③

国民党的汪精卫派已公开投降了日寇，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

①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11页。

②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后记，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生活书店1945年版，第5页。

派一面正大肆宣传“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一面又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和妥协投降的阴谋勾当，并通过其历史教学和研究去散布这类毒素；日寇也不断进行政治诱降的宣传活动和其军事的侵略行动相结合，针对这种情况，本书便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①

到了《简明中国通史》下册撰述时，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因此作者将“向群众进行反侵略反卖国投降的爱国主义宣传”作为撰写原则。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运用马克思历史理论与长时段的中国历史研究实践上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普通民众历史的高度关注，也显示了一些时代精神。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②

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及其历史观

根据范文澜本人回忆和其他一些资料，《中国通史简编》编写缘起于1940年年初。当时范文澜去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要他编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作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在范文澜主编下，由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谢华^③、尹达、叶蠖生^④、金灿然^⑤、

^①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后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 谢宝成：《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谢华（1894—1987），原名兹山，笔名病石，号仲池，湖南清池（今湖南衡南）人。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略论殷代奴隶社会》、《湘西土司辑略》、《论西周封建社会》。

^④ 叶蠖生（1904—1990），原名叶季龙，江苏沭阳人。1937年至1947年间，先后在延安新华社、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和中央宣传部，任编辑、历史研究室秘书、研究员，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⑤ 金灿然（1913—1972），原名金心声，山东鱼台人。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主持和组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的标点整理工作。

佟冬^①等学者分工写作。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集体写作经验，初稿并不成功。中宣部让范文澜重写。范文澜从1940年8月到1941年年底完成了上册（五代以前）和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前夕），分别在1942年9月和12月由延安陕甘宁新华书店出版。实际上中宣部的指示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范文澜到延安后，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演变》，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期间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如所周知，范文澜与毛泽东在思想和情趣上有诸多相合之处，^②在《中国通史简编》写作期间，范文澜曾就如何编写的问题与毛泽东有过讨论，《中国通史简编》夹叙夹议的撰写方式，采纳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③《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曾有“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的高度赞评。^④可以看出，与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通史不同，《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下、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由范文澜独自完成的通史著作。这部通史著作因此也具有了中共意识形态和范文澜本人史学风格的双重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编纂的中国通

① 佟冬（1905—1996），辽宁辽阳人。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② 有的研究者认为，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学术友谊”“学术知音”“学术共鸣”（参见程龙《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党史博采》2004年第4期；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陈其泰：《范文澜的学术交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更有研究者称：“范的心灵最接近毛氏……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颇类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70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4页。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散木：《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问世前后》，《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

④ 陈微：《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史著作中，它在当时和后来的影响都是最大的。^①

首先，《中国通史简编》强调历史是认识未来的必要起点，只有对历史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的把握未来的发展。《中国通史简编》“序”指出：

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进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②

鉴古知今是中国的史学传统；通过了解历史明了未来，也是社会史论战的鲜明主旨。然而，在这篇序文中，范文澜用三个“必须”强调了历史与未来的关系，这种高屋建瓴、气魄宏大的论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中共用历史研究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积极响应。在编纂宗旨上，《中国通史简编》尖锐地批评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这类著作对人民大众生活境遇的忽视，竭力湮没或歪曲中国历史道路向前发展的事实，认为应当从广泛的史料中，以通俗生动的

^① 《中国通史简编》问世后，毛泽东则说这部著作“资料多，让人容易看下去”（刘大年《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0页）。1947年国统区上海新知书店的《中国通史简编》初版本印刷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接着又连着印了2次，各2000册，在两三个月之间，共印了6000册，这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也是颇不寻常的（俞筱尧：《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新文化史料》1986年第2期）。刘大年指出：“《简编》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刘大年：《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255页）。《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力远至海外，何兹全回忆说，1947年他在美国霍普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担任弗兰西斯助手，翻译的中国史学家的著作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何兹全：《爱国以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② 范文澜（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序，《范文澜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方式，“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的法则”^①。规律、人民和阶级斗争这三个要素，成为《中国通史简编》一以贯之的重要线索。

其次，《中国通史简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公社时代（夏代以前）、奴隶占有制时代（夏商）、封建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以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出现时代，是范文澜对中国历史的判断。生产方式的续接上，范文澜的主张与马克思尤其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表述的人类历史阶段递进模式是一致的。不过，其间仍然有某些范文澜个人的心得。他将封建社会区分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时代（西周）、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汉至南北朝）和封建社会螺旋式发展（隋至鸦片战争）三个大的阶段，让读者可以在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历史的变化。在体例结构上，《中国通史简编》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活动、民族交往和思想文化，不遗漏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每章后有结语，对所述内容加以扼要概括和总结，可谓起止有据，章法严密。

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状况是《中国通史简编》的重要内容，置于每章的前沿。在说明不同历史时期变化时，作者都考虑到这个因素。范文澜认为，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和人两个因素，每个时代生产的发展，都依靠生产力水平。周初金属制农具的出现，造成其农业生产水平高于夏代和殷商，社会面貌与殷商有很大区别，作为一个新兴小国的周能够灭殷商，除去殷商统治者的腐朽，“同时也由于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而新社会必然要战胜旧社会”^②。不过，范文澜并不是简单地将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发展直接画上等号，在分析秦能够统一全国的原因时，他提到了秦对田亩制的改革，认为是“适合生产力

^① 范文澜（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序，《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4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23页。

的进步制度”，可以拉拢人心；而关东六国“生产力进步了，还保守旧制度，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对守旧是不会满意的”^①。从而指明了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再次，《中国通史简编》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和“阶级斗争”历史观。1948年4月，《中国通史简编》再版说明写道：“人民的历史，不是皇族的家谱，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帝王私产”，“故本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其姓名，年次全用公历”。不过《中国通史简编》所表现出的“人民性”主要并不在这种叙述形式上。通观全书，《中国通史简编》描述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是一部人民受压迫和反抗压迫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该书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几乎每一章中都尽可能表达这一历史观念。以该书上部为例，几乎每章的结语部分都说明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夏商：甲骨文我字作人执戈形，金文戈杀二字合成我字，说明“统治阶级一开始就依靠暴力压迫被统治者”^②。

西周：土地归封建主所有人民不得自由买卖。剥削非常苛刻，刑罚也极其繁重。^③

春秋战国：下层民众生活非常痛苦，战争中死亡率也非常大。^④

秦：秦朝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是非常残酷的。^⑤

西汉：经六七十年的安定，朝廷积聚起极大财富，统治阶级也繁荣富庶，同时贫民大量破产流亡，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⑥

东汉三国：东汉官吏贪污，豪强兼并，政治黑暗，刑罚残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48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90页。

⑥ 同上书，第114页。

暴，人民受到极端严重的压迫。三国时军阀屠杀人民，无恶不作。^①

西晋：统一后，统治阶级尽量享受，政治极端腐化，剥削超出人民生产限度，人民死丧流亡。^②

南朝：完全依靠大地主的拥护，所以人民受豪强压迫特别严重。土地集中在士族手中，农民沦为佣客或奴婢。^③

北朝：开始阶段统治者保持了强烈的野蛮性，北方汉族遭受无数压迫。^④

隋：隋末，人民不能忍受残酷无厌的榨取，起义军布满了全国。^⑤

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并不限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在范文澜看来，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取隋唐以来文化史作例，也丝毫没有例外。”^⑥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所引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通史简编》给予了高度重视。该书谈到的古代农民起义包括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农民大起义，北宋末年方腊、宋江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朝中期农民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清代白莲教、天理教起义，可以说，中国古代重大“民变”都未被遗漏。范文澜不是一般性的描述农民起义的过程，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进行了分析。

第一，他指出农民起义都是由于阶级压迫或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同上书，第171页。

④ 同上书，第198页。

⑤ 同上书，第224页。

⑥ 《中国通史简编》（下），第3编第九章，《范文澜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页。

所造成。在黄巾起义部分，他说黄巾起义不杀平民，也不破坏生产，“足见农民起义，纯属自卫性质”^①，肯定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称黄巢转战南北是一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行军”^②，颂扬了农民起义的英雄气概。

第二，他没有一味地赞扬农民起义，他看到农民身上所固有的“保守性，自私性，狭隘性”^③，以及由此对农民起义带来的破坏。他指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因此也不能终结封建主义统治。在赤眉起义部分，他批评起义军“缺乏组织和纪律”，“贪财物”^④。在唐代农民起义部分，他谈到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建立政权后，模仿地主阶级的腐化生活，“脱离了农民群众”，“被地主生活腐蚀了”，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拥护，而又被地主阶级抛弃，“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⑤。在秦末农民起义部分，他高屋建瓴地写道：秦末的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说明了军事脱离政治，军事归根要失败；说明了没落的贵族世家，敌不过新起的农村庶民；说明了保守旧制度，违反人民愿望，旧制度总归于破坏；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只能推翻旧地主政权，取而代之的依然还是地主政权，对农民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的出路”^⑥。这样，就区分了旧式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解放运动。

第三，封建社会的旧式农民起义，虽然不能改变社会形态，却能“争取到短期的休息，部分的减轻负担，减少苛法”^⑦，认为“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也就清楚地划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反之，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275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同上书，第108页。

⑤ 同上书，第275页。

⑥ 同上书，第89—90页。

⑦ 同上书，第90页。

族乘虚侵入，出现分裂或沦陷的局面”^①。他以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恢复为例指出，“统治阶级知道人民需要休息，所以采取黄老‘清静无为’政策”^②。这个可以看作20世纪60年代“让步政策论”滥觞的判断，在肯定农民起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同时，复又肯定了它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第四，范文澜也注意到不同时期农民起义的特征。他认为，西汉末年赤眉、绿林农民起义表现出很大的原始性；东汉末黄巾起义首领利用宗教组织农民，起义技术也比西汉先进，从而也成为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方式。^③在元末农民起义和清代农民起义部分，他又注意到这两个时期的农民起义，兼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特点。

总之，《中国通史简编》对农民起义论述了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农民起义的类型。它的基本判断和涉及的内容，在当时最为完整。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农民起义的讨论，长期沿用范文澜的看法或沿着范文澜的思路延伸，不是偶然的。

《中国通史简编》还涉及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理论。

(1) 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自秦以后，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历史上交错进行，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统一和分裂与历史的进步和倒退是否有着必然联系？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体上说，《中国通史简编》对统一持肯定态度。该书评论秦始皇统一时写道：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民族的国家，消灭了华族内部的相互对立，团结华族一致对外，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当时人民的要求。^④在谈到汉武帝统治时，该书赞扬“国家统一是异常伟大的力量”，由统一聚集起的全国力量扩展了版图，建立起亚洲唯一的大帝国，把中国文化传播到

①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114页。

③ 同上书，第115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邻近地区，从外国输入了许多物品，丰富了中国物产，改变了以前局促的世界观，“养成了泱泱大国的民族性”^①。可见，范文澜对“统一”的历史积极性定位于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增强国家实力等方面。对这些方面的肯定，显然与抗日战争的大环境有关。不过，应当说明的是，尽管谴责分裂时代出现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范文澜却没有完全否定分裂。他指出，五代十国时，与中原地区的混战破坏不同，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人民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经济，“南方诸国的割据，对人民有减轻负担，发展生产的意义”^②。可以看出，范文澜不仅以国家的强盛，同时也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存、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判定统一和分裂意义，而后两个方面似乎更为重要。他专门点出秦统一“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也由此而发。

(2) 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与和平交织的一种交往形式，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如何看待这些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国通史简编》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将北方民族对中原的武力占领和统治称为“侵入”“侵略”行为，并谴责这些行为给中原地区人民造成的灾难。范文澜将两晋之际看做是“塞外野蛮民族，大量流入黄河流域，落后低级的生活，残暴嗜杀的恶性，破坏华族二千年发育滋长的经济和文化”的“外族大侵入”时代。^③同样也将金、元、清等政权看作是由落后民族入侵中原后建立起的政权。第二，歌颂反抗外族“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英雄，谴责投降妥协，鞭挞汉奸。在北宋部分的结语中，他认为北宋的外交“完全采取屈辱忍耻、纳币求和的政策”，批评北宋统治者为了保持政权，“对外耻辱并不以为可耻”^④。《中国通史简编》在描述反侵略历史时不吝笔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民间熟知的岳飞抗金，同样用大量笔墨描述了读者未必耳熟能详的清初各地人民反抗清军的斗争。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102、114页。

② 同上书，第297—298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第3编第四章，《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141页。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范文澜全集》第8卷，第345页。

在第3编第八章之“满族侵入与汉族反抗”一节中，作者用8个小节，缕述“史可法的反抗”“民兵的反抗”“黄道周的反抗”“李自成余部及何腾蛟、杨廷麟的反抗”“浙东义士的反抗”“瞿式耜、何腾蛟的反抗”“李定国的反抗”“郑成功、张煌言的反抗”。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过讨论，学界有着不同意见。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不能把古代中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等同于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范文澜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他虽然没有直接将北方民族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与近代外国对华侵略战争相提并论，但却使用“入侵”“侵略”等语词，明确定义了这些战争的性质。

对历史上民族战争的这种判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范文澜对北方民族对中原经济文化的破坏，对中原人民反抗北方民族入侵的颂扬，也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中国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有的部分则别有一番用意，如在谈到北宋末年金军南下后，“人民即时停止起义，请求合力御侮”，但“朝廷却始终压迫人民，对金恐惧献媚，迫切求和以致求降。这里完全证明惧敌派一定转成议和派，议和派一定转成投降派。这里又完全证明甘心对外屈服，一定要对内压迫”^①。在论及明亡原因时，作者写道：“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由于抗满力量不能统一团结……明朝形成以特务为中心的统治机构。官吏们都为特务所指挥，所监视，彼此不相统属，没有正常联系，而特务们却横行非为，无恶不作。等到风气养成，就失去了抵抗外敌的力量，明朝被自己所养的小人，所立的特务制度断送了。”^②考虑到《中国通史简编》撰述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浪潮，对日妥协之声甚嚣尘上，我们可以对作者的这些表述，以及关于历史上民族战争判断，有更多的理解。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范文澜全集》第8卷，第344页。

^② 同上书，第558页。

(3) 封建王朝和统治者。《中国通史简编》的重要宗旨是把中国历史写成人民的历史，而不是统治者的家谱。但作者在处理王朝盛衰过程中，有着一定程度的历史主义倾向。他肯定汉武帝拓边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盛世”局面。对盛唐景象更是称誉有加：

唐是汉以后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全盛时期，开拓疆域，东灭高丽，北逾大漠，西邻波斯，南有安南。朝贡国范围更广，商业上文化上与唐发生关系。

唐对异族人不甚歧视，迁居内地的人数很多，军事上许多将帅是异族人，胡商也得自由往来。

因疆域扩大，国内外贸易很发达，唐朝航海技术进步，船舶特别巨大，掌握东西海上交通的霸权。

工商业尤其是商业，三百年中一直向上发展。^①

对于统治者，范文澜没有都予以全部否定，他赞扬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年，“生活朴素，减轻剥削，三百年来，人民第一次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②。

20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做了自我评估，肯定了5个方面，即（1）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否定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2）按照马克思学说，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3）将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看作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4）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5）注意收集生产斗争和科技史方面的资料。而对于这本著作的不足，范文澜强调了其中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包括否认和缩小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人在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借古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范文澜全集》第8卷，第277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范文澜全集》第7卷，第224页。

今”^①。如前所述,《中国通史简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主义,范文澜的自我批评,表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纠错精神;而《中国通史简编》对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却未曾引起范文澜的注意,这自然是历史的局限。

三 翦伯赞《中国史纲》及其历史观

《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半年后的1942年夏,身居重庆的翦伯赞开始撰写《中国史纲》。1943年,《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1946年,《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20世纪40年代,这两部著作分别在上海再版。^②出版的两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③虽然作者计划撰写第3卷《魏晋南北朝史》,^④但最终没有完成。因此《中国史纲》是一部不完整的中国通史。

尽管存在着残缺,但由于其基本思路和撰写理念都在已出版的两卷中有明确表达,因此并不至于影响我们认识翦伯赞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国通史的设想和努力。

《中国史纲》将东汉以前的中国历史划分为6个时期:

①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②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上海大呼出版公司1947年版。

③ 邓嗣禹评论说:《中国史纲》是对撰述中国通史的一种“雄心勃勃的尝试”,该书“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翦先生好像蔑视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著作的确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邓嗣禹:《近五十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美〕《远东季刊》第8卷第2期,1949年2月)。齐思和评论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顾颉刚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感慨:“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致白寿彝书(1947年9月23日),转引自王学典《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侯外庐后来回忆说:“抗战时代的进步青年,谁不以一睹《中国史纲》为快!”(《韧的追求》,第138页)也有学者对《中国史纲》中存在的材料使用问题提出批评(冉昭德:《评吕、翦两先生的〈秦汉史〉》,《中央日报》1948年1月8日)。

④ 张传玺:《翦伯赞传略》,《翦伯赞全集》代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 前氏族社会或原始群，相当于考古年代学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其中，早期旧石器文化对应于传说的有巢氏时代，中期旧石器文化对应于传说的燧人氏时代，晚期旧石器文化对应于传说的伏羲氏时代；与之相应的婚姻家庭形态分别是血族群婚、亚血族群婚和亚血族群婚家族向对偶婚家族的过渡。

(2) 氏族社会，相当于考古年代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其中，早期新石器文化对应于传说的神农、黄帝时代，中期新石器文化对应于传说的尧舜禹时代，晚期新石器文化对应于夏代；与之相应的生产形式分别是畜牧、种植的出现，畜牧、种植的发展和田野农业的出现。

(3) 古代社会或奴隶社会，亦即殷商时代。

(4) 初期封建社会亦即西周社会。

(5) 初期封建社会的转向，亦即春秋战国时期。

(6) 中期封建社会，亦即秦汉时期。

可以看出，与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相同，《中国史纲》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将东汉以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与前两部通史有所不同，翦伯赞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除去对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中国历史阶段作了更为具体的划分外，该书还有如下特点。

第一，关于史前社会。《中国史纲》对中国原始社会基本状况和演变过程给予了重点说明。在翦伯赞之前，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和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业已问世，但这两部著作对旧石器时代的论述不多，也未触及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发现，如翦氏所言：“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①，“依旧没有能把中国的原始社会具体的活的内容复现出来”^②。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21页。又，在该书序言中，翦伯赞提到了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和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尹达曾在1939年撰就《中国新石器时代》，但并未公开发表[后成为《中国原始社会》（延安作者出版社1943年版）的第一篇和第二篇]。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他明确提出，撰写《中国史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①。同时他又颇为自信地说：“由于古代遗存之连续不断的出现，提供了中国古代史以不少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还不够说明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但若以之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再加以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诸方面之配合研究，则至少可以证实这一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之已经存在，并显示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之大概内容。”^②

翦伯赞吸取了大量考古学资料，对研究者以前措意很少的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相当细致地描述。在撰写《中国史纲》第1卷期间，翦伯赞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探讨中国原始社会的出现和发展，^③可以说他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而准备通史撰述，因此《中国史纲》援引考古和文献资料之富赅，视野之广阔，专业性之强，叙述之清晰，在当时同类著作中难有比肩者。在分析原始社会血族婚姻形态时，他大量引用传世文献记录的后代残存的血缘婚遗迹，说明中国远古时代的婚姻状况，指明“今天看来是逆伦伤风的事情，在当时则认为是正当的行为”^④。在解释原始社会变化时，他找到的关键点是“社会生产力”，例如在原始群时期，“一个人的生产力只能生产养活自己的物质。换言之，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在生产了养活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之外，再能生产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养活别人，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人依赖别人的生活而生活”^⑤。他注意到劳动分工引起的性别和年龄别的在原始社会发生的变化，指出，在人类早期因劳动工具简单原始，劳动者皆能自己制造工具。随着工具的复杂化，对工具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21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③ 重要者有：翦伯赞：《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重庆《现代妇女》创刊号、第2期连载，1943年1月、2月。翦伯赞：《“人与兽争”时代的生活方式》，收入《民生史观研究集》，1942年。翦伯赞：《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重庆《群众》第7卷第5期，1942年3月。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7月。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57页。

⑤ 同上书，第56页。

的打制与修理需要经验，“而这种经验之保有者，则是那些经过长期劳动的老年人”，因此当壮年男女外出狩猎和采集时，老年男女则留守住处从事劳动工具的制作和修理，“从这一时代起，以前常被群体所遗弃之老年人便被引入生产过程中”。他还推测，由于残疾人可能也从事类似工作，因此也得到社会抚恤。^① 性别地位变化也因劳动而发生。他认为，随着采集经济向采集—狩猎经济的转变，出现了性别的分业，男子群从事狩猎，女子群从事采集，这样以前男女不分的原始人群分裂为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男子和女子相互以自己的劳动生产物相供应”，“建立了他们和她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同时由于狩猎的偶然性，这个阶段的生活资料主要还以采集为保障，“这样的经济关系，就决定了女子在原始公社制中之优越地位”^②。这即是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改组了劳动的编制，同时也改变了两性的关系，因为两性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反映”^③。显然，在讨论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时，翦伯赞没有脱离唯物史观的主航道，力图以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变化说明社会的状况和进步。尽管他的一些具体意见可以见仁见智，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说明，不仅拉长了对早期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于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第二，关于古代不同民族的历史活动。受到斯大林在《论苏联史的几个原则问题》中提出的“不要将大俄罗斯史与苏联境内其他民族史分开”的直接影响，^④ 或许也因为出身维吾尔族家庭的缘故，^⑤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59—60页。

③ 同上书，第61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2页。

⑤ 翦氏家族祖先原居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南宋末随元军进入内地。明初受赐翦伯姓，定居湖南桃源、常德一带，世奉伊斯兰教。翦伯赞幼时曾在清真小学读书（参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略》，《翦伯赞全集》代序，《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1—2页）。翦伯赞本人曾写道：“我的姓氏与《周礼》‘翦氏’之官毫无关系……我的族人也并不是所谓‘黄帝’的子孙，或是大汉族的一个宗族，而是来自新疆，所谓西夷之人也。因此，我不敢拉扯经典，妄承先哲，以邀‘黄帝’子孙的荣宠，而冒充大汉族的宗族。”（翦伯赞：《我的姓氏，我的家乡》，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16日）。语含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自豪。

翦伯赞格外留意中国古代民族的交往、融合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中，他批评以往的中国历史，都是以汉族为主，“汉族以外的其它与汉族有关的诸民族历史，除那个民族曾经‘入主华夏’以外，一切都以‘夷狄’二字而摈诸中国史之外。即使有记载，也非常简略”^①。他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不能脱离其周围各民族之相互浸润、相互影响和作用。在战争中，交换中，文化的交流中，血液的混合中……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这种作用。”^②在翦伯赞之前，吕振羽曾对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历史活动进行了说明，但翦伯赞认为“还是十分不够”。他的立论不仅是从当时有的学者所强调的反对大汉族主义出发，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反对研究各个民族个别的历史，而是说不要因为研究个各民族的历史，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③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说是他的这种历史观的实践。^④

《中国史纲》第1卷“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大争斗与大融混”一节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活动。他认为，春秋时代民族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围绕黄河中游地区的冲突是：一方面周族以及原住黄河中游的诸民族为保有这个大平原而斗争；另一方面是四周诸民族为了挤进这个大平原而斗争。从纵向看，中原诸民族，也是历经夏、商、西周漫长历史时期，经迁徙而“沉淀下来的历史的堆积层”：最古层是“诸夏”之族与“有苗”之族，其上是“商族层”，更上是“羌族（周族）层”，再上是“狄族层”和“新的狄族层”，从而在战国时期构成了很厚的民族堆积层。^⑤由于频繁战争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86页。

② 翦伯赞专门提到斯大林的这句话，认为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普遍准则。参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8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98页。

④ 同上书，第89页。

⑤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297页。

和其他交往，加强了中原诸族的血统与文化交流，并经过秦的统一，最终完成了他们的“混一”，汉族由此出现并闻名于世。^①这段论述涉及的是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交融和汉族形成的大问题，其中所描述的汉族的“混一”过程和具体细节会自然因新资料和新方法（如体质人类学和基因对比）的介入而有变化。但提出一个问题有时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翦伯赞以战争、迁徙、文化交流为线索，从纷乱如麻的文献中，钩稽出从夏至秦汉中国大地上众多民族的活动，揭示了万众归一的历史趋势以及统一王朝对民族融合所起的积极作用，伸展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1944年至1948年间，翦伯赞撰写了多篇民族史方面的专题论文，讨论了羌族与西域诸民族关系、吐蕃民族来源、三国时军队中的民族成分和魏晋时期塔里木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的论文。^②根据已出版的《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相关部分，这些论文应是《秦汉史》和未完成的第3卷《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准备。翦伯赞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问题的论述，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一。吕振羽关于中国民族史的一些观点，如不仅汉民族是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而且中国各民族也存在着交融；汉族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导民族，并不是它具有特殊的同化能力，而是由于汉族在生产、文化、人口、政治、军事方面的总和“常大于其对方”，同时“这种力量又常能贯串着汉族人民的斗争，发挥作用”^③，正沿着这个路径前行。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翦伯赞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② 翦伯赞：《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重庆《中苏文化》第15卷第2期，1944年2月。翦伯赞：《吐蕃人种考》，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4期，1944年5月。翦伯赞：《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翦伯赞：《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上海《历史社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47年9月。此外，这个期间，翦伯赞还撰写了《台湾番族考》（《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版），这个题目虽与《中国史纲》的撰写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却也反映了翦伯赞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

③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52、142页。

第三,关于商业活动和商人在历史中作用的估计。^①与其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纂的中国通史不尽相同,《中国史纲》十分看重商业活动的意义。如果说,对殷商时期商业活动的描述还限于奴隶主从商业交换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从而“巩固了商代奴隶所有者的政权”^②这样一般性的陈述,到了讨论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商业和商人时,则将之放置在历史变化的极为重要的链环上。在翦伯赞看来,商人阶级的崛起,是一种新兴的力量,由他们引导,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由初期向中期的转变。他认为,新兴商人来源于逃亡到都市的破产农民,它的最大特点是其身份的独立性。春秋时代是新兴商人的萌生时期,到了战国初年,新兴商人已经掌握了都市经济的命脉,“发育成人了”^③。但他们虽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却并未获得政权,遂开始了要求权力的斗争,一方是要求建立符合新经济内容的新政治体制的新兴商人,一方是要把新的经济放在原来的政治机构下的而受其支配的旧的领主。新兴商人以秦国为主心,以“合纵”为手段,与关东旧领主势力展开斗争。自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政权已是商人地主的政权,“秦国的武力也就是商人地主的武力,从而秦国所收夺的土地,也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因而秦国势力所及之处,就是土地之封建领主所有形态之消灭”^④。最终随着秦的统一,新兴商人地主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阶段的政治主角。汉代政权承袭了秦政权的这

① 应当说明的是,尽管都注重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翦伯赞关于商业活动的论述,与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说没有关系。翦伯赞本人曾批评陶氏主张,指出:“实际上所谓商业资本,只是生产方式之一种从属,它只能作用于既存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自身决不能独立的发展,更不能创造一个独立的生产方法,因而也不能形成历史发展中之一个独特阶段。它不仅可以存在于封建社会之内,而且也可以存在于从古代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之内。它可以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起着各种各样的正反作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翦伯赞的这个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所主张的秦汉是封建社会商人地主集团的思路和结论。

②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138页。

③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323页。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翦伯赞全集》第2卷,第39页。

个特性。汉初政治力量有两个来历不同的集团，一个是由先秦发展而来的旧的商人地主集团，另一个是由秦末农民起义中生长起来的贵族地主集团。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尽管商人地主与贵族地主的冲突，贯穿了西汉王朝的全时代，但“贵族地主本身也是商人地主”，所以，“西汉的政权，是商人地主的政权”^①。至于东汉，刘秀集团，大抵皆系南阳的豪民富商，“以这种性质的地方保卫团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东汉政权，当然是商人地主的政权”^②。

翦伯赞关于秦汉政权性质的看法在学界产生了争议。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取决于这个政权的基本政治表现。秦汉帝国一以贯之地鼓励农耕，打击商人势力，重农抑商是其基本国策，何以一个打击商人势力的政权就成为一个“商人地主”的政权？翦伯赞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对于这方面材料的使用，翦伯赞似乎也显得有些随意。如认定刘邦代表商人地主的理由是，刘邦出身于小土豪，其社会属性更接近于商人地主，因为他们同样是以榨取农民为生活，“即因如此，所以决定了他之必然走向商人地主的方面”^③。若以“榨取农民为生活”作为推论前提，则商人地主的对立面封建领主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是否也属于商人地主或必然走向商人地主？1949年以后的社会分期讨论中，翦伯赞的这个观点基本上不再被人们提及，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四，与其他通史著作不同，《中国史纲》是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观照中国的历史。翦伯赞在叙述每个历史时期时，首先论说这个时代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氏族社会”部分，作者以“世界的新面貌与中国历史的新形势”为标题，讲述了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东南亚新石器遗址的分布，以表明“这一时代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经有了广大的扩展”^④，而中国也是这个扩展中的组成部分。在“古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翦伯赞全集》第2卷，第268页。

② 同上书，第427页。

③ 同上书，第258页。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82页。

代社会(奴隶社会)”部分,作者以“古代的世界与古代的中国”为标题,讲述了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明进程,表明在中国历史走进古代社会的时代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有些人类的文明程度达到了与中国同样的历史阶段。在“初期封建社会”部分,作者以“西周时代的世界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活动”为标题,讲述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希腊以及古代印度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表明“当此之时,不仅中国史正在履行一个变革过程,世界史也有很大的波动。这种世界史的改变,就改变了中国史所处的世界形势”,而周族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原,“成为东方世界的一个历史动力,从而把世界史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①。在“初期的封建社会及其转向”部分,作者在“春秋、战国的世界与中国”的标题下,讲述了此时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发生的社会变化,表明中国文化圈和希腊文化圈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发展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东西两个世界之文化的波圈,已经逐渐接近了”^②。在《秦汉史》中,作者分别以“秦代的世界形势”、“西汉时期世界的新形势”和“东汉时国内各种族的活动及世界的形势”为标题,分别讲述了这三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要进程,以及与中国历史的关联。从翦伯赞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不是通过外国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比照,试图证明人类历史的趋同性;也没有企图显示我们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而是力图站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下,观照中国历史的进程,观照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对中国历史进行世界范围中的定位。翦伯赞在《中国史纲》第1卷出版之前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和大致前后撰写的《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表明他正是秉持着这种历史观念从事通史编纂的实践。前书指出:“各个民族的历史,决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史的全体之外;反之,只是作为世界史构成之一部或一环而存在着。”^③后文写道:“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注意中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史前史 殷周史》,《翦伯赞全集》第1卷,第231、233页。

② 同上书,第292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7—78页。

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引起之变动。并且必须考察由于这种变动而产生之经济生活、政治变局，以至艺术、宗教之新的内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史中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史中所处的地位，从而在不同的地位中所展开之不同的活动。”^①这种历史理念与20世纪末出现的全球史观颇为相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球史观的先驱。

翦伯赞晚年曾撰写了一些文笔优美的历史散文，备受好评。《中国史纲》也表现出翦氏特有的历史写作风格：在论说中挥洒着想象，在分析中蕴伏着机智，秀美浪漫，情理交融。试看他对汉武帝的描述：

说到汉武帝，也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幅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之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②

用考据家的眼光看，这段文字中的多数判断似乎都经不住推敲；用阶级斗争历史观看，这段文字，又有溢美统治者之嫌。但是，如果我们都承认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就不会过多地指责这段文字“言”胜于“义”的不足，感受到和体味到的是其中撷动人心的语言魅力和有血有肉的历史的魅力——而将“死板”的历史，变为“有血有肉”的历史正是翦伯赞的学术追求。^③历史写作最能体现历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本书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翦伯赞全集》第2卷，第298页。

^③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本书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史学家的个人风格，千人一面的著作在写作上便是失败的。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从容兼具激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平实流畅、翦伯赞《中国史纲》的优美华丽，三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通史撰述风格上的鲜明特征，正值得后来者借鉴。

第四节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 及其史学观念

一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

1928年侯外庐赴法国留学期间着手翻译《资本论》，由此确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①。这是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起点。对马克思理论经典著作的精读，使得他在着手中国古代史研究之前，具备了扎实深厚的理论根底。他主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作一个统一的研究”^②，将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融为一体。他把自己的治学风格概括为“独立自得”^③，即不人云亦云，不盲从权威，而是在主要关键问题研究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判断。这几个特点使得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格外引人注目。

社会史论战如火如荼之际，侯外庐已经回国，但没有参加论战。他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认为：“科学研究应取严肃谨慎态度，在未充分做好理论准备、掌握材料以及作严密思考之前，决不可放言高论。”^④与一些人认为社会史论战存在着“对于材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相合者，就无条件采用”、“急于求知识而怠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9页。

④ 同上书，第224页。

于问材料”^①问题不同，他指出，这场论战的最大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②。作为反对“公式化”和“教条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先驱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中，侯外庐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20世纪30年代以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看法，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经典表达。在生产方式上，它的表述是：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及其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但侯外庐根据对《资本论》的研究，对“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即（1）它是决定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因素，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就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2）它必须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有统治的地位；（3）它的内容可表述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③他后来解释自己为何要以“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作为限定词，是因为无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都是作为社会历史范畴出现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的一个真理。因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可以看成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的指针”^④。事实上，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侯外庐用以作为指导理论和方法论的正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他的基本看法如下：

（1）在社会发展史中，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古代东方社会构成，比“古典的古代”早走了若干世纪。

（2）这种前行史不是说它的“构成”是一种特殊的，是在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三种构成以外，也不是东方专有的“构成”。

①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友兰《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4—225页。

③ 侯外庐：《社会史导论》，《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1939年。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

(3) 它是在多种情况下形成的,包括热带、河流、黄土地带等自然因素,以及四周种族林立、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

(4) 古代文明有多种路径,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古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马克思说的“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标明的正是古代社会的多种路径。

(5)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古典的”和“亚细亚的”位置序列可以随便前后安置,在研究封建社会的解体时除去注意西欧,还着眼于东欧各国和东方殖民地的路径,都说明要对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路径作具体分析。

(6) 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是指特定形态的“过渡期”。过渡期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阶段,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东西。把过渡期当成东方社会的特别路径,或者把它当作全体历史的代表路径,都是没有根据的。

(7) 古代东方国家的发生采取的是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在青铜时代便进入了文明社会,因而是“早熟”的社会。

(8) 如果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作为文明路径的三个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叫作“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他的结论是:灌溉和热带等自然环境,是亚细亚古代“早熟”的自然条件;氏族公社的保留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而没有私有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因袭的传习;征服了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由于生产方式的本义是特殊的劳动力和特殊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

它和“古典的古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①

按照侯外庐的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三种社会形态之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古典的古代”属于同样的阶段。它的生产方式表现为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却在东方有了普遍发展，使得东方成为“早熟”的文明小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到理解，成为侯外庐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道路的基本前提。

侯外庐的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这是两个互为表里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史，只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对思想的脉络给予合理和深刻的解释。同样，思想史的进程，也指示并高度浓缩着社会史的进程，只有对思想历程有着准确的把握，才能深入地理解社会的过程。侯外庐选择这两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路径方面，侯外庐形成了4个基本看法：

第一，关于土地占有形态。侯外庐认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与西方不同。古代西方是先经过氏族公社的共耕制，然后转变为“把农地分作各个小块”，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制度。所以到文明社会时，旧的公社土地所有权已经破坏，以氏族为基础的组织也被打破。但在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在殷末和周初，土地由氏族公有转为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在周代是土地国有制，即氏族贵族的所有制。王侯是贵者同时是富者，富贵是不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以‘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之姿态’出现的，在法律上没有死缠，其所得形态是‘贡纳的样式’”，财富计算不在于土地的大小，而在于其所得。^②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11—12页。

^②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4页。

第二,关于劳动力。侯外庐认为,文明发生时,胜利者通过战争消化战败的氏族,让其作为俘虏,从事生产。卜辞记载引战争杀戮的人数很多,而俘获的人数却极少,这是它不能通过将战败的氏族转化为劳动力。周金的记载大为不同,俘获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这是历史文献显示的殷难以灭国而周大量灭国的原因所在。周在征服了其他氏族后,让战败者通过族人家室,成规模地参加生产,所以一开始就是“千耕其耘”^①。对周代奴隶以“家”和“室”计算的说明,被侯外庐认为是发现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特征的“一个秘密”^②。在侯外庐看来,土地和劳动力的这种形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这种结合方式,即是支配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到了战国时代,虽然土地财富的所有形式下降,劳动力分散,却始终没有产生出彻底的私有制。

第三,关于城市的出现和城乡分裂。在中国古代,“城市国家”是被“蒙在一层厚厚的‘封建’外衣里”的一个“秘密形态”^③。侯外庐后来回忆说,他分了三个步骤研究这个问题,第一个步骤是厘清“邦”和“封”、“城”和“国”的意义,为此他对殷末周初作邑和作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第二个步骤是着重考察中国城市国家成立和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此他的视角从殷末开始一直延伸到春秋时期;第三个步骤是考察城市和农村的关系。^④侯外庐认为,“封”在殷周之际,是指以树木划分疆界。封树所作的国(城)居住的是氏族贵族,将被征服的氏族转化为集团奴隶,并以疆界分割,使这些奴隶驯服,是古代社会作邦的首要意义。氏族酋长或盟主所以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在于有了城市王国。因此,古代的“城”“国”二字同义,筑城就是营国,城市即是国家。

侯外庐指出,城市与农村的分裂是阶级社会分工的总表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分裂开始于殷末或周人东下之时。周公的分国,不是后世所谓的“封建”,而是如古代罗马式的殖民,占领被征服的旧部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4页,第13—14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

③ 同上书,第240页。

④ 同上书,第240—244页。

落的土地。他根据周金《宜侯》资料指出，由于氏族制的存在，城市并未形成经济的堡垒，而是造成了“宗子维城”、“公侯干城”一类的政治堡垒。西周至春秋的城市，是“诸侯的营垒”，它是对外族的贸易的所在地，是宗教的政治所在地，所以在经济意义上没有“古典的”城市发达。战国时代的郡县制，是向地域性转化的城市制，商业城市才大量出现。与城市相对的是乡村，即文献所说的鄙野。城中居住统治者“君子”，鄙野居住被统治阶级“小人”^①。

第四，关于政治法律。侯外庐认为，殷的神器表明，殷人对祖宗一元神有祭享权，但这类神器并不代表政权观念。周代“器”的“求新”的意义在于，彝器表现一种政权的形式，显示出超社会成员的权力逐渐集中在个人身上，象征着神圣的政权。所谓周公作礼就是由宗庙的礼器固定化做氏族专政的宗礼。礼器就是所获物与支配权二者的合一体，由人格的物化转变而为物化了的人格。总之，礼器是周代氏族贵族专政的成文法，后来争夺礼器与争夺政权同等看待，理由正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明的实质是“器惟求新”的专政。礼与法是不同统治阶级的工具。“礼”是旧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即区别贵贱尊卑上下的法度；“法”是国民阶级（贵族、自由民、手工业者）的统治人民的政权形式。

“人惟求旧”不是指周人因袭殷人的全盘制度，而是说周因袭着殷人的氏族旧制。“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的人，是氏族的联盟体。周的建立，在“器惟求新”的同时，保留了氏族的残余。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一开始便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保存了旧人物，使‘旧的拖住新的’，以致一系列的旧生产方式遗留到后世，形成束缚历史发展的力量”，“这就叫做古代的‘维新’社会以及‘亲亲’宗法政治”^②。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2—13页。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②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6—17页。

在侯外庐看来，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在铁器还未使用的青铜时代便出现了“早熟”的城市即国家，是因为黄河流域有黄土地地区，西周政权四周有繁盛的人口部落从而可获得必要的劳动力源泉，以及因灌溉而产生的公共职能，“所以文明可能在温室似的环境之下长成，而有异于自然生长的希腊文明”^①。

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代社会道路是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的两个方面。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读，侯外庐把中国古代社会放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围中，用家族（氏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形成古代文明的不同路径：“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如中国）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而保留着家族。前者是扫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的路径，后者是保存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前者是马克思所说的“正常发育的”文明的“小孩”，后者是“早熟”的文明的“小孩”^②。侯外庐的研究理念和实践表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是多元的，并非一种理论模式所能涵盖。正如有的研究者评论说：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显示出“历史的发展、至少是奴隶社会，没有什么‘通例’，没有什么‘一般’，更没有什么‘标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线的，哪一条线都不是标准、一般、通例”^③。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他指出研究思想史，不是要“陈列古董”，而在于说明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所以然。“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④ 他将中国秦汉以前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由殷周之际古代思想的起源，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7页。

②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③ 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收入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

经过西周“学在官府”之学，以至东迁前后的思想；（2）由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缙绅的儒学；（3）由孔、墨显学对儒学的批判，经过百家并鸣之学，以至周秦之际的思想。^①这三个阶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例如，西周“学在官府”之学的出现，是因为土地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所支配，国民阶级^②没有在历史上登场，“思想意识的生产，也当然不是国民式的，而是君子式的”；土地国有、宗法制度和学在官府是西周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思想学术被其经济基础所决定；这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讲的上古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和明于仁义礼乐的“圣人”和“君子”是学术思想创立者的缘由。^③这些看法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影响。^④

关于“先王”观念产生和变迁的论述，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侯外庐通过社会史的研究把握思想史脉络的努力。“先王”思想是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之一。侯外庐的发现是，殷、周两代的称王和尊王有着明显不同。殷代的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即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是殷代氏族成员基本一致，没有分裂，人与人之间一元性的反映。西周的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即在先王以外另创出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于先王，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西周的“作邦”；同时，由于周代施行维新制度，保存了氏族制的遗绪，又使先王和帝结合在一起。这种在意识上既分裂又统一的神秘宗教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最初发源地，从而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思想。西周后期，尤其是春秋时代，由于有了中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7—18页。

② 侯外庐“国民”一词的含义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古典罗马社会时所说的“平民”。参见何兆武《释“国民”和“国民阶级”——兼忆侯外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25页。

④ 陈鼓应写道：《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提出的国民阶级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意义“在学术界是一项新颖而又合乎实情的提法，这个观点也影响了台湾的学者徐复观先生”（陈鼓应：《读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国古代奴隶制下显族的土地私有要求，有了国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试图推翻“维新”政治，普遍支配人们意识的新王思想受到怀疑，出现宗教先王向理想先王的转化。孔子将先王作为道德理想来拟人托古，墨子则将先王看成是平常人，开启了后世先王观的先河。战国诸子先王观众说纷纭，直至荀子和韩非子反对儒家的先王学说，显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变动。荀子拒绝将先王与天道联系在一起，把历史相对地归还于自然的过程；韩非子更进一步地否认周道，不遵循先王，都表现出对氏族政治的批判。对于先王观的认识可以见仁见智，但侯外庐的研究理论昭示出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正如他晚年所说，他对先王观的研究说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倘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史，特别是维新路径的亚细亚的特点，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的”^①。

二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侯外庐的史学思想

侯外庐的史学主张和研究实践清晰地显示了其史学思想的特征。

第一，理论的确立和如何运用理论。毫无疑问，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研究的基本准则。他在晚年多次提到这一点。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他在谈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写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②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他又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他本人研究历史时“紧紧掌握的原则”^③。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存在的种种“秘密”，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

^②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27页。

展规律，是侯外庐史学思想中的基本要素。但他不是“公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首先，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全面的理解，而不是用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作为认识历史的依据。他反对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的叙述，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的排列序列是不相同的，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是作为不同种类看待的。^①他批评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出现的“公式化”倾向，认为“只要不是孤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句话，而把它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联系起来，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心研究，问题是不难理解、也不难解决的”^②。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面和整体把握上，侯外庐身体力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典范。

第二，理论和具体研究的关系。侯外庐主张，理论的价值是通过具体研究得到体现。他在20世纪40年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但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而且要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加以发展；研究的成果应当被看成是对这种发展的一种贡献。”这段文字包括两层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代替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其次，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具有广泛启发意义乃至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是禁区，改革开放后，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争议。侯外庐的主张和他的研究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从本质上说，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学科，判断来源于史料的支持。侯外庐对史料极为重视。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出现和中国历史发展中，他详细分析甲骨卜辞、金文和传世文献。这个学术风格也延续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

到他对汉代以后历史的分析以及后来的研究工作中。^①他不拘泥于对史料的字面释读,而是着眼于史料背后隐藏的历史内容,透过字面看其实质,^②对一些人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如“封”“邦”“国”等给予了新的解释,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框架下的一个创造性的研究实践。他强调了在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他说:“研究古代,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在中国古代有若干的自然条件,也不可抹杀。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传统或传习和自然环境,都要仔细区别,要说明他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哪些不同之点。”^③正是着眼于这些“不同点”,他阐述了中国文明发生时土地占有形态、劳动力的获得和使用、城市的出现和城乡分裂以及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种种特征,以及中国古代的“维新”社会和“亲亲”宗法政治的“早熟”形态。侯外庐晚年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总结说:“(要)注意马克

① 如为了探明董仲舒的思想实质,侯外庐对《春秋繁露》进行了考证,他根据《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绝无繁露”推定“繁露”有“通贯”之意,并进而指出,董仲舒试图以《春秋》大一统精神通贯古今,为汉代立法,制造适合于最高皇权的神秘原理(龚杰:《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张岂之回忆说,在侯外庐的要求下,“我们几位年轻助手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外庐先生修订《中国思想通史》第1、2、3卷,基本上把书中所引用的每条材料都查对过,对不同的古籍甚至作过较长时间的考订”(张岂之:《远见卓识的引路者——略论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以上两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何兆武回忆,20世纪60年代,侯外庐与助手讨论问题,有一次杨超提到 *verschacheren* (*Verschacherung*) 在德文中只有“卖”的意思而无“买”的意思,侯外庐回答说:有买就有卖,有卖就有买,“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何兆武:《释“国民”和“国民阶级”——兼忆侯外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侯外庐对史料的“活”的理解。

③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①可以说，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一些学者认为，侯外庐史学思想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问题。^②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方面，侯外庐最为突出，贡献也更大。^③

第三，思维特质。侯外庐具有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他说：“在学术史研究上重视独立自得的精神，是我治学所一贯秉持的。”^④这并非虚言。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到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分析，侯外庐都一以贯之地秉持了“独立自得”的研究理念。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强调思想史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研究思想史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⑤；同时也注重思想史本身有其独立性。注重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链环；指明相互对立的学派在各自批判对方的过程中，往往又或多或少的吸收对方的思想来丰富自己。有的对立学派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批判和互相吸收，最后趋于融合，是“思想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⑥，将每种思想学说都放置在“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和“纵通”即思想源流的演变的交汇点上进行研究，也是侯外庐独立思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上的反映。在此之前，虽

①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18页。

② 瞿林东：《侯外庐史学理论遗产的科学价值》，《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9页。

⑤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第14页。

⑥ 同上。

然也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想史，如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何干之分别以经济、阶级和政治因素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思潮的出现和变化，^①但明确和系统地将社会的变动与思想的变动联系在一起，说明思想的形成和走向，侯外庐可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第一人。

独立思考必然会引起对历史现象和以往判断的疑问，侯外庐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他以排比递进的方式，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

社会历史的演变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式，环练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术理想与理想术语，表面恒常掩盖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定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②

这组被有的学者比作屈原《天问》式的疑问，实际上包括了“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

^① 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将先秦至鸦片战争的思想演变过程划分为9个内容，论述“种族国家的奴隶制时代”“初期封建领主集团的政治意识的演化”“初期封建制度发育成熟时代之政治思想各流派”“初期封建矛盾发展时代之政治思想各流派”“专制的封建初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及其演变”“在矛盾斗争中扩大期中之各派政治思想”“地主阶级经济复兴时代之各派政治思想”“封建主义末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专制的封建主义崩溃期各派政治思想”。强调了政治思想与阶级的关系。何干之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之一。1936年出版的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主张，任何思想文化运动都与当时社会生产状态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一个社会运动必有一个坚实的思想运动作它的先驱。例如文艺复兴是欧洲民主运动的先驱，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中国五四运动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因此，五四运动是区分新旧启蒙运动的标志，五四运动前的启蒙思潮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不是真正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是真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这个表述显示了思潮与社会政治的关联。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页。

“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等问题，^① 这既是人类认识也是思想史中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他对这些宏观问题的思考，是其富有深度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保证。从其著述看，他更着力于对中观问题的思索。在“特别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侯外庐对西周学官以及诸子出于王官、老子思想的时代性、孔子的人类认识与墨子的国民自觉性、诸子思想所反映的各自的阶级性等这些“需要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学术上的疑难问题”^②，进行了认真研究。

总之，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出现了以侯外庐为代表的新的声音，这就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这是对社会史论战中呈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积极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初步中国化的一次具有开创性并富有价值的重要实践，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第五节 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后不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介绍工作。代表性的著作有1924年出版的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和1926年出版的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其中李达的《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269页。

对社会的“构造”“起源”“社会意识”“家族与氏族”“阶级与国家”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而下的发展过程,这部书是李达另一部重要历史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①的前身,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由最初的理论研究,发展到实际研究,“并为后来郭沫若、吕振羽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具体研究中国历史,有重要启发”^②。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一批移译外国和由本国学者撰述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纷纷出版,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著作在介绍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并启发人们思考历史问题的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回应。在此期间,社会史论战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热切关注。如何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更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推进研究工作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翦伯赞完成了《历史哲学教程》,^③并在几年后陆续撰写了《略论中国史研究》《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等论文,^④集中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水准。

根据翦伯赞的叙述,这部著作的撰写间接缘起于社会史论战。他原本打算写一本中国社会史方面范围较大的著作,一方面梳理和讨论各家意见,另一方面系统表达自己的看法。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翦伯赞的思路发生了改变,他认为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的历史工作者不应让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而应“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⑤。因此,这部著作既有理论的庄重和质朴,也有历史与现实的生动与具体。

《历史哲学教程》除起首的“绪论”(概论全书)和末章“关于

① 李达:《社会学大纲》,北平大学商学院1935年印行,上海笔耕堂书店1937年版。

②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

④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收入氏著《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

⑤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页。

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讨论社会史论战中的主要论题，兼及评论有影响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篇，涉及了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历史发展中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历史规律、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历史进程中的联系性、传统史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方面的问题。

一 历史研究的理论

翦伯赞回顾了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研究过程，他把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的历史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把实际去适应于信仰，适应于预先幻想出来的教条的”神学阶段，^①这种史观认为，全部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由上帝（或神或天）导演出来的，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欧洲，从希腊、罗马时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受到这种历史观念的支配。在中国，甲骨卜辞、《尚书》、《诗经》和《左传》，也充分表现出这种神学的历史观。第二个阶段是玄学（即形而上学）阶段，“玄学史观与神学史观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在形式上。玄学史观把‘上帝’这个名词，换成了‘永恒真理’这个概念的术语。在以观念构成的历史来代替具体的现实历史这一根本出发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②。玄学史观在欧洲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特别发达，康德和黑格尔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从司马迁《史记》开始，“他们虽然已经在历史学上应用初步分类的逻辑学，但主要的出发点，是以玄学为根据的”，“都是以儒家伦理主义，贯穿中国的历史”^③。第三个阶段是把历史材料初步地加以科学的整理。这个努力在欧洲始于费柯，^④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登场，其中不仅有唯物和唯心二元论的对立，也因阶级立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39—40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④ 费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8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历史哲学家和美学家，今通译作维柯。

场使得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时甚至滑回到神学史观中。在中国则开始于新史学兴起之际。马克思主义出现，肇始了科学的历史观：

旧来的历史理论之能进到真正的科学阶段，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之建立。这种哲学，是新兴的劳苦大众的哲学，是从来社会发展理论之最高的成果。它把社会发展与历史上一系列之生产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指示出可惊的多样性阶级之矛盾对立的统一性，社会相续的变革性的法则的过程，即历史之科学研究的道路。^①

又说：

所谓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产过程中，去理解的——从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现象正是辩证的方法，辩证的依据”。

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说明，就一定要应用辩证的唯物论。^②

可以看出，翦伯赞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阶级的理论说明历史观念的演变的。他对唯物论历史观要点的概括，同样来自恩格斯的表述。^③虽然有些散漫，但翦氏将生产活动、阶级矛盾、社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据《翦伯赞全集》第6卷《历史哲学教程》校勘者施德福检录，翦伯赞引文系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但翦氏所引文字只是大意，与恩格斯原文有一些出入（如原文中没有“生产过程”），而恩格斯在此文中又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这或许是翦伯赞在文中说要说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必须运用辩证的唯物论的出处。这个理解似乎是误会了恩格斯的原意，夸大辩证唯物主义的价值。

会发展和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用“联系”“运动”“多样”和“错综”概括唯物史观的辩证特点，可以说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他对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的说明，尽管存在着“战斗精神”，但就论证方式看，不是说教式的和强迫式的，而是将人类历史观的演变过程作为出发点，分析以往各种史观出现的背景和缺陷，在对历史观的历史的陈述中，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所在。

针对唯物史观运用中出现的教条化倾向，翦伯赞提出了“论”与“史”、理论分析与史料的结合问题，写下了许多当时是、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理论光芒的论述。

在过去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近来，已有不少的历史家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史，但一旦接触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便不能正确地运用方法论了。因此，每一位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①

所谓原则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不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发生和发展。^①

（如果没有研究历史的材料）即使我们有最正确的历史方法，则方法永远还是方法，因为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的变成历史……历史方法之于具体史实，正犹如解剖刀之于尸体，他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假如知道了历史方法，而不用以解剖具体的历史，即无异一个医生，有了解剖刀不进行尸体解剖一样，结果历史方法就变成了无用的废物。^②

翦伯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方法”不是治史的“根本”，只是治史的一种“工具”^③。如果说“多记‘历史事实’”是翦伯赞的忠告，“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则包含着他对唯物史观的自信和对实事求是地运用唯物史观和让“论”与“史”、理论与史料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的期待了。

二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翦伯赞指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历史有阶级性，于是历史学家叙述或批评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所以历史学必然是带有社会各集团之阶级局限性的科学。”^④就是说，历史学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来源于阶级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由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叙述和评论都站在自己所属阶级的立场上，因此历史学必然带有各个阶级的局限。历史学家在对过去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反映着当下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史》，《怎样自我学习》，新华日报图书课1945年版。《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王学典：《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4页。

胡适关于历史研究者的“主观性”有许多名言，如说：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擦脂抹粉。又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任你如何去摆。又说，历史好比是一块大理石，任你如何去雕琢。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小序中也写道：“文学家下笔写历史时，也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哲学在心里，倒不如社会科学家本有他的原理和方法在心里，比那些口说没有成见，心却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成见的无自觉的人来得明白，去得磊落些。”说这是“历史是观念构成的，人们可以依据其个人不同的观念，为所欲为地创造自己所愿意的历史”。翦伯赞批评了胡适和陶希圣关于历史学主观性的意见。^① 在以后的著作中，翦伯赞仍然主张客观性是历史研究的前提。^② 然而，既然在阶级社会中，历史学家没有例外地必然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执行自己的阶级使命，那么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如何保证？翦伯赞强调说：正因为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所以除了最进步的阶级之外，任何阶级也不能给予历史以真正科学的认识”^③。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阶级立场的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认识的非科学性；第二，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能给予历史以科学的解释。然而，“客观性”和“科学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事物的不存偏见的描述，后者是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因此，尽管“客观性”是“科学性”的前提，但对事物的“客观”的描述，未必就能带来对事物的科学认识。在翦伯赞的笔下，这两种概念似乎有些混淆。历史研究中，完全的“客观”是否存在？是否只有“进步”的阶级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人们记录和认识历史时除去阶级立场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对事物的完整和不存偏见的描述？描述的“客观性”和认识的“正确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在当时翦伯赞都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103页。

② 翦伯赞曾说：“历史是具体的科学，要承认客观的事实，不能以主观的爱憎涂改历史的事实。”（翦伯赞：《论刘知幾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9月。《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0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绪论，《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5页。

未暇探讨。

关于历史和历史学、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在李大钊笔下曾有过相当深刻的说明。李大钊认为，客观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延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而历史著述则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正是由于历史学的存在，使得“活的历史”得以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之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①。他还指出，历史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因此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②李大钊论述了历史本体与历史记述的关系、历史认识的局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问题都是历史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循此而进，便可以触摸到历史知识的获得与解释、历史认识的发生和可能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翦伯赞已经徘徊于路口，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是令人惋惜的。

三 历史学的价值

“求真”和“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赋予历史学的两个最为耀眼的功能。新史学的兴起，不仅没将之消减，相反，关于“求真”和“致用”畸轻畸重的争论和实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最为常见也最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之一。在这两点之间，翦伯赞的身影倾向的是“致用”的一面。但他的“致用”追求主要不是简单的“影射”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56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和“比附”^①，而是通过认识过去来认识今天并指导未来前进的方向。

我们欲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当求之于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而当求之于历史。^②

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③

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未来。^④

历史不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价值的一个基本认识。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致用”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认同。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中救亡图存的需要更加强化的对历史学致用价值的要求：“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而是要“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⑤。

中国近代史学上的“求真”和“致用”实际上包含了这样几个问题：是以“求真”为目的，还是以“致用”为目的？为了“求真”是否可以放弃“致用”，或者相反？从整体上看，“致用”的呼声一直居于优势位置，即如陈垣那样传统史学功底深厚、学问笃实的大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主张“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⑥。翦

① 翦伯赞并不完全排斥以古讽今，在1948年9月至11月间他曾撰写了多篇借古说今的短文，如《孙皓的末日》（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7日）、《评南北朝的幻想》（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2日）、《末代帝王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香港《文汇报》1948年11月12日）。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3页。

⑤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页。

⑥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21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伯赞没有提到是否可以有意识地遗忘或用虚假的历史达到“用”的目的。《历史哲学教程》出版后的几年里，关于“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再次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关注。判断的天平有所转向，“真”的必要性得到了肯定。郭沫若的看法是：“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一切凸面镜、凹面镜、乱反射镜的投影都是歪曲。我们并不要因为一种歪曲流行，而要以另一种歪曲还它。如矫枉常过正，依然还是歪曲。答复歪曲的反映，只有平正一途”；“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①。华岗也指出：“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如果所根据的历史事实，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真实的，那么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②。显然，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明确的是，“致用”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求真”是“致用”的工具。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历史学的“工具性”。一切学问，当它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成为个别人自娱的生活方式，它必然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这样一门基础学科来说，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以致将这门学问用“工具主义”来统领，同样会使其丧失生命力。总之，“求真”和“致用”是否必然相互排斥？二者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平衡？当“求真”和“致用”之间发生对立时，又当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我们在翦伯赞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学者那里，都没有看到对此的必要说明。

四 历史规律

既然把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定义为对今天和未来的认识，更为具体的任务便是对历史规律的考察。翦伯赞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文集》（历史卷）第1卷，第612、617页。

②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5页。

律，不仅要把社会诸形态和诸构成，依照时间顺序和性质异同加以排列和分类，最主要的是要从“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行程中，加以全面分析”，“要把浮现于历史表面上的诸复杂现象放在其基础的推动力上，使其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斗争之中去”，并抽象出正确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法则，“来说明并指导人类实践生活的发展之历史的具体性和规律性”^①。在这里，翦伯赞将历史分为表层的和深层的两个部分，表层显示的是历史表面的各种现象，规律则潜伏在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下面。唯物史观所认识到的历史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活斗争”。我们今天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的说明应当包括两个要素，即（1）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有能力认识规律；（2）人类社会是运动 and 发展的，这种运动和发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尽管《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没有作出这种明晰的表达，但却或隐或现地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翦伯赞更为关注的是“历史法则”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他认为，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都存在于历史活动之中：

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所以历史科学的研究，固然要以一般的发展为前提，但只是理解一般的法则性或世界史的一般发展途径是不够的，因为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反之，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的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之具体的内容。^②

这即是说，历史活动和历史发展包括了人类共同具有的内容和特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54页。

定国家或地区所特有内容两个方面，因此探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翦伯赞肯定一般性对特殊性所起的“主导作用”，指出：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论其地理条件如何，技术如何，以及一切特殊的关系如何，在本质上，是有其发展之一般法则的。虽然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有其特殊的法则，但这只是多少改变其形式，对于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可能的。我们知道，一切文化民族都经过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同时有由此而转入阶级社会——即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社会。^①

但更多的篇幅则表现出对特殊性的强调：

历史的研究不仅在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探求特殊形势，即是说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又经常地从属于一般法则，但特殊性却又正是个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机。^②

他认为由于在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中，完全同一的两个现象是不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不能用一般性去掩盖特殊性。他举例说：阶级社会是以剥削关系为基础建立的，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阶级社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又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法则，“总是丝毫也不忽视特殊性的意义”，相反，只有那些“站在史的唯物论的名字之下，而把这个关系中的将来，包被在一片灰色里面的观念”^③，才会忽略对特殊性的认识：“形式主义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5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

的理论家，总企图把那些类似的特征归纳起来，再把那些差别除去，以形成抽象的一般观念。然后把一切现实的具体历史，笼统地嵌在他们的所谓一般法则中。”^① 翦伯赞尖锐地嘲讽道：“从理论方面说，再没有比这可怜的；从实际方面说，也再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那是极庸俗之愚笨。”^② 应当说，翦伯赞在一般性法则决定特殊性上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对特殊性的强调，应当与批判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立场有关。他在评论社会史论战各家学说时，表示“很钦佩陶希圣不为公式所拘束”^③，并对郭沫若中国古史研究中存在的公式主义表现提出批评。^④ 在政治立场上，翦伯赞是郭沫若同一阵营的战友，是与陶希圣对立的敌方，但以反对“公式主义”作为评定学问是非的标准，显示出翦伯赞对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厌恶，这也正是《历史哲学教程》向特殊性倾斜的原因所在。

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翦伯赞具体论述了怎样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既反对夸大历史进程的一般性，从而抹杀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也反对中国历史道路自外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

近来有些历史家往往强调中国史的特殊性，他们把中国史描绘成为一个神奇的东方之天国的图画，在这里充满了历史的奇迹与人类社会的神秘，一切都是特殊，中国史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史，因而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在中国完全不能应用，从而作出了中国史上不是缺了这个社会便是短了那个社会之结论。像这样的看法……与中国历史之客观的实在性，并没有关系。

另外有些史家，则强调中国史的一般性，他们不是用一般法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177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184—186页。

则代替现实的中国史，便是用一般法则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史，结果，在一般法则之前，中国史变成了一片灰色的东西，他失掉了一切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我们不应把殷代的奴隶制夸张得像希腊、罗马一样；反之，也不能因为殷代的奴隶主每人平均没有分配十八个奴隶，而遂谓殷代不是奴隶制。同样，我们不应把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与西欧15世纪的专制主义相提并论；但也不应因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之早期出现，而遂谓不符合公式。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式发展史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①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它的发展不能逸脱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它也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此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从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它的特殊性中去发现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②

五 历史的关联性

“历史的关联性”是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概括的命题，它涵盖了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用这个命题来叙述翦伯赞对历史的认识。

第一，历史的存在状态在时间上表现为活动和发展变化，由细微的量的积累，逐渐因为性质而发生突变。

翦伯赞强调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历史的本身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发展中，在这一瞬间到另一瞬间，它都有极细微的量的变化乃至质的变化，即所谓部分的突变。这种变化都直接与其先行阶段的诸残余的削弱和继起阶段的萌芽的生长关联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翦伯赞全集》第3卷，第12—13页。

②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着。”因此，要想正确地洞悉历史自身的“合则”和“变则”关系，就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之中各个阶段间的相互关联性”^①。因此，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量的增大或延续，只要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东西就会失去其以前的质，而在新质上面成了另外的新东西。就因为如此，所以历史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是一个绝对连续的；因为由一质到另一质的转变，却不是连续的进化，而是飞跃，是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之中断”^②。翦伯赞的基本主张是，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它始于量变，继之以量变的积累，终于“飞跃式”的质变，在一个“质”和另一个“质”之间形成两种形态间的中断。质变完成后，具备了新的内容，保留了的残余，并向下一个社会继续着这个由量变而质变的过程。翦伯赞的这种认识，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赞同。华岗写道：“量变是连续性的或渐进的变化，质变是连续性的中断，是飞跃性的突变，是革命式的变动。一定的质，和一定范围的量变分不开，这就表示量和质决不是完全不相关的，而是统一的。”^③

第二，历史的存在状态在空间上表现为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

翦伯赞指出：

各个民族的历史，决不是孤立地存在与世界史的全体系之外；反之，只是作为世界史构成之一部或一环而存在着。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在其每一发展时期中，在其生活的接触上，他总是不断地在摄取并消化着那些环绕在他周围的诸民族的文化，或是把它自己的历史的影响，投射或浸润到其他环绕在它周围或掺杂在它中间的各民族历史中去。^④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7页。

② 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读书月报》第2卷第3期，1940年5月。

③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7年版，第70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7—78页。

因此，在研究历史时，首先要把历史视为整体性世界历史，不要把这一个民族史从世界史中孤立出来，要看到它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互作用”。

第三，历史的存在状态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在翦伯赞看来，“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如何看待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作用亦即历史创造者的问题。这是翦伯赞重点研究的内容，他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多处论述个人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特殊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当作几个英雄人物的传记；而当前的一些“机械论”（即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历史学家，则绝对否认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这两种理解都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不将社会史的原理与历史事实分开、‘客观情形’与‘个别人物、集团、组织、政党’分开。这就是活的辩证法。‘一切皮毛之学’死板的公式、以及把历史的创造完全抛出于历史之外，都是机械论者的历史方法。”^①因此，翦伯赞他既批评了胡适所说的“个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几十年的战争”的观点，也批评郭沫若、吕振羽“闭口不谈个人”，认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②。翦伯赞指出，首先，人类历史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历史不是离开人类的创造而自然主义地发展起来的，事变之客观过程并不能排斥人类的主观活动；反之，人类的主观活动正是客观化的结果，即所谓历史的产物。其次，领袖人物的意志和愿望是他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意志和愿望的体现，他的作用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他所属的阶级和集团的：

当作一个历史行动的领导者个人，至少他在其行动上或思想上不仅仅是代表其自身，而是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一个阶级的权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9—80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力或意识。因而这种特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也就是某一阶级的行动和思想，并相对地能指导其阶级的行动和思想；对于另一阶级的实际生活，当然就发生支配或影响的力量。^①

他认为，历史上的个人虽然“无权”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或对历史的发展作本质性的改变，“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迟或速，是可以给予影响的”^②。1939年，《历史哲学教程》再版时，翦伯赞撰写《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作为再版的序言。这篇明显受到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述影响的论文，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的想法。翦伯赞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不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也由于领袖人物和政党（后者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出现：

对这一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倾向使群众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阶级行动或民族行动，这便是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或革命的领导人物，只有通过这种领导的政党或领导人物，才能使群众的行动规律化、组织化、集中化，引导他们依照正确的路线，走上历史的阵地。^③

推动历史的力量，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某些杰出的人物个人的动机；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所谓历史上某些杰出人物的动机，决不是代表着他个人的意欲，而是代表着某一民族全体或某一民族中之一个整体阶级的一致的生活的要求。不管这个杰出的人物自己的意欲如何，然而只有当这一动机是反映着大众的生活的要求的时候，才是推动历史的动机。换言之，所谓个人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整个的生活的要求之综合，通过这一杰出人物的头脑，而变为民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79—80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族意识或阶级意识。然后这一杰出人物再以这种民族意识或阶级意识去领导全民族或全阶级从事于实现这一大众的要求的斗争。^①

翦伯赞根据恩格斯关于特殊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但没有这些人物或迟或早会有其他的替代者的论说，分析了偶然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但这种人物或迟或早必然出现，表明“他”的出现“具有深厚的社会的需要”，表明历史人物的才能确能影响到历史的行程，却不能阻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决定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②。翦伯赞用中国历史具体说明英雄人物对历史活动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删去了秦皇、汉武、忽必烈、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这些伟大人物，也“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些英雄和民族革命的领袖来替代他们，“中国历史决不会因为缺少他们而改变其发展的规律”。这些人物能够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变为伟大，固然与其本身的特质有关，但最基本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各个人所处的时代之社会的深刻基础”，这些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中国历史的基础即社会经济之发展的规律性，使得这些人物的出现，则是必然的。历史的偶然性不但不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相反的，它是绝对服从历史的必然性的。伟大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要当时当地的社会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出现”^③。然而这并不能抹杀历史人物的独特贡献。例如，如果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孙中山，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来替代他；不过如果孙中山的“替代者”没有孙中山的人格、天才和意志，也许就不能喊出中国人民的全部要求，也许就不能看出只有三民主义要求的全部彻底实现才能扫除中国半殖民地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92—93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同上。

半封建社会的属性，也许就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为之奋斗。^①
翦伯赞的结论是：

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存在乃至行动，都是被决定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原因，被决定于历史发展之必然的规律，一个历史人物的本身，则完全是偶然的。同时，一个历史人物之有无力量，伟大与不伟大，也不是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天才与特性，而是看他是否代表着大众的一般要求，是否为实现大众的一般要求而领导这一历史行动。这样，我们便了解了群众与领导者的关系，了解了人类主观的创造作用与客观条件在历史上之辩证的统一。从而我们又知道了只有群众的力量，才是推进历史的动力，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②

《历史哲学教程》和该书再版序言“群众、领袖与历史”问世几年后，翦伯赞对这个问题又作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他指出：“研究历史，一方面，固然应该注重社会经济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只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人类之主观斗争，那就无异说任何人类的历史行动对历史都不发生作用，而历史的发展，只是经济的自动发展。反之，如果只注重人类的主观斗争，而忽视社会经济对历史之决定作用，则又无异说，历史是英雄手中的一块泥土，任他捏成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一切客观条件，都失掉了对人类主观斗争的制约性。但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中国史上的许多王朝，大半都被人民叛变所颠覆；反之，社会经济对人类的主观斗争，也有着决定的限制性，如中国史上许多反动的英雄，都一个跟着一个碾死于社会经济前进的车轮之下。因此，我以为历史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自动，也不仅是人类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1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再版代序，《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1页。

斗争的自由创造，而是社会的客观条件与人类的主观斗争之辩证的统一。”所以研究中国史应该拨开许多复杂的现象，去发现那条通过倾斜曲折乃至倒退的过程而贯通于中国史之社会经济发展的曲线；另一方面，也不要忽略活动于这一条曲线上之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史从死板的文字记录，变成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历史。”^①

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历史非个别“英雄人物”所创造，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独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②1931年，德国作家路德维希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次交谈。路德维希问：“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相反，它认为“英雄”在历史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伟大人物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而那些否认个人在历史上作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 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主张的“英雄”与大众共同创造历史，都以观念和意识作为基础。如朱希祖回忆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来自德国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的要素？稍微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Lamprecht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梁启超也说：“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侵入或诱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寢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三，第113—114页）

用的观点，是“庸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①斯大林的这些话与翦伯赞的表述在精神上完全一致。我们不清楚翦伯赞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是否读过斯大林的这篇文字，但没有读过的可能性很大。^②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创造作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那里就有了明确认识和表达。李大钊指出：“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③，“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④。刘静白写道：“伟人与领袖是群众在行动中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社会底必要而产生的。倒转过来说，社会不需要时摒弃了他。若是需要，万一既成的领袖偶然死亡，社会亦必依其需要从新生产；若是领袖不为它所需要，或违反它底需要，它亦必依其需要产生新人以代替。物质决定论底意义，盖不过如此。然而人到底是‘被动环境中的自动因子’，所以在社会发展行程中，有他底反作用存在，可以促进发展，也可以阻碍发展。然而他不能改变社会必然的发展。”^⑤不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大都忽略了个人对历史活动的影响，忽略了人的创造性。因此可以说，翦伯赞关于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想法，是自己通过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而获得的。他对于人民群众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对“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说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一个贡献。

第四，历史的存在状态的连续性。

翦伯赞主要讨论了历史由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存在怎样的联系。他反对用“观念的历史”解释历史的变化，将历史的发展看成

①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95页。

② 《历史哲学教程》和《群众、领袖与历史》征引的经典作家论述，主要是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斯大林著述也有，但不是这篇。

③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36页。

④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43页。

⑤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版，第43页。

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也反对用表面上的历史现象说明历史的变化。指出：“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只有把这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放在其基础的推动力——生产力之发展上，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各个阶段之依存性与关联性。”^① 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吕振羽对史前和殷商社会的研究的缺陷在于“过于着重个别阶段的特质”说明，却没有以同样的精力注意“阶段间的关联”^②。翦伯赞的本意自然是在说要注意一个社会形态在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表现，但从广义上看，“阶段间的关联”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中间形态，它不仅有助于了解两个递进社会形态之间联系和变化的细节和特征，也对认识其他历史状态的过渡性和联系性是一个启发。

六 阶级和阶级分析

毫无疑问，翦伯赞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阶级社会的一切活动包括历史学本身，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离开了阶级分析，我们对文明出现、国家建立以后历史的认识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值得提出的是，在坚持阶级分析原则的前提下，翦伯赞还提出了不能简单化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历史。

首先，注意特定社会中两个基本对立的主要阶级之外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他指出，如果忽略了个人的社会属性，“历史便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我们只看见混乱一团的无数个人之思想的活动、恩怨的报复”；反之，“把所有的个人都归纳到两个定型的集团，这又未免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历史上两个敌对集团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间的社会群”，他们“在两大敌对集团之间，往往起着缓冲或激发的作用”。他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中间层”是“小所有者”，这个社会集团在封建统治者与农民之间矛盾尖锐化时倡导改良，以挽救行将崩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溃的政权。他们的失败，促成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如汉代的王莽、唐代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东林党、清末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

其次，注意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变化，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上的阶级：“人类之社会关系，并不是一种死的不变的定型，而是经常在变动中发展，在发展中变动。”例如，奴隶社会的自由民，本来与贵族同为一体，但在奴隶社会崩溃时却站在奴隶方面；封建社会中最初的商人，本来与农民同为受压迫者，但后来却上升为统治者。

最后，注意分析统治阶级及其内部的矛盾。翦伯赞认为，中国历史上，宗藩、外戚、宦官的内乱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当作一个集团看，他们的利害是统一的，但是一个集团中，却包含着许多小的阶层，在这些小的阶层与阶层之间，仍然有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限度也要决裂的。”他归纳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表现出的“相继出现”的规律，即首先出现的是宗藩之乱，如秦末胡亥杀兄、汉吕后称制而七国同叛、晋贾氏临朝而八王互屠、隋杨广弑父等，认为这表明，当新的统治者削平农民叛乱后，社会矛盾转化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果克服了这一个矛盾，便开始了封建经济的繁荣，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腐化，外戚宦官登上政治舞台，随之而来的是“小所有者”的政治抗争，由此而把封建统治内部矛盾重新拉回到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因而又引起新一轮农民反叛。因此，“从宗藩的混战、外戚宦官的专政、小所有者的政治抗争到农民叛乱，这正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的转化过程”，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特殊内容”^①。

这三个“注意”说明翦伯赞不是教条的、僵化的和绝对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阶级斗争观点，而是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看待阶级因素的作用。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广泛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并出现对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化理解倾向的时候，翦伯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收入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

赞的论述不啻是一剂清醒剂。1963年翦伯赞发表的影响很大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强调“矛盾不仅存在于敌对阶级之间，也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乃至同一阶层内部各集团之间。不要把阶级矛盾简单化，要着重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①，显然这是他20世纪40年代历史观的一个延续。

七 传统史学

新史学兴起之后，批判矛头直指传统史学。最激烈的观点是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四蔽二病”的概括：一蔽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蔽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蔽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蔽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一病曰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病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②在这场被形容为“中国史学界的‘飓风’、‘火山大喷火’与‘大地震’”^③的史学革命浪潮中，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盘否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呼声。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基本出发点，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和否定传统史观中的唯意志论、天授皇权论和英雄创造历史。从罗章龙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传统史学位置：

中国数千年“相斫”的历史，形成了一种反动的旧史观，旧史观乃由皇权神圣，万世一系，“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神器至上等正统观念所构成……自两汉以来，历代史官均祖述班马，奉为圭臬，视同金科玉律。翻开二十四史所歌咏者均属帝王将相，至于后妃官妾，外戚宦官，官僚地主，富商巨贾，以及食客、鹰犬之徒，对于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厮养不惜大书特书，津津

①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②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10页。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2月第4期。

乐道，连篇累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如此史书，实属玷辱人类尊严，无以复加。^①

传统史学在事实的层面上“是非颠倒”，在道德价值的层面上“玷辱人类尊严”。可以说是一无所取。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翦伯赞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出现之前的各个时代史学家，都掩盖了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阶级压迫。他们高扬伟人与天才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否认人民大众的力量。他赞美马克思“不为士大夫立传，不为贵族立世家，不为古天子立本纪”^②，认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如司马迁、杜佑、郑樵、马端临等人的历史观以玄学为依据，宣扬“观念构成的历史”。虽然司马迁初步“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历史叙述法”，关注社会经济方面并《货殖列传》，且为“游侠”和“日者”等普通人作传。但却“未能进一步的以社会经济作为全部中国历史事实的根基对中国历史展开其全面的研究，也未能从社会各阶层与各阶级间之相互的矛盾上去指出历史运动的法则；依旧只是从政治的表层形式去说明历史”，从而“以儒家伦理主义，贯穿中国的历史”^③。然而这种对传统史学近乎全面否定的态度，在随后便发生了变化。

1945年，翦伯赞撰写了两篇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即《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幾的历史学》，^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研究司马迁和刘知幾历史编纂和史学思想的第一篇论文。限于篇幅，本书主要对翦伯赞的司马迁研究进行评述。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司马迁的贡献。

首先，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以前的史著，或纪年为录，或分国为史，或仅记世系，或截录断片，“皆系支离断烂的著作”，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写作的方法，也没有一定的成

①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2—53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6月。翦伯赞：《论刘知幾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9月。

规。司马迁把零碎散乱的史料，分别归类于各人之《纪》《传》而演绎之；然后于八《书》中总其历史时代的背景而作归纳之叙述；最后则于《年表》中，排比年代，以求从时间的关系上推求其彼此间之关联。在《纪》《传》中，又以本纪为纲领，而以《世家》与《列传》演绎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世家》与《列传》形成“无形的连锁”。以归纳、演绎、排比，为历史方法要素，以《纪》《传》与《书》《表》为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历史写作框架。这种框架饱受现代人的诟病，认为它把历史割裂成诸多碎片。翦伯赞却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由于当时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放在司马迁面前，只有片段零碎的历史材料等着他去编纂，司马迁采取纪传体的方法就是为了将这些零碎的材料整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在司马迁那里，“并不是用纪传体割裂历史”，相反，是以之来串联历史。^①因此，“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②。

其次，司马迁具有宽阔的历史眼光。在《本纪》和《列传》中，他不仅关注社会上层的活动，也关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形形色色的活动，关注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在八《书》中，他不仅注意到礼乐、律历，也注意平准、河渠，注意天官、封禅，从经济、政治乃至意识诸形态，无所不书。在十《表》中，他已知道详者纪月，次之纪年，又次之纪世；从三代下迄汉武，其间诸侯将相，无不依次为《表》。

最后，司马迁秉持了批判的精神。翦伯赞认为，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也在于他撰写的《史记》是一部具有批判精神的“富有灵魂”之作。司马迁通过多种形式执行他的历史批判，包括标题、书法和在叙述中夹以批判，而最重要的则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太史公曰”，其中显示出司马迁“贬天子，退诸

^① 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6月。《中国史论集（合编本）》，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337页。

侯，斥大夫”，“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气概，这是“司马迁设计的历史审判的法庭”^①。翦伯赞列举了一系列司马迁进行历史批判的例子，如歌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叛逆的陈胜，歌颂善良的官吏，赞美失败的英雄，惋惜古来命运多舛的贤圣，痛斥草菅人命的酷吏和佞幸之徒。翦伯赞申论说：“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也是为了批判历史”，他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史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②。

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是否存在缺陷，翦伯赞的结论是肯定的。他说：“自然，我不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完全无缺，例如他的历史观受了驺衍终始五德说的影响，而带着历史循环论的色彩。”然而，他笔锋一转，强调道：“我们论一个人，总要根据他自己的时代。在司马迁的时代，正是五行说高涨的时代，他怎能不受影响呢？假如我们以历史的循环论而责司马迁，那就无异责备殷人该信鬼。”^③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翦伯赞曾尖锐地批判了司马迁的历史观，这个基本看法虽然没有改变，但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上那种严厉的姿态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包容，一种理解，一种在历史主义引导下的自我反省。^④

“余读《史记》，不仅惊叹在今日两千余年前的史学家，竟能创

① 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6月。《中国史论集（合编本）》，第353页。

② 同上书，第357页。

③ 同上书，第361—362页。

④ 对待传统史学的历史主义态度，同样见诸翦伯赞对刘知幾的评论，他说：刘知幾的史学理论“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能想见刘知幾是7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翦伯赞：《论刘知幾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9月。《中国史论集（合编本）》，第391页）。1949年以后，翦伯赞在历史主义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更为明确。他反对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的要求历史人物。他写道：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要求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的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

造如此周密的方法，其头脑是何等的精细！眼光是何等的博大！”^①——翦伯赞对司马迁和《史记》赞誉的高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是空前的，这意味着，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自己的理论基础，也开始从中国传统史学那里寻找民族文化的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传承中国文化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了。对于后者而言，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人们的知识，也有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杰出历史学家的伟大的精神世界：

到今日，司马迁已死去两千多年，他的名字，和汉武帝的名字，同样的响亮。是知事业文章，各有千秋；又知权力之可得而摧残者，人之肉体；至于精神，则可以从血泊中，放出其光彩。^②

八 史料

在翦伯赞的历史理论研究中，关于史料的搜集和处理是重要的环节。20世纪30年代的翦伯赞主要是以一个历史哲学家的声望知名于世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翦伯赞则又多了一个史料学家的身份：“最值得注意的则是这时翦伯赞对‘方法’（史观、理论的别名）与材料并重、阐释与实证交融的强调。”这一变化本身“极具象征意味”^③。

作为史学史上的一个趋势，“史料”范围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在清代中叶已是创建性的见识，到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后，“史料”又得到更为广泛的扩展。在地上，“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

① 翦伯赞：《论司马迁的历史学》，重庆《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6月。《中国史论集（合编本）》，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342页。

③ 王学典：《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店迄今之账簿及城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则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得确实资料，而生存状态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瞻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①。在地下，研究者“所欲知者，为地下之情形，所研究者，为其陶片、战具、工具之类，所最切搜集者，为其人骨、兽骨。此皆前人所弃，绝无市场价值”^②。在翦伯赞看来，传统目录学“史部”中的史籍在正史之外还有数量远过正史的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和笔记，在这些史著外，更有诸多种类和数量的史料：

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只“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总之，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③

不仅各种传世可见的文字是史料，各种遗物也是史料。在《秦汉史料新研》中翦伯赞特别强调了考古上的各种发现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他说：包括遗址（如楼兰古城、西北地区汉代烽燧、敦煌西北汉长城）、遗物（如汉代钱币）、敦煌和居延汉简、汉代石刻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三，第51页。

② 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7页。

③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收入翦伯赞《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

画像在内的这些考古发现，“不知吹送了多少新生命到纪传体的秦汉史之中。由于这些新的史料之发现，从前在文献史料中仅能想象、或不能想象、乃至完全不知道的史实，现在已有若干被具体地显现出来了”。他期待着“从地层中射出更大的光辉”，“把全部的秦汉史从纸上浮凸出来”^①。

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梁启超账簿、家谱皆史料，到翦伯赞的“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和考古资料皆史料，不仅反映了史料范围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这种扩张不是由“玩古”的嗜好所造成，而是历史认识变化发展的结果。由于对经济活动的重视，对普通人民生存状态的重视，对中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影响的重视，原本不可能成为“史料”的历史记述，具备了“史料”的价值。因此翦伯赞的“一切文字皆史”和考古资料皆史的提出，不仅是他个人的才情使然，也是社会史发展的结果。

翦伯赞具体分析了不同史料的价值和局限。他对正史（二十四史）的评价是，虽记述历史系统，但由于存在循环论的观点、正统主义的立场、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主观主义的思想，以及政治上的限制，其中的一部分史料可能存在错谬，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对正史以外的诸史评价是，在史料方面并不多于正史，且大半由正史中网络搜括而来，故若要“补充和订正正史，就必须求助史流之杂著”。对经、子、集的评价是，这些书虽不是专记史实，但其中有意无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诸书上所载更为可靠的史料”。对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的评价是：“诚如韩愈所言：‘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只要我们善于爬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②。

^① 翦伯赞：《秦汉史料新研》，本文为《中国史纲》第2卷的序言。

^②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收入翦伯赞《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

翦伯赞还讨论了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以及统计学和逻辑学对搜集整理史料工作的意义。他指出，除了明白可辨的史料外，还有许多史料需要通过分析才能获得其价值。他把这些史料概括为三类，即（1）“暗示性”史料。其价值“不是完全可以从正面看得出来的；但在它们的正面或侧面，却往往暗示出一种重要的历史内容”。如《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刘邦献项羽白璧和玉斗，在侧面暗示出大掠阿房宫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因为白璧和玉斗并非一个亭长所能有。（2）综合性史料。这类史料从个别去看没有意义，要综合起来才有价值。如历史上关于天灾和河患记载比较零散，只有通过统计学的综合分析才能给予人们以新知识。（3）分析性资料。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汉平帝时的户口数和人口数，“这个笼统的数字，实在没有很多的意义。但是我们若把当时各郡国的人口分别观察，则知当时的人口，大半集中于黄河流域，而尤以今日山东、河南接壤之处，最为密集”。（4）比较性史料。这类史料主要在经济史领域上。翦伯赞认为：“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把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物价、田赋、官俸、垦地等数字都计算出来，相互类比，则许多枯燥无味的数字，都会变成极有价值的史料。”^①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人们所公认的。然而，对于不同类型史料价值的判断则一向仁智互见。翦伯赞对正史评价之低是“前所未有的”，非但与孟森论正史之言背道而驰，也与傅斯年互有长短之说大异其趣；他对诗曲传奇资料的重视却与陈寅恪不谋而合。^② 在我们看来，由于对上层社会和群体所拥有的话语权的批判意识，导致了翦伯赞对正史的深切怀疑和对正史以外著述的肯定。不同学者对不同类型史料价值认识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历史观不同。

此犹小者。如何定位史料在史学中的位置，更不是那样“不言

^①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上海《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

^②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24—425页。

而喻”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①这个命题后来释者颇多,但要义似集中于如下4点:(1)通过史料可以获得“客观知识”,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2)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3)史学的本业在于“纯就史料以探事实”,通过“客观处理”材料以寻求事实,发现问题。而“材料之外”的则“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4)史学的起点在于保存材料,搜集材料;史学革新在于扩充材料和寻求新材料。^②简言之,史学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处理还原历史事实。如果说,将“历史学便是史料学”说成是“历史学等于史料学”可能误解了傅斯年的本意,那么将“历史学便是史料学”理解为历史学便是通过分析史料肯定存在的历史或否定不存在的历史,大约便贴近了傅氏的这个说法。

翦伯赞的看法则明显不同。首先,他反对将历史研究止步于恢复历史的原貌,他追求的是寻找在历史表象下潜伏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翦伯赞比喻说,如果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就是X光线。^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唯物史观是在寻找历史发展的大势。其次,由此出发,他没有把理论与资料截然对立,而是期待理论与资料有机和完美的结合。对此,他有一系列精彩的表达:

懂得研究方法,则一切的历史资料,都变成了工程师手中的砖瓦,不懂得历史方法,则结果便会被材料所包围而不得脱身。^④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

②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45—246页。

③ 翦伯赞:《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文萃》(上海)1947年第15、16期合刊。

④ 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10日,据《中国史论集(合编本)》。

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①

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方法与史料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②

注重于理论和史料的统一，也就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空头理论和史料之上的弊端，使历史研究的研究臻于完善。许冠三认为翦伯赞关于理论和史料关系“识断之精审，固在傅斯年‘史料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及”^③。此言后半部分容有偏差，但对傅、翦二人史料观的评定，是允当的。

九 历史知识的普及

1948年9月，一位青年给翦伯赞写信，提出了希望能读到用通俗文字写成的历史作品。翦伯赞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知识通俗化已经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在自己主持的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副刊上以公开信的形式阐发了自己对通俗史学的认识：

任何学科的通俗化问题都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内容上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谈历史知识普及化，尤不能不着重于内容问题，就是拿怎样的内容的历史知识来普及的问题……本国史知识

^①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收入翦伯赞《史料与史学》，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据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合编本）。

^② 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原刊《怎样自我学习》，新华日报图书课1945年版，据《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26页。

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

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上下数千年的本国历史的工作固然已开始好多年了，成绩也有不少；但是缺点和不够之处也还很多……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对于一部中国历史的了解，在许多方面还是停留在概念式的轮廓画和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还没有能掌握全部必要的资料，发现各种具体的历史规律，因而也还没有能把对于本国史中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认识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概念的知识和抽象的了解，无论用怎样通俗的文字写出来，毕竟还是不能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上，提高的问题又不能不与普及的问题同时提出来。^①

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翦伯赞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第一，普及和提高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一般来说，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导了普及，二者互相扶助，互相推动。第二，普及不仅是语言的通俗化，更重要的是普及的历史知识内容应当是“科学的历史知识”。第三，普及工作的对象是大众，但不能认为只有人民大众感兴趣的事件才值得我们研究，“因为这一事件必然千头万绪地和其他许多历史现象相关联，如果不全盘地进行研究，孤立地认识这一事件一定会陷于错误”^②。就是说，普及工作和学术研究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味地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都无助于各自的工作。通俗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组成部分，但素来不为上层文化人士所重视；而民间流行的各种形式的通俗历史，又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知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

^② 同上。

识错误。^① 如何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如何让大众从延绵不断的历史记录当中获取历史智慧，时至今日，依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翦伯赞在60多年前提出的设想，也因此而具有它的现实价值。

第六节 毛泽东的历史观

一 毛泽东早年对历史的认识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湖南湘潭人。早年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这也是毛泽东最初接触中国历史的知识，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政治上改良与革命交织，文化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在思想上对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注重历史知识、具有历史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的湖湘文化传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毛泽东早年对历史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其一，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少年毛泽东喜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他发现，这些小说和故事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的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于是他分析了故事的内容，“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③。历史的主角是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还是少数社会上层？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用怎样的标准衡量历史的活动。目前所能见到毛泽东最早的文章是一篇题

^① 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史学理论丛书》第2辑《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6页。

^③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历史短文,^①写作时间是1912年6月。这篇文章对商鞅变法意义和商鞅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评说。毛泽东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而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他叹息“国民之愚”,叹息“执政者之煞费苦心”,叹息“民智之不开”,肯定商鞅是“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②,反映出毛泽东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忧患与关注。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呼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痛惜对民智不开,也将“福民”作为评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从这点看,将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角,将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在其少年时代已有了苗头。

其二,肯定革命和斗争。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格外喜欢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中“关于造反的故事”^③,这成为毛泽东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起点。在20世纪初守旧与革命的纷争中,毛泽东对革命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中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④旧的毁灭并不是一种事物的终结,而是这个事物的新生。由此而发,他甚至对历史上的“乱世”和征伐也得出了积极的结论:“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其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⑤可以看出,对革命、斗争和

① 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③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页。

⑤ 同上书,第186页。

动荡的偏爱，既与进化论的影响有关，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个人的情性。

其三，颂扬英雄人物。青年毛泽东对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心往神之。他写道：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①

在毛泽东看来，英雄的这种力量来源于其本性，是先天获得。常人是否能成为英雄，毛泽东没有作正面回答。不过他对自己自我发展的设计，似可看做是对此的某种解释：“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实有以自完。后人因吾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② 在这段略带伤感的文字中，毛泽东并不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他“不信”所有人都可做到历史上继而开来的功业。但他对修性修身又颇不满足，在生前事和死后名中明显倾向于前者。这也可以作为毛泽东看重英雄的一个佐证。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这就是重视人民群众和重视英雄的同时出现。不过细观前举毛泽东论商鞅徙木之例，不难发现，毛泽东只是将“福民”作为评价历史活动的标准，而百姓依然是“愚民”，需要“英雄”去引导。换言之，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历史观中有着浓厚的英雄史观的色彩。

其四，强调历史知识的应用功能。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喜好历史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4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要出于兴趣，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则明确了历史知识的现实功用，并有意地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服务于现实的需要。“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①——历史知识不仅可以有益于自我完善，而且也可以成为探求“绳束古今”的人类发展规律的路径：“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公理公例之求为急。”^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的毛泽东虽然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运用历史知识解释历史和现实，但其历史观基本停留在进化论上，英雄史观和唯意志论也对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方面在以后虽有改变，但一些痕迹一直存留在他的思想当中。

二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初步形成

对于毛泽东历史观发展来说，1918年到19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1918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早已是《新青年》杂志忠实读者此时又身处北平的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不仅认真阅读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而且还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导。李大钊的讲解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仿佛看到在中国的希望”^③。但此后一个不长的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者。《湘江评论》第2期发表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介绍了马克思理论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③ 桂诗新：《“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毛泽东和李大钊》，《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鲁泡特金。”毛泽东对克鲁泡特金的评价“更广、更深远”，颇含赞许之意。

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平。经历了创办《湘江评论》和领导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毛泽东，开始“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按照毛泽东的描述：这些著作“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从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①。“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 中国和世界社会现实的剧变，最终促成毛泽东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这个时期，直接反映毛泽东历史观的资料不多，主要见诸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对学生的授课，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从这些资料看，此时毛泽东历史观中最鲜明的内容，是对唯物史观的信仰。1920年秋，同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及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惟理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毛泽东复信称赞蔡和森的主张，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时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③。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将马克思唯物史

① [美] 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观比作“锄头”，认为可以借此懂得中国历史和农民的状况。^①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和现实，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是此时毛泽东历史观的又一显著特征。他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的观察”，否定用“平和的手段”和“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的可能，认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②——由这句话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毛泽东后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著名论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所的授课中，他将陈胜、吴广反秦斗争称为“纯代表农民利益者”，而将刘邦称为地主阶级，^③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较早的认识。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为标准，剖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即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代表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处于中间状态的并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态度的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在内的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他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④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怀疑和反对阶级斗争理论，批评说：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

① 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9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

③ 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12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①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初步探索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 这段表述，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普通人民所受压迫和束缚的基本形式，注意到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点和差异，显示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较为深刻的洞察力。

对历史知识直接作用的价值依然被毛泽东首肯。他分析一个事物总是从其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怎样解决问题？他说：“你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

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①他还从历史入手，具体分析了许多与现实斗争有关的问题。^②如何把历史作为今天的借鉴？他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流寇主义倾向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③总之，在毛泽东的眼光里，历史知识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使用的便利的工具，并且在现实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历史知识这个武器。

三 两个核心与六个原则：毛泽东历史观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先是致力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继之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三年内战，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历史观已臻于完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也远非昔日可比。另一方面，在此期间范文澜、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尹达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来到延安，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以及翻译的一些苏联哲学著作，^④对毛泽东历史观的成熟产生了影响。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毛泽东历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矛盾对立统一思想。毛泽东认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他将人类认识史上的分歧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在17、18世纪的欧洲是机械唯物论，在20世纪初是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表现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长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② 例如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注意到“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④ 《矛盾论》的前身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讲稿主要参考了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定等《新哲学大纲》等书籍。参见许金兴《〈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世界一切事物、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在社会发展观上它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与之相对立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①。这种发展观主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在自然界如此，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毛泽东批评形而上学家的观点，说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②。他分析道：“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而在同一个国家，“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③。这个例证实际上也回答了社会史论战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论”和受普列汉诺夫等人影响的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解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02页。

中国文明出现的观点。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归纳，“矛盾”这个范畴包含着如下问题，即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他的这些问题的解释是：

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①

毛泽东既把“矛盾”看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的存在状态，也把“矛盾”（以内部“矛盾”为主）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可能考虑到与历史和现实现象的冲突，他又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加以缓和。如果将“矛盾”理解为对立和斗争而不是单纯的差异，毛泽东的上述表述显得有些“泛矛盾”化了。毕竟，人类历史中的“矛盾”和“斗争”只是一种类型的现象，同时还存在着各种非“矛盾”的表现，有时“矛盾”和“非矛盾”还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中，用“矛盾”解释一切，尤其是将“矛盾”观庸俗化后，难免会失之偏颇。不过，以“矛盾”入手，确也抓住了人类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一个重点。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以及“矛盾”性质的转化的论述，体现了唯物史观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6页。

的辩证理念，在方法论上是有价值的。这些有价值的部分和偏颇的部分，对当时和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历史认识论的第二个重点是其实践性。毛泽东的实践观包括四个要素。

其一，人的意识不是与生俱来或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历史的各种活动。他指出：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①

在毛泽东看来，生产活动将人“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②，但是生产活动并不是人类认识的全部来源，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人类认识的源泉，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认识。

其二，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类的认识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于“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③，因此“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④；人的认识也总是在不完整的、永恒的进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④ 同上。

其三，人类认识的真理性的，不是由认识本身来检验，而是由实践来检验，“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个过程是由对事物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对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阶段，亦即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他以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为例说：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其四，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事物，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事物：“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就是说，正确的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还要回到实践中去。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如此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作用则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特殊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方面的偏重。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论述相同，他对认识的实践性的表述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毛泽东在其对历史的论述中，体现出了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阶级和阶级斗争原则。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初步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诸阶级的构成、政治立场和相应的策略，以及农民运

动的意义，进行了考察和说明。此时的毛泽东由于对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有了更多了解，对阶级分析方法的秉持更为坚定，运用也更为熟稔。从过往到现实，从历史学到文学艺术，以至其他一切社会领域， he 都用阶级的观点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在论述历史上人的意识时他写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②。在他看来，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只有两类，即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③他对阶级社会的历史做了这样的概括：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

他针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⑤。同时要求“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

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①。对延安文艺界一些人提出要写人类普遍的情感，毛泽东深为不满，他尖锐地批评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②他十分欣赏范文澜的经学研究工作，原因在于范文澜将经学性质的定义为“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③，指出了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现代中国幻想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道统”，或利用“读经”麻痹青年，他们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一定是将人民大众作为无知无觉的“阿斗”，永远不让人民有民主权利。因此“必须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④。《永昌演义》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健侯撰写的一部反映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小说，书中对李自成人格评价较高，却贬低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读后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作者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他写道：“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他还说，自己不仅阅读了全书，而且还“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⑤。既然毛泽东不赞成《永昌演义》的基本观点，何以还要再三致意，大概只能用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重视来解释了。1948年，毛泽东读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③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页。

④ 同上书，第299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8页。

了吴晗^①《朱元璋传》，对吴晗关于红巾军领袖彭莹玉（彭和尚）归宿的推测不以为然。《朱元璋传》原稿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认为，像彭莹玉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吴晗复核更多资料，发现彭莹玉是被敌对势力杀害了。^②这桩趣闻也反映了毛泽东自觉和本能地将阶级斗争作为观察历史的重要工具。总之，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活动和意识，都不可避免的具有他本人所隶属的阶级的印记。这即是毛泽东历史观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出发点。

第二，人民性原则。前面提到，少年毛泽东便表现出了对历史上普通人民生活的关注。此时的毛泽东系统地表述了这个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始终坚信人民群众巨大的创造力和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在革命实践上，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③。在理论上，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而这发展和进步的途径，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中完成的。因此，不是英雄圣贤创造了历史，而是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他提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类似的名言还有：“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⑤1944年，延安评剧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评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后大为振奋，写信给编

^①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受胡适主张影响，在治学方法上沿袭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1940年以后，吴晗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

^② 吴晗：《朱元璋传》序言，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导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①

肯定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承认人民群众可以自动地成为历史创造者。在他看来，只有受到先进思想教育并觉悟了的人民大众，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由此，引出了他的历史观的第二层含义，即用正确的历史知识教育人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

毛泽东没有普及历史知识的系统论述，不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他的认识，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他关于用中国历史教育干部的论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根本”和“原则”问题的高度。毛泽东指出，文艺方针就是要服务于人民大众，在这个前提下，要重视文艺工作的普及。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比较难于在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由于人民群众文化落后，迫切需要普遍的启蒙运动，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他还认为普及和提高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因此，“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①。总之，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文艺的立足点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把文艺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

教育干部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一项重要措施。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了学习运动的重要性：“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② 为了顺利开展学习运动，毛泽东要求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制中级课本。范文澜主持编纂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正是在毛泽东为干部编写读本的要求下进行的。毛泽东还指定范文澜负责编选《中国国文选》，并直接提出要收入《聊斋志异》和《西游记》的一些篇章。专为干部编写的《文化课本》完成后，毛泽东为之写序，称赞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为干部“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③。

很显然，毛泽东对在人民大众中普及历史知识，用历史知识教育人民和干部，同样是持积极态度的。

第三，中国本位原则。毛泽东在中国传统私塾教育下度过童年时代，此后虽然对传统文化持尖锐的批判态度，虽然受到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在他身上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本位原则还表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偏爱上。在他一生读过的历史书籍中，中国历史方面的占据绝大比重，外国史则较少。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387页。

至晚年，他仍对身边的人说读历史书，要“先读现代史，然后读古代史、近代史，再读世界史”^①，把世界史（外国史）放在最后。在延安期间，他多次对中共党内不重视学习中国历史的现象表示不满和忧虑。1939年他致信何干之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②1941年，他一方面称赞“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同时又批评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③。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怀疑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认为“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④——这个表述在后来仍出现过，1944年7月，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⑤他还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的这个倾向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他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历史，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先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搞清楚。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对尹瘦石说：“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

① 张贻久：《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0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语言文字学家。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①他指出：“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②《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同成为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而对本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③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④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⑤

1942年，毛泽东对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和若

① 于均道等：《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③ 同上书，第798页。

④ 同上书，第797页。

⑤ 同上书，第798页。

干意见。其中，研究方法便是著名的“古今中外法”^①，毛泽东是这样解释这个方法的：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②

在另一个场合他又提出了这个方法，并解释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③单就“中外”平列而论，这种研究方法似乎是二者并重，但在毛泽东提出的设想中，“中”与“外”之间的平衡却被打破了。毛泽东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批评了一些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

^① 1941年毛泽东曾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1页）“古今中外法”的提法或受“八面受敌法”的启发。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0、406页。

^③ 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①。这就是说，“中”是立足点，而“外”只是一个参照物，从毛泽东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思路与其矛盾论中提出的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是一致的。

毛泽东历史观的中国本位原则中跃动着他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怀。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将中国现代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归之为西方的影响。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孤立的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产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毛泽东指出被“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中国的革命斗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艾奇逊不过是“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展示他“伪造”的中国事变的因果论。他自信地而辛辣地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②

第四，批判和继承原则。人类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上前行。如何对待以往,如何评定前人留给后人的遗产,人们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高涨,后来虽有所冷却,但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一直没有中断。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是以批判的精神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对此,他有一段重要论述: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毛泽东肯定了中国数千年文明留给今人许多宝贵财富,在这些财富面前表现出一个“小学生”的谦虚。尤其是他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是“历史主义者”,因此,不能割断历史,而要让“今天”的中国在“过去”的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步。“继承”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而是要以批判的精神有选择地吸收。毛泽东认为,对于历史遗产,首先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②。在此时的其他文章和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述了关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说明继承传统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他说:“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③,“我们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② 同上书,第707—708页。

③ 同上书,第623页。

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①，“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②。

第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主张不能生搬硬套理论，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必须在实践中经受考验。1944年他在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关系时说：“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③他认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要在实践中有创新，“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要能够成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力量，“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④。他批评教条主义者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⑤。他将中国共产党不断经受挫折而又不断壮大并走向胜利的历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⑥ 这些文字是毛泽东关于不但要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8页。

⑤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796页。

学习而且还有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一次飞跃，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历史致用性原则。历史不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是认识和改造社会，服务于现实的武器，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学价值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对历史的“用”的使用，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寻找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进而发现未来的方向。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和指导。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当前的任务和未来的发展目标的重要理论基础，便是开篇详细论述的中国从原始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进过程。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①

其二，更为常见的，是用历史知识为当前较为具体的需要服务。“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②，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说过的一段话，也是毛泽东长期实践的内容。毛泽东读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中寻找经验和教训。他对中国古代史籍的取舍，也大抵以此为标准。他赞誉《资治通鉴》“写得好”，是因为这部书详细叙述了兴亡治衰的始末，可令今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③。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说明现实问题，在毛泽东的著述和演讲中十分常见。他用“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反对党内存在的“流寇主义”习气。^④为了说明战争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②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张贻久：《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2页。

③ 此段文字系1954年冬毛泽东与吴晗的谈话。参见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419页。

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通过“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战略击败优势的一方，援引《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鲁国曹刿击破齐国军队的故事，他评论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还用中国历史上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战例，说明“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亡国论的喧嚣沉渣浮起，毛泽东对这个逆流的批判，从论据到论证，依靠的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

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②

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451页。

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①

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所擅长的游击战术：

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②

尽管中外历史上都有过小而强的国家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例子，但毛泽东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比较，指出这时的中国内部与外部条件与历史上的那类例子完全不同，为抗战必胜的呼声，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希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也能通过研究历史为现实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服务。何干之准备研究中国民族史，毛泽东得知后建议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452页。

② 同上书，第405页。

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①他在读了范文澜经学史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表示自己“十分高兴”，“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他认为范文澜的研究工作“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并希望能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②。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将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归纳为骄傲轻敌、军纪败坏和屠戮功臣，毛泽东读后大加赞赏，将这篇文章作为整风文件，^③认为历史上“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教训深刻，而如何能通过学习历史“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经验”，对中共提供“有益”的帮助。^④

毛泽东关于矛盾和实践的理论，是对人类历史的基本形态（永恒的变化）、发展原因（各种矛盾的对立、斗争和同一）和判断标准（实践性）的系统说明，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性、中国本位、批判继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历史致用性六个原则则是对两个核心的具体伸展，彼此之间也相互关联，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原则是人民性原则的张本，中国本位原则又与批判继承原则沟通，这些原则又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原则一起，成为历史致用性原则的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了毛泽东的基本历史观。

四 毛泽东的中国历史研究

集中反映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认识的著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3页。

② 同上书，第29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④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又据来延安的国统区记者所述，《甲申三百年祭》印刷4万册，一个星期即在延安售罄（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版，第166页）这也间接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层对这类著作的热情。

党》的第一章“中国社会”(下文简称“中国社会”),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1939年冬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三人负责起草,^①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知道毛泽东是如何修改文章初稿的。但可以说,这篇文章既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集体研究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本人历史观的反映。

“中国社会”分三个方面论述中国历史。

第一,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该书认为,中国历史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开始了长达三千余年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第二,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社会》概括出如下四个特点: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包括地主、贵族和皇帝封建的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

^① 徐春夏:《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杨松,(1907—1942),湖北大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第一任主编。吴亮平(1908—1986),又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在延安其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是毛泽东和斯诺谈话的翻译。著有《社会主义史》,并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陈伯达(1904—1989),福建泉州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曾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兼中央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著有《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

上还是农奴。”^①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社会”指出，由于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下，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由于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由于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在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后，“中国社会”又特别提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②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农民战争。“中国社会”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 同上书，第626页。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有大小数百次的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①。“中国社会”特别强调了农民起义的作用和局限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②

第四，中国社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和半殖民地反封建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在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封建制度客观上所起的瓦解作用后，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社会”历数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社会”概括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6个特征，即（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被破坏了，但封建剥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23页。

^② 同上书，第625页。

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起着颇大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以及中国幅员宽广，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基于这个判断，“中国社会”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中国社会”对中国四千多年文明史（该书提法）进行了全面论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上的一篇重要文献。首先，在此之前，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有过讨论。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封建社会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建立的，其基本特征如何，都在讨论范围中。部分学者反对奴隶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前一个阶段，主张氏族社会是到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① 甚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不过是原有封建社会的一种变形。^②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持西周封建说的是吕振羽、翦伯赞和范文澜，他们从金属农具普遍化、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

^① 陈邦国：《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

^② 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合刊。

(即实物地租)转变和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专制主义的出现,来分析和概括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生和特点;另一些学者则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①或地主关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和官僚的国家统治形式,^②概括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即使是对春秋战国封建社会出现论述相当充分的郭沫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也未作系统考察(以上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秉持马克思和斯大林的社会形态理论,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制度、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等方面完整地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在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中国社会”将农民起义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高度概括地指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生原因,以及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指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③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这是以前著作中所不曾见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④列宁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政治变革的基础”^⑤。斯大林则以普加乔夫和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例说明中世纪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⑥“中国社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别强调了农民起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进作用,同时又指出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新的阶级。实际上为历史地看待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扩展了视野,细化了马克思主义

①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② 丘旭(王学文):《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1930年2月第4号。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0页。

⑤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⑥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页。并见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页。

的阶级斗争学说。

再次，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共产国际内部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六大”纲领也指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判断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吕振羽所接受。^①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华岗^②还撰写了大革命历史的专著《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③“中国社会”承续了中共“六大”纲领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但在对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国半殖民地反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独创性”的贡献，^④固然不很准确，但它对原有提法的大范围、大幅度增补弥合，却也是实情。

总之，“中国社会”以高屋建瓴的姿态，以逻辑上的严密说明，以流畅明确的文字表达，对中国文明发生以来的社会形态的依次递进加以论述，对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做了富有深度的论述，其中的几乎所有观点（周秦以来封建社会说后来做了调整），都成为以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流观点。揆其因，似乎并不完全在于强势的政治话语的要求，“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自然不限于本书对“中国社会”的上述引录。“中国社会”和毛泽东的其他著述，显示出他对中华民族的

①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60页。

② 华岗（1903—1972），原名华延年，又名华少峰、华西园，浙江龙游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③ 华岗：《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上海春耕书店1931年版。这部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保存了大量史实，阐发大革命的意义，但“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当作是不容置辩的绝对真理，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参见廖盖隆《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叶桂生、刘茂林：《华岗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文史哲》1988年第5期；王记录：《论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④ 叶桂生：《论毛泽东与历史科学》，《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历史创造、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和文化遗产的浓厚兴趣。他说自己养成读书习惯后“一拿就是历史(书)”^①。1937年他逋至延安,即致电李克农,要求“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②。他曾打算撰写战争史的著作,“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但因事物繁忙,一直没有着手;又打算以后“研究近代史”^③。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研究的孜孜追求。大致上说,在中国历史知识方面,毛泽东对古代史的熟悉和偏好似乎超过了近代史,尽管他从青年时代就有“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矣”^④的想法。毛泽东博览中国古代史籍,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认为“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⑤。他对正史的看法也与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不同,认为这些著述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描述,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⑥。

对历史的特殊偏好又延及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与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交往颇密,或书信往来,或聆听讲演。1940年夏秋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毛泽东两次听讲,一次未听,又写信致意。1943年他为中共中央制定的“保存骨干”计划中,专门提到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骨干:政治(范文澜),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⑦。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的讨论,文章主要发表

① 毛泽东1959年8月1日对彭德怀的批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② 张希贤:《毛泽东在延安——关于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组织、人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3页。

④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⑤ 此段文字系1954年冬毛泽东与吴晗的谈话。参见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张贻久:《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页。

在学术刊物《中国文化》、理论刊物《解放》《群众》上。^①学术气氛一时颇为浓厚，这不能不说与毛泽东倡导学习和研究历史有着直接关联。在延安之外，他与郭沫若关系最密切，并与邓初民、侯外庐、周谷城、吴晗等有过往来。他颇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吕振羽去延安后毛泽东曾询问此书的写作经过和如何确定书名，他外出考察时还指名携带。^②毛泽东在与史学家的交往中，每以朋友兼指导者的姿态，希望他们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并用历史知识为当前的斗争服务。他读吴晗《朱元璋传》后，致书作者，直言“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鼓励说：“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③

对于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毛泽东颇有自豪之情。“中国社会”写道：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④

而对于中华民族反抗内部和外部压迫的精神，更是不吝赞誉之辞：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

① 徐春夏：《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11期。

② 逢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623页。

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前面谈到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反对用地理环境因素解释中国历史的变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反对将人口因素作为中国历史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事情起源于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白皮书和信称：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大幅度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①毛泽东用中外历史上革命的发生，回应了艾奇逊的判断：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页。

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①

他接着指出，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原因不在于人口太多，而是在于“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②。

1939年，陈伯达发表了《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③毛泽东两次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写信，对如何评价孔子思想谈了自己的看法，其内容大致是：（1）对《论语·子路》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句应从两方面看，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它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同时还要看到“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2）关于孔子的“君臣父子”观，陈伯达认为是“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毛泽东则认为，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他的根据是，家庭先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3）关于孔子的“中庸”思想，毛泽东赞同陈伯达的评价，认为这个思想“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1511页。

② 同上书，第1511页。

③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延安《解放》，1939年第69期。

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他又指出这个思想保守的方面。对中国古代文献颇为熟稔的毛泽东，援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以及《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朱熹提出的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④关于孔子的道德论，毛泽东认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他举例说，孔子提出了“知仁勇”，其中的“知”（理论）不是依据于客观事实的，而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因此他所说的“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进而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应该对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予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①在另一处文字中，毛泽东也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②。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主张是长期秉持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1944年他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③1960年他又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编者注：“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的主要部分。”

③ 同上书，第191页。

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①对历史上“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要批判继承，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一个创造性的提法，尽管这个提法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但实可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延伸。一方面毛泽东高倡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批判继承，尽管后面的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阶级斗争学说对历史研究可能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前者是本，因此从逻辑上说，对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些不正确的解释就难以避免。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是在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用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对待孔子（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思想家）思想。^②他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强调阶级斗争观念。应当指出，阶级分析方法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成分，但将其作为判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其非科学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唯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5页。编者注：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② 例外可能是曾国藩。毛泽东早年曾受曾国藩的影响，尝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又云：“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但在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极少出现曾国藩的名字（即使出现也是被否定的）。按，1926年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1864）与巴黎公社（1871）的建立和失败在时间上相距不远，而曾又得到国民党政权的推崇，可能是出于这个缘故，毛泽东刻意回避了他的这位大同乡。1944年7月25日和26日的《解放日报》连载了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延安新华书店同年发行该文的单行本），谴责“曾国藩是百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说“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抨击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中对曾国藩的赞誉。从中亦可见毛泽东的取向。

物史观中阶级斗争学说对统治阶级大加挞伐，这种构想很容易走向由大加挞伐走向完全挞伐的极端，很容易造成历史研究的公式化、教条化和简单化。事实上，这种情形在此时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身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表现。

结 语

理论的壮阔与研究的意境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与社会结构和人们观念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相一致，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史学，表现出史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史学救国”的思潮，反映出19世纪后期史学领域内发生的鲜明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以往限于传统社会，以帝王将相为考察对象的旧的史学格局被打破了，史学的研究中心由古代转为近今，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由国内拓展至国外，中国史学开始面向世界，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出现的最早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20世纪初新史学蓬勃兴起。这个思潮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以民史替代君史，试图吸纳科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史学体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下，一些与传统史学迥然有异的史学流派相继出现。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开始的大革命浪潮，加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前进的步伐。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系统宣传和广泛传播，并自觉地将它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起步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备了政治组织形式的基础。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了社

会，第一次提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用历史的事实来阐释革命的纲领，现实的需求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历史研究之路，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当代中国工农运动史、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三个领域。^①也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因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

起步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即自历史自身的认识得出的见解思想，再运用于历史的研究，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它来分析历史与社会问题。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此后，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论著，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原理进行了更全面更系统的阐发，并努力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研究实践，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示范。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奠定在了一个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重新探讨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重要的历史理论。在历史学理论的探索中，李大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大钊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对历史学的任务、性质、体系、功能及史学与其他学问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具体分析了历史学的现状，指出其成为历史科学的途径，为创建中国马

^① 参见陈海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社会科学》第3期。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著作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刘少奇《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写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和《二七大屠杀之经过》、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和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挥代英编写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的代表作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克思主义史学构建出基本的理论框架。在对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探讨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类历史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强调“历史的根本理法”，“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果律的”，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他们突破了“循环论”，认为历史发展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①。在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探讨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阐明了经济条件是社会一切变更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社会的变革，最终是由经济的条件来决定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突破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

第三，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阶级性。这一时期里，史学研究的主体基本上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战斗的姿态涉足史学领域，他们的唯物史观历史实践在解释历史的同时，又反过来用历史促进唯物史观的宣传，证明唯物史观革命理论的现实性及科学性，从而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种与当时革命形势和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体现了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现实性特征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征。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中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其他一些著述，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他的历史研究实践，不仅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影响了许多人的研究工作，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深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中国社会史论战为平台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08页。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运用或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作为大革命时代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①的延续，参与讨论的人，“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从事分析。^② 尽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使得这次论战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争辩，而是被赋予重大政治任务的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探讨；尽管由于论战参加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和把握能力表现出了重大欠缺；尽管由于讨论者大都将欧洲社会历史作为普遍性的规律而忽视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探讨，但这次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这次论战提出和引发的问题得到重新研究，并有新的进展。^③ 正是通过这次社会史论战，许多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指导——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无不受 20 世纪 30 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国际大讨论的影响，他们的史学体系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为前提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因此得以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成长并走向兴盛。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成果，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肯定。1939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论著可以通过出版社和杂志公开发表，促进了并增强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对唯物史观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论战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早期形态，这种形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是在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也是在与一些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形成的。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指导意见，以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10 期，1949 年。

② 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读书杂志》1933 年第 3、4 期合刊。

③ 侯外庐曾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归为两个承续，其中一个就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第 4 页）。

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在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变化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人类社会的其他形态尤其是欧洲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表现出广博吸取，认真研究的精神。对史料尤其是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和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两个基本价值上，更加侧重于“致用”的方面，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并不放弃“求真”的精神。这个态度也导致在理论和史料方面的基本倾向，即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和启迪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在研究中注重理论和史料的合理结合。尽管当时已显露出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和教条化的明显苗头，但总体上说，仍然保持了对史料的尊重。如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常说的“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研究取向衡量，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表现出的是“以论带史”和“史论结合”的双重研究态度，并以前者略占上风。上述这些基本表现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是否应将其提倡的基本原则与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区分开来？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是否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途径？这些问题在当时虽有所涉及，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并不在此。这些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随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回应。

1937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两场接续而至的战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经过三年多的内战，国民党政权据守孤岛，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在13年的岁月中，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样也走过了伟大的历程。这个时期，在研究领域方面，关于中国历史分期诸问题继续进行，并走向深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得到开展；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对中国历史的断代和贯通性研究持续进行。在理论与研究实践的关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考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得到推动。在历史学的功用方面,以历史为现实服务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职业担当,使历史学的价值在拥有学术性的同时也走向了社会和大众。

第一,20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要着眼于理论的引介,相形之下,对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较为薄弱。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视野更为宽阔,呈现出由“上”而“下”即着力于对中国历史的考察的趋势。在研究的问题上,不仅有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等重大问题,也有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在研究领域上,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革命史都被纳入考察范围。尤应提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中国通史撰述工作,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创建了以社会形态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向学界和社会提交了厚重的成果。同时,通过对中国通史的撰写,也丰富和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水平。

第二,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通过理论认识的深化和丰富的研究实践,初步完成了由接受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其中,侯外庐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他在研究理路上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作为研究的起点,在方法上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不仅向学界提交了厚重的成果,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有着极为密切的共生关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实践始终具有指导性意义。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的历史观也走向成熟。这个历史观的基本构成是

历史认识论上的矛盾对立统一思想和实践观，以及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人民性原则、中国本位原则、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原则以及历史致用性原则，毛泽东历史观中的这两个核心和六个原则，在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中得到明确体现，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以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姿态接受、理解唯物史观，并将之运用于对历史知识的解释，他的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因而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在1949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进程中，学院派的研究和中共领导人的理论导向在整体走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路径上，二者并不完全重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中共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观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四，相对于1949年以后的某些时期，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是在平等和宽松的气氛中展开的，这种情形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表现得格外明显。侯外庐的一段回忆可视为一个有意义的事例。侯外庐不同意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这个看法，结果当场就有人口气“逼人”地提出质问，说他的观点和斯大林给生产方式下的定义相悖，侯外庐回应说：“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提问者继续追问，要求侯外庐进一步说明。一时气氛有些紧张。后来杜国庠说：“人家已经表示不懂了，再问什么呢？”提问就此打住，事后也没有给侯外庐带来麻烦。^①然而，这个故事显示的将政治家的见解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的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大趋势，从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这个教训值得汲取。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229页。

思想史所体现出的进步，是在沉淀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是如此。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以往研究不足和欠缺的反省。经过反复斟酌，郭沫若调整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殷商时代不是自己原先主张的氏族社会，而是“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①吕振羽原先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没有看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前的假设，指的是“东方封建主义的特殊性”^②。到了1936年他改变了看法，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义为“初期国家之奴隶制度的形态”^③。又经过多年思索，吕振羽反省了自己的研究存在“教条主义的偏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度的变种。^④对原有观点的改变是学术研究的必要过程。我们看到，郭沫若等人，对原有看法的修正，是经过认真思索后的放弃和更改。吕振羽将研究中的“失误”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更体现了这种自我批判的严肃性。与反省意识相呼应的是历史分期讨论的细致化——这些讨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进行的，尖刻的语言被较为和缓的学理争辩所取代，较之社会史论战，学术性大为增强，显示了研究的深入。

思想史所体现的进步，是在思辨中延伸的。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接续了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研究，在历史理论上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翦伯赞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历史观的论述，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历史学的价值、历史规律、历史活动中各种因素的关联性、阶级和阶级分析、传统史学的价值、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以及历史知识的

① 1935年，郭沫若在《中日文化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讲演中说殷周是青铜时代。但在随后发表的《屈原时代》中却再次强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我在七八年前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是分析殷代为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为奴隶制，秦汉以后为身分制的封建社会”，“这个见解我到现在依然是维持着的”（《沫若文集》第11卷）。1941年，在《由诗剧说道奴隶制度》一文中，他声明：“我以前把殷代视为氏族社会末期未免估计的太低。现在我已经证明殷代已有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存在了。”（《沫若文集》第12卷）

②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

③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

④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纲》第2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

普及问题的思考，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思想史所体现出的进步，也是在具有原创意义的思考和实践发展的。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样体现出这个特征。侯外庐提出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理论的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研究得到体现。他在20世纪40年代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但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而且要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加以发展；研究的成果应当被看成是对这种发展的一种贡献。”这段文字包括两层含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代替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其次，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框架下的一个创造性的研究实践。他强调了在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时，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这是对社会史论战中呈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积极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初步中国化的一次具有开创性并富有价值的重要实践，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1949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17年（1949—1965）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这两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持批评态度。在研究对象上，这两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重点，反对琐细的历史考据。在研究理念上，这两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现出明显的以论带史或史论结合的倾向。如果说在这三个方面这两个阶段有着某些差异，那就是1949年之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侯外庐倡导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本土化的进程。而在1949年至1965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在这条富有生机的学术道路上步伐迟缓。这种情形得到根本扭转还要等到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

附 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大事记^①

(1898—1949)

1898 年

夏，上海广学会出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该书原为英国人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第七章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

1899 年

2 月，广学会主办《万国公报》连载名为《大同学》的文章，该文据英国进化论者颌德所著《社会的进化》一书前四章改编，改编者是李提摩太，中国人蔡尔康撰文。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5 月，颌德的《社会的进化》全书十章被译成中文，仍以《大同学》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其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还提到了恩格斯。

1901 年

1 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连载日本学者有贺长雄

^① 主要参考文献：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附录二《中国现代史学大事编年》，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之《二十世纪史学编年》，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大事记》，吴根梁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年表》（《理论探讨》1983 年第 1 期）。

的《近世政治史》，其中以相当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的历史，译著中出现“社会主义”一词，并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

9月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

1902年

2月8日，《新民丛报》创刊，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号召史界革命。

4月，罗大维译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较系统介绍的第一本中文译著。

6月，章炳麟致信梁启超，与论修史事。

8月18日，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呼吁掀起“中国史界革命风潮”。

9月16日，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发表《独史》。

9月20日，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

10月，梁启超于《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11月，赵必振译日本著名学者幸德秋水著《广长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一本系统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

12月，汪荣宝编译日本学界成果《史学概论》，发表于《译书汇编》第9、10期。

本年，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本年，上海普通学书室编定刊行《普通新历史》。

1903年

2月16日，马君武于《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作者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附参考书目包括《共产党

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

2月,赵必振译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该书对《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和要义依次作了介绍。

5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由东新译社出版,作者主张“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先锋”。

9—10月,刘鹗整理《铁云藏龟》由抱残守缺斋出版,罗振玉为之墨拓。本书为第一部介绍中国甲骨文专著。

10月16日,樵隐于《政艺通报》第17期《史学文编》发表《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

10月,《浙江潮》编辑所在日本出版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的中文译本,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

本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中国新史学》。

本年,[英]甄克思(E. Jenks)著、严复译《社会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作新社印行《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世史》《世界文明史》《近世外交史》《近世政治史》等。诸书皆译自日文。

本年,[日]浮田和民撰、李浩生译《史学通论》由杭州合众译书局出版。浮田和民此书另有侯士绾译本(名《新史学》,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罗大维译本(名《史学通论》,1903年进化译社出版)、刘崇杰译本(名《史学原论》,1903年闽学会出版)、杨毓麟译本(名《史学原论》,1903年湖南编译社出版)、东新译社同人编译本(名《史学原论》,1902年《游学译编》第1期译书预告)。

本年,屯庐主人著《五千年中外交涉史》97卷由上海蜚英书局出版。

1904年

3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东方杂志》,此为1949年

前，中国连续刊出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4月，章炳麟修订重刻《癸书》，其中《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对中国通史撰写提出新构想。

6月，夏曾佑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

本年，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

1905年

11月，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于《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的生平及其学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和最末一段话。

本年，《国粹学报》创刊。

本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史序》。

本年，[美]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迈尔通史》由山西大学堂出版。

1906年

本年，陈庆年著《中国历史》6册，武昌印本。

本年，富光年编《简易历史课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梁启超著《史传今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7年

9月，申叔（刘师培）在《天义报》第6卷上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文章还提及《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为《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但作者竭力混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本年，邓实于《国粹学报》第27期发表《国学真论》。

本年，秦瑞玠译编《西洋历史教科书》印行。

本年，周树人（鲁迅）发表《人之历史》，以达尔文学说阐述人类起源。

本年，皮锡瑞《经学历史》（5卷）刊行。

1908年

1月，《天义报》第15卷刊登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写的序言。

3月，《天义报》第16—19合卷（春季增刊）刊登民鸣根据日译本转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刘师培作“序”，序文简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经过，并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文中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1910年

1月，《教育今语杂志》创刊。本刊由章炳麟主办，钱玄同任编务。本刊《章程》云：“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其论治史学云：“大概历史中间最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

本年，曹佐熙著《史学通论》由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出版。

1911年

2月，罗振玉创办《国学丛刊》。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

本年，屠寄《蒙兀尔史记》48卷出版。

本年，刘彦《鸦片战争史》由中国近时外交史发行所出版。

1912年

7月，历史陈列馆成立。本馆设在故宫午门，1926年定名为国立

历史博物馆，1930年改名为北平历史博物馆，1933年4月改为中央博物院历史博物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改名中国历史博物馆。

10月，王国维在日本撰成《简牍检署考》。

本年，郭孝成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2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天笑生著《中华民国大事记》4册由有正书局出版。

本年，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在日本出版。

本年，[日]多浅治郎著、湖北兴文社译《西洋历史教科书》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1913年

4月，汪荣宝、许国英撰《清史讲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王国维编辑《齐鲁封泥集存》。

秋，王国维撰《布帛通考》2卷，创以实物证古文献之例。

本年，周希贤著《历史的研究》由宁波新学会社出版。

本年，章崧编《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由中华图书馆出版。

1914年

2月4日，古物陈列所成立。

2月，罗振玉、王国维编纂《流沙坠简》3卷、考释3卷由日本京都东山学社刊行。

3月9日，北洋政府设清史馆，编修《清史》。赵尔巽任馆长。

5月25日，北洋政府设国史馆，王闾运任馆长。

6月，罗振玉续办《国学丛刊》。

12月，[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梁启超著《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谷种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1915年

1月,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1卷,对出土甲骨文进行了分类考释。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本刊自第2卷第1号起,改名《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书》,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了介绍西方文化的热潮。《新青年》杂志的创办,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本年,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刊行。

本年,丁谦著《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由浙江图书馆刊行。

1916年

1月,王国维撰《生霸死霸考》。

本年,孟森著《心史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917年

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

2月,王国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卷,4月,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卷。利用甲骨文重建殷商信史。

3月4日,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

9月13日,王国维撰《殷周制度论》定稿。

11月10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报道还着重介绍了列宁于11月7日晚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上海的《申报》《时报》《中华新报》等也纷纷予以报道。

本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史学门,后改称史学系。

本年,陈垣著《元也里可温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成立。

1918年

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期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潮流”、“新文明之曙光”,并确信它必将成功,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系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11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新潮社。

11月末,李大钊出席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举行的讲演大会,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称赞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12月初,李大钊于《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称赞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

1919年

1月1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发表《新纪元》一文。

1月,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本杂志1922年3月停刊,共出12期,主要介绍西方近代思潮,讨论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问题。

1月,刘师培、梁漱溟、黄侃等发起组织国故社。

2月,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国故月刊》创刊。刘师培、黄侃任总编。本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4月1—4日,陈博贤在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署名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简介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一生的事迹,高度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意义,揭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序幕。

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署名舍我(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的宣言》,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重要段落和十

条纲领。

4月15日,胡适发表《实验主义》。本文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本文详细介绍了实验主义,以迎接美国学者杜威访华。

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8号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5月1日,杜威来华,开始在中国11个省作讲演,宣传实验主义。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5日,在“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陈博贤(署名渊泉)译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这是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篇文章,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

5月—11月,李大钊负责编辑《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本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集中发表了一组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陆续翻译介绍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生平传记。其中包括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著作。

6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由邵力子任主编,陈望道为助编。李达在《觉悟》上接连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

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信守实用主义主张的改良方法,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大加质疑。胡适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们发难,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该文发表后,李大钊、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开始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论战持续了一年多。

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周刊。

8月3日《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和《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题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首先反驳了胡适的

观点，指出了胡适文章中思维逻辑及常识上的错误。

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在文中对胡适片面否定“根本解决”的谬误进行了集中批驳。

11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为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2月4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颁令柯劭忞著《新元史》列入正史。

12月，李大钊在《新潮》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阐述唯物史观的原理。

本年，北京《国民》第2卷第1号刊载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

本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初编。

1920年

1月，《建设杂志》发表文章，开始讨论井田制问题。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要有胡适、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季融五等人。

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策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提出：“中国近代新思想是应经济和社会的新要求发生，不是凭空造出”的。

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在湖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组织了第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10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之《史地丛刊》创刊。何炳松为本刊撰写了《发刊辞》。

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正式成立。

9月，陶孟和发表《新历史》。本文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

1号。

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长篇政论文章《谈政治》,不仅表明了对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而且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政府主义,并宣布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

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旨在从思想上、组织上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工作。

11月,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

11月,连雅堂(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由台湾通史社出版。

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大力宣传罗素的社会改良理论,文章的矛头指向科学社会主义,从而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7日和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先后发表陈望道、李达和邵力子写的文章,对张文进行了质疑和反驳。陈独秀将对立双方的有关文章共13篇汇集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刊登在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进一步扩大了讨论的影响。

11—12月,梁启超著《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在《改造》杂志连载。

12月,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本文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作者主张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

12月,《共产党》第2号发表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

1920年年底,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对社会主义论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述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肯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本年,李大钊著《史学思想史讲义》。作者认为:“自有马氏(案: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本年，柯劭忞著《新元史》由徐氏退耕堂刊行。

本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丛书》和《共学社丛书》。

本年，《建设》第3卷第1号刊载徐苏中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此文系节译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的一部分。

本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本年，郑次川译，王岫庐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节的中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本年，北京《国民》第2卷第3号刊载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常乃庸译的《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即摘译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本年，上海《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刊载恽代英译的《英哲士论家庭的起源》，此文系摘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21年

1月，李达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

1月19日，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刊登于《广东群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致信陈独秀，就陈《社会主义批评》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进行辩护，陈独秀作了答复，《答区声白的信》刊登在1921年1月27日的《广东群报》上。

1月25日，顾颉刚致胡适《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

1月28日，胡适致顾颉刚《自述古史观书》。

1月29日，顾颉刚致钱玄同《论辨伪工作书》。

1月，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刊载范寿康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摘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月，蔡和森致信陈独秀，公开声明：“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2月—5月，《改造》第3卷第6号发表梁启超和张东荪的文章。

梁的长篇文章《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对张的观点加以支持、补充和发挥。文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表达出相当复杂的心情，梁启超仍然选择了“利在目前害在将来”的资本主义。张东荪的《一个申说》一文再次解释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他要把社会主义“推得很远”。

5月，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全面批驳张、梁的改良观点。文章中深刻分析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论证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和前途。

5月，李达从日文翻译的三部译著：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高昌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6月9日，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

6月，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为我国第一部人名大辞典。

7月1日，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刊登于《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

8月25日，胡适发表《研究国故的方法》。本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提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系统的研究国粹”。

8月，《新青年》第9卷第4号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发表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三次通信，使双方争论进一步明朗化。陈独秀主要从经验事实层面驳斥了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

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负责。这是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首次在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施存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文章就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运用问题展开论证。

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任主任。

11月，柳诒征、吴光迪、吴宓等人创办《史地学报》。本刊为国立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会刊。

1922年

1月，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月，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在上海创办《学衡》杂志。被称为学衡派，他们反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新人文主义重新阐释和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3月，《新潮》第3卷第2号设专栏“1920世界学术专号”。本专号介绍了世界最新科学研究成就，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杜威的《哲学改造》、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等14种。

3月，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校长蔡元培兼任所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罗振玉、王国维被聘为函授导师，金石学家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兼导师。

5月，北京《今日》第1卷第4号刊载熊得山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本刊提倡整理国故，并于9月增设了《读书杂志》副刊。本刊1923年10月停刊。

6月15日，章炳麟致柳翼谋（诒征）书，批评疑古思潮。

9月，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中共中央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由蔡和森任主编。到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10月，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李季译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

10—12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先秦政治思想史。

11月，章炳麟著《国学概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11月，顾孟余主编《社会科学季刊》创刊。

本年，李泰棻著《中国史纲》第1卷出版。

本年，梁启超发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演。

1923年

1月6日，“朴社”成立。本社由郑振铎、周予同、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沈雁冰、胡愈之、陈兼善、常乃惠等人发起，以研究汉学为宗旨。

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胡适任主编。

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讲演，并在《清华周报》上发表。

3月，王国维自选之《观堂集林》20卷由乌程蒋汝藻校印行世。

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由此展开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5月2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3期上发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

5月15日，李达在《新时代》第2期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原理，指出中国已经具备应用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改造社会的条件。

5月，《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对中国思想界起于1923年2月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5月，丁文江、张元济、罗振玉等发起成立“古物研究社”，以“发掘搜集并研究中国之古物为宗旨”。

5月至12月，《努力》增刊《读书杂志》连续载文讨论古史。

6月，李法章著《太平天国志》由常州华新书社出版。

6月，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出版。

9月，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为中国第一部白话通史专著。

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汪东任编辑。

12月,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由北京中华印刷局出版。

本年,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于《地质汇报》第5号发表。

本年,陈垣撰《摩尼教入中国考》。

本年,高劳著《辛亥革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胡适著《科学与人生观》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4年

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终年38岁。

5月,李大钊的专著《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出版,此书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历史学概论。

5月,郭沫若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5月,李泰棻著《中国近百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9月,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本书单行本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7月,[美]鲁滨生著、何炳松译《新史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10月22日,清华学校筹备设立研究院。

11月,顾颉刚于《语丝》第2、3期发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作者认为,世人所传殷纣的种种恶行都是后代逐步增加的,由此证明古史是层累造成的。

12月27日,李玄伯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本文后收入《古史辨》第1册。

本年,易白沙著《帝王春秋》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5年

1月, [瑞典] 阿尔纳(T. J. Arne) 著、乐森瑁译《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

3月25日, 瞿秋白在《新青年》第3号发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一文, 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5月, 北京《政治生活》第76期刊载猎夫(李大钊)译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即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6月, 李达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的专著。

6月, 安特生著、乐森瑁译《甘肃考古记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

6月, 曹聚仁编《古史讨论集》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本书收录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人讨论古史的9篇文章和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7月,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发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学问》的讲演。

8月, 孟世杰著《中国最近世史》第1册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10月10日, 故宫博物院成立。

本年, 《学衡》杂志连载柳诒征《中国文化史》, 采用了综合性的文化通史体裁。

陈顾远著《中国古代婚姻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

4月, 《实学》月刊创刊。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刘盼遂、杜钢百等组织的“实学社”所办, 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

春, 陈垣编《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

6月11日, 《古史辨》第1册由景山书社出版。

6月30日,东亚考古学会成立。

9月,李济、袁复礼等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进行的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

10月5日,周予同发表《僵尸的出祟》。本文发表于《一般》杂志第1卷第2期。作者对当局倡导读经的言行进行了抨击。

10月,[法]朗格诺瓦、瑟诺博思合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李思纯著《元史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清华研究院成立考古陈列室,并与大学部历史系共组考古学委员会,李济任主席。

梁启超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朱谦之著《历史哲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本年,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著《唯物史观解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27年

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情况进行了32天的实地调查。此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先后在《战士》周刊、《湖南民报》和《向导》周报上刊登。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4月,瞿秋白翻译的《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由武汉长江书店出版。

春,蒙文通著《古史甄微》印行。

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6月,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出版。本期发表了徐中舒的论文《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反夏商周三代同出一源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殷周属于不同民族的观

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月，《燕京学报》创刊。

7月，何炳松著《历史研究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为中国第一部报刊史专著。

8月，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由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本书为作者1925年至1926年参加“山西考查团”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

8月，李泰棻著《记录以前之人类史略》由北京青云阁出版。

10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设立，傅斯年任所长。

11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

本年，赵尔巽等纂《清史稿》由清史馆印行。

本年，冯承钧编译《史地丛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另编译有《史地丛考续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月出版。

本年，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

2月，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本书是中国出版较早的民族史专著。

4月4日，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

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

10月1日，陶希圣于《新生命》第1卷第10期发表《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到最上层的军阀，乃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

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广州创刊。创刊号发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11月，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由上海革命史编辑社出版。

12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学会成立。

本年,陶希圣创办《新生命》杂志。陶氏关于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多在本杂志上发表,其著作亦多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因而形成了所谓“新生命派”。

本年,陈垣著《史讳举例》由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编辑会出版。

本年,国史馆修《清史列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卫聚贤著《古史研究》第1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1929年

1月19日,梁启超逝世,终年57岁。

1月25日,何炳松于《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发表《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

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师生在朱希祖倡导下,成立中国史学会。同时,中央大学缪凤林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

3月10日,南京中国史学会主办《史学杂志》(双月刊)创刊。

3月,熊得山著《中国社会史研究》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春,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不承认三皇五帝被政府查禁。

6月,杨贤江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9月,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该院下设物理、原子、化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史学9个研究所,徐炳旭任史学研究所所长。

10月,王钟麟著《太平天国革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美]绍特韦尔(J. T. Shotwell)著、何炳松、郭斌佳译《西洋史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一个中译本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译者署名杜竹君,系从法文译出。

11月,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本书主要汇集作者在流亡日本期间所撰论文,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

辞中之古代社会》《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作者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

本年，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出版。前书由南强书局出版，后二书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全面否定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本年，卫聚贤著《古史研究》第2集由上海述学社出版部出版。

本年，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本年，王云五主编之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第1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居延河畔黑城子发现一万余片汉代木简，即“居延汉简”。这批汉简后经劳干考释、整理，于194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1930年

2月，法国伊科维兹著、樊仲云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2月，刘剑横著《历史学ABC》由上海ABC丛书社出版。

2月，孟森著《清朝前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为作者《清史讲义》之上编。

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该书征引甲骨、金文和考古材料，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论述，首次提出“西周社会奴隶制”说，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第一部专著。

4月，《新思潮》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中

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李一氓《中国劳动问题》等。

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成立。9月15日创办了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后又出版了机关报《新文化》。

5月10日，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本文原载《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后收入《古史辨》第5册。

6月，何炳松著《通史新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乃据[法]塞诺波《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编译而成。

6月，曹聚仁著《中国史学ABC》由世界书局出版。

6月，吴贯因著《史之梯》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本书1937年由上海文化书局再版，更名为《史学概论》。

7月15日，《动力》第1期发表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主义的经济》，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不同意王学文关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论点。《布尔什维克》、《读者月刊》、《读书杂志》、《学艺》等陆续发文参加讨论。

9月8日，《古史辨》第2册由朴社出版。

10月，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10月，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月4日，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

11月7日，中央研究院与山东古迹研究会联合发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

11月，陈功甫著、蔡元培校《中国革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北平师范大学《国学丛刊》创刊。

12月，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主办《史学》创刊。本刊为不定期刊，1933年停刊。

12月,班兹著、向达译《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又曾以《史学史》《社会科学史纲》(第1册《史学》)等书名多次再版。本书是30年代初我国译介的“新史学”理论著作中影响较大者。

12月,钱如铁以《反杜林格论》为译名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译本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本年,《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本书为1920年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胡适、季融五等人关于井田制有无论战的论文集。

本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开始出版。《明清史料》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编,从此年起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至1975年出齐。

本年,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至6册)由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出版。

本年,汤用彤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讲稿。

本年,[美]摩尔根著、张栗原、杨东莼译《古代社会》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本书1935年又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和《万有文库》。

本年,[法]施亨利著、黎东方译《历史之科学与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开始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本年,谢国桢编《清开国史料》(6卷)由北平图书馆出版。1933年,作者又出版了《清开国史料考叙论订补篇》(北平图书馆《清初史料四种》本)

本年,向达著《中西交通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恩格斯《反杜林论》吴黎平译本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

本年,李达翻译日本人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1931年

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4次科学发掘。这次发掘由李济主持。

4月,[英]殷格兰姆著、唐道海译《奴隶制度史》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本书附有[日]西山久荣的《中国奴隶制度》一文。

5月,北平中国大学《国学丛刊》创刊。吴承仕任编辑。因与北平师范大学《国学丛刊》同名,故从第2期起,改名为《国学丛编》。

8月,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由大东书局出版。

8月,杨东莼著《本国文化史大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9月,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

10月,梁思永等对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进行第二次科学发掘。

11月,《古史辨》第3册由朴社出版。本书主要收录讨论《易经》和《诗经》的文章。

11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五次科学发掘。

12月,梁思永等人对后岗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科学发掘。

本年,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本年,陶希圣著《西汉经济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陶希圣著《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郭沫若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大东书局出版。

本年,谢国桢著《清开国史料考》(6卷)由北平图书馆出版。

本年,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出版。

本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

本年,郭沫若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2年

2月,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立。

3月,王礼锡、陆晶清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为《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此后至1933年3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共出版4辑,收录了1931年至1933年朱伯康、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王宜昌、李季、陈邦国、杜畏之等人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亚细亚?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征?等等。

3月,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柳若水的译本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

3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即陈豹隐)译本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7月,张霄鸣著《太平天国革命史》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8月,缪凤林著《本国史》(上册)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夏商。

8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9月,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由国际学会出版。

8月,陶希圣于《读书杂志》第2卷第8期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作者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了“先资本主义社会”。

10月,《东北史纲》第1卷出版。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编纂。本书编纂的目的在于以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本年,陈登元著《中国土地制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谢无量著《中国古田制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在日本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于1935年增订为《图录》和《考释》两卷出版。本书对两周重要的青铜器进行了编年、考订，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年，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本书至1935年出齐。

本年，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沈曾植著、张尔田校补《蒙古源流笺证》8卷刊行。

本年，陈垣著《〈元典章〉校补》10卷、《札记》6卷、《阙文》3卷、《表格》1卷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出版。

本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汤象龙、陶孟和主编。该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本年，[德]黑格尔著、王灵皋译《历史哲学纲要》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本年，王静如著《西夏研究》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至1933年，共出版3辑。

本年，谢国桢著《晚明史籍考》（20卷，附通检）由北平图书馆出版。作者此后又对本书进行了增订修补。

1933年

1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办《现代史学》创刊，创办人为朱谦之、常乃惠等。

3月，《古史辨》第4册由朴社出版。此册为《诸子丛考》，罗根泽主编。

4月，[俄]柯金著、岑纪译《中国古代社会》由黎明书局出版。本书讨论了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其中对井田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尤为重要。作者还对胡适、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关于井田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评论。

5月，郭沫若著《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作者通过卜辞对商代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

6月,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1961年12月,三联书店重印。

9月,李鼎声(平心)著《中国近代史》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本书起鸦片战争,迄“九一八”事变。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0月,刘静白著《何炳松历史学批判》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本书从“历史科学论”“历史方法论”“历史系统论”“史学发展论”对何炳松的《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等书进行了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

10月,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印行。

本年,吕思勉著《先秦学术概论》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本年,邓之诚著《中国通史讲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万国鼎著《中国田制史》由上海南京书店出版。

本年,杨家骆编《四库大辞典》由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出版。

本年,蔡雪村著《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由东亚图书馆出版。

本年,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4年

1月,左舜生著《辛亥革命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3月,顾颉刚、谭其骧发起筹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

4月15日,北平中国学院国学系创办《文史》。本刊由吴承仕任主编,齐燕铭、孙席珍任编辑,撰稿人有吕振羽、侯外庐、黄松龄、李达等。创刊号上发表了吕振羽撰《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作者主张殷代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

4月,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5月,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容庚、徐中舒等发起成立“金石学会”。9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并更名为“中国考古学社”。

7月,李季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本书包括:关于中国社会史上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所必具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对于经济发展分期的指示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中国经济时期的划分及其说明。书后附: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8月,李季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一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于东周,秦至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代,鸦片战争后为资本主义时代。

9月21日,《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由洪业、张荫麟、容庚发起。

9月,商务印书馆开始选印《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此事由袁同礼、张元济主持,选书231种,至1935年出齐。

9月,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第1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本书是在李达的指导下撰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古代传说进行了研究,讨论了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神话传说所暗示由氏族到市区转变的形迹、仰韶文化各期出土物与传说时代、中国古代各民族系别、洪水的传说和其时代,等等。

12月1日,《食货》(半月刊)创刊。本刊由陶希圣任主编。

本年,吴晗、夏鼐、汤象龙、罗尔纲等成立史学研究会。

本年,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上、中册出版。

本年,卫聚贤著《历史统计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用统计学原理研究历史的方法论著作。

本年,陈顾远著《中国法制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略》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本年,陈序经著《中国文化的出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是国内“全盘西化”的代表作。

本年，张东荪著《唯物辩证法论战》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

1935年

1月，《古史辨》第5册由朴社出版。顾颉刚主编，内容为讨论今古文及其相关问题。

2月，谢兴尧著《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15日，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全盘西化，胡适则发表《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与之论战。

3月，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曾骞著、陶希圣校《中国古代社会》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4月，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5月，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美]罗维著、吕叔湘译《初民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成立。

8月，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冬，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月，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殷代和周代的社会性质，作者提出，殷代是奴隶社会，而西周是封建社会。孟子所谓的“井田制”即是封建庄园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12月，郑鹤声著《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作者提出，在历史教学中应注意建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信力。

本年，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8卷由励耘书屋刊行。陈寅恪为本书作序。

本年，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开始辑印《丛书集成初编》。

本年，谢兴尧著《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第1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由北平研究院出版。

本年，李达发表《中国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著，进一步深化了“新思潮派”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研究。

1936年

3月，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由开明书店出版。

4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主办之《史学集刊》创刊。

5月24日，禹贡学会在燕京大学正式成立。

6月，顾颉刚整理之《崔东壁遗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8月，李济主编《田野考古报告》创刊。《田野考古报告》后改称《中国考古学报》。

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于右任等任评议，董作宾等任理事，卫聚贤任总干事。

9月21日，由顾颉刚等倡办的边疆研究会成立。

9月，[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10月，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史学消息》创刊。本刊由刘选民任总编，蒙思明、张玮瑛等任编辑。

10月，禹贡学会开始出版《边疆丛书》。由吴丰培、顾廷龙主编。

11月，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中国文化史丛书》。

本年，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陶希圣等著《唐代经济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唐庆增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近代研究方法撰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

本年，冯自由著《革命逸史》4集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

1月，萧一山、范文澜创办《经世》半月刊。

1月，何干之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1月，何干之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由生活书店出版。

1月，罗尔冈著《太平天国史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月，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月，〔德〕伯伦汉（E. Bernheim）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收入了恩格斯的《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和《欧洲军队》5篇著作。

4月，瞿同祖著《中国封建社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1939年桂林文化供应社再版，1943年修订版出版。1953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增订再版。

7月，何干之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本书共分三编，上编：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争的意义；中编：中国奴隶社会的方法论；下编：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质。

7月，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郭伯恭著《四库全书纂修考》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

12月,卫聚贤著《中国考古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之一。

冬,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以“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名义刊行。

本年,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本书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批判陶希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本书“序”谓其写作之方法云:“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之各种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个流派,更把每个流派中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作为一个体系去论究。”

本年,马乘风著《中国经济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由罗氏影印出版。

本年,何天行著《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由上海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

本年,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由开明书店出版。

1938年

5月5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张闻天任院长。后设历史研究室,陈伯达任主任。

7月,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由长沙文史研究会出版。作者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7月,[法]古朗士著、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由长沙新知书店出版。

8月,《资本论》全书(第一、二、三卷)郭大力、王亚南合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9月18日,吴玉章在《解放》第52期上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一文,提出:“我们大中华民族正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

有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我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胜利。”

9月，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联共（布）党史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一书由华东新华书店出版。

9月，《古史辨》第6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本册由罗根泽主编。

11月，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处在重庆成立。

12月19日，昆明《益世报》之《边疆》周刊创刊。该周刊由顾颉刚创办。

12月，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史学研究所。

本年，蒙文通著《周秦民族史》由四川大学出版。本书1958年改名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由龙门联合书局再版。

本年，蒙思明著《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本年，王庸著《中国地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9年

1月17日，钱玄同逝世，终年52岁。

3月，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4月，杨鸿烈著《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周谷城著《中国通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8月，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修订版由桂林新知书店出版，增加“再版代序”《群众、领袖与历史》一篇。

12月，毛泽东主持撰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本年，张心澄著《伪书通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有总论，论辨伪之缘由、伪书发生的原因、辨伪的方法和辨伪学的产生等，然后仿《古今伪书考》，对1059种古书进行了考辨。

本年，陈垣著《释氏疑年录》12卷《通检》1卷由励耘书屋

刊行。

本年，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40年

1月，《中国文化》月刊在延安创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月，岑家梧著《史前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月，陈恭禄著《中国史》（第1册）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宣扬文化形态史观，被称为“战国策派”。

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本文发表于《群众》第5卷第4、5期。

6月，顾颉刚、蒙文通、萧一山等74名史学家发起创办《史学季刊》。

6月，钱穆著《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认为，对上古史的研究有史前遗物发掘与传说神话之审订两种途径，作者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对《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进行了批评。

8月，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所述，主要为中外关系史。

8月，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由鸡鸣书店出版。

8月，平心著《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中国现代史实初编》）由香港国泰出版公司出版。

9月，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讲演。文章后发表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演讲内容受到毛泽东称赞，并写信给范文澜云：“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

必有大的影响。”（《致范文澜（1940年9月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月，蔡尚思著《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由昆明中华书局出版。

11月1日，齐鲁大学研究所《齐大国学季刊》创刊。顾颉刚任主编。

11月，邓初民著《社会史简明教程》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本年，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辩证》出版。

本年，周谷城著《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由辅仁大学出版。

1941年

3月1日，中国边疆学会在成都成立，顾颉刚被推为理事长。

5月，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本书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史著作之一。

6月，《古史辨》第7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6月，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上册）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

6月，李宗侗（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由北平来熏阁出版。本书对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

7月，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1日，为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洛甫，副院长由范文澜担任。中央研究院共设9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为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为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何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由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国历史研究室又分3个组：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

9月,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原题“中国历史研究会编”。本书曾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并且卷次也各不相同,1947年全8册出齐,起上古,迄义和团运动。

9月,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12月,吕思勉著《先秦史》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本书在编撰体例上颇有特色,在民族疆域、社会组织、农工畜业、衣食住行、政治制度、宗教学术等方面,皆作专题论述。

12月,林同济、雷海宗等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

本年,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由重庆开明书店出版。

1942年

1月,《中国边疆》创刊。该刊由中国边疆学会出版。

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2月,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出版。在此前后,郭沫若的历史剧作《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等相继演出和出版。

9月,吴泽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由重庆峨眉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12篇。除编者论文外,还收录了翦伯赞《实验主义中国历史观的批判》、华岗《法西斯侵略主义中国历史观的批判》、吕振羽《中国历史研究诸问题》等文。

11月,吕振羽著《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由耕耘出版社出版。本书为作者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论文集,包括“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书后有附录: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本国史研究提纲。

本年,朱谦之于《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发表《考今》一文,

批评实证主义史学。

1943年

1月,侯外庐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3月10日,陶希圣撰、署名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7月21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中国之命运〉》。

3月24日,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朱希祖、陈训慈、卫聚贤、缪凤林、金毓黻、沈刚伯为常务理事。

4月,方豪著《中外文化交通史》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5月1日,翦伯赞在重庆《学习生活》第10卷第5期上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

5月,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罗尔冈著《太平天国史丛考》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10月,徐炳旭《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10月,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1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第1卷为史前史、殷周史。

12月,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由重庆文风书局出版。共收1940年至1943年所作论文20篇。

本年,朱希祖著《中国史学通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本书为作者1919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义。

本年,侯外庐著《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本年,尹达著《中国原始社会》由作者出版社出版。

本年,黎东方著《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曾资生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

本年,郑鹤声著《中华民国建国史》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1944年

3月19—22日,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由《新华日报》连载。作者述其写作之旨云:“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异族的人主,人民的血泪更替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本文发表后,《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批评,延安的《解放日报》则附编者按后全文转载。

3月,胡厚宣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本书之二集、三集于次年出版,四集于1946年出版。

4月,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由重庆国立编译馆出版。

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史料与史学》创刊。

6月,吴晗著《明太祖传》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6月,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由重庆文风书店出版。

7月,傅振伦著《中国史学概要》由重庆史学书局出版。本书为中国史学史。

7月,蒋祖怡著《史学纂要》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8月,罗香林著《唐代文化史研究》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简又文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吕思勉著《历史研究法》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本年,陶希圣著《中国社会史》(古代篇)由重庆文风书店出版。

本年,张荫麟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1948年正中书局再版时名《中国史纲》(上古篇)。

本年,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嵇文甫著《晚明思想史论》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郑鹤声著《中国近世史》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

本年，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劳干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考证）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1945年

6月，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由重庆文风书店出版。

7月，常乃惠著《历史哲学论丛》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侯外庐著《苏联历史学界诸争论解答》由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出版。

11月10日，郭沫若著《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由重庆群益书社出版。

11月21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称赞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

11月，陆懋德著《史学方法大纲》由南京独立出版社出版。

11月，陈梦家著《西周年代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陈垣著《通鉴胡注表微》完稿，在《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合期上发表前十篇。

本年，董作宾著《殷历谱》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本年，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

本年，邓广铭著《岳飞》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1946年

2月，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由华北新华书店修订出版。1941年，毛泽东要求组织力量开展近百年来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研究，以帮助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中国国情。范氏即为此撰写了本书。本书起自1840年，终于1901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是本书的重点。

4月，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5月28日,《文汇报·史地周刊》创刊。

5月,中国史学会主办之《中国史学》创刊。

5月,林同济、雷海宗著《文化形态史观》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主要汇集了作者在《战国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6月,胡绳著《理性与自由》由华夏书店出版。

7月,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

8月,曾资生著《中国宗法制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蓝文征著《隋唐五代史》(上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16日,上海《益世报·史苑》(周刊)创刊。

10月,华岗著《中国历史的翻案》由作家书屋出版。

11月,童书业著《春秋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本年,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创办北方大学。北方大学曾先后开设7个学院和经济、历史2个研究室。刘大年曾任该校领导小组成员、工学院负责人,尹达任教务处负责人,尚钺、王治秋等在此任教,范文澜亦曾在此讲历史。后北方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并成为人民大学前身的一部分。

本年,金毓黻著《宋辽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启明书店出版。

本年,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由国立编译馆出版。

本年,范文澜、陈伯达著《曾国藩与袁世凯》由华中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年,侯外庐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修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

本年,唯真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

1947年

1月,国民政府国史馆正式成立,张继任馆长。

1月,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3月,吕思勉著《秦汉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3月,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2卷)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

4月,方壮猷著《中国史学概要》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本书实际上是中国史学史。

5月,翦伯赞著《中国史论集》(第2辑)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5月,侯外庐著《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下册)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5月,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6月,侯外庐、杜守素、纪玄冰著《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此卷内容为殷商至战国。

6月,胡华著《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

6—12月,郑振铎编《中国历史参考图册》(1—20册)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9月,顾颉刚、丁君匋主编之《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开始由中国图书局出版。

10月,侯外庐著《中国古代社会史》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本书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结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思想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殷末周初中国才进入以“城市国家”兴起为标志的阶级社会。1955年,本书修订出版,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内容上主要的修订为承认殷代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

本年,李源澄著《秦汉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孟森著《清史讲义》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本年,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社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郑天挺著《清史探微》由独立出版社出版。

本年,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修订版由上海新知书店重印。

1948年

2月,柳诒征著《国史要义》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旨在表彰中国传统史学。

4月,董作宾编《殷墟文字甲编》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5月,刘节著《历史论》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7月,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本书内容上起1840年,下迄1924年。

9月,陈述著《契丹史论证稿》由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出版。

10月,吕思勉著《两晋南北朝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12月,裴文中著《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由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出版。

本年,董家遵著《中国奴隶社会史》由中国社会学社广州分社出版。

1949年

2月,吴泽著《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符合亚细亚的特点。作者将世界当时的三大文化区域(殷商、埃及、巴比伦)进行了比较研究。

4月,吴晗著《明太祖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从第二个版本起,更名为《朱元璋传》,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的一封信》。

5月,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修订版由长春新中国书局重印。

6月,吴玉章著《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由新华书店出版。

7月1日,中国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

8月,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由华北大学出版。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时期的历史学开始。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任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任副院长。

本年,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其办事机构以后归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管理。

本年,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二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增订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年,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本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修订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年,范文澜著《太平天国运动》由天津知识出版社出版。

本年,吴玉章著《中国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革命运动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年,胡华著《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3编)由华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年,艾思奇、吴黎平著《科学历史观教程》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本年,[苏]普列汉诺夫著、博古译《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苏]普列汉诺夫著、唯真译《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

主要参考文献

一 参考书目

- [德]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 [德]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年版。
- [德]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言行出版社 1938 年版。
-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俄] 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 [俄]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0—13 卷、第 16 卷、第 19 卷、第 21 卷、第 25 卷、第 30—34 卷、第 44—48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2008 年 7 月第 2 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0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60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990年12月第2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200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研究历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艾思奇:《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辰光书店1946年版。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7年版。

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曹家齐:《顿挫中擅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陈鼎忠、曾运乾:《通史叙例》,南京中山书局1933年版。

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陈鹏鸣:《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

- 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 陈启能、于沛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 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
- 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陈微：《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丁晓强、李立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
-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新华晋绥分店 1947 年版。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高军等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东书局 1930 年版。
-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影印 1930 年版。
- 郭沫若：《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书店 1933 年版。
- 郭沫若：《殷契粹编》，日本文求堂书店 1937 年版。
-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 郭沫若：《郭沫若选集》，开明书店 1951 年版。
- 郭沫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韩震主编：《20 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代青年出版社 1937 年版。
- 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何兆武：《苇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

-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出版社 1948 年版。
-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 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版。
-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侯外庐：《侯外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 侯云灏：《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洪认清：《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 1919—1949》，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 《红旗》杂志社编：《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版。
- 胡汉民：《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民智书局 1925 年版。
-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胡绳全书》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胡绳：《理性与自由》，华夏书店 1946 年版。
- 胡绳：《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民国丛书》第 1 编第 94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年版。
- 稽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 翦伯赞：《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
-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 1938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生活书店 1946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大孚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历史概要》，知识出版 1980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一辑，文风书局 1947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 1947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大孚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 1980 年版。
- 翦伯赞：《翦伯赞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 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 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上、下），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 1995 年版。
- 历史科学规划小组编：《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 李达：《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民国丛书》第 5 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年版。

-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雷海宗：《伯伦文集》，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雷海宗：《历史形态与例证》，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雷家骏：《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年版。
- 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林甘泉等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林同济：《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 1933 年版。
- 刘俐娜：《中国民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 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 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 刘泽华：《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 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吕希晨、何敬文：《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 1936 年版。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店 1937 年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 1934 年版。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 1949 年版。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马金科、洪金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绪论 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宁可、汪鲁征：《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彭卫：《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 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 瞿林东主编：《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瞿林东：《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瞿秋白：《瞿秋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第 1—8 辑，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 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汤勤福：《中国史学史》，陕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民书局 1930 年版。
-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 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8》（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肖黎主编：《20世纪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王德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经联出版社2003年版。

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民国丛书》第2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王斯德、童世骏、盛邦和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桐龄：《中国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版。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王正平：《史学理论与方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版。

温乐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吴廷嘉、沈大德：《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 1986 年版、1988 年版。
- 许凌云主编：《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叶桂生、谢保成：《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于均道等：《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张广智主编：《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 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
-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年版。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贻久：《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章汉夫：《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章士嵘：《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编辑部编《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等编：《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等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四册《中国社会史论战》上，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2 年。
-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中国社会史论战》下，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2 年。
-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三册《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上，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4 年。
- 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四册《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下，辽宁大学哲学系内部出版，1984 年。
- 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齐卫平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 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朱政惠：《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
-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1931 年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
-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1932 年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
-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3 辑，《读书杂志》1932 年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

- [波] 托波尔斯基 (Topolski):《历史学方法论》, 张家哲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 [德] 罗梅君 (Mechthild Leutner):《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 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孙立新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法] 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 张和声、程郁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 [法] 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 (Emmanuel Leroy Ladurie):《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杨豫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美]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 1919—1937 年》, 翁贺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美] 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 [美] 郭颖颐 (D. W. 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 雷颐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美] 郭颖颐 (D. W. Kwok):《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 雷颐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美] 鲁滨逊 (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 齐思和译,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 [美] 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 [美]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 [美] 威廉·德雷 (William H. Dray):《历史哲学》, 王伟、尚新建译, 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美] 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何兆武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瑞士] 让·皮亚杰 (Jean Piaget): 《人文科学认识论》, 郑文彬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
- [苏] 柯金 (M. Koknh): 《中国古代社会》, 岑纪译, 黎明书局 1933 年版。
- [意] 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傅任敢译,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 [英] 柯林武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英]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论历史》, 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二 参考文章

- 白寿彝: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
- 曹守亮: 《翦伯赞和 1949—1966 年间的历史教学思潮》, 《宜宾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 曹守亮、曹小文: 《唯物史观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第 1 期。
- 蔡美彪: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前前后后》, 《河北学刊》1999 年第 2 期。
- 陈春雷: 《侯外庐史学成就述略》, 《历史教学问题》1998 年第 5 期。
- 陈峰: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 陈峰: 《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 19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史学月刊》2010 年第 9 期。
- 陈光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 《东北师大学报》1983 年第 4 期。
- 陈其泰: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1 期。

陈其泰：《范文澜理论创造的特色》，《史学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陈其泰：《从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纪念范文澜诞生 100 周年》，《齐鲁学刊》1993 年第 5 期。

陈其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成就三题》，《浙江学刊》1994 年第 3 期。

陈其泰：《论范文澜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河北学刊》2001 年第 5 期。

陈其泰：《范文澜的学术交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

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陈其泰、张利：《范文澜在延安——20 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篇章》《人文杂志》2001 年第 3 期。

陈其泰：《范文澜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道路》，《学术研究》2004 年第 8 期。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 年 10 月 11 日。

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陈善学：《李大钊与我国“第一次社会主义论战”》，《历史教学问题》1957 年第 5 期。

陈宗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

戴炳中：《蔡和森对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 年 11 月第 1 卷第 3 期。

- 丁迪豪：《殷代奴隶史》，《历史科学》1933年9月第1卷第5期。
-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1950年2月第3卷第12期。
- 杜蒸民：《吕振羽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史学集刊》1987年第1期。
- 杜蒸民：《扬弃旧史学创建新史学——郭沫若对胡适、古史辨史学的扬弃》，《郭沫若学刊》1990年第2期。
- 段启咸：《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
-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1940年第5卷第4、5期。
- 范文澜、王南：《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学家——李大钊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 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1945年6月第5卷第5、6期。
- 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第19期。
- 高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学术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 龚杰：《侯外庐思想史学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9日第9期。
-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8日第20期。
-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29日第23期。
- 郭建宁：《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及其现代思考》，《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

郭烙：《李大钊同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韩翼：《李大钊与历史科学》，《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贺渊：《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胡绳：《近五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半月刊》1946年第2卷第5期。

胡逢祥：《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1期。

胡晓：《梁启超、胡适、李大钊历史观比较》，《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

何刚：《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何刚：《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

何刚：《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解——以郭沫若与孤军社论战为主的考察》，《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洪认清：《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

洪认清：《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洪认清：《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三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侯且岸：《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侯外庐：《社会史导论》，《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

侯云灏：《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及其基本特点》，《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

侯云灏：《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

侯云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史学月刊》

- 2002年第6期。
- 侯云灏：《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3期。
- 黄修卓：《李达唯物史观研究论析》，《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 黄宣民：《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2期。
- 黄元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科学和史学概论研究的关系》，《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 翦伯赞：《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
-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 蒋大椿：《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二、三、四）分别刊于《历史教学》2000年第6、7、8、9期。
- 姜义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晋荣东：《〈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
- 匡裕从：《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5期。
-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李萍：《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两个问题》，《安徽史学》2001年第3期。
- 李其驹、王炯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东岳论丛》1983年第5期。
- 李润苍：《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史学的巨大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 李曙新：《李达和吕振羽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历史贡献》，《文史杂志》1997年第4期。

- 李田贵,赵学琳:《二十年代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4期。
- 李小林:《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党史文苑》2005年第8期。
- 李小树:《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
- 李小树:《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构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李小树:《论李大钊在中国史学多元格局中的理论选择》,《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李小树:《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纪念〈史学要论〉问世8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 李小树:《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与李大钊的变革主张》,《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
- 李学勤:《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13日第3版。
- 李学勤:《郭沫若同志对夏代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 李勇:《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 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 李永春:《蔡和森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 李子文:《历史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吕振羽史学思想管窥》,《史学集刊》1991年第4期。
- 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林甘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林甘泉:《郭沫若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林国华：《创制体式位本民族——论范文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 林晓平：《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
- 刘宝才：《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史学开创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 刘海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
- 刘洪英：《略论瞿秋白对社会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刘茂林：《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苦心经营》，《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1期。
- 刘茂林：《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与李大钊》，《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 刘绍孟：《李大钊在历史科学上的贡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
- 刘卫平：《略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 刘支全：《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 卢钟锋：《论侯外庐的学术道路》，《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卢钟锋：《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09月17日第9版。
- 卢钟锋：《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下，《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09月24日第9版。
- 罗新慧：《〈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年4月第1卷第

1期。

马迪亚(即马扎亚尔):《中国的农业经济》《新生命》1929年8月第2卷第8期。

马尚云:《郭沫若在先秦史研究中使用的科学方法管窥》,《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莫金山:《对范文澜与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的再评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牛方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视角——重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争》,《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欧阳哲生:《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彭邦本:《世纪回眸:郭沫若古史研究特色的几点思考》,《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1期。

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史学理论丛书》第2辑《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彭卫:《寻找史学理论进步的突破口》,《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皮明麻:《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齐卫平:《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6期。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丘旭(王学文):《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新思潮》1930年2月第4号。

瞿林东:《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瞿林东:《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而作》,《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瞿林东:《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瞿林东：《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任大援：《侯外庐史学的文化生命力——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 任俊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概况》，《哲学动态》1983年第7期。
- 阮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史观、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经济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沙健孙：《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 邵成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
- 沈传亮：《五四时期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教学》2002年第8期。
- 石国亮：《“五四”精英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 史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 石云：《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
- 宋馥香：《论范文澜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 孙国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 唐光怀：《吕振羽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特质探析》，《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 邵凤琳：《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北京党史》1999年第6期。
- 田昌五：《论郭沫若的史学体系》，《文史哲》1993年第5期。
- 田居俭：《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田居俭：《郭沫若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4期。

田彤：《简析社会史论战中的方法论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

佟佳凡：《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3期。

王东：《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5期。

王贵仁：《从传播“唯物史观”到建构“民生史观”——解析1920年代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态度的转变轨迹》，《社科纵横》2009年第11期。

王贵仁：《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其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王记录：《论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山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王记录：《一般的历史与特殊的历史——论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历史地位》，《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王军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

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王戎笙：《郭沫若关于历史编纂体裁的思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王晓华：《建国后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变化》，《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王学典：《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论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

王学典：《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

-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 王宜昌:《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中国经济》1935年6月第3卷第6期。
-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合期。
- 王玉德:《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 王志刚:《“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 王志刚:《“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3期。
- 王志刚:《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 魏特夫:《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新生命》第2卷第8期,1929年8月。
- 温济泽:《延安整风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3期。
- 吴汉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 吴汉全:《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
- 吴汉全:《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 吴怀祺:《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
- 吴元钊:《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论战》,《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吴泽:《吕振羽史学研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1期。
- 吴泽:《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河北学刊》1987年第5期。

武育文：《李大钊同志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夏保国、颜劲松：《试论吕振羽史学分期及其治史特点》，《史学集刊》1991年第4期。

谢保成：《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问題——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谢保成：《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谢保成：《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

许莹莹：《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

徐春夏：《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

徐方平：《论蔡和森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杰出贡献》，《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徐文杰：《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薛广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历史学科学化的探索》，《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薛其林：《革命性与学术性交融：郭沫若的学术研究特色》，《长沙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杨春方：《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心理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

杨丙元：《李大钊同志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

杨培星：《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看郭沫若的治学精神》，《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杨鹏、马婷婷：《试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术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杨艳秋：《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北京联

- 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 叶桂生：《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合著），《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1期。
- 叶桂生：《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合著），《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叶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合著），《晋阳学刊》1986年第6期。
- 叶桂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史学倾向》（合著），《史林》1987年第3期。
- 叶桂生：《读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 叶桂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萌芽》，《晋阳学刊》1988年第4期。
- 叶桂生：《论毛泽东与历史科学》，《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 尹达：《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
- 尹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 俞旦初：《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 于沛：《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4期。
- 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读书杂志》1933年第3、4期合刊。
- 曾宪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日本“沫若文库”谈起》，《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
- 章清：《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 张传玺：《为创建新史学而奋斗的一生（上）——翦伯赞新史学探索述论》，《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期。

- 张传玺：《为创建新史学而奋斗的一生（下）——翦伯赞新史学探索述论》，《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2期。
- 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3期。
- 张广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传播（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 张广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世纪40年代前后）》，《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
- 张海燕：《延安时代古史分期的学术争鸣评述》，《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张剑平：《论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 张剑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学海》2002年第4期。
- 张剑平：《郭沫若古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
- 张剑平：《郭沫若古史分期学说的完善及引起的学术论辩》，《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3期。
- 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简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 张静如：《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张静如、齐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张利：《翦伯赞论历史评价问题》，《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
- 张利：《范文澜的唯物主义历史评价观》，《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 张立波：《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批评与辩护》，《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 张立波：《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理论旨趣与现实指向》，《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 张美丽：《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对其接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乐山师

- 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0期。
- 张岂之：《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 张文生：《李大钊论历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张先贵：《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安徽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 张兴堂：《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
- 张艳国：《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 张艳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
- 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1期。
- 张越：《〈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 张越：《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张越：《从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的评价看郭沫若的史学思想》，《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
- 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及评价》《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 张越：《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 张越：《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
- 张正光：《论延安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赵国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生与发展》，《江汉论坛》1992年第7期。

赵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个案研究——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周朝民：《二十年代在与旧史学斗争中初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1期。

周春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周文玖：《论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山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周星：《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史前学》，《郭沫若学刊》1991年第1期。

周一平：《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研究》，《史林》1992年第2期。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1年2月。

周振刚：《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周振刚：《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

周忠社：《论李大钊的历史思想》，《理论导刊》2000年第2期。

朱发建：《杨匏安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2期。

朱发建、张林发：《吕振羽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6期。

朱政惠：《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

朱政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朱政惠：《论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朱政惠：《吕振羽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 朱政惠：《吕振羽的史学致用实践及其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 朱政惠：《辟开榛莽播浓荫——吕振羽史学成就述要》，《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
- 朱政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6期。
- 朱仲玉：《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 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 邹兆辰：《五四时期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评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 邹兆辰：《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 邹兆辰：《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 邹兆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与风格》，《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邹兆辰：《李大钊对“历史”概念的探讨》，《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索引

A

爱国主义 19, 197, 206, 367

B

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 84, 92, 142, 144, 194, 248, 288, 289, 292, 294, 297, 306, 340

北京大学 39, 44, 320, 321, 323, 327, 328, 330, 333, 339, 350, 358, 362, 366, 380

必然（必然性） 1, 24, 40, 48, 50, 51, 69, 75 - 77, 83, 85, 101, 116, 119, 137, 160, 165, 175, 176, 192, 200, 204, 215, 218, 230, 236, 237, 240, 248, 249, 251, 264, 273, 293, 300, 328

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 72 - 75, 78, 93, 102, 129, 306, 346, 353

卜辞 97, 106, 127, 153, 155, 222, 320, 333, 339, 360

C

蔡和森 40, 41, 43, 71, 78 - 86, 92, 93, 231, 269, 305, 306, 320, 325, 327 - 329, 358, 372, 376, 382, 386

陈独秀 23, 37, 40, 41, 72, 79, 83, 320 - 326, 328, 331, 358, 365

城市 81, 100, 135, 152, 157, 191, 222 - 224, 228, 293, 354

传统史学 1, 3, 7, 11, 14, 17, 20, 22, 101, 193, 233, 239, 254, 255, 305, 312

春秋时代 129, 135, 138, 164, 165, 212, 214, 225, 289

春秋战国 151, 164 - 169, 194, 201, 209, 214, 296

D

达尔文 4, 5, 16, 34, 35, 42, 43, 173, 318

地理环境 82, 114, 131, 241, 273, 300

地主阶级 27, 135, 138, 140, 203, 270, 271, 293, 295

- 帝国主义 66 - 68, 78, 84 - 86, 88, 110, 142, 168, 170, 176, 181, 182, 206, 270, 272, 273, 276, 284, 292, 294, 295, 297, 301, 309, 335, 354, 355
- 帝王将相 3, 9, 17, 58, 207, 254, 279, 305
- 东方社会 (东方世界) 109, 112, 113, 116 - 118, 216, 219 - 221
- 东方专制主义 (东方封建主义、东方专制政体) 112, 113, 118, 150, 312
- 杜威 23, 24, 29, 171, 322, 327
- E**
- 恩格斯 24, 30, 33 - 35, 42, 46, 48, 57, 79 - 81, 83, 85, 98, 99, 102, 107, 109, 118, 119, 124, 132, 136, 144, 147, 148, 227, 228, 234, 247, 248, 296, 309, 314, 318, 322, 325, 326, 333, 334, 336, 338, 344, 357, 358, 369
- F**
- 法西斯 (法西斯主义) 168, 170, 180, 182, 183, 282, 349
- 范文澜 103, 151, 154, 160, 163, 171, 197 - 200, 202, 204 - 209, 218, 272, 278, 281, 291, 295, 298, 310, 344, 347 - 349, 352, 353, 356, 359, 371 - 373, 377 - 379, 384
- 方法论 29, 40, 79, 97, 101, 111, 115, 119, 124, 125, 129, 140, 144, 147, 150, 169, 171, 219, 230 - 232, 235, 236, 275, 299, 308, 312, 313, 340, 341, 344, 362, 380
- 分封 155, 157 - 159
- 分工 73, 119, 121, 198, 210, 222, 282
- 封建国家 120, 122, 123, 141, 200, 290, 293, 301
- 封建领主 128, 129, 159, 163, 167, 168, 214, 215
- 封建史学 6, 17, 94, 307
- 封建制 (封建制度、封建社会) 83, 90, 109, 111 - 114, 117 - 123, 128, 131, 135, 136, 139 - 141, 149, 151, 154 - 161, 163, 164, 166, 167, 169, 191, 194, 195, 200, 202, 203, 207, 209, 214, 216, 220, 232, 253, 270, 271, 273, 278, 289, 292 - 297, 301, 302, 332, 334, 338, 341, 342, 344
- 封建专制主义 189, 190, 244
- 傅斯年 25, 27, 29 - 31, 102, 105, 176, 261 - 263, 321, 332, 338, 348, 350
- G**
- 工人阶级 34, 271, 316
- 公理公例 12 - 14, 16, 19, 268
- 公式化 (公式主义) 101, 132, 133, 148, 219, 227, 243, 246,

- 304, 309
《共产党宣言》 32, 34, 35, 37,
41, 42, 45, 46, 79, 269, 316 -
318, 321, 323, 325
共产国际 96, 136, 142, 297
《古代社会》 80, 111, 150, 312, 336
古代希腊(古希腊、希腊) 80,
99, 101, 110, 114, 119, 120,
124, 130, 157, 159, 163, 172,
181, 216, 224, 228, 233, 244,
283, 295, 334, 345, 348
古史分期 101, 161, 168, 364,
378, 384
顾颉刚 5, 27 - 31, 125, 147, 176 -
179, 325, 326, 328 - 330, 333,
335, 336, 340 - 343, 346 - 348,
350, 354, 360, 373
郭沫若(郭氏) 29, 97 - 108,
110, 112 - 114, 118, 123, 126 -
130, 133, 147, 150 - 153, 156 -
159, 161 - 167, 230, 232, 240,
243, 246, 291, 296, 299, 307,
311, 312, 329, 333, 334, 337,
339, 349, 350, 352, 356, 357,
359, 360, 363, 366 - 368, 371,
373, 374, 376 - 380, 382 - 386
- H**
- 何干之 113, 115, 118, 140, 192,
230, 282, 290, 344, 345, 354,
360, 377, 381
胡汉民 41, 42, 160, 161, 323,
336, 339, 361
胡秋原 112, 113, 115, 118, 120,
139, 156, 338, 341
胡适 24, 28 - 31, 102, 105, 106,
161, 162, 171 - 176, 237, 246,
291, 321 - 323, 325 - 330, 336,
339, 342, 355, 361, 362, 365,
373, 374
- J**
- 家庭手工业 140, 293, 29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79 -
81, 85, 118, 227, 325, 333, 334
甲骨卜辞 98, 103, 115, 121, 153,
154, 162, 227, 233
甲骨文 31, 201, 316, 319, 320,
337, 360
翦伯赞 103, 123, 126, 129, 130,
134, 144, 151, 153, 159, 160, 163,
167, 171 - 173, 175 - 179, 183,
208 - 218, 231 - 238, 240 - 249,
251 - 265, 295, 298, 310, 312,
345, 346, 349, 350, 352 - 355,
358, 361, 362, 366, 371, 375,
380, 383, 384
教条化(教条主义) 133, 148,
150, 166, 219, 227, 235, 243,
253, 264, 287, 312, 304, 309, 312
阶级斗争 34, 35, 40, 41, 47, 73,
87, 89, 90, 185, 191, 194, 196,
200 - 202, 207, 208, 217, 236,
250 - 253, 269 - 271, 275 - 279,
290, 291, 294, 296, 297, 303,
304, 310, 311, 317, 318, 325

- 阶级分析 252, 253, 270, 276, 277, 303, 311, 312
 阶级社会 109, 117, 126, 129, 139, 201, 209, 222, 236, 237, 242, 252, 275, 277-279, 354
 进化论(进化) 3-5, 7, 9, 12-16, 19-22, 24, 25, 33, 34, 41-43, 45, 48, 74, 77, 80, 82, 83, 85, 88-91, 157, 173, 187, 194, 231, 245, 267, 268, 270, 272, 281, 305, 314-316, 322, 358, 368
 近代化 1-3, 23, 30, 86, 170, 179, 188, 305, 362, 374, 385
 近代史学 7, 27, 51
 经济基础 39, 45, 69, 70, 73, 87, 88, 101, 122, 128, 141, 147, 165, 173, 194, 225, 226, 241, 294, 308, 310
 经济生活 57, 66, 117, 217, 277, 295
 经济制度 40, 89, 122, 292
 井田制(井田制度) 122, 128, 160-163, 165, 166, 323, 336, 339, 342
 瞿秋白 37, 43, 71-78, 92, 93, 231, 305, 306, 328, 330, 331, 365, 373, 377, 383
 K
 康有为 6, 8, 10, 253, 291
 抗日战争 145, 146, 151, 176, 180, 194, 196, 198, 205, 206, 232, 239, 279, 281, 287, 289, 290, 292, 298, 308, 311, 372
 考古学 5, 63, 104, 125, 126, 152, 210, 327, 331, 333, 341, 343, 345
 客观规律 12, 25, 66, 76, 94, 99, 100, 169, 175, 307
 客体 12, 13, 58, 59
 孔子(孔夫子) 16, 70, 71, 175, 226, 231, 286, 301-303
 L
 劳动工具 155, 210, 211
 雷海宗 27, 179, 181, 182, 347, 349, 353, 363
 礼乐 166, 225, 256
 李达 37, 41, 43, 71, 86-93, 231, 232, 305, 306, 322-326, 328, 330, 331, 336, 340, 341, 343, 359, 362, 374, 375, 381
 李大钊 23, 25, 28, 30, 36-39, 43-72, 92-94, 126, 151, 154, 230, 238, 251, 268, 305, 306, 312, 321-324, 329, 330, 362, 370, 372-387
 李季 112, 114, 115, 118, 119, 125, 132, 133, 135, 138-140, 157, 158, 327, 338, 341, 362
 历史发展的动力 57, 58, 94, 266, 307
 历史发展规律(历史规律、历史的规律性) 60, 77, 82, 95, 100, 131, 134, 172, 173, 228, 233, 240-242, 264, 312

- 历史观 14, 15, 40, 42, 43, 45 - 47, 49, 50, 52, 54, 55, 58, 59, 63, 65, 75, 94, 100, 158, 167, 171 - 173, 176, 183, 194, 197, 198, 201, 202, 208, 212, 217, 232 - 235, 238, 250, 251, 254, 255, 257, 261, 265, 267 - 270, 272, 276, 278 - 280, 285, 291, 292, 300, 303, 305, 310 - 312, 356, 374
- 历史观念 43, 101, 107, 171, 186, 201, 216, 233, 234, 266
- 历史科学 60, 61, 63, 94, 218, 229, 237, 241, 306, 340
- 历史理论 49, 53, 60, 61, 72, 81, 93 - 95, 97, 115, 131, 132, 142 - 144, 146, 149, 155, 156, 166, 176, 186, 197, 204, 219, 229, 231 - 235, 239, 243, 244, 250, 251, 253, 255, 258, 305, 306, 308, 310, 312, 313, 360, 368, 374
- 历史人物 59, 200, 248 - 250, 264, 266, 288, 298, 303, 310
- 历史认识论(史学认识论) 14, 54, 60, 238, 275, 311
- 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论) 37, 43, 58, 66, 67, 72, 73, 78, 80, 92, 132, 142, 169, 171, 299, 346, 353
- 历史现象 51, 59, 73, 77, 106, 174, 182, 187, 204, 230, 241, 252, 264, 288
- 历史研究 10, 19, 25, 28, 29, 39, 43, 52 - 54, 59, 61, 63, 72, 92, 93, 95, 102, 103, 105 - 108, 125, 142, 146, 176, 186, 197, 199, 230, 232, 233, 237, 240, 259, 261 - 264, 298, 303 - 307, 311, 332, 333, 335, 340, 345, 346, 351
- 历史哲学 11 - 14, 23 - 26, 49 - 52, 54, 58, 62 - 64, 72, 93, 212, 216, 232, 237, 240, 241, 243, 244, 246, 247, 249, 255, 257, 258, 306, 331, 339, 345, 346, 352, 354, 355
- 历史知识 108, 188, 192, 193, 238, 263 - 265, 267, 268, 271, 272, 280, 281, 288, 298 - 300, 311, 312, 375
- 历史主义(非历史主义) 75, 93, 101, 207, 208, 256, 286, 378
- 梁启超(梁任公) 6 - 20, 24, 25, 27 - 29, 33, 64, 87, 184, 192, 193, 195, 253, 254, 260, 291, 315, 317, 319, 324 - 329, 331, 333, 344, 359, 363, 374
- 列宁 111, 132, 169, 171, 247, 277, 296, 320, 322, 326, 357, 358, 369
- 列宁主义 37, 331
- 吕振羽 89, 103, 118, 123 - 131, 133, 150 - 159, 162, 167 - 170, 194 - 197, 209, 212, 213, 218, 230, 232, 246, 252, 295, 297,

- 299, 310, 312, 340 - 342, 344, 345, 348, 349, 356, 363, 364, 369, 373, 375 - 377, 379, 381, 382, 386, 387
- 罗马 80, 99, 101, 110, 114, 119, 120, 124, 130, 157, 159, 162, 172, 181, 216, 222, 233, 244, 295, 334, 345, 348
- 罗素 23, 24, 324, 371
- M**
- 马克思 1, 24, 27, 33 - 42, 45 - 48, 51, 52, 54, 55, 57, 58, 71, 73, 74, 79, 80, 83, 86, 87, 93, 100, 102, 108 - 116, 118 - 122, 124, 129, 131, 132, 136 - 138, 142 - 150, 155, 156, 158, 166, 168, 169, 171, 176, 180, 195, 197, 200, 207, 209, 218 - 220, 224, 227 - 229, 234, 236, 255, 268 - 270, 277, 296, 306, 308 - 310, 312 - 318, 321 - 328, 330, 333, 337, 338, 341, 357, 358, 369, 371, 381, 382
- 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 36, 41, 111, 283, 285, 287, 361, 380
- 马克思主义 30, 32 - 34, 36 - 39, 41 - 45, 47 - 51, 53, 54, 59, 65, 66, 68, 69, 71 - 75, 78 - 80, 86 - 89, 92 - 98, 101 - 103, 106, 108, 109, 111, 112, 114 - 118, 124, 126, 129, 130, 132, 133, 140 - 149, 151, 152, 154 - 156, 158, 164, 168, 170, 171, 180 - 186, 191, 194 - 200, 202, 208, 211, 213, 214, 218, 219, 226 - 235, 237, 239 - 241, 243, 245, 246, 250 - 255, 258, 262, 268 - 270, 272, 276, 278, 279, 282, 286 - 288, 290 - 292, 295 - 297, 299, 303 - 314, 317, 321 - 325, 328 - 330, 336, 340, 345, 347, 348, 357, 359, 360, 365 - 367, 369 - 387
- 马克思主义史学 1, 27, 30 - 32, 43, 44, 66, 71, 78, 79, 89, 92 - 95, 129, 130, 141, 145, 147, 185, 218, 227, 232, 236, 253, 258, 303, 305 - 308, 310, 311, 313, 314, 342
-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49, 71, 93, 95, 100, 102, 103, 112, 134, 148, 184, 240, 298, 306, 307, 309, 311
-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54, 71, 86, 89, 100, 229, 231, 250, 379, 382, 385
-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53, 54
- 毛泽东 36, 79, 171, 196, 198, 265 - 292, 297 - 303, 310, 311, 320, 322, 331, 346 - 349, 352, 357 - 359, 366 - 368, 372, 376, 378, 382, 383
- 民族 6, 13, 18, 19, 21, 30, 31, 57, 61, 65, 67, 68, 77, 81, 82, 85, 86, 94, 99, 103, 106,

120, 123, 125, 135, 149, 170,
175 - 179, 181, 182, 184, 185,
187, 193, 195, 196, 200, 202,
204 - 206, 211 - 213, 216, 229,
232, 239, 241, 242, 244 - 248,
256, 258, 264, 266, 268, 270,
277, 278, 285, 286, 290, 295,
300, 307, 309, 310, 316, 331,
332, 340 - 343, 346 - 349, 356,
376 - 379

民族革命 66 - 68, 78, 85, 248,
330, 346

民族精神 18, 196

民族危亡(民族危机) 2, 18,
22, 32

民族意识 177, 178, 248, 342

民族战争 205, 206

铭文 98, 103, 104, 157, 163, 337

摩尔根 80, 81, 98, 111, 114,
147, 150, 312, 336

母系 67, 85, 114, 341

N

农民 66, 68, 78, 101, 113, 117,
129, 141, 142, 162, 167, 169,
188, 191, 196, 202 - 204, 207,
214, 215, 252, 253, 265, 269 - 271,
276, 291 - 296, 331, 348, 351

农民起义 191, 196, 202 - 204,
215, 253, 270, 278, 294, 296

农民战争 196, 202, 203, 270, 278,
288, 293, 294, 296, 340, 342

奴隶制(奴隶制度、奴隶社会) 81 -

83, 90, 96, 101, 110, 111 -
115, 117 - 124, 127 - 134, 136,
137, 140, 143, 149 - 160, 162,
164 - 167, 169, 170, 172, 195,
200, 209, 216, 222, 224, 226,
232, 244, 253, 273, 292, 295,
301, 312, 334, 337, 338, 340,
342, 344, 349, 354, 355, 360,
372, 381

O

偶然(偶然性) 48, 76, 129,
131, 143, 174 - 176, 204, 211,
248, 249, 251, 252

P

普列汉诺夫 37, 72, 73, 114, 115,
117, 131, 273, 356, 357

Q

启蒙运动(启蒙思想) 6, 22, 51,
230, 280, 345, 354, 359,
361, 375

前资本主义 117, 118, 134, 135,
138, 140, 141, 143, 219, 273, 341

钱穆 27, 183 - 189, 342, 344,
347, 365

青铜器 129, 152, 153, 157, 337, 339

R

人类社会 4, 35, 45, 57, 59, 61,
66, 69, 75, 76, 79 - 83, 90,
94, 99, 100, 108, 111, 114,

- 117, 119, 120, 131, 133, 136, 137, 143, 147, 169, 173, 182, 199, 220, 229, 232, 239 - 243, 273 - 275, 305, 307, 309, 322
- 认识论 16, 52, 75, 272, 285, 357, 371
- S
- 商业资本 135 - 137, 139 - 141, 172
- 商业资本主义 96, 118, 134 - 144
- 上层建筑 39, 45, 73, 81, 85, 87, 88, 90, 91, 101, 147, 157, 194, 215, 226, 241, 308, 310
- 少数民族 178, 181, 195, 212, 346
- 社会发展规律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89, 92, 264
- 社会革命 38, 46, 85, 90, 91, 271, 317, 322, 324, 328, 329, 346
- 社会功能 13, 18, 64, 107
- 社会关系 91, 101, 104, 125, 138, 189, 195, 253
- 社会结构 81, 96, 99, 114, 128, 137, 165 - 167, 194, 270, 305, 313, 374
- 社会进化 21, 53, 79 - 82, 85, 87, 89, 90, 93, 94, 123, 132, 270, 306, 329
- 社会科学 3, 10, 11, 23, 25, 40, 45, 72 - 74, 78, 93, 126, 131, 231, 237, 306, 327, 328, 335, 336, 339, 356, 358 - 363, 366 - 368, 370 - 379, 381, 384 - 386
- 社会生活 18, 55, 56, 58, 61, 65 - 67, 69, 75, 76, 89, 97, 185, 226, 277, 293, 334
- 社会史论战 96, 97, 100, 102, 111, 112, 118, 119, 124, 126, 127, 129, 130, 133, 141, 145 - 147, 149, 151, 154 - 156, 161, 162, 164, 170, 195, 199, 218, 227, 231 - 233, 243, 273, 295, 307, 308, 312, 313, 341, 371, 374, 376, 379, 380, 382, 383, 386
- 社会形态 101, 107, 109, 112, 115, 119, 121, 129, 132, 135 - 137, 139, 155 - 158, 160, 164, 166, 194, 195, 200, 203, 209, 219, 221, 252, 296, 297, 310, 313
- 社会性质 84, 96, 110, 136, 137, 142, 151, 152, 155, 156, 159, 163, 164, 166, 168, 297, 298, 307, 334, 338, 342 - 344
- 社会学 3 - 5, 19, 33, 39, 42, 47, 49, 51, 63, 72 - 74, 76, 86 - 89, 93, 95, 106, 107, 124, 126, 179, 231, 232, 306, 330, 341, 355, 377
- 社会制度 40, 73, 87, 89, 101, 125, 126
- 社会主义 30, 32 - 36, 39 - 42, 45, 51, 68, 72, 78, 79, 83, 87, 90, 91, 95, 99, 100, 136, 143, 172, 196, 268, 269, 273, 284, 305, 307, 314 - 318, 321 - 326, 376
- 生产斗争 207, 234, 250, 251, 277
- 生产方式 30, 81, 108, 109, 113,

- 114, 117, 118, 121, 136 - 138, 140, 147, 175, 200, 203, 219 - 223, 226, 296, 308, 311, 341,
- 生产工具 101, 127, 130, 138, 165, 166, 195, 200
- 生产关系 39, 45, 57, 81, 85, 87 - 91, 94, 101, 108, 113, 131, 157, 194, 201, 211, 215, 219, 241, 270, 275, 294, 296, 310, 311
- 生产力 38, 39, 45, 46, 48, 77, 80, 81, 83, 85, 87 - 91, 94, 101, 108, 125, 127, 147, 164, 194, 200, 201, 210, 211, 219, 241, 252, 270, 294, 296, 307, 308, 310, 311
- 生产资料 157, 159, 219 - 222, 270
- 剩余价值 34, 40, 87, 137
- 十月革命 33, 36, 37, 86, 300, 320 - 322, 324
- 实验主义 24, 29, 73, 124, 171 - 176, 322, 349
- 实用主义 24, 27, 29, 171, 322
- 实证主义 3, 6, 23, 24, 61, 350
- 《史记》 9, 154, 191, 192, 233, 256 - 258
- 史界革命(史学革命) 7, 8, 10, 11, 15, 18, 22, 28, 71, 184, 254, 315
- 史料 27 - 29, 31, 61, 64, 80, 94, 102, 103, 105, 106, 108, 115, 133, 141, 147, 148, 155, 161, 164, 176, 185 - 187, 191, 199, 227, 228, 232, 235, 236, 256, 258 - 263, 279, 309, 312, 336, 337, 343, 347, 351, 352, 362, 377
- 史前社会 66, 125, 209, 211
- 史学的功用 64, 149, 310
- 史学方法论(史学方法) 11, 25, 29, 124, 262, 344, 352, 366
- 史学观念 9, 28, 49, 97, 102, 107, 363, 376
- 史学家(历史学家) 5, 25, 47, 49, 51, 54, 56, 57, 59 - 61, 63, 64, 143, 146, 218, 234 - 237, 239, 240, 241, 246, 255, 257, 258, 272, 299, 308, 347, 382
- 史学理论(历史学理论) 3, 6, 7, 11, 25, 28, 30, 54, 71, 73, 80, 92, 93, 306, 359, 360, 362 - 364, 366, 368, 371, 374 - 376, 378, 380, 385 - 387
- 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 2, 5, 12 - 14, 16, 19, 25, 49, 52, 54, 60, 61, 63, 64, 95, 106, 108, 181, 232, 305, 307, 324, 332, 333, 339, 341, 343, 344, 346, 355, 356, 365, 367 - 369, 379, 381, 382, 386
- 《史学要论》 25, 30, 44 - 46, 54, 59, 71, 93, 126, 306, 329, 362
- 氏族(氏族制度) 61, 67, 82, 83, 88, 100, 113 - 115, 120, 122, 123, 125, 128, 136, 151, 152, 155 - 157, 170, 220 - 226, 232, 341
- 氏族贵族 157, 172, 220 - 223, 225

- 氏族社会 82, 112, 114, 117-123, 139, 150-152, 156, 161, 168, 170, 209, 210, 215, 242, 295, 301, 312, 341
- 世界战争 182
- 庶人 122, 137, 158-160, 163, 166
- 司马迁 9, 26, 191, 233, 255-258
- 私有制 (私有财产) 35, 80, 81, 82, 85, 90, 99, 108, 111, 115, 117, 122, 123, 151, 155, 161, 172, 220, 222, 224
- 斯大林 136, 142, 177, 179, 200, 211, 247, 250, 251, 277, 296, 297, 311, 331, 346, 357, 358, 369
- 孙中山 34, 66, 67, 78, 248, 286
- T**
- 太平天国 67, 68, 188, 191, 271, 276, 289, 294, 328, 333, 338, 342-344, 350, 352, 356
- 陶希圣 27, 100, 121-123, 132-138, 141, 144, 145, 156, 237, 243, 332-334, 337-339, 341, 342, 344, 345, 350, 351, 365, 378, 382
- 土地制度 90, 127, 128, 154, 157, 159-161, 164, 338, 339, 363
- 托派 96, 125, 131, 134, 142
- W**
- 王国维 5, 9, 27-29, 31, 98, 103, 125, 152, 319, 320, 327, 328, 330, 331, 350, 385
- 唯物史观 30-32, 34, 36-55, 57, 58, 65, 66, 68, 69, 71-73, 78-80, 85-89, 91-95, 100, 103, 124, 126, 127, 133, 136, 142, 146, 147, 149, 156, 194, 197, 211, 230-232, 235, 236, 241, 242, 254, 262, 269, 274, 281, 299, 303-313, 315, 322-327, 331, 334, 345, 361, 362, 364, 367, 368, 371, 373-376, 378-382, 384, 385
- 维新思潮 (维新思想、维新变法) 8, 11, 385
- 伟人 50, 58, 77, 94, 251, 255
- 文明史 6, 7, 20, 27, 277, 295, 316
- 无产阶级 36, 40, 71-73, 78, 79, 83, 84, 90-92, 95, 203, 269-271, 284, 290, 294, 296, 306, 307, 321, 324, 325, 330
- 吴晗 278, 279, 299, 341, 351, 355, 356
- 五四运动 (五四、五四时期) 25, 27, 28, 30, 36, 39, 42, 67, 78, 84, 92, 266, 276, 321, 322, 359, 361, 364, 368, 375, 379, 381, 382, 385, 387
- X**
- 西方史学理论 1, 3, 5, 25
- 西周 21, 100, 101, 103, 104, 110, 112, 123, 128, 129, 131, 135, 151, 156-160, 162-165, 168, 200, 201, 209, 212, 216,

- 223 - 225, 231, 334, 342, 352
 西周封建说 129, 158, 160, 295
 现代史学 22, 23, 39, 44, 50 - 52, 54, 64, 125, 339, 349, 365, 367
 辛亥革命 22, 24, 86, 194, 289, 301, 318, 329, 340
 《新青年》 23, 37 - 41, 43, 44, 72, 79, 87, 268, 320 - 326, 328, 330
 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新石器遗址) 153, 209, 215
 《新史学》 7, 10 - 12, 15, 16, 19, 25, 315, 316, 329, 370
 新史学 1, 3, 5, 7, 9 - 12, 14 - 20, 22, 23, 25 - 27, 45, 64, 183, 195, 234, 238, 254, 258, 305, 316, 336, 367, 368, 374, 383, 386
 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 23, 36, 42, 44, 102, 171, 183, 265, 286, 305, 320, 327
 新中国 206, 273, 275, 288, 317, 354 - 356, 367, 371
- 224, 226 - 229, 308, 312, 334, 338, 339, 341, 342, 344, 349, 354, 355, 380, 381
 意识形态 90, 96, 100, 111 - 113, 134, 142 - 144, 166 - 168, 171, 182, 198, 226, 229, 236, 237, 257, 308, 371
 因果律 24, 76, 77, 94, 173, 307
 殷商 101, 114, 127, 129, 130, 133, 151 - 156, 159, 170, 181, 200, 214, 320, 354, 355, 383
 殷商社会 127, 129, 150 - 153, 155, 156, 252, 312
 殷商时代 127, 130, 150, 156, 168, 209, 312
 殷墟 31, 127, 152, 153, 319, 336, 337, 355
 英雄史观 94, 181, 182, 267, 268, 307
 原始社会 67, 80, 82, 85, 101, 112, 114, 117, 120, 124, 125, 127, 131, 133, 196, 209 - 211, 232, 270, 273, 288, 292, 342, 350

Y

- 鸦片战争 1 - 3, 27, 67, 70, 84, 135, 195, 198, 200, 239, 283, 292, 305, 307, 318, 340, 341, 345, 352, 361
 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亚细亚社会) 96, 100, 108 - 120, 122, 126, 131, 139, 143, 144, 146, 149, 150, 159, 169, 219 - 221,

Z

- 战国策派 27, 179, 183, 347
 战国时代 135, 167, 180, 182, 222, 223
 哲学家 3, 16, 50, 63, 86, 113, 272
 政治制度 77, 81, 180, 183, 292, 294, 296, 349, 350, 358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殖民

- 地) 85, 294, 297
- 中共党史 83, 84, 92, 283, 284, 288, 306, 367, 370, 372, 379, 384, 385
- 中国传统史学 3, 9, 11, 13, 16, 64, 193, 238, 239, 254, 258, 264, 305, 355, 382
- 中国革命 68, 78, 79, 83, 85, 86, 89, 92, 93, 136, 142, 270, 287, 288, 291, 306, 319, 328, 330, 331, 334, 335, 346, 374
- 中国共产党 44, 68, 71, 78, 79, 83, 84, 86, 92, 96, 97, 131, 136, 142, 149, 151, 154, 196, 203, 283, 286 - 288, 290, 291, 305, 309 - 311, 323, 324, 326, 346, 386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97, 98, 102, 103, 128, 129, 147, 152, 157, 162 - 164, 166, 307, 333, 334, 360
- 中国古代思想史 221, 224 - 226, 310
- 中国近代革命 84 - 86, 92, 306, 356
- 中国近代史学 1, 14, 27, 239, 359, 361, 364, 367
- 中国历史 16, 20, 21, 25, 28, 44, 65, 66, 78, 79, 96, 98, 100, 108, 112, 116 - 119, 121, 124, 126, 130, 132, 133, 135, 142, 143, 145 - 147, 149, 152, 159, 167 - 170, 172, 178, 180 - 183, 187 - 191, 194 - 201, 204 - 213, 215, 216, 218, 221 - 224, 227 - 229, 231, 232, 235, 238, 243, 244, 248, 252, 253, 255, 260, 261, 264, 265, 269 - 272, 275, 280 - 282, 288, 289, 291, 292, 294, 296 - 298, 300, 302, 307 - 311, 313, 316, 317, 319, 326, 331, 338, 340, 345, 348 - 350, 353 - 356, 383
- 中国历史观 171, 349
- 《中国历史研究法》 25, 28, 327, 349, 363
-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32, 43, 44, 53, 71, 72, 92, 93, 100, 107, 219, 306
-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1, 93, 96, 97, 102, 107, 108, 116, 145, 147, 149 - 151, 194, 218, 231, 251, 306 - 308, 310, 311
- 《中国史纲》 153, 208 - 210, 212 - 218, 310, 328, 348, 350, 351, 353, 354, 362
- 中国通史 11, 19 - 21, 191 - 195, 197, 198, 208, 214, 310, 317, 337, 371, 372, 386
- 《中国通史》(《中国通史讲义》、《中国通史简编》、《简明中国通史》) 15, 194 - 202, 204 - 209, 218, 281, 310, 340, 346, 348, 349, 356
- 中华民族 149, 170, 176 - 179, 195, 197, 199, 229, 286, 295, 297, 299, 300, 309, 333, 345, 373
- 主体 6, 12, 13, 17, 22, 58, 59, 95, 154, 163, 307

- 《资本论》 34, 35, 37, 42, 46, 158, 218, 219, 316, 338, 345, 357
- 资本主义 32, 40, 45, 48, 49, 71, 78, 81, 83, 85 - 87, 90, 91, 100, 111, 112, 114, 117, 119, 122, 123, 130, 135 - 139, 171, 219, 232, 273, 284, 285, 289, 290, 293 - 295, 326, 334, 335, 338, 341
- 资产阶级 27, 32 - 34, 51, 78, 82, 84 - 86, 88, 90, 91, 94, 108, 109, 139, 142, 171, 233, 234, 270, 278, 285, 290, 291, 295, 300, 302, 307, 317, 328, 347
- 自然环境 121, 131, 220, 228
- 自然科学 4, 23, 43, 52, 94, 126, 324, 327
- 宗教 7, 18, 20, 46, 48 - 50, 56, 68, 69, 72, 75, 87, 101, 127, 156, 157, 179, 204, 217, 220, 223, 226
- 宗教观(宗教观念) 225
- 宗教学(宗教学术) 14, 19, 63, 126, 349

后 记

本书是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第3卷，本卷的作者是彭卫和杨艳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课题立项、课题进行各阶段的检查，以及课题结项时，都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世界史所科研处的马渝燕、陆晓芳等同志还承担了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保证了本课题的顺利完成，在本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先生、副总编辑郭沂纹女士，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鼓励和具体指导。他们热情关注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有力地提高了本书的学术质量，给编写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约编辑丁玉灵，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的刘志兵、安芳、张湑、郑彤、耿晓明、刘芳等同志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们的敬业精神，是保证本书顺利出版的基本条件。他们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而且也在体例的准确性、规范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加班加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本书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得以避免。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诸位编辑朋友表示真诚的敬意和谢意。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在本质上都是阶段性的成果，而不可能是穷极真理、达到真理顶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就更是如此。迄今为止，这是国内，也是国外第一部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的专著，但限于时间和研究条件，特别是课题承担者的理论素养和学识有限，毋庸讳言，这项成果不尽如人意之处在

所难免。诚挚地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将认真汲取、改正，努力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这一时代的课题方面，做出更多更有益的贡献。

编者

2015年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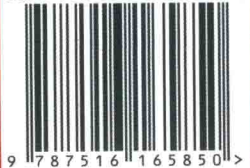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161-6585-0



9 787516 165850 >

定价:138.00元